

房山贾岛墓与贾公祠考

杨亦武

贾岛是我国唐代著名诗人，他牢落不偶、磋砣一世，然而傲骨峻增不谐于俗，在中唐时极意苦吟，自成一派，因而闻名于世，至今为后代人所推崇。但是知道房山贾岛墓的人并不多。至于曾建在墓侧的贾公祠，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房山贾岛墓在房山城南十五华里左右的二站村，现在作为房山区重点文物暂保单位。一般的说法，贾岛墓有三处，一处安徽当涂，一处四川安岳，一处河北涿县(即唐范阳)。所谓河北涿县的贾岛墓实际上在房山。

贾岛墓为什么在房山呢？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房山实为贾岛故里的所在。清房山知县罗在公在《创建贾公祠记》中说：“公房人也，房山如公者不多。”明房山的《修乡贤名室祠碑》中写到：“若浪仙之诗名家彦敬之，博学有文弥张之，德行政事俱见诸记载昭焯如生……”《房山县志》称：“县西北十数里有贾岛峪。”明《一统志》载道：内(指贾岛峪内)有石室，世传为贾岛所居，明末清初的人写的《贾岛墓记略》中也载道：“今房山有石庵曰贾岛庵(故房山八景之一)，西南(西北之误)之十里有贾岛村，一曰贾岛峪，盖诗人邱里名岛多为身后名岛为久。”《房山县志》还载到：“房山城南外有贾岛故里碑碣，今已无存。”据说贾岛早年曾在云盖寺为僧。云盖寺的遗址，就在房山城南稍偏西的次洛村(旧称次乐村)贾岛生前有《过木岩寺日暮》一诗，木岩寺遗址在房山城西南，距房山城数里的周口店西。

《唐书》上说：贾岛是范阳人，范阳该是今河北省涿州市。说贾岛故里在房山，似乎和史书不符。其实并非如此。《旧唐书地理志》在谈到范阳时是这样记载的：“范阳，汉涿郡涿县也。武德七年，改为范阳县，大历四年复县置涿州。”《元史地理志》记载道：“涿洲，唐范阳县，复改涿洲。”可见今河北涿洲在唐时称范阳，又称涿洲。唐人刘济在他的《小西天石经堂记》中说“……涿洲有涿鹿山石经堂者”。其中提到的涿鹿山就是闻名中外的今房山石经山。由此可知，房山一带，在唐时隶属于涿洲或范阳。换言之，唐时的范阳或涿洲包括今房山一带。因此说贾岛的故里在房山，贾岛墓在房山是情理之内的。言贾岛墓在河北涿洲该是一种误说。

在二站贾岛墓地上，现有两块碑碣，一块是创建贾公祠两年后即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为贾岛祀地一事勒的，一块是重建贾公祠一年后，即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为重建贾公祠勒的。前者距今二百八十余年，后者距今一百六十余年。前后两碑相距一百一十八年。至于二站贾岛墓较早的墓碑在清代就下落不明了。

据明人的《帝京景物略》记载：明弘治年间(即公元1488—公元1505)御史卢某寻访贾岛墓。找到了一块断碑，于是重新修葺贾岛墓，把断碑复之于墓地上。当时二站村还没有今二站贾岛墓地。那时属石楼地面。所以《帝京景物略》中称“得断碑于石楼村”。明李东阳的一首七律中也曾提到这件事“地无椒浆供庙祀，有人骢马问村名。”后来到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大学士李东阳又重新为贾岛残墓勒了一块墓碑。碑额是四个篆书大字“唐贾岛墓”，碑面是整理的断碑旧记和重新撰写的碑记，其中还有他为贾岛墓题的一首七律。墓碑勒毕，由当时的房山县知县曹俊经手立到贾岛墓上。从此贾岛墓为之一新。

房山贾岛墓建自何年？史料没有确实的记载。明弘治年间发现的断碑和李东阳的墓碑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遗憾的是，前者早已遗失，后者虽然还在但是由于二十余年来被二站村民们作为井边的垫脚石，

字迹消磨，也无从凭考了，不过假如我们回顾一下唐以后的历史，还是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答案。

唐以后是五代。这一时期，在短短的五十三年间更换了五个朝代。而且还有其它十个封建政权同五代并存。五代人在这种朝代频繁更替，及封建割据的情况下，建造贾岛墓是不太可能的。继而是宋，五代人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北方外族，至使宋一建立就坠入了与辽的战斗中，房山一代正处在双方争战的战场。此时，在这刀光剑影下的土地上，谁会去顾及一个相隔数代的诗人。辽亡后，金又取而代之。不久金便以两路大军南征，直抵宋都城汴京，从此宋被迫开始了和金的长期战争。金以其强大攻势向南扩展，包括房山一代的河北广大地区处于金人的控制之下。在这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金人会在自己控制的地区为一个汉民族古代诗人建墓是不可想象的。至于宋人，正值国土沦丧，虽欲建而不可得。继而是元代。（查史书），元统治中国只有八九十年的历史，一般地说，贾岛墓如果建在后代，最可能建在某个朝代的鼎盛之时，至于元代，除去它确立巩固政权的前期及走向崩溃的后期，其和平稳定的中叶实在太短暂了。那么元代建立贾岛墓的可能性也不大。元代之后就是明代，贾岛墓是不是在明代建的呢？我们知道房山贾岛墓是在明弘治年间寻查到的。当时已是墓没碑残。从明建立到明弘治年间的一百多年里，明正处在日益兴盛的时代。贾岛墓如果建立在明代，目下就不会如此凄惨。

从上述分析中可见，从五代到明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没有可能建贾岛墓。那么房山贾岛墓该是建在唐代贾岛死后一段时间。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推测，我们从古代文献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根据。唐代诗人姚合，在他的《过贾岛故里》一诗中有“新坟松三尺，空阶月二更”的诗句。从诗的题目和“新坟”中可知，这是姚合在贾岛死后不久，在贾岛故里写的。而且当时贾岛墓已经在他的故里建成。上文我们讲过据载贾岛故里在房山一带，那么诗中的新坟应该指房山贾岛墓吧。姚合是贾岛的好友。贾岛在世时，两人常杯酒相邀，诗歌唱和可谓情深意笃，贾岛死后不久，姚合过其故里以酒相吊是很自然的。此外据《长安客话》记载“岛卒于易，归葬房山。”可见房山贾岛墓该是建在唐代贾岛死后不久。

对于归葬说，有人持否定态度。在《旅游》杂志刊登的，《贾岛墓》一文中，就否定了归葬说，同意贾岛葬在四川安岳的说法，主要理由如下：贾岛家境寒苦，官职低微，死后迢迢千里归葬原籍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这个观点理由不太充分，从古代的史料和一些古典文学作品中可知，归葬是古人的一种习俗，和家境与身份关系不大。有些人无论家境还是身份都不如贾岛仍能得以归葬故里。对这一习俗，古人非常重视。有些人为了使亲人得以归葬，不惜千辛万苦。况且贾岛也并非一贫如洗，位同匹夫，他毕竟还是个普州司户。说他贫困潦倒，只是和一时的达官显贵相比，再说他是个诗名誉世的人。赫赫的京兆尹韩愈竟然屈身和他交游，当朝皇帝唐宣宗微行与他相遇，言称久闻诗名。这样一个朝野闻名的人，死后被归葬到故里，怎么没有可能呢？可惜的是事隔数载，我们很难找到比较直接切实的证据。这里我们要提到明弘治年间御史卢某发现的断碑，假如今天还在对贾公归葬故里说的理由也许要更充分一些。不过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房山贾岛墓是在贾岛死后不久落成的。或是有人扶柩归葬，或是他死后，其故里人为了悼念他，凭空而建的也未可知。

诗人生前蹉跎一世，死后又倍受冷漠。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房山贾岛墓绝少问津者。到明中叶卢李二人葺墓植碑前，已是碑缺坟残，目不忍睹。难怪清人孙锦在《重修贾公祠碑记中》叹道：“何以历数百年，始现于西崖相国（即李东阳）之碑乎！”

明末清初，贾岛墓又曾一度荒芜，泯然于世。清康熙年间的房山知县罗在公，在他的《创建贾公祠记》中，提到了他在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偶遇贾岛墓的情景，“康熙丙子仲冬，余以公事至琉璃河归，维时水涸草枯，马蹄轻快。由旷野取捷，至二站村南，见残碑高三尺余，篆额为‘唐贾岛墓’云……观其地，广不盈丈，其塚，高不过尺，践踏已甚也。”这期间，明对内对外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无疑贾岛墓经历过兵马的践踏。而后一朝即灭，一朝方立，穷乡古丘，谁人相顾，贾岛墓的再度荒芜是自然的。

罗在公在位任房山之初，曾向人打听贾岛墓的所在。众人竟然不知，于是他驱车查访，结果徒劳而归，

后来竟无意遇到了。找到了贾岛墓的下落后，罗在公喜出望外，开始筹建贾公祠。两年后，即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贾公祠在贾岛墓南侧落成。知县罗在公在为贾公祠的落成亲自撰写了《创建贾公祠记》。勒碑祠中(碑已断失，记见《房山县志》)。

在《创建贾公祠记》中记述了创建贾公祠的概况：当时是在贾岛墓前建了三间祠堂。用来供奉贾岛遗像，因为贾岛早年当过和尚又在祠堂前建了三间佛殿。考虑到贾公祠建成后如果没人主持，久后是必荒芜，于是又在祠堂东西两侧各盖三间禅房招募僧人居住。贾公祠落成之日，知县罗在公欣然带领乡里人士前往拜谒。众人赞叹道：“美哉，彬彬乎！敝邑之文运自此兴矣。”从众人的赞语中可见贾岛祠气宇非凡。

创建贾公祠时，还有这样一段趣闻。清顺治初年，户部圈地时顾念贾岛是房山一带的乡贤，留了五十五亩祀地，可是后来一向被一个叫修实的和尚窃为己有。这次在创建贾公祠时被清查出来。于是，房山县衙门向洲府呈请，把祀地收归贾公祠所有。呈请一直递到户部，户部查核属实，批准了县衙门的请求。并称：“僧非善类也，日后恐起争端。”又言称：“至僧人修实既属无行，应飭县驱逐”，并缴令房山县为五十五亩祀地，择选有德耆老，责成典守。每年的地租，除备办祭祀之外，剩余的留作修祠之费。事在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即创建贾公祠两年后，同年，知县罗在公为此事勒碑于贾公祠。碑碣尚存，即今贾岛墓南。

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贾公祠又经修葺一次。从康熙三十七年到嘉庆二十二年以前，由于一百余年雪雨风霜的侵蚀，贾公祠已大失旧观。清嘉庆年间良乡县拣选知县孙锦在他的《重修贾公祠碑记》中曾记载了他在嘉庆二十一年秋，拜尚贾公祠时的情景：“进则三教殿，入后屋三楹，先生(贾岛)之遗像在焉。满壁琳琅题咏甚众，惟是栋宇倾圮，不足以肃观瞻。”来年春天，即嘉庆二十二年春，祠内住持道人，贾元明、孙元玉等积极到各处募捐筹款。鸠工庀材，重修贾公祠。几个月以后，贾公祠便修葺完毕。一年后住持道人贾元明等委托良乡县拣选知县孙锦写的《重修贾公祠碑记》连同为重修贾公祠捐资的人事与金额一起勒碑祠中。这次虽然只进行局部的修整，但贾公祠的面貌焕然一新。

当时为重修贾公祠，人们纷纷踊跃捐资。捐资范围：有京都的，如大庆局、金山店等。有四乡八镇的，如二站村(祠所在地)、杨胡屯村(今杨户屯与杨胡屯，在祠南八里许)、杨附马庄(即今北庄，祠西四里许)等。捐资人员：有地方军政官员，如护军参领兼口长苏兴阿施钱一千文；有乡绅富豪如二站贾进成施钱拾千文，杨胡屯杨福全施钱二千，涑水镇石亭村崔成施钱二千。有一般工商业者，如聚盛厂施文银四千文，德昌号施钱二千，元古当施钱二千五。还有一些工匠艺人，如瓦作宋喜施钱一千，木作于顺施钱一千，画作宋杰施钱一千，石作胡斌施钱一千。一些少数民族的人也施钱相助，如蒙古人富宁阿代化施钱三千文。

房山二站贾公祠在解放初期还在，所以二站村的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对它记忆犹新，据他们讲，贾公祠在贾岛墓的南侧，坐北朝南，轩昂的殿宇被四周高大的院墙包容着。祠的正南，一个朱红大门把你引进院内，眼前便是一间小殿，径直进小殿出后门，再入一个院落，迎面是三间佛殿，再进佛殿出后门，进入最后一个院落，便是贾岛的祠堂了。祠堂也是三间大小，贾岛的泥塑遗像南后端居于祠堂中央，遗像背后的墙壁上，墨迹连绵，满是拜谒者题咏的诗句，从有关材料看，贾公祠在清代颇负盛名。自康熙年间创建以来，一些社会名流，文人墨客，来谒者往往不绝，瞻仰之余或题咏于壁或勒诗于石。一时间堪称京畿名胜。祠堂的两侧有东西禅房六间，那是僧侣居住的所在。贾公祠的背后，就是贾岛墓了，在墓前祠后，还有一个飞檐翘瓦，小巧玲珑的亭子。亭下立着一块三尺多高的圆顶墓碑，碑额是四个俊秀的篆书大字“唐贾岛墓”，碑面的文中有一首七言律诗，诗云：

百尺桑乾绕帝京，浪仙曾此寄浮生。
葬来诗骨青山瘦，望尽荒原百草平。
地无椒浆供庙祀，有人驄马问村名。
穹碑四尺标题在，诗赋风流万古情。

这即是明朝大学士李东阳，为贾岛墓重勒的墓碑，墓上的文字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这块墓碑，本来立在贾岛的丘塚上，贾公祠建成后，人们便在后边建了一个亭子，把墓碑移到亭下。在贾公祠的东侧，还有一个跨院，院南设一个柴门供人出入，进了跨院一条北去的小径把院子分为东西两侧，西边是一个菜园，是供僧侣们吃菜用的，东边是一个谷场，农闲时空着，农忙时村民们用此打轧。场的北端备有碾磨，也是为方便村民们设的。大约对着碾磨的位置小径便向西转去，穿过一个朗月圆门进入贾公祠后院，院内三间正殿便是贾岛的祠堂。从这条路线也可以出入贾公祠。

那时，出入贾公祠的除社会上层及一些封建文人外，还有一些普通老百姓。他们没有文化，固然对贾岛其人不甚了解，也没有那么多闲情逸志。然而，贾岛是他们神化了的偶像。为进香祈祷，他们也常来贾公祠。况且祠内的道士，往往会治些病，例如：据说民国初年祠内有个姓马的老道，人称马老道的就能治些浓肿疮，他们又乐于方便百姓，所以，当地出入贾公祠的人就更多了。但是贾公祠的正门是不常开的，百姓们只能从跨院出入。只有当有身份的人前来拜谒时，或重大传统节日才打开正门。清人有关贾公祠的题咏中有这样的诗句：“千载令名谁不念，岁时斗酒集村翁。”可以想见，每逢年关，贾公祠内的道士们开门候迎，四乡的绅士耆老陆续而至，而后他们举杯欢宴，纪念贾岛这个垂名千载的乡贤。另外，听当地的一些老人讲，早年二站村有吵子会，每年正月初一、十五，贾公祠便朱门大开，任凭欢乐的人们在祠内欢聚一堂。吵子会进祠后散灯花儿就开始了，会人献技，观者喝彩。还有那村童放的三三两两的爆竹声，真是热闹非凡。

然而，这一切都成了过去。1956年贾公祠被拆毁，用来盖了小学校和其他公共用房。1963年贾岛墓也被掘损。据说是想用墓穴的砖，结果挖出来一些石头，也没再挖下去。这固然有些侥幸，但珍贵的古迹终究遭得严重破坏。往日贾岛墓和贾公祠的所在而今夷为田野和麦场，所谓雕梁画栋者，曾不留断壁残垣。墓祠中有价值的碑碣文物大多也荡然无存，明弘治年间发现的原始断碑，固然早就佚失了。明朝李东阳立的墓碑虽然还在二站七队饲养室的废井边，但字迹泯然，名存实亡。康熙年间罗在公为创建贾公祠立的碑，至今下落不明，幸好碑文还记载在《房山县志》上。现在，唯有康熙三十九年知县罗在公为贾岛祀地一事立的碑，及嘉庆二十三年良乡县拣选知县孙锦为重修贾公神祠撰写的碑尚存，而今立在贾岛墓上的便是。至于清拜谒者的题咏除《房山县志》记载的一部分之外，更是无得而存之。前不久二站村翻盖小学校，竟意外地拆出了一首属名定甫德保的七律石刻，这便是前人题咏中仅存的实物了。

千载古迹，一朝名胜。如今竟落得如此境地，实在令人可悲。而今现存的三处贾岛墓中，四川安岳的最负盛名。然而，四川安岳贾岛墓，只有1954年建的一间祠堂，及几块明清文人的碑刻，至于建自清代的瘦诗亭在民国初年已圯。对比之下，四川安岳贾岛墓的规模及历史价值远不如房山贾岛墓与贾公祠，况且在房山贾岛墓与贾公祠周围，还有其他贾岛遗迹（见前文），这些都是年代久远久负盛名的。例如座落在大房山间的贾岛遗庵，早在明代以前就闻名于世，清康熙年间户部的公文曾有“该县（即房山县）旧有贾公庵三楹”云云（见康熙三十九年《罗在公遵奉勒石碑碑文》）。早年为房山旧八景之一。明清时的一些社会上流及封建知识分子前来拜谒，有的还留下题咏。这该是四川安岳贾岛墓所不可比拟的。由此看来，房山贾岛墓与贾公祠本来应该比四川安岳贾岛墓更负盛名。遗憾的是1956年、1963年房山贾公祠与贾岛墓先后被毁，至使今天泯然于世。目前房山贾岛墓与贾公祠已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房山区文化文物局已搜集两块遗碑，立在墓祠旧址上，把它列为区重点文物暂保单位。几经兴废的房山贾岛墓与贾公祠残局初整，恢复有日。

房山贾岛墓与贾公祠，有着悠久的历史，堪称古代名胜，它座落在驰名中外的大房山角下，与人们去上方山、石经山、十渡等处的所经之途相隔不远。有兴者不妨亲来一访，或在游览房山其它名胜之余，顺便来此一瞥。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上方山拾零

赵润东

孤山山口村

读者朋友，在您闲暇有兴去上方山观光游览的时候，定要路过孤山口。然而，您可了解过它的古今地理位置？可曾知道这里的故事和来历？

孤山口，在天开村西北。顺着天开水库大坝一直向里，沿北山盘山公路绕过两道湾，见村就到了。孤山口，要说它是孤山，其实并非如此；称它为孤口，那倒是自然。这里，群山环抱，河溪缭绕。果树林布满山坡，庄稼染得田园一片绿色。顺着弯弯曲曲好似飘带一样的盘山公路向里走，可以直通“二七八”医院，向外可以直达天开出口。过去，这里是个关口要塞。

据《房山县志·古迹》记载：“按大清一统志，孤山是涿、易三州分路处。宋雍熙三年李继宣战契丹于拒马河上，追至孤山口，契丹引去。”又据当地百姓们的传说，外口天开村东坡上有个“悬羊擂鼓台”，是当年窦尔墩的妹妹窦小姐占据的地方，向里到圣水峪青沟，又是唐刘武周拒守的隘口要道，推断出孤山口不但是古时涿易(涿州、易州)的分界处，而且还是一个值得注视的古战场。

说起孤山口，您一定要问还有什么古迹没有？有的。关于孤山口村名的来历，其村北二里许，现存石碑一通，上面有文记载。石碑正面刻：“元寂普济堂上开山第一代银公孤山口和尚之铭。”背面文记：“普济开山墓志。”根据碑文内容可知，所谓“孤山口”，是由孤山大师所创造。孤山大师，俗姓李氏，讳进寿生，于武清少侍内庭银作局管理公务，公务之余，留心内典，颇于佛法相应。于是，遍游南海诸大名山，历添知识。后来，披荆更名，隐居在此。结识静侣，以尽礼诵。看到“山路迢遥，行着艰辛”。于是，在这里创建普济堂，又称普济禅寺(即孤山口村中大寺名)接纳行者，便利来往路人。因此，“劳者得安，行者得息”。以后，大师又将此地命名为孤山，以铭其志。所以，当地人就根据孤山大师及这里的自然地势，称此地为孤山口，直至今日。

现在，孤山口远不是当年孤口要塞了。在它的北面，有从北京通往山西太原的穿山铁路；村前，是从周张公路引过来通向上方山的柏油公路。这里四通八达，引来了众多游客，开阔了当地人们的眼界，丰富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生活。人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正在尽情地享受着幸福生活。

中院村

房山区岳各庄乡境内的中院村，位于著名的上方山下。它群峰环抱，丛林疏密；圣泉之溪，萦回九曲。两岸峰峦倒映，每曲各有异境。大凡去上方山游览观光的客人，路过此处，只顾上方山之奇境，而忽视了这里的风光古迹。

其实，中院村与其它胜景一样，也有着幽雅风貌和值得考究的历史。就在上中院村北，现在座落石桥的地方，原来有一通历史久远的“里程碑”。上面镌刻着几个大字：“张骞通西域之路。”前几年，石碑不幸被村中住户砸毁了房基。

中院村，得名于中院寺。中院寺座落于上中院村北的平顶山上。顺着溪水缘源而上，从北面一看，那真

象山东的蓬莱仙阁。

据《房山县志·古迹》载：“在城西南四十里，魏必复开天中院碑记曰：“天开古名刹在房山之麓。规制终于汉，历晋隋迄五代，盛于辽废于金。至元十年应公禅师始来住持，次建栗园寺，次建皇后台东西两寺，次建涿州设济寺，规模庄严，拟于天开又建中院寺于南沙河按据上游创水碾三，以从众僧饷费。至元二十七年世祖闻而嘉之，特赐圣旨护持应公……”由此可见，中院村之中院寺，与上方山之兜率寺和天开寺，自然形成上方山三院。过去的僧侣香客经天开寺漫游，多聚于此。然后至接待庵，缘云梯而达兜率禅林。

有关中院村的景致，房山邑人刘玉衡曾作诗咏道：

疏疏密密树丛生，
转过山头一水横。
三两人家茅屋隐，
隔墙犬吠马蹄声。

现在，中院村已是几百户人家村庄，红砖瓦舍，果树成荫。公路可通东西南北，再也不是闭塞的山庄了。

七十二庵

上方山上，古木参天，风景秀丽，古迹传说，煞是迷人。九洞十二峰，洞洞奥秘，峰峰奇异，七十二茅庵，庵庵有水，有僧，别有一番景致。当地人都不称圣水峪，上方山的名子，而习惯地叫它“接待庵”。

其实，“接待庵”并不是圣水峪、上方山的总称。它只是七十二座茅庵最前边的一个，也是依次游览的起点。原来，接待庵是座落在进上方山的道口，现在二七八医院的位置上。这里原有一个四合大院，是专门为了接纳招待拜佛进香的僧人游客而设置的。僧人游客每每行至于此，都要歇歇脚，住一宿，第二天从这里出发，便可登攀云梯上山，漫游观光上方山全景，有诗记曰：“绿阴深处口停骖，选胜先登接待庵。峭壁压檐朝耸翠，清溪绕户晚拖蓝。逢人共说蚕又险。欸客频聆尘尾谈。到此行行应小住，无边妙境好徐探。”^①又有“云梯庵”诗曰：“红墙隐约紫霞蒸，突兀天梯三百层。鬼斧悬崖开石径，佛门觉路引金绳。仙心缥缈宜诗客，梵语依稀听老僧。宛上蓬莱登绝顶，书生凤志遂云凌”^②。据《房山县志》记载，原来上方山有一百二十座庵，后来仅七十二座。兜率寺是群庵的总汇。其它各庵是：崇宁庵、延寿洞、苹果园、大藏庵、大悲庵、本极庵、文殊殿、文殊阁、观音殿、西朝阳庵、般若庵、静业庵、大成庵、望海庵、西域庵、兴隆庵、端云庵、澹远庵、西方庵。弥陀庵、黄龙庵、地藏庵、松棚庵、西向台、永慈庵、因果庵、福寿庵、胡公庵、十方院、福德庵、积德庵、势至庵、皈依庵、塔院庵、云花庵、送子庵、华严洞、东坡庵、药师殿、办香庵、东朝阳澹、圣贤殿、虹桥庵、普提庵、普兴庵、新开庵、普贤庵、尊胜庵、一斗泉、文殊洞、圣泉洞、狮子崖、广慈庵、九还洞、云居庵、法华庵、石佛殿、堂子庵、极乐庵、金刚洞、向阳庵、云梯庵、接待庵、普济寺、白牛洞、西方洞、背阴洞、观音洞、摘星坨、毗卢庵，总计七十二处。可见，当年的上方山是多么奇异壮观。高书官曾作诗“上方山”赞云：

境比桃园信不惭，蒔花种竹似江南，云梯直上三千界，法宇宏开七二庵。创建独存冯保迹，苦修遥想道微龛。昆仑同与瑶池近，会稽休言禹穴探，诗客寻芳憨似蝶，老僧入定静如蚕。一湾潭影澄怀报，百尺星坨接蔚蓝。奋志功名浑似梦，弹情云水也为贫。晚年饱阅人间事，到此方能悟苦甘。

注：①《房山县志·艺文》“接待庵”赵之燮

②《房山县志·艺文》“上方山”高书官。高书官：田各庄人，原保定师范毕业。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贾岛故里

杨亦武

唐代诗人贾岛，以他在诗歌上的成就名垂史册。《唐书》上说贾岛是范阳人，有人认为该是今河北涿州市。其实，现房山一带唐时就隶属范阳管辖。金时划分出来，为奉先，元时更名房山。故长期以来，在贾岛原籍问题上曾引起人们的误解和考证上的分歧意见。

贾岛故里就在房山。《房山县·古迹》^①中载道：“县西北十数里”有贾岛峪。《房山县志》中的《贾岛墓记略》一文也载道：房山“有贾岛村，一曰贾岛峪”。房山贾岛故里名曰贾岛峪，在房山西十五里处。而今在贾岛峪中贾岛庵遗址尚存，贾岛峪西北不远处还有贾岛松。

贾岛峪

出房山城西行，过周口店向北而西进入一道山沟，沟内散居着数十户人家，这就是安家园。顺山沟蜿蜒西行，少许，有高山拦路，沟分左右。右边的山沟北行西折，过捐兵湾，经凉水泉，达长沟峪。左边的山沟就是贾岛故里——贾岛峪。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贾岛诞生在这里^②，他在这里度过了早年的一段生活，出家后到三十几岁才告别了故土，去西京游宦。

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来贾岛峪追踪诗人遗迹，寄托对诗人的敬慕之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曾赋诗吟诵贾岛峪^③。诗云：

闻说浪仙里，依然在范阳。

不因逢吏部，终是记空王。

幸有遗篇在，难寻宿学荒。

一家言自在，僻瘦定何妨。

贾岛峪山沟初向西南，一进沟口，便可透过稀疏的树木，望到不远处的几家院落。当地人说，早先贾岛峪路边有块一人高的石碑，后来下落不明了。《房山县志·古迹》中有这样一则记载：“房山城南门外有贾岛故里碑碣，今已无存。”看来石碑是被人移到了房山城南门外，后来又遗失了。

到了山家附近，山沟向正南纵深，顷而转向正西。向南的一段，俗称大南沟，向西的一段俗称大西沟。沟中杂木成林，山泉隐现。大西沟的尽头，贾岛庵遗址依稀可辨。大西沟南山叫岫山，岫山之阳有木岩寺遗址，贾岛曾写下《过木岩寺日暮》^④(又名《岫山寺》)一诗。岫山不高，从大西沟中顺着山阴小路攀行少时即可到达。当年贾岛要从贾岛峪去木岩寺是很方便的。大西沟北山叫磨山，因早年间石工们在这里采石打磨而得名。而今，山上山下还有很多未成形的磨盘石坯。

贾岛峪中有很多山居遗迹，从大西沟尽头一直延续到大南沟北端接近住户的地方。观此情景，这里的村落最早当在大西沟贾岛庵附近，世代代步步迁移，直至今天的位置。这里的居民也在减少，当地人说，原来贾岛峪有三十来户人家，现在只剩下四、五家了。所谓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用不了多久这里将人绝山空了。

而今，贾岛峪中不再有贾姓人家，甚至在贾岛峪前后数里的村落也再找不到姓贾的人。沧海桑田，令人喟叹！

贾岛庵

贾岛庵在贾岛峪大西沟尽头。现在还残存着石砌的庵基，高处达丈余，矮处也有六、七尺。根据遗址的情况推断，贾岛庵依山而建，占地约一亩，建筑平面呈“L”形，正殿约三间，左右配殿各是三间的样子，另外似乎还有些其他建筑。它座西朝东，居于两山之间，临于幽谷之上，早年人们进贾岛庵，需爬丈余高的石阶。

贾岛庵遗址的前面，大约在山门旁边的位置，尚存着庵僧用过的石碾盘。

近年来，贾岛峪人在劳作时，从大西沟两侧的山坡上挖出多处僧墓，早年这里一定有不少墓塔和墓碑，可惜年代久远都已无从查找了。

文献中不乏贾岛庵的记载。《房山县志》中《贾岛墓记略》一文云：“今房山有石庵，曰‘贾岛庵’”。《房山县志·古迹》中也载道：贾岛峪“内有石室，世传为贾岛所居。”这里的“石室”即上文所说的“石庵”，也就是贾岛庵。至于“世传为贾岛所居”，显然是贾岛僧时所居而不是俗时所居。那么，贾岛应该是在贾岛庵剃度的，进而言之，起码在唐大历年间贾岛庵就已存于贾岛峪中。那时山庵一定另有名称，贾岛死后，庵内僧人为了纪念他便把庵名改为“贾岛”。

古时，贾岛庵为世人仰慕之地。清人把它列入房山八景，名曰：贾岛遗庵。当年文人墨客常来这里游览。凭庵吊古，引起人们多少感慨：

乱峰青抱石溪寒，中有诗人独倚栏。
夜月龕灯曾礼佛，秋吟驴背偶惊韩。
残碑剥落苔封篆，古寺荒凉草压坛。
我有新诗吟未成，推敲相忆路漫漫。

这是孔进士拜谒贾岛遗庵时作的一首七律，^⑨诗中有对浪仙故事的追崇，有对世事兴衰的感叹。此外还不知有多少诗章吟咏在这深山古寺之中。

岁月流逝，葬尽多少繁华旧事。贾岛庵即是如此。关于贾岛庵的倾圮，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某个朝代，庵内的僧人不守本份，当地百姓身受其害，纷纷向官府告状，官府的暗探发现庵中有女人的踪影，不久，山庵就被官府查抄烧毁了。在贾岛庵遗址上，当地人指着南面的一段残墙说：“那儿就是当年僧人窝藏妇女处所。仔细一看，断壁确象两重，其间有一人余宽的空隙，颇似夹皮墙的样子。这些都是山野之言，无从凭考，姑且当个结论而已。

贾岛庵倾覆之后，有三间石殿幸存，直到清末。

贾岛松

贾岛峪西北不远处有松树岭。此岭地处长沟峪村南，与贾岛峪隔峰相对。松树岭成锥形拔地而起，岭上有棵千年古松，人称“贾岛松”，当地人直呼它“贾岛”。相传，当年贾岛常来松下消遣，并留下不少诗句：

偶来松下，高枕石后眠。
日出僧未起，寒暑不知年。

这首《松下偶成》据说就是贾岛在古松下写成的^⑩。诗中写他在夏季的一个夜晚，偶然来到贾岛松下休息，不知不觉地在石后睡着了，松下凉爽舒适，太阳来了尚未起身。

谈起贾岛松，当地一位老者说：“所说‘松下问童子’就是在那儿。”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那么，贾岛这首著名的《寻隐者不遇》也是在松下作的了。

《寻隐者不遇》诗，给人们发现了贾岛在故里生活的又一内容。当年，在贾岛松一带隐居着一位贤士，身为僧人的贾岛常到他的山庐作客。显然，古松下是他们一同畅谈的所在。在当地人的传言中，贾岛松颇有些神秘色彩。他们说：贾岛松砍不断，伐不倒，无论是有风的天气，还是没风的天气，树上的松枝都发出沙沙的响声，无论晴天，还是阴天，松下都有树影。如果赶上好天气，那树影能照到北京城。为了追寻贾岛松的神秘所在，我曾爬上松树岭。

贾岛松就在松树岭西北侧半山腰间，沿着山坡攀援即时可达。贾岛松高约两丈，形状颇似泰山迎客松。数条虬根从地表牢牢地植入山体之中，主干苍劲挺拔，齐胸处有两搂半粗(这样粗的干，砍伐起来着实不易)，主干顶端派生两枝，一条枝干擎天而上，仿佛撑起亭亭翠盖，一条枝干伸向西北，仿佛向岭下的过客招手。松巅枝叶繁茂，松果累累。远观近赏，贾岛松一副卓然脱世之姿。

上岭时不见有风，此时果然听到松间发出飒飒风声。仔细观察，贾岛松东北、西北、西南有三道风口，松旁总有气流通过，贾岛松位置又高，因此即使在没有风的天气，贾岛松也风吹不断。置身松下，沐浴着习习松风，观眺远峰近岭真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奇妙境界。

在贾岛松稍下的位置，松树岭好似伸出两条手臂，一东一西向北延伸出二岭。倚松下望，下端的主峰与东西二岭衔接处形成一条明显的半圆形轮廓。二岭平直承光，看去明朗一些，主峰倾斜承光，看去阴暗一些。因此，既使在阴天，也能看到松下有半圆形的硕大阴影。究其根源，是松树岭的山体结构及光线的明暗反差造成的。其实，贾岛松本身的影子很难显现出来。贾岛松固然根深叶茂，但它地处山阴，射来的阳光都被高大的山体遮住了。人们看到树影不过是山体的阴影而已，然而看起来却和贾岛松的影子一般无二。贾岛松影，实为世间罕见的奇观。

可见贾岛松的种种奇异现象，是松树岭特定的自然环境造成的。贾岛故里人给它披上一层神秘色彩，寄托对诗人遗迹的挚爱之情。难怪他们有“好天气，贾岛松的影子能照到北京城。”这样的童话般的语言。

是的，贾岛故里人对贾岛松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称贾岛松为神松，象敬神一样敬仰它。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习俗，每年正月初九的“燕九节”，贾岛峪一带的男女老少都要爬上松树岭，对着贾岛松顶礼膜拜，祈求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一切。

时代的风雨清洗了人们的封建思想，人们已不再相信贾岛松是什么神。但是，对贾岛松的崇敬却没有变，今天，人们从松树岭下的山居，从四乡八镇，从百里，甚至更远的地方来到贾岛松下，面对千年古松追忆祖国古老的文明，缅怀贾岛这个幽燕骚客。

注：

- ①本文引用的《房山县志》均为民国十七年本
- ②本文有关贾岛生平年代均根据李嘉言的《贾岛年谱》
- ③见《房山县志·艺文》
- ④见《房山县志·坛庙寺观》及《房山县志·艺文》
- ⑤见《房山县志·艺文》
- ⑥根据贾岛峪人安东福所讲，诗的内容为他口述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石花洞

赵润东

京西著名的游览胜地石花洞，又叫潜真洞。它位于房山城西北三十里河套沟内南车营村北。这里群山环抱，绿树成荫，风景秀美，煞是迷人。

石花洞全长八百四十七米，从高至低分为上下六层。洞中大大小小的“殿堂”，排列得井井有序。其中那富丽堂皇的凌霄宝殿，似怡然自乐的竹篱茅舍，如缥缈神奇的蓬莱仙境，若果木压枝的蟠桃园，兀起嶙峋的石钟乳，情态各异，形象逼真，奇峰陡绝，变化多端；鲤鱼戏珠，活灵活现；金鸡报晓，气势雄伟；仙人观澡，耐人深思；瑶池石莲，维妙维肖；四湖塔标，古朴典雅；盘龙玉柱，巍峨耸立；避暑胜天，树木成荫。另有龙宫竖琴高悬之上，江南水田清晰可辨。这里，仙人对弈，龙女绣花台，悟空的金箍棒，新颖别致的玲珑塔，人形兽态，各俱特色。珍珠翡翠，应有尽有，简直是一座鬼斧神工精雕后的艺术之宫。

据有关资料记载，此洞最早发现于明代。那时，有大和尚圆广法师在此修身养性多年。有一年，这里山洪爆发，冲毁庙宇，绝了栖身之处。圆广法师不得不弃舍搬家，钻入洞内。进入洞中，发现里面豁然开朗，景观奇特，十分幽静。可供养性栖身，从此他便率两个小和尚在这里住下。

石花洞在政府和有关部门关怀下，于1981年开采，现已探险到五层。进口至二层三十三米，出口一百四十一米，所游之处，绝不重复。里边四十八米高的一百五十六层人工石阶安有扶手铁链，行走方便，没有危险，因此不论老幼皆可游览。目前开放的两层内的几个大厅，还不足全洞的五分之一。待全洞开发完毕，那神奇动人的景观会给游客带来更大的乐趣。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木岩寺

杨亦武

岩岫耸寒色，精庐向此分。
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云。
绝顶人来少，高松鹤不群。
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闻。

熟悉贾岛诗歌的人知道，这是贾岛有名的一首五言律诗《过木岩寺日暮》。诗中所描绘的僻远偏幽，与世隔绝的寺院，就是古代幽燕名刹——木岩寺。

当人们读到《过木岩寺日暮》一诗，一定想知道木岩寺的下落。其实，木岩寺遗址就在京郊房山城西的

周口店。周口店西有两道隆起的山梁并行北去，在大约三里处和一座北山相汇。《过木岩寺日暮》中“岩岫耸寒色”一句所写的就是这座北山。早年，木岩寺就座落在这座山的半山坡。

木岩寺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有关文献记载：木岩寺建于南朝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当时一个叫空的和尚来到这里建寺，距今有一千四百八十多年的历史了。辽天祚帝天庆元年(1111年)定慧和尚进行了一次修整，明太祖洪武初年(1380年左右)洪林和尚再次修整，“兴衰崇旧”使木岩寺“造制复显”。时隔一百多年，到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年)重修木岩寺的工程又开始了。

关于这次重修，在明人的《重修木岩寺碑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当时由僧人真祥，真纪、真安，真宁等人主持，“始于通他”次两廓，次给孤独宇、次达摩等宇，次中殿、次后殿，禅堂、库厨、蔬圃，并碾总计若干楹”。工程直到嘉靖十年(1531年)才结束。历时十一年之久。从以上情况，我们不仅看出这次修葺工程的浩大，也可以想见木岩寺规模之宏伟，可惜这座千年古刹竟毁于一旦。

木岩寺所在山间贮有煤矿，数世纪前，人们就开始了煤矿开采，明文谈到木岩寺僧人的生活时曾写道：“取煤于穴，汲水于泉。”由于煤的长期开采，破坏了原始的地质结构，清末木岩寺所在的北山南坡突然塌陷，随着这毁灭性的灾难，木岩寺便在人间消失了。

木岩寺在古代实为一方名胜。明代的木岩寺贤公太师塔碑，篆额特书“大金古刹，木岩禅寺”，明人的《重修木岩寺碑记》曾这样赞叹“大凡我涿贤士大夫，言及西山奇胜，必曰木岩之大，与夫上人之贤，弟子之盛，愧羈尘俗，未得一瞻。”而今，木岩故事一去不返，木岩古迹庶几无存，当人们来到木岩寺的所在，唯能看到的是寺院塌陷后的断崖，和断崖东侧木岩僧人取水的古洞泉(此处山间唯一的水源，年代之久可知)。岭云悠悠，木岩何在？

木岩寺重立于世是不可能了，但是在木岩寺遗址上建个小亭，树碑其间，略记木岩的起止兴衰，名为木岩亭，既可以光复古代文明，又可以点染大房山色。但愿这一设想在将来会变为现实。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千古纵横话石经

颜景河

闻名中外的云居寺，寺以经贵。被称为房山石经的石刻佛教经籍，自隋大业年间由静琬和尚创刻，历经唐、辽、金、元、明，绵续达千载。计划佛经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二卷。被人们称颂为“国之重宝”、“北京的敦煌”。

房山石经知多少？经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市文物局整理，查明云居寺现存石经共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块。但房山石经远不止这个数目，历来许多石经残片流散在外，或被盗窃，甚至流失国外。如唐刻《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四百七十五卷残石一方，不知何时流入日本，为松本三郎所藏。我国旅顺博物馆亦藏有一些石经残片，其中贞观八年静琬题记的后半部，就存放在那里。关于石经的破坏损失，在文献上也有记载，据清末金石学者叶昌枬著的《语石》云：“厂肆往拓者，日携一、二残石至都，视之皆隋唐经也，恐毁失者已不少矣。”另外，尚有不少石经仍藏入山穴，埋入沃野。据有关文献记载，不仅山上还有藏经洞尚未发现，而房山区附

近马鞍山、京西卢沟河东垠也还藏有石经。这些疑点，待调查挖掘后，终会大白天下。云居寺石经经版大小不一，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大型者长二百五十公分，宽六十公分；中型者长一百六十公分，宽六十二公分；小型者长七十六公分，宽四十六公分。藏经绝大多数为小型经版。

“锲而不舍历千年，石经宝藏冠人间”。佛教兴于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南北朝时佛教更为盛行，凿窟造像，建塔筑寺，僧侣急剧增多。佛教石经也应运而生，首创于北齐时代，分布在山西、山东等地。但佛教在我国历史上也屡遭变故。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下诏尽诛境内沙门，焚烧寺院经像，佛史称为“魏武之厄”。北周武帝亦行其法，佛史称为“周武之厄”。经过两次“法难”，许多手写经卷都化为灰烬，而北齐时唐邕在河北省武安县响堂山所刻《维摩诘经》、《胜鬘经》等几部大乘经典由于石刻而安然无恙。这给佛教徒石刻佛经以很大启发。隋统一天下后，文帝杨坚笃信佛教，佛教又复兴起来。房山石经创始人静琬和尚是北齐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承师“发愿刻石藏，闕封岩壑中”（《帝京景物略》）的遗愿，于隋大业中来到幽州，发现白带山麓，重峦叠嶂，风光秀丽，“状若天竺”，又加此处盛产石料，有手艺娴熟的工匠，故“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唐初唐临著《冥报记》）静琬在“小西天”刻经二十余载，于唐贞观十三年去世，当时经版洞满七室，其弟子玄导承师志，续其功而续刻之。

房山石经的刻经事业到了晚唐，渐趋式微，至五代战乱而中断。值得庆幸的是石经由于僧人和佛教徒的保护，在战火中得以留存。据辽应历十五年（965）王正撰《千人邑会碑》载：“寺主谦讽和尚……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无贫富先后，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故寺不坏于平地，经不坠于东峰。”“东峰”即指藏经的石经山。

辽初，北方契丹贵族取得了包括房山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之后，国势日渐强大，不久建立了辽国，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并提倡佛教，房山刻经事业亦随之复兴。辽太平七年（1027）地方官韩绍芳从政之暇游石经山，取出经牌，验名对数并奏请辽圣宗，复兴刻经事业。其后兴宗、道宗继续刻造，至辽大安八年（1092）共刻造《大般若经》八十卷，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完成了四大部，并续刻了一些小部头经。至此，山上石洞藏经已满，以后再刻经版便藏埋于寺内地穴中。根据石经的经末题记及有关碑记的记载分析推测，辽、金两代曾先后进行过三次瘞埋。第一次是天庆八年沙门善锐，穿地为穴，瘞藏经版，并建石塔，刻文标记，知经所在。这个穴就位于现在地穴的北部，主要瘞埋通理大师的刻经和后来寿昌乾统年间（1095—1110）续刻的一些经；第二次是金天会年间（1123—1137）瘞埋了山西圣州保宁寺玄英俗弟子史君庆等所刻二十七经，由于容纳不下，便在原穴南端又开一穴，于天眷三年（1140）瘞入。在这以后金代大定、明昌之间（1161—1199）又刻了许多大、小乘经，再一次启开地穴将经版埋入，这是第三次所瘞藏的经版。此后，则从未被发掘过。

元、明时期所刻经版不多。今日雷音洞左侧第六洞所藏经版，乃是明末一些在京做官的南方居士在北京石灯庵刻造的几十部小经版。随经版存放的有明末书法家董其昌写的“宝藏”一石，是世上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从房山石经经末题记可以了解到，千余载的刻经事业不仅得到帝王和地方长官的支持，同时还有广大信徒和社会团体的赞助。仅以商业行会为例，就有：米行、布行、绢行、肉行、生铁行、炭行、磨行、染行、油行、果子行、椒笋行、五熟行、帛行、锦行、幞头行、靴行等不下三十多种行会。在保护石经中，外国僧侣也曾做贡献。据贾志道撰《重修华严堂经本记》载，元代高丽比丘慧月于至正元年（1341）夏朝礼五台山，路经房山，访石经山华严堂，“悯其石户摧圯，经本残缺……惜其将来浸泯静琬之功”，募缘重修，补刻五块石经。

本世纪初叶，云居寺以其庄严的庙宇殿堂和秀美的风光，一度成为当时一些驻外使馆的渡假游览处。使人痛惜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寺院的主体建筑及压经塔毁于日本侵略军炮火。但是石经却未受毁坏，幸运地保存下来。

1949年，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房山石经的发掘、保护和研究工作。中国佛教协会于1956

年至1958年历时三载,对房山石经进行全面调查、发掘和拓印工作。首先是发掘石经山的藏经洞,1956年3月21日在石经山上建工房和工棚,筹划发掘拓印的准备工作。4月21日,中国佛协周叔迦副会长、黄炳章先生会同北京图书馆金石部曾毅公先生亲临现场,首先启开第三洞洞口,搬出经版,开始拓印。这次共开掘、整理了九个洞口贮藏的石经,经版数量计四千一百九十六石,洞内外残石七百八十二块,共计四千九百七十八石。接着1957年夏,周叔迦居士会同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和黄炳章先生来到云居寺进行地穴的发掘工作,8月1日开始勘测,并清除土丘,8月6日塔基方台全部露现。8月7日发现第一块经版。这次清理出两穴所藏经版,北穴为六千二百九十五片,南穴三千七百八十七片,共计为一万零八十二片。经过发掘整理,石经山和地穴中共藏经版计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块,共拓印七份,分藏于全国一些大博物馆、图书馆中。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一度扬言要毁寺砸经,是敬爱的周总理保护了石经。据云居寺附近驻军防化团领导回忆,当时周总理办公室来电话,通知部队保护好云居寺,保护好石经。于是部队出动武装力量,日夜监守,劝阻了前来闹事的红卫兵,使石经在浩劫中得以幸存,可惜的是小西天第五洞华严堂上的千佛柱神像却被一些愚昧者刀砍斧凿,遭受到严重破坏。1973年谷牧副总理游云居寺,发现国宝石经散置露天院内,深为痛惜,立即指示北京市文化局拨款建库贮藏。北京市文化局迅速拨款十五万元,由房山县文化科负责在原地穴遗址建起三十余间库房,使石经在当时条件下得到较妥善保护。

“今逢盛世希有缘,愿观众力复庄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房山石经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继1978年中国佛协编辑出版了《房山云居寺石经》一册后,1980年成立了佛协图书文物馆,设立“房山石经整理研究小组”,专门从事房山石经的整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房山石经编辑刊印小组委员会,开始编辑出版房山石经。1984年中国佛协图书文物馆与北京图书馆共同编辑出版了《房山石经》、《房山石经题记汇编》。

1985年4月1日,北京市政府在云居寺召开现场工作会议,决定修复云居寺,科学地保护石经,并成立“云居寺修复委员会”,聘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赴朴初为名誉主任;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为主任,领导推动整个修复工作。修复云居寺,保护石经的消息见诸报端后,海内外各界人士无不欢喜赞叹,大力资助。几年来,市、区政府先后投资数百万元,中国佛协捐赠10万元,美籍华人应行久先生,金玉堂居士夫妇捐助4万美元,新加坡何惠忠居士捐助港币一百万元……今日修复后的云居寺又复现往日庄严,更有石经珍宝如灿灿明珠,闪烁着历史文明之光,对中外僧侣、学者、游客将有更大的吸引力。

房山石经是我国古代遗存的金石文物伟大宝藏,其价值,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评价。在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同时又是校勘历代木刻藏经字句脱误的最好版本。它也反映了我国自隋唐以后各个时代石刻艺术的成就。我们衷心祝愿早日修复好云居寺,合理的科学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房山石经,使这一世界罕见的文化宝藏重放异彩,为弘扬中国文化,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

杨亦武

舍利，是梵语 SARTRA 的音译，亦写作设利罗、室利罗、实利，译作身体、身、身骨，通常指释尊（释迦牟尼）的遗骨，亦即佛骨、佛舍利。

舍利又称“驮都”、“要素”之意。据巴利文长部经注，身体荼毗之后，可以磨成如珍珠、黄金般的粉末，成为驮都。《法苑珠林》第四十称舍利有三种：一为骨舍利，其色白；二为发舍利，其色黑；三为肉舍利，其色赤。

1981年11月27日上午，房山石经山雷音洞出土了两颗骨舍利。1987年4月28日上午，北京市政府在北京饭店中七楼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首次发布了这一消息。会上，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宣布，公元616年安置在北京房山云居寺内的佛舍利现已发现，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言称，在北京石经山雷音洞内发现的两粒舍利，经反复考证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遗骨。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周绍良说，佛舍利的发现，无论是在宗教，还是在文化、文物等方面，都具有世界性意义。

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始末

关于房山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放置年代，佛舍利青石函铭曰：“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可见，房山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始置于隋代大业十二年（616年）四月八日。

为什么要在石经山雷音洞安放佛舍利呢？想来和石经山开山鼻祖静琬刻经有关，静琬是北齐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隋大业年间，他秉承师训，在石经山“凿岩为室，摩四壁以写经，又取方石，另更摩写，藏诸室内”（《冥报记》）。静琬刻经受到大隋朝野的重视，当时隋炀帝正临幸涿郡（今北京附近），炀帝后萧后随驾在涿，萧后弟内史侍郎萧瑀笃信佛法，把静琬刻经一事告知萧后，萧后施绢千匹，萧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冥报记》）。石经山雷音洞是静琬刻经之所，隋人在此安置舍利，也定然是为嘉其壮举。所以铭文上说“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永劫，即永久之意。这是祝福静琬的话，祝静琬矢志不移，祝他开创的刻经事业代代相传。

就佛教本身的意义而言，石经山雷音洞安放佛舍利有其必然性。在佛教中，佛舍利是一种至高无尚的神圣物，它作为佛的物质实体，随佛经从天竺（古印度）传播到我国，成为佛教徒们顶礼膜拜的对象。

有佛舍利，犹如佛即在此。因此，我国早期佛寺都在寺中央设塔供奉佛舍利，以示佛的存在，以至后来的佛寺多有舍利塔，不管塔内是否存有释迦舍利，有的甚至建座空塔也冒以“舍利”之名。如此情形，足见佛舍利在佛中的地位。石经山由于静琬的凿室刻经，一跃而成为佛教圣地，自然要安置佛舍利以昭佛光。

若是佛寺，佛舍利定要建塔贮之，石经山并非佛寺，而是一个藏室经库，所以佛舍利置于藏有石经的洞室。雷音洞是静琬刻经之首洞，为石经山唯一的开放式经室，除四壁刻有石经外，里面还供奉着佛象，并雕有千佛柱，它是诸藏经洞的核心，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地方。故此，佛舍利终归安置在此洞。

当年，隋人在石经山安置佛舍利的盛况已不得而知了，但是，安置佛舍利的四月八日却从此写在石经山

的文明史上。人们称这一天为佛诞日，每逢此日，石经山都要举行盛大的法会。辽人王正的《燕山云居寺碑》载曰：“风俗以四月八日共庆佛生，凡水之滨，山之下，不远百里，预饷供粮，号为义食。”这是古人大庆佛诞的真实记录。到了近代，这一习俗仍久盛不衰，以至于风靡房山各寺。《房山县志·礼俗》云：“县境各寺院如永寿西域等寺，每于是日作浴佛会，西域尤盛，远方来者颇多。”而今，有些房山人还道得出四月八日佛诞法会的情景，殊不知是雷音洞佛舍利的安置开了一方风俗之端。

佛舍利自隋大业年间安置之后，在石经山雷音洞沉睡了九百七十六年，直到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才重现于世。明僧人德清的《涿州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略》记载了事情的原委。

万历二十年四月十五日，五台僧人达观禅师自五台山送龙子归京西潭柘寺。慈圣太后闻讯，遣近臣陈儒，赵斌送斋供资。达观一行行至房山，于五月十二日往石经山雷音洞拜经。达观见洞内像设瘫敝，石经薄蚀，乃命东云居寺住持明亮酌情整饬。动工翌日，启洞拜石，石下有穴，内藏石函约一尺见方，面刻“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三十六字铭文，内贮四五升灵骨，状如骨髓，异香馥郁。其间有一银函方寸许，内盛小金函半寸许，金函内有一小金瓶，内贮三颗舍利，状如小米，紫红色，按《法苑珠林》所言，这三颗舍利为肉舍利。达观即刻付书赵斌，请他把石经山雷音洞发现佛舍利一事上奏。慈圣太后获悉，欣然斋宿三日，六月把佛舍利迎入其寝宫慈宁宫，供养三日。佛舍利在皇宫逗留两月许，八月二十日，皇家遣专使将佛舍利放归石经山雷音洞原石穴内，上覆以金身如来佛像。所以清人毋配坤的《小西天石经寺碑》言：“藏于金身如来所踏石板下。”僧人德清受命作了《涿州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略》。

佛舍利归山，并非按隋人三函一瓶的原始格局，而是有所增易。德清记云：“乃于小金函外加一玉函，玉函外复加一小金函方一寸许，坐银函内，以为庄严。出帑银五十两，仍造大石函，总包藏之。”德清此记与事实颇有出入。对此，下文的《房山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辨》另有详析。

佛舍利的再次发现即是在1981年。自明万历二十年至此，历时三百八十九年之久。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几为世人淡忘。

1981年11月27日上午，云居寺文物保管所人员在雷音洞内清理地面，见原佛座后边地下五公分处有一方石，不觉有些诧异，掀开方石，下有一穴，穴中有一石函。此时在场的还有文管所负责人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专家。人们想到了史书上关于石经山藏有佛舍利的记载，于是小心向外发取。经一小时的忙碌，上午十二时十五分，五重封函。全部取出。佛舍利藏于内函中，共两颗，小米粒般大小，乳白色，为骨舍利。现场拍照后，封函及佛舍利被北京市文物局迎往北京保藏。随后，佛教、文物专家逐一打开封函，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时过五年零五个月，1987年4月28日，北京市政府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才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翌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刊，纷纷报道新闻发布会的情况及佛舍利发现的经过。

未几，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在北京某寺院展出。据悉，待云居寺修复之日，佛舍利将放回寺内安置，迎接海内外各界人士瞻礼。

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辨

1981年在房山石经山雷音洞发现的佛舍利，是不是隋大业十二年即公元616年安放的佛舍利呢？众所周知，1981年发现的佛舍利是明万历二十年经明人手再入雷音洞的。佛舍利的真伪取决于明人是否取走了隋人安放的舍利。因此，应辨析一下1981年发现的佛舍利封函格局，它反映了明人函封佛舍利的真实情况。

1981年发现的佛舍利，计五重封函。

外函为汉白玉函，函盖刻有一百七十二字铭文，函内刻有八十三字铭文，铭文记述了明万历二十年首次发

现隋藏佛舍利情况。此函为明人增制。德清记中所云：“出帑银五十两，仍造大石函总包藏之。”即指此函。

次函为青石函，面刻：“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足见此函系原隋佛舍利外函。函内原有四五升灵骨，1981年发函时不见了，看来是让明人取出了。

三函为汉白玉石函，属明人增制。

四函为镀金银函，方一寸许（3.85公分），四周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图案，内藏木质彩绘香珠一颗，珍珠十一颗。德清记中误称此函为明人造的“小金函”方一寸许，坐银函中。此处的银函乃指隋佛舍利二函。据载，此函亦方一寸许。方一寸许的金函如何坐进同样大小的银函呢？何况并未见隋佛舍利二函，也未见明人造的小金函，只有一个同样大小的镀金银函。显然明人并未造什么“小金函”，只不过把隋佛舍利二函镀金文饰了而已。函内的木珠、珍珠等物，均为明人安放无疑。

德清之误，不该是行文疏忽。何以至此，颇宜思忖。

佛舍利内函为一白玉函。德清记云：“乃于小金函外加一玉函。”也就是说，此函是加封在隋佛舍利内函小金函外的。然而，白玉函内未见有隋内函小金函，只有两颗乳白色，小米粒般大小的骨舍利及两颗珍珠。隋内函小金函内，原藏有小金瓶，隋人安置的三颗肉舍利即在此瓶内。显而易见，明人再封佛舍利时取走了隋小金函，小金瓶及瓶内的三颗肉舍利，而代之以白玉函，两颗骨舍利及两颗珍珠。言述至此，1981年发现的两颗舍利是不是隋大业十二年即公元616年安置的舍利就不言而喻了。

反思明人在佛舍利封函上的种种举动，无非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德清所记又以不实之辞隐却真情，可谓一段谎文，足欺百代之人！

是谁巧施调包记窃走了隋人安置的佛舍利呢？根据明万历二十年佛舍利发现后的情形推断：其一，不可能是达观等发现佛舍利的僧众。僧人们在石经山雷音洞发现佛舍利后，即刻转于达观之手。达观既已通书越斌向慈圣太后奏明了佛舍利详情，绝无再窃之理；再者，对佛教徒来说，佛舍利即佛，唯其崇拜，窃之无益。其二，不可能是迎、送佛舍利的使臣。且不说明廷择使不会选鸡鸣狗盗之辈。我们知道，慈圣太后是获知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详情后遣使迎奉的，迎函使自不敢偷梁换柱以欺太后。至于送函使，在佛舍利封闭归山之日倒有开函窃宝的便利，不过根据明人在佛舍利封函上的种种举动及德清的不实之记推断，窃取佛舍利分明有一个精心策划了的过程，佛舍利的失窃岂在归途之中。

窃去佛舍利的该是慈圣太后。

追其根由，佛舍利的失窃，是慈圣太后凭当朝国母之尊位把佛舍利迎入皇宫所致，仅此一点，慈圣太后就难脱干系，何况慈圣太后确有种种可疑的迹象。如前文所述，慈圣太后获悉石经山发现了佛舍利意态欣然，随即，又是遣使，又是斋宿，又是供奉，表现了对佛舍利的极大兴趣。此其一。佛舍利六月进宫，八月二十日归穴，在宫中逗留二月许，如果把佛舍利迎来只为一瞻一拜，又何必耽搁许久。此其二。更甚者，佛舍利归山之前，慈圣太后授意添造了两个汉白玉石函，一个白玉函，且将隋佛舍利银函镀金文饰，将函中放入珍珠、木珠等物。此番忙碌，美其名曰是“以为庄严”，而在佛舍利调包中，恰恰起到了掩人耳目的作用。德清所记又分明将此举弥合得毫无破绽。德清乃受命作记，佛舍利从宫中封闭归山，德清对佛舍利封函实情不得目睹，既是受命作记，所述定是皇家口径。正所为德清无辜，太后有鬼。不难看出，从佛舍利迎奉进宫到德清受命作记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而这个骗局的策划者，只能是慈圣太后。

慈圣太后，何以窃取佛舍利呢？众所周知，佛舍利为两千多年前的释尊遗骨，乃稀世佛宝。而象慈圣太后这样的国母帝后多有罗珍致宝之癖，且慈圣太后又笃信佛法，留下佛舍利便永润佛泽。一旦得之，岂肯释手？然而隋藏佛舍利乃石经山祖传至宝，即便作为当朝国母，私索舍利毕竟有失公道，于是来了个偷梁换柱。

由于伪饰巧妙，慈圣太后在青史上倒留得个佳名。明人德清说她对佛舍利如何虔诚，如何为佛舍利添造封函，甚至不惜动用帑银。（见德清《涿州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略》）。清人毋配坤言称，“奉朝使”把佛舍

利送归石经山后，“雷音殿”被“饰以金碧，山寺又一兴旺”。(见毋配坤《小西天石经寺碑》)。

如此，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的一段真实经历被掩盖了三百余年。而今该当大白于天下了。事实确凿，1981年发现的两颗佛舍利并非隋大业十二年即公元616年隋人安置的舍利，而是明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明人安置的舍利。至于这两颗舍利是不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遗骨，本人无从凭考，不敢妄断。

参考书目：

- 1、《日下旧闻考》
- 2、《涿州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略》
- 3、《房山县志》
- 4、《石经山记略》
- 5、《小西天石经寺碑》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北京的金陵(一)

肖 智

金朝二十四帝

金朝自1115年建国，号“大金”至1235年国亡，在历史上存在一百二十年，历经十个皇帝，追谥的皇帝有十四个，其中二十一个葬在大房山，一个葬在河南开封，两个葬在蔡州。做皇帝时间最长的二十八年，最短的只有一天。

大房山二十一帝：

先迁者二：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

金太宗完颜吴乞买。

金史海陵记(104)：贞元三年三月(1156)“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太祖葬三峰山脚下，太宗葬坟山。

继迁者十：

金史海陵记(107)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

十帝是：

始祖：函普，德帝：乌鲁，安帝：跋海，献帝：绥可，昭祖：石鲁，景祖：乌古，世祖：劬里钵，肃宗：颇刺淑，穆宗：盈歌，康宗：乌雅束。

这十帝生前并未坐皇帝，是天会十三至十四年(1137—1138)金熙宗追谥的。

十帝的葬址：车厂村南，石门沟的半山腰，占地面积有 60 多平方米。现存遗址有：两个 1.10×0.8 米华表底座，柱础，石栏底盘，残破油灯碗，砖瓦石阶等，据观察，此处地下墓葬没有被盗。

被杀者三：

金熙宗完颜亶，被其弟海陵王完颜亮所杀。“贞元三年”由东北迁来，“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以思陵狭小，改葬于峨眉谷，”（金史熙宗 87）石门沟之南沟现有遗迹可寻。

海陵王完颜亮，于正隆六年被兵马统制完颜元宜所杀。大定二年“四月，葬于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兆域中。”之后又“降为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金史海陵 117）但也未出大房山山区。现已无踪迹可寻。

卫绍王完颜允济，于至宁元年八月被宦者李思中所杀。金史没有记载卫绍王葬于何处，但却记有：金宣宗是葬完卫绍王后南迁开封的，估计也不会出大房山陵区。

追谥者四：

金熙宗父：景宣皇帝完颜宗峻；

金世宗父：简肃皇帝完颜宗尧；

金章宗父：光孝皇帝完颜允恭；

海陵王父：睿明皇帝完颜宗幹（后降辽王）。

以上四帝，除简肃皇帝石碑已出土，其余尚无着落。景宣皇帝，睿明皇帝是海陵王从东北迁葬于大房山。简肃皇帝是世宗即位后迁葬于大房山的。光孝皇帝是直接葬于大房山，他本来不用追谥，世宗去世就可以坐皇帝，不幸先于世宗病逝，皇帝的位置只好由章宗去坐。

全始终者二：

金世宗完雍颜，

金章宗完颜。

金世宗大概葬于太祖陵东侧柳家沟，这一点有待于将来挖掘证实。金章宗葬于今燕化地毯厂后山大楼沟与后沟普光寺中间，这里有很多金朝遗迹。另：连泉顶石碑碑文也可以证明。

南迁者三：

金宣宗完颜珣，

金哀宗完颜守绪，

金末帝完颜承麟。

金宣宗葬于河南开封，也是全始终的皇帝。金哀宗在元、宋联兵打击下，危在旦夕之中“传位于东面元帅承麟，帝自缢于幽兰轩”（金史哀宗下 403）完颜承麟刚刚即位就被乱兵所杀，史称“金末帝”。是历史上坐皇帝时间最短的皇帝。

金太祖陵区概况

金太祖陵区即是完颜阿骨打之陵区，此陵区并非埋葬阿骨打一人，还埋葬着另外两个皇帝。共计七个皇后，三个妃。它东西宽百余米，南北长五百余米。呈梯田状。位于大房山东侧三峰山（又称云峰山、九龙山）脚下，龙门口村后坡。

建陵经过

据《大金国志校证》载：国初，祖宗止葬于护国林之东，逮海陵徙燕，始令司天台卜地于燕山之四围，岁余，方得良乡县西五十里大洪谷曰龙城寺，峰峦秀出，林木隐映，真筑陵之处。遂迁祖宗于此，唯熙宗葬

于山阴，盖以刑余遂不入陵。又（596）页，山陵：“虏人都上京，本无山陵。祖宗以来，止卜葬于护国林之东，仪制极草创。迨亮徙燕，始有置陵寝意，遂令司天台卜地于燕山之四围。年余，方得良乡县西五十余里大洪山曰大洪谷曰龙喊峰，岗峦秀拔，林木森密。至筑陵之处，亮寻毁其寺，遂迁祖宗，（应是祖父）父，叔改葬于寺基之上，又将正殿元位佛像处凿穴，以奉安太祖、太宗晟、父德宗宗幹，其余各随昭穆序焉。惟亶被杀，（即熙宗）葬于山阴，谓其刑余之人不入。”从以上文中可以看出：太祖陵区葬有三帝，其实只有太祖阿骨打，次祖父太宗吴乞买埋葬在距太祖陵区二里之遥‘坟山’。据《日下旧闻考》记并不在太祖陵区。海陵之父辽王宗幹虽记载改葬于寺基之上，如果假设是真，那么在世宗即位后，（大定二十二年）削睿明皇帝称号，（曾称明肃帝降封为辽王）。既不称帝就不该葬在太祖陵区，只能葬在诸王兆域，而金史却没有记载，宗幹降封后迁出太祖陵区。（也许漏记？有待于将来证实）。可以说宗幹不在太祖陵区，但距太祖陵也不会太远。

我们再看建陵时间。金史海陵（104—105）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丙寅，如大房山，营山陵。”八月“甲申，启土，赐役夫，人绢一匹。”十月，“丁酉，大房山行宫成，名曰磐宁”。十一月“戊申，山陵礼成。”太祖陵区从“八月甲申启土”到“十一月戊申”竣工，修陵时间只有三个多月，可见修得不会太复杂，如果地下有庞大的宫殿，三个月时间是绝不会修成的。况且金朝在大房山建陵是属初次，还没有“坐皇帝就修坟”的习惯。否则世宗生前就不会说“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世宗下 188）了。太祖陵区修建之所以进展较快，只能用“龙城寺”地基改建而成。

陵区内的“三皇”

一、金太祖完颜阿骨打（1068—1124）

享年五十六岁，三次下葬，可谓受罪。第一次，天会元年九月乙卯（1124），“葬宫城西南，建宁神殿”。天会三年三月（1127），“上尊谥曰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立原庙于西京。”第二次，天会十三年二月辛酉（1137）改葬“和陵”，皇统四年，改和陵曰睿陵。五年十月（1146），增谥“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第三次，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号睿陵（金史太祖 42）。

二、金睿宗完颜宗尧（1097—1137）

享年 40 岁。天会十三年（1137）行次妫州薨。陪葬睿陵（正值改葬和陵曰睿陵之时）追封潞王，谥襄穆。皇统六年，进翼国王。（1146）正隆二年，追赠太师，上柱国，改封许王。世宗即位，追上尊谥立德显仁启圣广运文武简肃皇帝，庙号睿宗。二年，改葬于大房山，号景陵。（金史世纪补 410）海陵迁诸陵时不知何故遗漏睿宗？还是世宗即位后，大定二年，九月，“辛酉，奉迁睿宗皇帝梓宫于磐宁宫。”十月，“戊子，葬睿宗皇帝于景陵”，即是太祖陵旁边，现简肃皇帝石碑已出土于太祖陵西侧，这一点与金史所记相符。

三、金世宗完颜雍（1124—1191）

享年六十七岁，直接葬于大房山，以后并未迁葬它处。大定二十五年四月，“上谓群臣…祖宗旧邦，不忍舍去，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金史世宗下 188）“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上大渐，不能视朝。”“癸巳，上崩于福安殿，寿六十七。”“三月辛卯朔，上尊谥曰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庙号世宗。四月乙酉，葬兴陵，”顺天府志记（877）“金世宗陵前地隘，应增修享殿并祭台，围墙，甬路等项，不能立正门，今就碑亭连接栅栏，立两角门，足符体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乾隆十七年从修太祖，世宗陵时，已是破烂不堪，不过还是有迹可寻，现在，太祖陵东侧，一个名叫柳家沟的地方还存在着一片废墟，黄土层很厚，揣其位置很像是世宗陵。金世宗是全始全终的皇帝，被后人称为“小尧舜”深受人民的爱戴，如果挖掘整理这里出土的文物，应当比别处丰富，有可能和民间传说部分相吻合。

陵区内的“皇后与妃”

金太祖阿骨打的“四后一妃”：

圣穆皇后，光懿皇后，钦宪皇后，宣献皇后，崇妃萧氏金睿宗完颜宗尧的“二后”

钦慈皇后，贞懿皇后：

金世宗完颜雍的“一后二妃”

昭德皇后，元妃张氏，元妃李氏。

大定二十九年昭德皇后衬葬兴陵与世宗合葬一处。

墓碑及其它

金碑十三块，清碑二块。

金碑：三皇，七后，三妃（如果昭德皇后与世宗合葬一处，而不复立墓将是十二碑）。

清碑：恭勒世祖章皇帝御制碑文（顺治）

圣祖仁皇帝御制碑文（康熙）

太祖陵区除有大批的石兽、碑亭、享殿、华表等物外，还有一石人像。

海陵迁诸陵于大房山，以挾懒尝给事太祖，命作石像，置睿陵前。（金史列传四 1567）瑞云宫：

《房山县志》记：按涿州志记：“瑞云宫在太祖陵侧，遗址仅存。”今已踪迹全无。

太祖陵区的复灭

《日下旧闻考》记：圣祖仁皇帝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文中记：“天启元年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金太祖陵区与所有的金陵一起毁灭了，这对历史尤其是金史，是空前的损失，这证明了明朝天启皇帝的愚昧无知。金太祖陵区诸陵虽经清朝大力修复，也无法恢复原状，只是建立在一堆废墟之上。民国期间土匪为捞取皇陵内的财宝，又拆毁了重修的陵墓，里面得到的却是一堆乱石，难怪当地人都说是“假坟”。遗憾的是“文革”时又把拆毁的陵墓遗迹推成梯田。目前，太祖陵区只剩下一片片残砖碎瓦，一条条汉白玉石阶，闪着残光的黄、绿琉璃瓦，缺肢断腿丢头的石兽，让有兴于金陵的人们面对着废墟去遐想，去追踪当年的盛况。

金朝是第一个在北京建都的，也是第一个在北京附近建陵的。北京的文明及繁华也是从金朝开始的，所以金陵研究在北京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一页，还有更多的金陵废墟、遗迹等待着我们去开发、探索、挖掘、整理。

金章宗陵考察记

全章宗完颜璟（1170—1211）享年41岁，显宗子，世宗孙。在位二十年，“谥曰宪天光运仁文义武神圣英孝皇帝”，庙号章宗。葬道陵。（金史章宗四 285）金章宗葬于大房山，具体葬在何处？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这就让我们探索章宗陵址大费周折。

《日下旧闻考》记：“圣祖仁皇帝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天启元年，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压胜之术。”

《顺天府志》记：乾隆十七年，钦命修葺金太祖、世宗陵时，也只是在原遗址的一带废墟上重修，也未必是原来的陵址。其它的金代诸陵便是“荒草寻飘乎”，荡然无存。章宗是全始终的皇帝，死后直接葬在大

房山，地下墓葬可能没遭到破坏。民国时，以盗墓闻名的刘振山，活动在金陵区域，也只是对清代重修的太祖、世宗陵进行盗掘，对于从明代即化为梯田的其它金代陵墓，大概不会深入研究、盗掘。我们如果能找到金章宗陵，金朝的随葬品可能是丰富的。

《大清一统志》记：“世宗陵在县西北，大房山东北，（又称猫耳山）名曰兴陵，相近有章宗道陵……”这可以说明，金章宗陵就在世宗陵附近，又，世宗陵在太祖陵一侧，所以距太祖陵也不会太远。

另外能够提供金章宗陵线索的即是：太祖陵山后的连泉寺遗址，有一明嘉靖八年碑，上面记着这样一句话：有一和尚从南方“行至京畿西南涿县西北地，大房山也。前山游玩大金章宗古墓，后陞从顶巔峰分林拨木至山。”这也是能够提供金章宗陵位置的一字的字句依据。大房山金帝陵共有 21 个，十个在石门沟，三个在龙门口，一个在坟山，一个在鹿门谷（后迁出），一个在蛾眉峪，还有五个散落在山南这一带。太祖陵区葬有祖孙三代，可以看出金代陵墓的葬法没有什么严格的规矩。那么金章宗陵附近还会有其它陵墓，连泉寺碑文只提到了：游玩大金章宗古墓，却不提其它陵墓，只能说章宗陵修建的要比其它陵好。根据碑文，我们把上连泉寺的三条路线进行分折。

首先，我们可以说此人没走正前方，因为寺的正前方是太祖陵，东侧坟山是太宗陵，碑文没有提到。

向西便是三盆山，沟中有十字寺，寺中有辽碑、元碑，是房山闻名的古迹，向后爬上杨家大岭再向东即是连泉寺，碑文也没有提到。再向西就是长沟峪，爬上北梁即是‘金章宗歇凉台’。虽然存在许多金朝遗迹，但不会在山的顶峰修建陵墓。折回向南经过大房山顶峰，再向东也可到达连泉寺，但方向不对。左前方是大楼沟一带，地势宽阔。从房山城上连泉寺此路最近，沟口处有一山凹，叫‘金刚圈’，据说也是金陵，但规模很小，不像是章宗陵。后沟普光寺至大楼沟一带山势雄伟秀拔，巍峨险峻，沟中有四季不干的双泉沟水，潺潺流过，满山丛绿，百鸟喧鸣，风景优美，附近还保留着几十棵三搂粗的古栗树，树前是一片空地，此处曾发现许多金代的残砖。再向上，宝顶沟前一小房处有四个直径 320 毫米的柱础，大量的虎头瓦，绿琉璃瓦，桶瓦等物均是金朝遗物。可见金代在此处曾有过大规模建筑，再向西走上二百米余米，便是一条羊肠小路盘上顶峰，通往连泉寺，此路很像碑文中所记之路，山梁向东是上店村、东岭村，山势不足为奇，经反复考察没有发现金朝遗迹。

大楼沟至普光寺这片地区，从方向看是在大房山东北，符合一统志所言。（距太祖陵五里之遥）是连泉寺的左前方。从地势看类似于太祖陵，三面临水，一面依山，从遗迹上看：有辽金明清建筑残迹，而金代最多。可以说：金章宗陵就在这一地区，这种提法是否正确，还有待于将来挖掘地下文物来证实。

磐宁宫

磐宁宫就在房山附近，而今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岁月中、但遗迹不会没有！残砖碎瓦会告诉我们“磐宁宫”在哪里？

《金史》记：贞元三年(1156)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八月“甲申，启土，赐役夫，人绢一匹”。十月“丁酉，大房山行宫成，名曰磐宁”。这是金史上第一次提到“磐宁宫”。

《金史》记：奉先，有房山，龙泉河磐宁宫。奉先，是房山县的旧称，金代明昌二年(1194)由万宁改为奉先，元代改为房山。

金史世宗（129）大定二年九月(1165)“辛酉，奉迁睿宗皇帝梓宫于磐宁宫。”

《金史》记：后妃下大定十九年(1522)世宗德皇后，“改卜于大房山”，“戊午，奉安家磐宁宫。”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磐宁宫在海陵王时期作为“行宫”存在，到了金世宗时就作为“停灵殿”了。修建时期从贞元三年三月至十月，八个月之久，可见其规模相当宏大。

《房山县志》记：“按金史地理志记，奉先县有磐宁宫。”又记：“瑞云宫，按涿州志，瑞云宫在太祖陵侧……而瑞云宫究不知建自何年或磐宁宫更名瑞云宫，亦未可知？”

由此可知，作房山县志时也不知磐宁宫建在何处？甚至怀疑磐宁宫即是瑞云宫，瑞云宫在太祖陵侧，这也可能，可以作为皇帝祭灵时休息的宫室？但磐宁宫绝不会建在太祖陵区！《金史》和《房山县志》均没有磐宁宫的具体位置。

那么，磐宁宫的遗址到底在哪？

我们从金世宗将其父、其后的梓宫停于磐宁宫，然后再去下葬这一点上，可以知道：磐宁宫与陵区相距很近。

有人认为长沟峪，东天宫，西天宫和房山之巅的上寺，是磐宁宫？殊不知房山县城与长沟峪相距二十多里，婉转入川十余里，山路崎岖，况又深入陵区之后，要停灵于此，岂不舍近求远？大费周折吗？

还有人认为，现在胜利桥北坡上的山神庙遗址即是磐宁宫？但其面积狭小，山势陡峭，不会把灵抬上山，再抬下山，徒劳人工，况此处已进入陵区，北面三里之遥即是太宗、太祖陵寝。

试想，当年进陵路线：有三条。

(一)从房山县城一带地方去周口店，走河滩延坝河入山口，进入陵区。

(二)从朱各庄走北庄过歇息岗入沙峪进车厂。

(三)从饶乐府过北关，洪寺进塔湾，上迎风坡，穿良各庄、西庄入陵区。

我们看第一路。要走河滩进陵，当年河水势必很大，不会逆行涉水而上，此路走的可能性不大，牛口峪，云峰寺，周口店，山口等处也没发现过多的金代遗迹。

第二条，沿各村仔细考察终未发现金代建筑遗址。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一进入塔湾，路旁就有一寺庙遗址，四周散落着大量金代的砖瓦石块，占地面积200余亩，颇为宏阔壮观。分内院，外院，四层院墙层层相套，又有前、后，正三殿，布局非常严密，整齐，其方位；坐北朝南，三面环水，一面靠坡，周围又有山岗环绕，真有‘世外桃园’之意。沿院墙遗址散落着大最的碎砖残瓦，黄绿琉璃瓦。用琉璃瓦盖庙大概是极少，在这么一个山坳中修如此豪华的寺庙，意义也是非同一般。据说，此庙叫洪恩寺。可能“洪寺”村名也是来源于此。

隔河相对的山坡还有一处遗址，它是依山势而建，类似于梯田，大概每层梯田都有石栏围绕。南北长300余米，两头呈半园形，东西宽100余米，分五层，越向上越小，顶端、南北长100余米，东西宽30余米，中心靠北有一凸处，四围散落着砖瓦，据传说这里原有一白塔，解放后就拆除了，今已踪迹全无。值得注意的是，东侧的阶梯遗址，留给我们的是：花岗石砌的阶梯围墙，孤独地站在那里，向我们展示着过去的繁华和神秘的岁月。还有那一堆堆碎砖忍受着已不知多少年来的风吹雨淋。

这里还埋藏着大量瓷器残片，碗片还带有七个黑点，像是一朵梅花。有的瓷片还非常薄，经考证，有黑点的显得粗糙，是属金代北方瓷器，薄片显得精致，是属宋代南方磁器，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据：这两处遗址都是金代建筑。这里还散落着水缸，沙锅、水缶，瓷盘等残片，可以推断此处原是厨房所在。对面洪恩寺遗址临河一面，也散落更多的瓷器残片。

再向西二个山坡顶端似乎是人工修平，四周都是用花岗石砌成，有些地方还可辨认出殿房遗址，周围散着砖瓦。

在这个地区里到处可见一些奇形怪状的巨石，有的形如馒头，有的形如雪人，还刻有五官，有的像两排卫士站立在一条宽阔的路两旁，有的形如大鹏展翅，有的立在石上岌岌可危，有的双石并立，有的数石群集。如果再有森林围绕，将是一所绝妙的天然公园。

问本地老人：原有一条大路可去车厂，今已残缺不齐，不过路边的扩基石还能依稀可辨。这里离陵区还

有七里路，站在山岗上即可遥望山陵。可以这样认为：洪恩寺原是一座寺庙，海陵命云峰寺为山陵后即改建成“磐宁”行宫（太祖陵也是寺庙改建，此处为何不可改行宫？），建宫阁宝塔于山岗，增修院落，殿堂于寺，利用天然的奇石山水，森林，稍加修整即是行宫，所以磐宁宫修建只用八个月。后因世宗把磐宁宫改为停灵殿，即召僧守之，国亡而寺存。鸿雪因缘图记记载：清道光年间，金世宗二十四代孙麟庆前去拜陵还曾路过洪恩寺，还有僧人守之，大约在民国初年，因战乱僧走寺毁。其规模宏大，风景雅致绝不是一般寺庙可比，此地可能是“磐宁宫”遗址，（但也不排除歇息岗，羊儿峪，西庄，车厂等村存在其遗址的可能性，因这些村都在金陵区附近）这种提法是否正确？有待于挖掘地下实物来验证。

十王坟

大房山有一条向南延伸的山脉，叫“凤凰山，”中间段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沟，称“石门沟。”从沟口至沟里自然生成三道屏障，横在东西走向的山梁上，似乎像三道石门，在第三道石门北侧，有一高大而奇形的巨石立在沟口；

这就是“十王坟”。

金史海陵(107)页，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

十帝即是十王，顺天府志记：石门峪(王志，娥眉峪北上，有十王塚，金之宗藩也。)这十帝生前只是女真族部落首领，并未坐过皇帝。金熙宗即位后，于天会十四年(1138)追谥为皇帝，定庙号，皇统四年(1145)定陵号，皇统五年增谥。十王坟在历史的岁月中逐渐消失了，而在人们的记忆中却保存下来。

据车厂人讲：从前听老人传说，石门沟里面有十王坟，但不知坟在哪里？有一次下大雨山水冲毁了地阶子，露出一块石碑，才知道十王坟的确切地点。

还传说：车厂村有一人，一生专以盗墓为生，临死前还念叨：可惜，十王坟没挖，里面一定有东西。

十王坟座落在半山腰的山坳里，占地面积约60多平方米，面向沟口，偏东方向。在层层梯田上长满一人多高的荆丛，进出非常艰难。地上散落着许多遗物：花岗石栏杆柱槽，两个华表底座，制做非常简单的柱础，汉白玉栏杆底盘，一些残砖乱瓦，油灯碗残片，花岗石阶条等，传说中的石碑一直没有找到。

十王坟修建的时间比较长，从贞元三年三月至正隆元年十月(1156—1157)大约两年之久，也许是山高路远修建艰难吧！看样子工程很大，沟里填满了碎石块，大概墓室依山开洞为穴。传说中，“十王坟未被盗”这种说法可能性很大，如果仔细观察，靠北部，靠西部还可辨认出两个大土堆，中间被一条排水沟隔开，但是十个皇帝，如何就这两个土堆？或许是每个土堆周围再各围四个？那么十个皇后又埋在哪呀？60平方米的狭窄地区，埋葬20人，不是显得太拥挤吗？很有可能打了山洞，十王坟到底是怎样建的，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十王坟未被盗过的原因有三：

(一)过去是山老林密无人问津，碑亭亭殿自然倒塌，淹没在这片废墟之中，或经雨水冲刷毁坏了原来的痕迹。

(二)大明天启皇帝对金陵的扫荡，因路远，只是拆毁地表建筑，未能光顾地下。

(三)因其诸陵打洞为墓，埋葬深而隐蔽。

不管十王坟被盗与否，都是应该重点保护的對象，十王坟现已公布于世，应防止被盗现象的发生，对它应及早挖掘整理，也许有许多金朝文物出土。

十帝及后的名称：

始祖，函普，明懿皇后。

德帝，乌鲁，思皇后。
安帝，跋海，节皇后。
献帝，绥可，恭靖皇后。
昭祖，石鲁，威顺皇后。
景祖，乌古乃，昭肃皇后。
世祖，劬里钵，翼简皇后。
肃宗，颇刺叔，靖宣皇后。
穆宗，盈歌，贞惠皇后。
康宗，乌雅束，敬僖皇后。

金章宗歇凉台

金章宗歇凉台，位于大房山之巅，海拔 1050 米，占地面积 1500 平方米，改建于金章宗五年(1197)，距今已近八百年。现遗址已是杂草丛生，荒凉不堪。

《房山县志》记载：茶楼顶在县西北二十里（即是大房山之旧称，现称猫耳山），上有金章宗歇凉台，尚存四石柱。

又记：金章宗歇凉台，“按灵峰寺在大房山之上，长沟峪之北，俗名‘上寺’”。“其碑皆隶书，为金苏敬安撰，今撮其略曰：房山南三里泉石最幽，奇处旧有梵宫，肇自唐光启(唐僖宗)二年重建，辽中章上人者，声闻朝省奏：请名额，取灵峰之义，敕赐令名。时重熙十五年也(辽兴宗)，后华严大师公官赐紫袍，以旌妙行。至皇朝开奠房山为陵寝寺，属治内，迨明昌改元复建崇圣宫，白云亭于峰顶……明昌五年重阳日。

又记：灵峰寺，在长沟峪北岭，已圯。

从以上文中可以看出，灵峰寺，上寺，歇凉台均是一处。不过据碑文，“房山南三里”应指长沟峪北之“西天宫”。(经实地观察，确有辽代遗迹，这暂且不论)。云峰寺东北方向，即是金太祖诸陵寝，南、西、北三十里范围内均是金陵的王陵区域。灵峰寺即是陵区中央，如果说“以大房山灵峰寺为山陵”，倒更为合适，但金史却说：“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而云峰寺却无从查找，周口店东有个村叫云峰寺，但却在山陵区域以外，与山陵不相关。也许海陵王选陵时把灵峰寺改为云峰寺？或许是刊印之差？不过按山陵的地理位置讲：灵峰寺即是云峰寺，也是在辽代寺庙上改建的，崇圣宫，又不知什么时候又被称为“金章宗歇凉台”，也不知金章宗是否到崇圣宫乘过凉？但它是金代遗迹，这是确切无疑的。

上面留有金代汉白玉柱础等遗物，据说“文革”前还有一口钟、一石碑与四石柱也不知什么时候就消失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 2 辑)

作者系燕化集团公司职工医院职工

北京的金陵(二)

肖 智

金陵的范围

金陵即金王朝完颜氏的皇、王陵园，位于北京西南九十余里，它以房山县城二十余里大房山顶峰“灵峰寺”为山陵中心，其范围，向东一十八里，向南二十六里，向西二十三里，周围计一百二十余里。

金陵原在黑龙江省阿城县，金朝第四个皇帝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迁都于燕京，改燕京为中都(今日北京)，随即在大房山大规模地修建了皇家陵园(当时还未设房山县，大房山属良乡县管辖)。我们称它为“北京的金陵”。金陵自贞元三年八月甲申启土，至十一月戊申，“山陵礼成”。完颜亮下令把太祖、太宗、熙宗等皇、王诸陵迁葬到大房山。正隆元年，“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大约两年时间完成了浩大的迁陵工程。

金陵距今已八百余年，它借助于大房山这一带山区的自然山水和茂密的森林，于万树群山之中烘托出宫阁、楼亭、享殿及行宫，把大房山打扮得金碧辉煌，雄伟壮丽，千姿百态，使人留连忘返。

金陵泛指金代的所有皇陵、王陵，并非指某一个皇陵。很多人把三峰山脚下的金太祖陵当作金陵，这是因为金太祖陵经过清朝重修，地表遗迹较多，所以显得比较突出，其实金太祖陵的规模远比不上金章宗陵。还有的人误称金太祖陵为“金兀术坟”。解放前，山陵附近的人都称金太祖陵为“皇陵”。

金陵大体分为两个区域：皇陵区和王陵区。

大房山向南延伸的“凤凰山”和东北延伸的“连泉顶，云蒙山”，(有人错称“凤凰山”)基本上是金代的皇陵区。在这两条山脉中也有王陵区，不过是完颜氏族的，如：《金史》记，海陵王“葬于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兆域中。”《金史》卷四87页熙宗“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金徽宗完颜宗峻，金显宗完颜允恭，入葬时均是“王”的封号，他们分别散落在这两条山脉中，以后，除海陵王降为庶人迁出陵区，熙宗，徽宗，显宗都恢复了皇帝称号。这两条山脉以外的其余各处均是金代的王陵区和其它的陵区。

《大金集礼》卷十二至卷十七记载：

“大安元年十一月三十日，承省薊奏帖近奏，差秘书监丞温迪罕胡士三司知事，边源勘坟山以西银洞事云云。今据以差官胡士等检勘得止合龙泉河为禁限西界口等商量，若准所申是为相云云。为此于十一月二十九日闻奏过，奏圣旨封堠得分朗者，余并准奏行。

——坟山禁界封堠四至周围地理：

东至万安寺西小岭一十八里

南至黄山峪水心二十六里

西至辘轳岭二十三里

周围计地一百二十八里

——坟山以西过辘轳岭有南郊河道，隔断山势，隔以西过木浮岭下至龙泉河又隔断木浮岭，其龙泉河身阔处约五十余步，水深三四尺，自陵寝红排沙至此三十二里。其坟山兴银山不是一带山势。

——银山在坟山西北，其山东西形势，岭南属奉先县，有银，洞五十四处，山岭北属宛平县有银洞六十

二处，两县银洞是一山，自陵寝红排沙以西最近银洞四十二里，最远银洞四十八里。

——取责到将去司天台阴阳人张庆渊等三人状称，相视得自陵寝红排沙以西过涧，辘轳岭道隔断山势，以西又过木浮岭，下有龙泉河身深阔隔断地脉，按地理新书五音地脉篇，凡隔坑潭江河地势已绝不相连。按兼山陵至此已三十二里，若龙泉河便为禁限，西界委是别无置疑，其东南北三面禁界止合依无定界墩为限。

大定二年正月初七日，省官刑部主事薛万亭并提点山陵，涿州刺史完颜璋同衙甲取责到司天台，张庆渊，魏器博，卢世明等三人状称：“合自坟山西北系奉先县所管神于乡上冶村，龙泉河为西界为头，排立封墩，沿龙泉河至南羌弧岭，其龙泉河水流正西南去，离坟山八十余里，止合于羌弧岭东南下坟，按坟山旧南界封墩是周围四至别无置疑，呈省，一起自万安寺西岭为头，打量至西面尽北南郊涧口，旧封墩，计地六十二里令一百四十四步。自南郊涧口旧封以西上冶村接连排立，沿龙泉河南至羌弧岭密排讫封墩一百一十六个，接连至赤石峪旧封墩计地五十八里令二百二十八步。自赤石峪口旧封墩至万安寺西岭计地三十五里令三百步，周围计地一百五十六里令三百一十二步”。

这里应该指出上文中有一点是错误的，“大定二年正月初七。”大定这个年号是错误的，应该是“大安”。大定二十九年(1191)设万宁县，明昌二年改奉先县(1193)大定二年还未设县，因其文是历史文献，本人不敢妄改，只是照原文抄上，仅供参考。

对照上文，我们看金陵范围，向东至万安寺西小岭一十八里，从坟山向东一十八里就是朱各庄村，羊头岗村后坡，其山势一高一低，高者称鲇鱼砣，低者大概就是西小岭，它像一堵低矮的围墙，顺山势，呈半圆形向西延伸到金太宗陵之南钓鱼台止，(胜利桥旁)环卫着皇陵区，朱各庄后坡上的小圆山头大概是东端的起点。万安寺已无从考证。

这里可以定为“金陵范围”的东界边缘。从此处到一局安装公司火炬下还残存着七八个封墩遗址，遗憾的是，1970年左右被拆毁，遗址只留下一片鹅卵石及残瓦(养儿峪，东流水，均在界线以北，都有金代陵墓的可能)。

向南至黄山峪水心二十六里，如果按里程讲，向南二十六里应是孤山口一带，按地势讲，应是黄山店，栓马桩一带，那么，长沟峪、娄子水、黄院、黄山店等处都有金代陵墓。在这些地区如果仔细寻找，还可以找出许多金代遗迹。“水心”大概是指沟的中心。

向西至辘轳岭二十三里：

按里程计算，辘轳岭应是大西沟，黄石岩一带地方，“辘轳岭”之名已无从查找，南郊涧口，大约是指入南窖的沟口，南郊也许就是南窖。木浮岭，羌弧岭，赤石峪等处均未访到其名，待将来慢慢地核对。

龙泉河就是大石河之旧称，发源于大安山老龙窝尖，辗转蜿蜒奔流而下，汇合各条沟之水，依山势出坨里入琉璃河，按“八十余里”之说，应指“黄土台”这一地区。

金陵中的皇陵区的具体位置，羊耳峪村北有个小村叫“上店”，村中有一关帝庙，里面有一明朝嘉靖四十二年碑，上面记载：“上店西沟开采煤窑十数个。”这可以说明，上店村在嘉靖年间，已不再是皇陵禁区，煤炭已大量开采，而大楼沟地下也蕴藏着丰富的煤层，碑文一字未提，也许是皇陵禁区，不许进入的原因，上店则为禁区的边界，此后经过隆庆、万历、泰昌至天启，相距五十七年皇陵始遭破坏，通过这块碑，我们可以认为：“上店”位于皇陵区的东端。

长沟峪矿修建断头峪家属区时，曾挖出金代的石棺，断头峪后面是康乐寺沟(遗址尚存)里面曾出现过石棺，据说也是金代陵墓。康乐寺沟北就是娥眉峪——金熙宗陵址，向北翻过山岗即是石门沟——“十王坟”。可以看出，这一带山势是葬金代皇帝的，那么，断头峪之陵也应该是金代皇帝的陵墓，那么，究竟埋葬的是那个皇帝？由于石棺出土时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已无法考证了。

如果我们把断头峪之陵看作皇陵区的一端，上店为另一端，则金代的皇陵区域大致可以定下来了。葬在

大房山的金代皇帝陵墓一般不会超出这个范围，而金太祖、太宗陵正在两端的中间，其余各处便是金代王陵范围了。

我们明确了金陵中的皇陵区与王陵区，对以后研究、考证金代诸陵大有益处，这只是本人对金陵的粗略看法，有些古今地名还没有仔细对照考证，难免有些错误。

金陵的地宫

谈起金陵，人们自然想到明、清两代帝王陵的庞大地下宫殿，认为金陵也会是那个样子，再加上民间的种种传说，把它描绘的神乎其神，金陵便被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金陵有没有地宫？据已暴露出的金代陵墓，暂时还没发现，所以金陵的地宫还是个未知数。

金代陵墓的葬法大致有三种：一、穴地为墓，就是在地上挖坑，直接放入棺椁。二、拱室为墓，就是在地下用石或砖修建简单的拱室，里面放入棺椁。三、地宫为墓，其实也是拱室的一种，不过要庞大得多，有墓道，墓门，正室，侧室等。

金代诸陵入葬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一、以海陵王为主，迁葬时期（1135年—1136年）。二、金世宗—卫绍王直接葬入时期—（1163年—1216年）。金宣宗南迁开封并葬在那里。前一时期，除十王坟最有可能有地宫，其余可能没地宫。后一时期，最大可能：都有地宫。下面把葬在大房山的金代帝王陵逐个研究。

一、金太祖阿骨打死亡日期为天辅七年（1124年），先葬黑龙江省阿城，后迁葬三峰山下（1156年）。《金史》记，贞元八月“甲申，启土”，十一月，“戊申，山陵礼成”，太祖陵修建大约三月，时间较短，不大可能有地宫。1986年北京文物所挖掘此陵址时，墓坑只是在地上凿成一个长方形的坑，里面的石棺已被砸成碎块，坑里面乱七八糟地摆着二三百斤的大石头，显然，是举起来扔下去的，这也许是明朝天启皇帝扫荡金陵之遗物。《大金国志校证》记：“至筑陵之处，亮寻毁其寺。遂迁祖宗、父、叔改葬于寺基之上。”记载与实物是相符的。太祖陵确切地说有无地宫，还不敢完全定论。

二、金太宗完颜亶死亡日期为天会十一年（1135年），先葬黑龙江省阿城，后迁葬于坟山（1156年），与太祖同期迁来。现址是今燕化东炼厂。建厂时从一大堆黄土下推出一双人棺，比其它五六个石棺大而厚，华丽。没有石碑，墓志铭。都是穴地而葬，双人棺可能是太宗与其后的，太宗陵如果不是向山打洞为墓，从现场看是没有地宫的。

三、金熙宗完颜亶死亡日期为皇统九年（1150年），先葬黑龙江省阿城，后迁葬大房山蓼香甸（1156年），大定二十八年，金世宗在临去世之前又把熙宗迁到娥眉峪，大概其陵修建的也比较好，娥眉峪沟口梯田处曾发现许多金代砖瓦，黄琉璃瓦，但没听说此处出现过石棺。只传说里面有达子坟，具体位置，尚难确指。熙宗陵可能修有地宫，这一点尚待以后挖掘验证。

四、海陵王完颜亮死亡日期为正隆六年（1163年），入葬时间，大定二年四月（1164年）。世宗将其皇帝称号降至海陵王，简称海陵王，他先葬于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兆域，大定二十年（1183年）又降为庶人，迁出陵区40里（大约甘池一带）。海陵王从死亡到入葬近一年时间，这段期间并不是为他修地宫，而是他昏庸无道，朝臣怀恨，无人顾及。海陵王的墓最多不过有个拱室，绝不会有地宫。鹿门谷葬址已无法考察，陵区西南更无人问津。

五、金世宗完颜雍死亡日期为大定二十九年（1192年）一月，入葬时间，大定二十九年四月。葬址在金太祖陵东侧。金世宗是个全始全终的皇帝，他在位时金宋两朝和好多年，被后人称为“小尧舜”。他的坟大概不会修的太草率，也许在生前就修了坟。太祖陵东侧柳家沟的金代废墟，可能是金世宗陵遗址，这里从没听说有汉白玉石棺出土，世宗陵很有可能修了地宫。

六、金章宗完颜璟死亡日期为泰和八年(1211年)十一月，入葬时间，大安元年二月(1212年)。葬址在普光寺西侧。其山之颠有连泉寺石碑，有一句“前山游玩大金章宗古墓”。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金章宗陵修建的豪华壮观，值得游玩，它占地面积也必然很大，按此类推，古栗树附近地势最为宽阔，而且还有金代砖瓦，汉白玉栏杆和柱头等。1989年9月初，北京地质勘探队邀我同去金章宗陵区考察，结果在预计地点仪器反映出呈“T”字型地下建筑，并在“T”字型地下建筑南二十余米处发现规整的地下异常现象，很象碑亭和享殿。如果真是，那么天启皇帝扫荡金陵，不知捣毁地宫没有？假设破坏了，只是对尸骨、随葬品的破坏和掠夺，地宫的轮廓不会破坏，我们还有机会看到它的真面目。若没破坏？那么地下文物必将多于其它各处。况且金代皇陵在北京第一次发现，其意义也非常之大，此处就可以办一个“北京金陵博物馆”对外开放，它将会丰富补充北京史，更能使房山和燕山地区，又开辟一个新的旅游点。

七、卫绍王完颜允济死亡日期为至宁元年(1216年)八月，入葬时间，贞佑二年四月(1217年)。《金史》未记载卫绍王葬大房山，五月宣宗南迁开封，按当时元兵压境，宣宗不会运卫绍王到开封下葬，其陵也应在大房山。卫绍王从皇帝封号降至东海郡侯，其陵也不会修得太复杂，甚至连碑也未必来得及立，就更甬说什么地宫了。卫绍王陵有两处疑点：一、长沟峪断头峪家属区出土的石棺，属金代已无异议，此陵正在皇陵区最南端，入葬很方便，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石棺是青石板制成，呈十字形，北侧石棺内遗留一个像老树皮样的圆桶(一说是铠甲)，还有水银。二、小娄矿下，“金刚圈”处在沟口，是皇陵区东北向的末端，半圆形山凹中有三个土包，中间最大。前者已无法验证，后者尚待挖掘验证。

八、金徽宗完颜宗峻熙宗父生前未坐皇帝，由熙宗追谥力景宣皇帝。死亡日期，天会二年(1126年)，贞元三年与诸王改葬于大房山诸王兆域。葬址不详，可能在双泉沟、大楼沟等处。根据太祖、太宗等处出土的石棺来看，迁葬来的诸陵一般没有地宫，此陵可能也没有。

九、金德宗完颜宗幹是海陵王之父。海陵王杀熙宗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即追谥宗幹为睿明皇帝。大定二十二年又被世宗降为辽王。死亡日期，皇统元年(1141年)，贞元三年八月迁葬于大房山。按《大金国志校正》记载：“亮寻毁其寺，逐迁祖宗，父，叔于寺基之上。”(叔，大概是兀术)宗幹可能是代替了宗尧陪葬太祖，以至未迁宗尧。金史没有记载宗幹迁往它处，也许还在太祖陵园内，也许在太祖陵西侧的阁儿沟、周家峪等处，估计也没有地宫。

十、金睿宗完颜宗尧是世宗父。死亡日期，天会十三年(1138年)，迁葬日期，大定二年(1164年)。由世宗迁葬在太祖西侧，继续陪葬太祖。宗尧是由世宗追谥为皇帝的，可能在未迁陵之前就为其父修建了地宫和陵园。目前，只发现了宗尧的墓碑未见其墓坑、石棺。宗尧的地宫大概在太祖陵西侧的小山包中，其坟头立在山包之前，就是当地老人看见最西头的陵墓。不久可能将其地宫挖掘出来。

十一、金显宗完颜允恭，世宗子，章宗父。死亡日期，大定二十五年六月(1188年)，入葬时间，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金史未记载葬址，按实际考察，可能葬在大楼沟下，章宗陵之西，因那里发现金代的砖瓦，柱础，绿琉璃瓦，可能是其享殿遗迹。显宗可能有地宫，但规模不会太大。

十二、十王坟，金之十帝陵，这十帝是女真族部落首领，由熙宗追谥为帝。迁葬时间，正隆元年(1157年)，由海陵王从东北迁来。葬址，车厂村南石门沟半山腰。修陵时间大约两年，沟中堆满了碎石块，看得出，是手工开凿的。十王坟很可能是依山开洞为墓。那么，地宫也自然在其中，也许它是金代陵墓中最大的地宫群，将来可能与我们见面，让我们饱览金代文化遗产。

以上是葬在大房山金代称过皇帝的陵墓有无地宫的概略推断，大都是根据地表遗迹、皇帝生平、地势等推理判断，仅作为有兴趣于金陵研究者的参考。

金陵的布局

金陵是怎样布局的，是杂乱无章？还是有章可循？大概从建陵至今无人去注意它，由于本人对金陵研究兴趣浓厚，经过反复观察、比较，觉得金陵就象临阵对敌的阵势，以太祖、太宗为中心（太祖在后，太宗在前），完颜子孙环列两侧，它又像依借山势排列成一个“金”字。

金陵的布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这里只谈太祖陵及周围的两个部分。

一、金陵的中心

太祖陵背倚三峰山(从北庄附近看，三峰山的头一个小山尖非常像一个头盔)，左前方有坟山作为屏障(坟山像一个半圆形的帐篷)。坟山下就是太宗陵，其山势不高，也不雄伟。三峰山左右有许多奇峰险山，却不去葬，反而葬在低矮的坟山，这不是有意的布局吗？太宗生前与太祖征战四方，太宗总是为太祖打前哨，在阵前指挥，死后又被安置在太祖陵前，而太宗陵前又有一道老虎山作为屏障，燕山火车站后的白水寺里面的三座石佛又设在老虎山的前方，白水寺石佛很大可能是金代在山陵下修建的山神庙，也许就是当年的祭灵处，这三点形成了金陵的中心。

从另一方面说，太宗是太祖之弟，也不便葬在太祖陵山后或身边，太祖与太宗在传位之前，有口头协议：“死后子孙互传”，所以太宗把皇帝位传给太祖嫡长孙熙宗，但海陵王迁陵时还是有偏心眼，把亲祖父太祖葬在雄伟的三峰山下，把叔祖父葬在山陵之前沿，来守卫太祖的前门。

二、太祖陵的两侧

海陵王以太祖陵为中心，把完颜氏族的诸王陵寝散布在两侧(其中也有皇陵)来拱卫着太祖。

西侧，鹿门谷诸王兆域；东侧，蓼香甸诸王兆域。

《房山县志》记载“金章宗歇凉台”一文中说“歇凉台东临鹿门谷”。指出了鹿门谷的具体位置，它向南一直延伸到断头峪，形成了以太祖为中心的西南侧一线。

《金史》记，“以思陵狭小”；《大金国志校正》记：“遂迁祖宗于此，唯熙宗葬于山阴”，祖宗即是太祖。按此推理，山阴大概是指双泉沟、大楼沟、后沟等处。这条沟大体上是东西走向，沿沟的北侧地势比较宽阔，而且散落着许多金代的砖瓦，其山顶巅处连泉顶石碑也记载着大金章宗古墓在这条沟中。此处很可能是蓼香甸诸王兆域。

如果此处真的是“蓼香甸诸王兆域”，那么就形成了以太祖陵为中心的东北侧一线。这两侧诸王兆域就起到了拱卫太祖的作用；很象出战时左右众将围绕着太祖，这与太祖生时的战斗场面很相似。这两条沟又像“金”字上边的“人”字，坟山，老虎山就像“金”字里面的两个横，整体上看就像“金”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海陵王选陵时确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大金集礼》记载金陵的范围，“向南二十六里，向东一十八里，向西二十三里”，位于大房山顶峰的“灵峰寺”就是金陵的制高点——金陵的中心，应该说“以灵峰寺为山陵”《金史》上“以云峰寺为山陵”的“云”字可能有误。

如果挖掘验证，两条山沟确是两个诸王兆域，那么不久的将来会有许多金代墓葬出土。

金代山神庙

金代山神庙遗址在车厂村东、胜利桥北坡(冯全钓鱼台后，今遗址无存)，呈正方形，长宽各60米，面朝南，盘山道还可辨认，四周有护墙，两层院落。遗址上还残存着金代绿琉璃瓦，被砸碎的汉白玉石块，石

条，残砖等物。当地人还知道：此处叫“保陵公”还称它为“停灵殿”。

金代修的山神庙有两个，一个叫“山神庙”一个叫“山神堂”，山神庙是大定二十年所建(1183年)，山神堂是大定二十一年所建(1184年)，也就是保陵公。

《大金集礼》载：“大定二十年十月三日敕旨山陵下盖山神庙，今后，但节下去后交享祭。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检定下项礼数，蒙准呈每遇享祭日，先次设祭物于山神庙，俟差去官山陵行礼后，礼直官引提点山陵官，公服诣神位前再拜，少进，北向跪奠讫，免伏兴复位立读祝官，读祝讫，免伏兴献官，再拜，读祝官奠版于神位前，俟礼毕，诸陵署官取祝版焚之”，“大定二十一年，敕旨坟山起盖山神堂，合封王，合封神，礼部定了奏知本部……”

从这里可以看出，金代的山神庙在山陵之下，据调查有两所，一、在胜利桥傍，靠钓鱼台，就坟山村老人亲眼所见，山神庙修得很排场，院里有一石人用铁链拴着一只石刻的老虎，也不知解放后哪位勇士把它砸烂了。传说原来山陵地区，山高林密，老虎经常出来伤人，自修了山神庙就制服了老虎，以后就再没出现老虎伤人的事情。二、燕山火车站旁有一明朝重修的白水寺，这里正是山陵之下，此处还遗存着一个拱形的全石结构的庙宇，里面有三座石佛，一高二矮，其中一个被砸掉了脑袋。原有一座石桥跨沟而过，传说中“有桥无路”正是此处。山顶处曾有一华表，大概与山陵有关。现在立着一个经幢，被本地人讹传为“穆桂英拴马桩”。“山神庙”也许就指的是白水寺。

山神堂在坟山上，这已不用考证，也就是火炬下的山神庙遗址，它就是“保陵公”。坟山村老人大概看过庙里的石碑上的册文，能知此庙是“保陵公”这与《金史》的记载相符，看大定二十一年敕封山陵地大房山神为“保陵公”册曰：

“古之建邦设都，必有名山大川以为形胜。我国家即定鼎于燕，西顾郊圻，巍然大房，秀拔浑厚，云雨之所出，万民之所瞻。祖宗陵寝，于是焉依，仰惟岳镇，古有秩序，皆载祀典。矧兹大房，礼可阙欢！其爵号服章，俾列于侯伯之上，庶足以称。今遗官备物册，命神为保陵公，申转有司，岁时奉祀。其封域之内，禁无得樵采弋猎，著为令。”

由于庙毁碑亡，人们再也看不到它的全貌，只能在庙的遗迹上追索当年，但是碑文中的“保陵公”却在本地人的记忆中保存下来。关于山神庙是“停灵殿”之说纯属妄谈，从年代上看，是金世宗二十一年所建(1184)，金世宗在建庙之前先是迁其父，再迁其后，其梓官都是停于磐宁宫，以后各帝也没有停灵山神庙和磐宁宫的记载，海陵王迁诸陵时还没有山神庙，更别说停灵了。

据车厂和坟山村人讲，过去车厂附近到处开有煤窑，从张家口等处雇工挖煤，一旦伤亡，就抬出来停在山神庙，待其家属来处理，久之，就称山神庙为“停灵殿”，此种说法倒像在情理之中。坟山的山神庙不是金代的“停灵殿”而是“山神堂”——“保陵公”。

金太祖陵区概况补

一、柳家沟遗路：

金太祖陵区东侧有一条沟，叫柳家沟，一直通向龙门口，从陵区的南端至北端泄水洞止，沟中用花岗岩砌成的路已被山水冲得七零八落，路的两侧遗有汉白玉栏杆，有的路段中间还遗有两条一寸深的车辙，此路可能是当年的祭灵之路，因年深日久被木轮车上的铁皮轧出深沟，似乎像对我们诉说着当年太祖陵区的盛况。

二、泄水洞：

东西长百余米，宽一米许，高一米二左右，由花岗岩石块砌成，太祖陵东侧留有洞口，西高东低(西口已被乱石堵死)，穿过三个小山头，就是清代所修的三陵(坟包之后)，西：睿宗，中：太祖，东：世宗。太

祖有遗迹，其它没有。因此，泄水洞被披上神秘的外衣，“一通向墓室的隧道”。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墓室的隧道暴露在外表。这只是因为太祖陵区地势平缓，背后即是高山，每至降雨，山水骤增，山洪下来后必冲毁陵园，所以修此洞以遏山洪，保护陵园内的诸陵。如果按这种说法，那么在三个小山头之间也应该各有一条小泄水洞与此洞相通，为验证“泄水洞”之说是否正确，笔者曾亲自钻进洞内查看。进洞向西不远，洞壁北侧就发现一束光线，这里正是世宗与太祖陵后的小山头中间，果然找到了花岗岩砌的小泄洞，洞口很小，只能爬行，由于洞内的积土太多无法深入而终止，再向西走十余米，洞内倒塌而折回，出洞后，沿洞的走向找到了西边的洞口，狭小的坑口忽而涌出无数条长蛇。这些事实可以说明它不是通向墓室的隧洞，而是保护陵园的“泄水洞”，挡住了从西、北方向下来的山水，沿洞排向柳家沟汇入圣弘池。

三、关帝庙遗址：

在太祖陵小山头后背，有一二十余平方米的地基，留有明代的残砖，地基南端与小山头中间被挖了一道深沟。据说，这是“斩龙头”。康熙二年九月御制碑文中记载：“天启元年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金陵，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压胜之术。”这个遗址许是明“天启三年”年所修的关帝庙。

四、《中国历代帝王陵寝》中记载太祖陵区的状况：

……由于人为和自然的破坏，房山金代诸陵寝。早已荒废，不仅地面建筑全毁，地宫也遭盗掘，除清初修葺的太祖、世宗陵尚有遗迹可考之外，其余诸帝后，王妃陵墓连遗迹也不多了。

太祖(阿骨打更名完颜旻)世宗(完颜雍)两陵东西仅隔三四十米，现除封土(即坟头)尚保存之外，其它地表建筑，已经倒塌。太祖睿陵的封土较大，高约五米余，周围约三十余米，其结构下部为砖砌，上部用三合土夯成。从这种结构的形式判断，当是清朝重修的遗迹了，因为明朝以前尚无用砖和三和土修筑坟头的情况。

在坟头的南面有享殿台基遗址一区，用光平的平石砌成，殿基面宽十六米，进深十二点二〇米，高出地面五十多厘米，上有纵横排列的石柱础四行，共十六个，柱径约三十厘米。在坟头和享殿的周围，有东西约二十六米，南北约六十米的残毁围墙环绕，残墙用砖石砌成，也是清朝初年所重修的，但从残墙中还发现辽金沟纹砖的遗物，当是清初修缮时所用的旧料，院墙之南，有碑亭遗址一座，亭顶已毁，亭内碑文已剥蚀不清，当是清顺治世祖章皇帝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文。世宗兴陵的结构与太祖陵相同，坟头也是砖和三和土结构，但规模稍小。享殿遗迹已看不出来，陵前亦有残碑亭一座，亭内石碑即是康熙二年九月所建，御制碑记述了明末毁陵和清初修陵的经过，字句尚还清楚。

五、1967年太祖陵区状况：

“文革”期间，笔者闲余在家，被“金兀术坟”之名所吸引，一路打听，找到“金兀术坟”(当年不知是太祖陵)在数层大块梯田的最上端，有三个小山头。中间最大，山头前有大坟，坟底部用砖砌着，上面抹得溜光，像是大蘑菇，坟头已被刨开一半，露出地表石头，由一道东倒西塌一米多高的围墙环卫着，坟后小山头上有一棵小树正罩在坟头上，坟前十几米有两个像土地庙一样的小房，高约一米六左右，中间摆着一石供桌，一石香炉，四周都是农田，陵区四处散落着黄绿琉璃瓦、残砖、石条等。

金太宗陵

《日下旧闻考》记，“金太宗所葬之坟山，号曰“豫陵”。这是该书引自于《神麓记》，但两书的陵号都错了，太宗的陵号曰：“恭陵”。太宗的葬址基本上是现在燕化东炼厂所在。建厂时推去了所有的遗迹，目前，东炼厂西绿化队处偶而还可以看见一块半块残砖碎瓦。

《金史》记，天会十三年“三月庚辰，上尊谥曰文烈皇帝，庙号太宗。乙酉，葬和陵。皇统四年，改号恭陵。贞元三年十一月戊申，改葬于大房山，仍号恭陵”。可见，金太宗陵从没有称过“豫陵”。

金太宗陵目前已不可考，就坟山村老人亲眼所见金太宗陵出土的遗物：

汉白玉石棺五、六个，其中有一双人棺，上面有两块石棺盖，石棺长约3米，宽约一米五，厚0.3米，最薄处0.2米，棺的南面有一洞，显然被盗过，里面有三个铁篮，别无它物。其中一个石棺有一镏金面具和水银，东炼厂南门附近还有一道东西走向的大围墙，北门靠山处有一山洞，据说无人敢进而掩埋，另外还有好多用汉白玉石条和花岗岩石条砌的地阶子。此地没有发现墓碑，墓志铭及带有文字的东西。

出土的石棺有没有金太宗？还不敢定论，《金史》太宗记只祔一后，双人棺很可能是太宗？也有可能以后在坟山的某一处山洞发现其陵。

金熙宗陵

金熙宗陵位于房山县城西，西庄村西坡，大房山支脉凤凰山中段娥眉峪沟，北靠金代十王坟。

金熙宗完颜亶，金太祖阿骨打之嫡孙，金朝第三个皇帝，于皇统九年，丁巳（1163年）被其弟完颜亮所杀，享年31岁，在位十五年。

海陵王完颜亮杀了熙宗，“降帝为东昏王，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谥武灵皇帝，庙号闵宗，陵曰思陵。别立庙。十九年，升祔于太庙，增谥弘基纘武庄靖孝成皇帝。二十七年，改庙号熙宗。二十八年，以思陵狭小，改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诏中外”（《金史》）。

《大金国志校正》载：海陵王迁诸陵于大房山，“唯熙宗葬于山荫，盖以刑余遂不入陵”。如果按金太祖陵的地理位置讲，山荫，就是太祖陵后山，“遂不入陵”就是没有和诸王陵排列，而是葬在诸王兆域的某一角，此地似乎像是大楼沟左右，也就是地毯厂北坡。按“思陵狭小”之意查找，审度各条山沟、地势，唯大楼沟北侧有一条狭而短的山沟，从外部几乎看不到沟里，很像一个葫芦，口小肚大，它长约二三百米，宽约五十余米，中间靠西有一平台，台上长了许多核桃树，台基西侧一股泉水汨汨涌出，雨季后台基东侧沟里形成一股小瀑布。在倒塌的台基中可以看见里面埋葬着大量砖瓦，当地人说此地是“庙”，但谁也没见过，都称它“殿台子”。假如把熙宗葬在此处，倒符合海陵王仇恨熙宗之心，这里还有几分“瓮中之鳖”之意。

海陵王迁太祖于三峰山，迁太宗于坟山，迁诸王陵于鹿门谷，而蓼香甸不大可能越千米之山，葬之其后，或沿龙泉河（大石河）逆水而上。所以，大楼沟殿台子，后沟等处可能是金代的“蓼香甸”诸王兆域，那么，那里将埋着许多金代陵墓。

现在峨眉峪沟口梯田上，还残留金代砖和黄琉璃瓦，而且黄土层也厚。向里，峨眉寺遗址处都是山石劣土，这里从未听说有石棺出土，奇怪的是连块石碑也没有，在残存着汉白玉石块上，一点字句也找不到，熙宗的石碑会不会被拉走盖房修庙？还是长眠于地下等待我们去叫醒它呢？

金代遗字

在房山县城北有个村叫“养儿峪”，村南头高岗上，有一花岗岩巨石与一小石孤伶地停在那里，像一头大象领着一头小象慢慢地走着……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羊儿峪大象石”，石上刻有醒目的大字：“卓尔不群”。然而象石上的真正价值并不在这里，上面还刻有800年前的金代遗字，因其字小，很多人并不去注意它，字句经过数百年的风吹雨淋，已有些模糊不清，如果不及时抢救，就有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淹没，岂不可惜？

《房山县志》记，“养儿峪大象石，县西北十二里，一名红羊峪，有大石高二丈余，形似象故名象石。上有唐贞观元年刻石，其文：古石异样，其名曰象，问我生时，天地未判。民国十三年，村人白文珊，赵普

泉等恐其日久湮灭复题‘卓尔不群’四字，刻于石，以记胜，石前有庙，即名象石庵。”

《房山县志》记载不但纪年上有错误，连文字上也有错。请看象石上左下角，(从北面)竖着刻有：“古石异样，其形类象，问我生时，天地未判。贞元乙亥仲春二月二日。”贞元是金朝皇帝海陵王迁都北京后的年号，也正是派司天台来大房山选陵址之时，是金代的遗孑。《县志》却把金代的“贞元”写成唐代的“贞观”，一字之差相距几百年。“其形类象”，写成“其名曰象”。直到现在还有人重复这个错误。

金陵古路及封堠遗址

金陵境内有遗迹的古路有两条：

一、从羊头岗沿着朱各庄北坡(顺河沟)到东流水望日台在北化建院内分叉，一向白水寺方向延伸，二向养儿峪村西。到此处又分为两叉，一向大楼沟方向，二向上店。山上花岗岩断续遗留着许多车辙，深 0.10 米，宽 0.20 米，外轮距 1.20 米，路宽一丈许。路两侧都有护基石，北侧沿山势砌有护墙，已东倒西塌，透过杂乱的荒草，还可以看出路的弯弯曲折的轮廓，给人以追忆当年凄凉的感觉。访本地高龄老人都不记得此路，可见其路年深日久。这条路可能是当年入陵路线之一(可从养儿峪村西去大楼沟到金章宗陵)。

二、从房山北关至洪寺、塔湾，上迎风坡到良各庄、西庄进车厂。

据说这条路在民国初年热闹非凡，长沟峪、西庄、车厂等数十座煤窑的煤都用牲口驮，必经此路，运至洪寺转向它方，这条路也是通往金代西侧陵区的最近最好走的路，不过随着金陵的覆灭和煤业的兴起，入陵路线变成了运煤路线，仔细观察还可辨认当年的护基石，车辙已被马蹄踏成石窝。

封堠遗址：

据《大金集礼》记载黎尉，沿金陵禁界都有封堠。其遗址在金陵东界，羊头岗、朱各庄北坡、望日台等处，高 3 米许，直径 15 米许。各处的堠都是就地取材，如望日台附近的封堠就是河卵石砌成，因年代久远，历史的尘沙已吹满了石缝。而朱各庄北坡上的封堠遗址是用山石砌成。这里一直被当地人称为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之处和假粮仓，可惜的是 1971 年才被朱各庄村人拆毁拉走盖房。每个堠周围都残留着砖瓦，可能是当年守陵驻兵之处。目前，地表还可以看见一些遗迹。羊头岗北坡、羊头岗村南、小洪寺北坡等处都曾残留着一些封堠遗址，人们称它为大石堆、黄土台等。

(《房山文史资料》第 3 辑)

北京的金陵(三)

肖 智

金兀术其人其墓

金兀术是不是葬在大房山？是不是埋在太祖陵侧？没有文字已载，也没有石碑出土，目前，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对金兀术坟我们只能做一些判断和猜测。

在太祖陵附近有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地方，那就是阁儿沟(又叫皋儿沟)“牛皋坟”。

牛皋坟就在太祖陵西侧，去过太祖陵的人一般都要去牛皋坟转上一圈。因为有牛皋坟吧，人们便把这条沟叫作皋儿沟，又叫阁儿沟。皋儿沟长二里许，山后(西侧)即是房山的名胜古迹，“三盆水、十字寺”，沟口靠北侧有两块长方形的梯田，在第二块梯田的中间，有凸起的古坟遗迹，四围散落着大量的明朝砖瓦、汉白玉碎块、花岗岩阶条，梯田下还可以找出许多金代的砖瓦残迹，很显然在这里金代曾有过建筑。

明代末期，女真族后裔努尔哈赤在东北建立了“金国”(史称后金)与明朝分庭抗礼，天启皇帝依“风水、王气”之说，认为努尔哈赤的后金国与他们的祖先葬地金陵风水有关，不但捣毁了金陵，而且在每一个陵上都修建了关帝庙。由于当时《岳飞传》上有牛皋骑在金兀术身上乐死的故事，于是便在金兀术坟上修了牛皋坟，旁边又建牛皋塔。这些是本人根据：“牛皋坟，皋儿塔”和明朝建筑遗迹，金代砖瓦石料来推测的。

另外，《金虏图经》记载海陵王迁其父，其叔葬于寺基之上，叔，是不是金兀术？海陵王未篡位之前曾在其叔兀术帐下任职，而海陵之叔又不止一个，葬在寺基上的叔，假设是兀术，世宗迁其父睿宗于太祖陵傍时，兀术与宗干可能会迁出去，虽然史书没有记载迁往何处，我们猜想也不会离他父亲太远，牛皋坟处离太祖陵最近，以此类推，皋儿沟的前方周家峪处与龙门口沟的左侧空旷的梯田也应是金太祖阿骨打的儿子们的陵墓，皇太子陵区，对不对？不能下结论，仅作参考。

根据史料记载：兀术名叫宗弼，兀术是女真名，宗弼是汉名。《金史》称兀术是太祖第四子，《女真传》称兀术为太祖第六子，四子，六子之差，是因为兀术下江南时其二兄已死，故称四子。

兀术生母为太祖元妃乌古论氏。兀术六下江南：

第一次，随宗望伐宋，入河南攻下汤阴县降其卒三千人。

第二次，随宗辅攻山东，打败宋军郑宗孟数万之众。回师途中突然被宋军三万余人包围，兀术率军奋勇拼杀，宋军死者一万余人。

第三次，兀术奉诏率军伐宋，攻开封府，夺大名府，占领整个河北，其后兀术又追宋康王赵构于扬州，走越州，“宋主走，入于海”，兀术大获全胜，所得战利品无数，回师途中不幸被宋军名将韩世忠围困在黄天荡，兀术广求良策，一夜间开通老鹳河故道三十里，突围后又在大江之中与韩世忠展开水战，兀术令军士以火箭射烧韩世忠船，宋军大败，兀术乘胜追杀七十余里，韩世忠侥幸脱逃。过江后，兀术又被宋军张浚包围，兀术险遭被杀，后被部将韩常拼死救出，又合兵一处，打败张浚。途中又与宋军吴玠展开激战，宋军凭险据守，兀术又中伏击，全军几覆没。

第四次，兀术奉诏率军南下，在收复汴州时打败宋将岳飞。

第五次，兀术伐宋，进取中原，北中国已进入金军控制之下，宋朝皇帝迫于金军的攻势上书请和，金朝册封宋康王为帝，康王给金朝皇帝上表称金主为伯皇帝，自称侄皇帝。

兀术为尚书左丞相，都元帅兼侍中时，又第六次举兵南征，遇岳飞，败于顺昌、郾城、柘皋、朱仙镇。宋朝又转败为胜士气高昂，上表熙宗，要南北各守疆土，息战和好，百姓免受涂炭，秦桧此时也劝康王，“北自北，南自南，”主和不主战。皇统七年兀术迁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兼修国史，皇统八年(1148年)病死于东北。

如果皋儿沟的牛皋坟真的是压着金兀术坟，一旦挖掘出来，将会引起更多的人对金陵的兴趣。

因金陵而建的房山城

原房山城，周长四华里，高丈余，城墙由花岗石包砌而成，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各有城楼。如今，这些建筑早已不见，只西北角还可看出城墙残土的遗迹。房山城是什么时候建的？为什么建呢？

房山这个地区在金代之前曾隶属于范阳郡涿州、良乡县等，金朝第四个皇帝完颜亮，自1153年从上京迁都于北京，1155年便在房山县城西北大规模修建了完颜氏的皇家陵园并责成涿州刺史提点山陵事务，由于涿州距房山山陵路途遥远，山陵事务繁多，管理不便夕所以金世宗完颜雍死后，其嫡孙完颜璟即位之初，于大定29年(1189年)在大房山陵傍置万宁，以奉山陵。

万宁的作用只是管理陵寝事务，不作为行政县。其意为万世寝都迁葬于此，故于明昌二年(1191年)改万宁为奉先县。

万宁、奉先这两个名称都来自于金章宗时期，章宗，卫绍王、相继葬于此，宣宗南迁后，奉先便有些冷落，至哀宗守绪被元宋联兵消灭在河南，此时已设县46年。以后到了元代，奉先之名一直用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因奉先县西北有大房山，高耸入云，巍峨险峻，遂又改名为“房山县”。从设万宁县到今天，房山已有800年建县的历史。

房山县城最初修建在洪寺村东的两山之间，扼守着西去陵区的大门，是座土城，城墙高一丈多，周围长一千四百四十步，有四座城门；东叫朝曦，南叫迎恩，西叫仰止，北叫拱极。从西门，北门的名称来看也与山陵有关。

这座小小的金代土城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一直到了明朝，由于长城外的少数民族趁明朝微弱之际，从紫荆关闯到北京附近抢掠骚扰，房山便又成了北京西南的门户。所以，在明隆庆年间对房山城进了彻底的整修，城墙增高加厚，同时加宽加深了护城河，引东、西沙河围城灌之，又用本地产的花岗岩石包城（在建城史上用花岗岩包城为数不多）。房山城从一个看守皇陵的土城就变成了保卫北京，易守难攻的石城，重新整修的房山城出于保卫北京的需要，原来的位置已经不合适，所以县城向东移了一段距离，与东面齐家坡，西面的山顶庙形成犄角之势。

现在，房山地区还流传着当年选城址时的一句话：“三山不露，四水不流，”说的是房山城的位置是建在三个小山包上，四个城角有四个大坑，城外东、西沙河，象两条龙环绕着房山城，两条河又同时注入琉璃河。据说，当年从琉璃河上来的船能驶到房山城北，还能驶到洪寺村后。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城中心确实高出许多，四角的四个大坑，解放后，仍有遗迹可见。民间传说：“京涿州，怯良乡，不开宴的房山县”大概也是来自金朝。

房山县在金代确与众不同，它受金朝皇帝直接管辖，专处陵寝事务，在皇帝和皇帝祖先的陵前怎么能设筵招待各方官员呢？久之，“不开宴的房山县”就成了，“不开眼的房山县”了。金代的山陵延锦百里，倒占有全房山县的三分之二，真可以说是“陵寝县”了。

当年金朝皇帝一年中不知要来山陵多少次？到山陵下葬的皇后、嫔妃、王及完颜氏族成员又不知有多少？房山县车水马龙。热闹非凡，运灵车，祭灵车，包有铁皮的木轮车一趟又一趟地行走在房山城的山岗上，把坚硬的花岗岩硬是轧成20公分深和宽的车辙，至今还保留在山岗的某些地方。金朝虽然灭亡了，可完颜氏族的后代一年四季还是不断地来房山祭陵，香火不断。到了明朝末期，因女真族努尔哈赤在东北建立了大金国(史称后金)与明朝对抗，天启皇帝一登基便下令“罢金陵祭祀”禁止女真族入关祭陵，由于明朝军队在东北战场上连续被挫败，加上“风水、王气”之说，激怒了天启皇帝，故于天启三年(1623年)下令捣毁金陵，从此金代的陵寝就从地表上消失了，房山县也因此冷落下来。

清代，顺治、康熙时期分别对金太祖、世宗等陵进行整修，又从房山北关经北庄、歇息岗(今岗山)、沙峪(今凤凰亭)到坟山修了一条路，即使这样，也没有给房山县城带来多大变化。民国时，房山县山区盗贼蜂起，有明显特征的陵墓全被盗坏，金陵自然不能幸免。

解放后，房山城的市容、市貌发生巨大变化。七十年代末，城墙逐渐被拆除，尤其是在城西北金太宗陵址处建立了炼油厂，给古老的房山城又带来新的生机。随着燕化公司在金陵范围内的兴起，房山城旧貌换新

颜，800年前曾红火一时的奉先，800年后又火红起来了。

金朝皇帝在房山的行踪

房山县过去是个很普通的小县，但它也有一段“繁华”的历史，现摘录《金史》上记载金朝皇帝来房山的活动情况如下：

海陵王完颜亮

一、贞元元年三月，海陵王迁都于燕京，十月就到良乡打猎，封良乡城东的料石岗神为“灵应王”。海陵在未篡位之前就早有野心，曾数次路过良乡，在此祠前，“持杯致祷曰：‘使吾有天命，当得吉卜。投之，吉’。又祷曰：‘果如所卜，他日当有报，否则毁尔祠宇。’投之又吉。故封之”（《金史》）。看来海陵王还是个守“信用”的人。

二、贞元三年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丙寅，如大房山，营山陵。”（金史、卷五104页）这是史书记载金朝皇帝第一次来房山，可以说，先去了坟山，龙门口，车厂等地，再巡视其它陵址处，订下了金陵的布局，从此北京地区有了正式的皇帝陵墓。

“七月癸丑，太白昼见。辛酉，如大房山，杖提举营造官吏部尚书耶律安礼等。”（金史卷五，104页）

“八月壬午，如大房山。甲申，启土，赐役夫，人绢一匹，”此时建陵工程也正式开始。“九月己未，如大房山”。

“十月丁酉，大房山行宫成，名曰磐宁，戊戌，还宫。”（金史卷五，105页）海陵王迁都于北京后便看上了大房山的山清水秀，又修建了供帝妃们玩乐的行宫——磐宁宫，这在北京地区还算第一个。

正隆元年二月“庚子，谒山陵”。

“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视山陵”，（金史卷五，106页）此时，太祖，太宗等陵已基本竣工。

“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闰月己亥朔，山陵礼成，群臣称贺”。（金史卷五，107页）北京的金陵迁葬工程已经结束，历时两年，耗资无法计算，浩大的迁陵工程在我们后人看来是毫无意义，但当时金、宋两朝开兵见仗，互争领土之时，意义却非常巨大，这是海陵为夺取江南一统中华迈出的第一步。

正隆六年“辛酉、谒山陵”（金史卷五，112页）这是海陵王在下江南之前来向他的祖先告别，也是他最后一次来房山祭陵。之后，便召集各路兵马，征调粮芽、战船，此事引起宋朝君臣的恐慌，急派使臣张庆来北京探视虚实，海陵欺骗宋使说：“朕昔从梁王军乐南京风土常欲巡幸，……帝王巡守自古有之……况朕祖宗陵庙在此，安能久于彼乎。”此时道出迁陵的动机。海陵没想到，两月后他也“葬于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兆域中”（《金史》）。

金世宗完颜雍

大定二年正月“乙亥，如大房山，丙子，献享山陵”（《金史》）。此时金世宗从东北来到北京后，先要看看祖先陵寝，遍走各陵。

大定二年九月“辛酉，奉迁睿宗皇帝梓宫于磐宁宫。”也许，世宗不愿带后妃在山陵地区游玩，就把海陵王时期的行宫改作停灵殿，“十月戊辰，如山陵，谒睿宗皇帝梓宫”，“戊子，葬睿宗皇帝于景陵”（《金史》）。

大定三年八月“乙酉，如大房山，丁亥，荐享于睿陵”(《金史》)。

大定七年八月“己未，如大房山，壬戌，致祭睿陵”(《金史》)。

大定二十九年正月，世宗死，“四月乙酉，葬兴陵。”金世宗在他当皇帝后十年中，很少来房山祭陵，三番五次去东北老家。

金章宗完颜璟

大定二十九年八月，“丁酉，如大房山，戊戌，谒奠诸陵。”

九月，“乙酉，如大房山”。

十月，“丁亥朔，谒奠诸陵”。

十二月，“乙巳，祭奠兴陵”。

明吕元年正月，“甲子，如大房山，乙丑，奠谒兴陵、裕陵(《金史》)。

二月，“甲寅，如大房山”。

三月，“乙卯朔，谒奠兴陵”。

二年四月，“乙酉，葬孝懿皇太后于裕陵”，裕陵是章宗父允恭之陵，十之八、九有地宫。九月，“甲寅，如大房山，乙卯，谒奠裕陵”。此时的进陵路线可能改为北线——双泉沟。

四年四月，“丁酉朔，幸兴隆崇妃第”。可以看出，世宗之妃未必都与他合葬，一部分可能葬在兴陵傍。

九月，“庚午，如山陵，次奉先县，辛未，拜天于县西，壬申，致奠”(《金史》)。据此，可以肯定金朝皇帝在奉先建县后进过县城。

大安元年春“二月，甲申，葬道陵”(《金史》)。

卫绍王完颜允济

大安元年九月，“如大房山，谒奠睿陵、裕陵、道陵”。卫绍王是世宗的第七子，章宗的叔。

以上是金史记载金朝皇帝来大房山的活动。

大楼与小楼

在金太祖陵的东北，连泉寺山脚下，有一条长约二里的山沟，沟口处有一荒圯的建筑遗址，四周有院墙围绕，占地面积，约三十平米，东、北、南三面已塌毁，只有西部院墙还保存着二米多高的残迹，院墙的西北角有一个石砌的高约五米的建筑，类似于瞭望台或烽火台。本地称之为“大楼”，大楼沟因此得名。楼的东侧已圯，楼里面有一条通向顶端的曲折通道，楼的顶端还可辨认出花岗岩砌的垛口。东面的地基还可看得出一个被乱石砌死的圆形大门，北面地基下还有一口被乱石填死的枯井。

这个大楼耸立在这里有多少年？

它又向我们暗示着什么？无论谁看见它，都觉得它是那么“神秘”，于是，便产生了许多美丽而吸引人的传说。

说大楼是宋代穆桂英的点将台；

说大楼是关押白天竺的监狱；

说大楼是辽将韩昌的营垒；

这些传说大部出自于民国期间“说书”者之口。

《房山县志》对大楼有文字记载：

“县西北二十里羊耳峪西塔儿沟，楼在沟口内，高六，七仞，叠石而成，四面有门，中穿一井，明末邑人避乱沟中，以板盖井，以便出入，别无歧路，撤去木板，外人不能进，有一夫当关之势，今名大楼沟盖由于此。”

这段记载给我们以启示，就是明朝时此楼就有，可还是不能说建于何年，又因何而建。据说，古井中有一块石碑，也许上面记载着它的来历。

从大楼沟向东约二里至小楼矿，路傍有一废弃的地基，现已化为梯田，人们称它为“小楼”小楼矿因此得名，县志记载山上还有一股泉水，叫小楼泉，四季不涸。

据本地老户赵家传说，他们祖上从北京迁来时就住在小楼这个地方，也没见过小楼，后来在小楼的西侧盖起了赵家大院，小楼这个地方就种了地。从二米多高地基遗址上看，小楼这个地方不是赵家所有，谁也不会用几百方石头垫地基，可以说小楼与大楼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

大楼与小楼之间有三条沟：后沟，草帽沟、宝顶沟。这些名称自然是近代人起的。

小楼与后沟中间是赵家大院，这里的面积很大，地势也较宽阔，尚未发现金代建筑残迹。后沟与草帽沟中间是普光寺，这里已发现许多金代砖瓦，石柱础，磨的溜光的石臼。普光寺修建年代不详。据说原来是关帝庙，光绪年间赵家无子，到庙祈求，果然得子，因此发愿重修关帝庙，改名为普光寺。现大殿前地上还躺着一块汉白玉石碑，碑顶是二龙戏珠，碑文已经涂抹，隐约还可辨认片言只字。普光寺高出地面两米左右，它背后正是一条小山梁，山头处曾发现很多砖瓦石块，但不是金代的。山梁前修庙，庙基又高出地面许多，庙西侧可能是金章宗陵址，二者联系起来看，普光寺下很可能是一座金代后妃墓。

草帽沟至宝顶沟中间保留着许多古栗树，种得很有规矩，初来这里时会给你一种神秘感。古栗树好像暗示它的脚下埋着什么东西（笔者 1983 年来栗树下时就被它吸引，随后探究它的神秘以至引出对金章陵的研究）。栗树前的地势在这条沟中最为宽阔、平坦，地表上金代遗迹最多。1989 年笔者曾引导某勘探队探寻章宗陵，就在栗树下不远处测得南北 6 米×15 米的一条地沟，第二天于这条沟的北部又测得 6 米×25 米东西向深沟，两沟为“丁”字形，为验证测得结果，又在沟中心打探眼几十个，最深处 5.1 米，最浅处 1.5 米，沟底为白色石渣，估计是金章宗陵地宫，向东测，在民房地下又得出三处异常反应，估计是后妃陵墓。

宝顶沟至大楼的北侧还有一个凸起的小山头，前边路基下有一段石砌的护墙，护墙南边有一块 30 余平方米的荒地，这里到处散落着金代建筑遗迹，除石臼，柱础，砖瓦石块，汉白玉残块外，偶尔还能找到绿琉璃瓦，这些残迹在 1989、1990 两年中，因建果园扫荡无存，目前很难找到了。这块地中，经过打探眼取出地下遗物是房屋建筑残渣，山头下，经勘测地下有一异物，东西长 9 米，宽 6 米，呈长方形。很可能是金代陵墓。山顶端是原生土，没有动过的痕迹，这座陵墓很可能是从南或东掏洞而进，那座护墙可能是封闭口用的，陵前又修碑亭享殿，这座陵墓估计是章宗之父——显宗，允恭。山头西侧有一道一人深的沟，看样子当年还要深，假如这个山头是显宗陵，那么，沟西侧的一片梯田就是显宗之妃的陵墓，不过，还未找到遗迹，那条沟也就是护陵用的排水沟，或者是沟两侧叠的院墙。经勘测在下边地中央还有一条一丈多宽 100 余米长的很规整的异物，一直通向沟底。怀疑是一条废弃的古道。

从大楼到小楼这中间已经定型的遗物有两处，疑点多处，还有许多地方未测，再加上地表的遗物，可以说这条沟是金代的诸王兆域，葬有帝王陵，大楼与小楼正处在这两端，像是两个碉堡守卫着中间的陵墓，小楼正处上来的要塞，大楼地势高，可以看到东边。沟口，又可以监视太祖陵方向，还可通连泉顶，像这样的地势，穆桂英是不会在这点将的，她怕山上的袭击，韩昌更不会建营垒，他怕被歼灭，如果作为望哨来守陵驻兵大楼与小楼倒很合适。

坤厚陵寻踪

坤厚陵是金世宗完颜雍之妻乌林答氏之陵，同时葬有贤妃石抹氏、德妃徒单氏、柔妃大氏、元妃李氏。坤厚陵只记载于史书，并没记载具体葬地，然而，坤厚陵又存在于大房山山陵之中。

乌林答氏死时并不是皇后，金世宗即皇帝位后，大定二年，追册为昭德皇后。她幼年时聪敏孝慈，容仪整肃，受到宗族的尊敬。与世宗结婚后，发现睿宗伐宋时得到的宋朝皇帝用的白玉带，便劝世宗说：“这白玉带不是我们王家所用的东西，应当献给天子。”世宗听了她的劝告向熙宗献了白玉带，受到了熙宗的夸奖。

海陵王篡夺帝位后，向宗室大开杀戒，唯世宗得以幸免，这也是乌林答氏的功劳，她早已发现海陵王贪得无厌，劝世宗把珍宝玉器送给海陵王，得到了海陵王的欢心，可是海陵王又非常好色，又看中了乌林答氏的美貌，在世宗镇守济南时下诏书命乌林答氏进京，乌林答氏觉得不去见海陵，是违旨不遵，世宗就要被杀，去见海陵，又不甘心受辱，于是行至良乡，趁侍从守护疏忽自杀身亡。以后世宗从济南改任西京留守，路过良乡，想起乌林答氏的恩情，便叫鲁国公主起出乌林答氏之柩，重新葬于宛平县土鲁原，世宗当皇帝后追封为皇后。大定十九年，为乌林答氏在大房山陵区选择位置，十一月，“戊午，奉安于磐宁宫，庚申，葬于坤厚陵，诸妃附焉，二十九年，附葬兴陵”。于世宗合葬在一起。地位仅次于乌林答氏的元妃李氏最初葬在海王庄，“大定二十八年九月，与贤妃石抹氏，德妃徒单氏，柔妃大氏俱陪葬于坤厚陵。”（《金史》后妃下 1522—1523 页）元妃张氏陪葬于乌林答氏，石抹氏，徒单氏，大氏陪葬于元妃李氏。李氏列为诸妃之首，那是因为李氏之父李石助世宗夺取帝位有功，李氏理应当得到皇后的桂冠，但是世宗非常担心李石父女内外呼应夺去他的帝位，以至于对李氏加以限制，可是世宗又不明说，用“朕所以不复立后者，今后宫无皇后之贤故也”。来掩饰他的真正目的，并且明确地说：“妃虽贵，不得予政。”从这里可以看出，坤厚陵中有两座主陵，一是乌林答氏，二是元妃李氏。世宗死后，乌林答氏又从坤厚陵中迁出与世宗合葬在兴陵，那么坤厚陵中便以李氏为主了，他与诸妃很有可能没有迁出，那么，坤厚陵就是一座后妃陵园。我们还可以看出坤厚陵有这么多妃，其占地面积不会太狭窄。

坤厚陵倒底在哪里？

根据太祖两侧的山脉中埋葬的都是帝王陵和地表遗迹以及传说，综合起来分析，坤厚陵不太可能在各条山沟之中，很有可能。在山沟附近。经过反复观察研究，有三处可疑地点：

一、塔湾村南的塔坡

据本地老人亲见，塔坡上面原来有一座白塔，高十丈多，白石头（大理石）砌成，“文革”中被毁。塔坡、塔湾因此而得名。从山顶向下有五层梯田都有建筑残迹，说明原来就有栏杆围绕，这个形制与世宗母亲葬法近似。

世宗生母，李氏，贞懿皇后，世宗十三岁时睿宗死，李氏一反旧俗，不嫁宗族兄弟，削发为尼，临死前告诉世宗说：“乡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金史》后妃下，1519 页）世宗坐了皇帝后又下诏增修旧塔，并建奉慈殿于塔前。这个记载与塔湾的建筑非常相似。世宗从小受李氏教诲，对世宗影响很大，李氏又以聪明慧敏，刚正有决，容貌端正，言不妄发出名，而世宗之妻乌林答氏的品行不在其母之下，世宗就有可能仿照他母亲的作法也为乌林答氏修一座塔，塔下安放乌林答氏，附近再修建寺庙，以表示对亡妻的悼念。

二、车厂村南

车厂村南至西庄村南，这一地区大约有五、六百亩地，西侧百余米即熙宗陵址，十王坟陵址。据当地人说，“学大寨”平整土地时发现好几处墓室黑洞，水灌不满，后来用石头填死了。在金代皇陵区域附近有

这么大的空地，当年未必是空闲所在，附近曾找到许多黄琉璃瓦说明确有过建筑，如果修建一个后妃陵园，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三、小楼及上店

据米粮仓出土的金代墓志上曾提到“小楼”二字，但是否指的是观在的小楼遗址，还没有证据。小楼遗址在半坡的山凸处，方圆几十米(不算四周的山地)，这个地方很狭窄，葬一人倒很合适，如果葬上四、五个人，再修上享殿，碑亭在那里是摆不开的。坤厚陵是金陵中的后妃陵园，想是很大，看地势不太象，假如葬在上店，这倒有可能，那里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其它帝陵，倒也很幽静。上店村北至今还有一个关帝庙，修在这一地区的关帝庙一般都有可能建在金陵之上，不过目前尚未找到证据。

以上是对坤厚陵地点的几种分析，以后还要进一步进行探索和研究，直至找出它的踪迹。

瑞云宫辩

县志记载瑞云宫可能是磐宁宫，可是瑞云宫碑出土于太祖陵区，磐宁宫是不会修在太祖陵区的。近日仔细观察存在房山文物所内的瑞云宫碑，石碑呈长方形，一米多高，0.70米宽；0.20米厚，石质为青灰色，上面没有雕龙刻云，模糊的字句尚可辨认，左侧竖着刻有：钦授瑞云宫，祖师灵阳真人门下真宗，都提点受洞徽崇其礼素大师，王道通仙莹。

下面没有记年，也没有生平，瑞云宫看来是皇帝所封。很可能是世宗所封，王道通可能是世宗的密友？原来以为是一块宫碑，其实是一块墓碑，道士王道通可能是受金朝某个皇帝的宠爱，死后为他修一所享殿，起名为瑞云宫，而且道士王道通在朝廷中占有重要位置，能葬入金朝的皇陵中是非同一般的。我们对王道通目前还是一无所知，有待于将来挖掘出墓铭志才见分晓。不过，我们倒是清楚了瑞云宫是什么。

金陵诗句

乾隆十八年谒太祖陵诗

开国金源肇自东，一时攀附会云风。
丕承肆伐追辽帝，善任知人类沛公。
史策鸿猷传赫奕，睿陵佳气闋茏葱。
建康前岁犹亲奠，况复龙兴渤海同。

御制金世宗陵句

牧犹樵侵不忍言，重瞻宰树郁陵园。
事殷不袭三分迹，称侄何殊一统尊。
君德已臻子尧舜，国风每朔旧根源。
爱民勤政心无斁，景仰山高老所存。

乾隆作大房山歌

太行连延西南来，千支万脉纷纡回。
房山于此独称峻，拔地秀拥金堂开。
卢水带在拒马右，伏流不敢争谷走。
我从长途直北望，茏葱佳气干牛斗。
梵宫琳宇楼嵌崎，辟邪互埋行殿基。
春风万树花张锦，忆昔金源全盛时。
半壁江山迹始发，海陵迁建实唐突。
至今修葺滕二陵，其余荒草寻飘乎。
行将酌酒临寝园，昭德怀古予心存。
圣人穹碑揭日月，拱读义尽休重论。

大房山金源诸寺

奉先西下乱山侵，涧道回旋入暮林。
翁仲半存行殿迹，莓苔尽蚀古碑阴。
秋山春水风烟换，大定明昌恩德深。
欲是宣和解亡国，穹芦黄屋恐非心。

金陵佳致

步入云山第几层，高封马鬣两朝陵。
苍松挺秀年逾古，瑶草香生地有灵。
写下绿堯山月白，花归碧涧水云蒸。
岩堯宫阙人安在，惟有苔痕雨后青。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琉璃河商周遗址概述

雷少雨

现今北京市所辖的各郊区县中，以房山区的地上文物和地下文物遗存最为丰富。其中琉璃河商周遗址就是很有名的一处，此处古代文化遗址位于琉璃河乡境内，距北京市区43公里，范围包括琉璃河乡北部的涧

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村。整个遗址面积东西长 3.5 公里。南北宽 1.5 公里。大石河（琉璃河）流经遗址的西侧与南侧，北侧是京石公路，京广铁路则从遗址的中部穿过。在遗址台地的断崖上，一些灰坑，灰层等古代遗迹清晰可见。

这处古代文化遗址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正式发掘，经过十几年的考古实践，已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遗址内包含了居住址，古城址和墓葬三区部分遗存。由于这三部分遗存同时存在于一个遗址内，时代又相同，这就决定了这处古代文化遗址的性质和重要性。通过对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的分析和研究，认定该处遗址应属商周二代的古文化遗存，至今已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

在已发掘的居住址中，发现了当时人们居住过的房子，使用过的窖穴，以及属西周时期的遗物，包括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其中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在一些使用过的灰坑中，也发现过时代属于商代的陶器。

古城址座落在遗址中部的董家林村。六十年代初期，北城墙有的地段，在地面上还留有一米多高的夯土城墙，后因平整土地，这些残留在地面上的城墙，已被夷为平地了。虽如此从远处望去，整个城址仍比周围的地面高出一米有余。昔日城内巍峨的宫殿，长短宽窄不等地街道，房屋，手工业作坊等的分布情况，目前尚不清楚，由于城内绝大部分地面被民房所占据，破坏严重，它们的遗迹也许很难重见天日了。

经过钻探和发掘，得知北城墙和东西二面城墙的北半部，在地下尚保留了大部分墙基。其中城的东北角和西北角保存最好。北城墙全长 329 米，东西二面城墙保留的北段长约 300 米，南城墙及东西二面城墙的南段，由于破坏严重，长度不明。在东，西、北三面城墙外，发现有深 2 米多的护城壕沟。根据城的东北和西北两个城角的方位，以及已知的长度，推测城的平面应是方形或长方形。

埋在地下的城墙，虽已属断壁残垣，但通过考古发掘，对它的修建方法，版筑技术，墙体结构，以及筑城时所用的工具等，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关于城墙的修建年代，由于城墙内侧的“护坡”被商末周初的墓葬以及属于西周时期的遗迹所打破，这就说明这座古城的修建年代，最迟不应晚于西周初期。对古城历史的认识，是和古代文献所载西周初期北京地区的历史情况，基本上是相一致的。

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在现今北京城西南的茫茫原野上，还曾经存在过一座规模较大的城池。那么，它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当时占有它的是些什么人？通过对遗址的第三部分遗存——墓葬区的发掘，找到了确实可靠的答案。

墓葬的钻探和发掘工作，是从 1973 年秋开始的。墓葬最集中的地区，是在遗址中部的黄土坡村。为工作方便，以穿过墓葬区的京广铁路为自然分界线，把分布在铁路以西的墓葬划为 I 区，铁路以东的则划为 II 区，到 1986 年冬为止，二区共发掘墓葬二百余座，车马坑近三十余座。

按照墓葬规模的大小，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在墓葬 I 区多中、小型墓，未见大型墓。II 区则大、中、小、型墓都有，但被盗掘的现象严重。墓葬的基本特征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四周一般有熟土二层台，坑底放置棺槨。大型墓往往在墓室一端还带有墓道。人骨保存情况，一般是小型墓较好，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屈肢葬较少见。另外，在墓葬 I 区，在墓坑的填土中和墓底腰坑中，一般都有殉狗现象，而在 II 区此种现象则少见。

墓葬中的随葬器物，一般放在头前的棺槨间或二层台上，小型墓以陶器为主，大中型墓以青铜礼器为主，但被盗的墓，青铜礼器则少见，有的甚至被盗掘一空。

发掘的三十余座车马坑，最少的埋二匹马，一辆车，最多的埋四十二匹马、十余辆车，有的光埋马未埋车。有的车马坑，还发现有埋人和狗的现象，一般较大的车马坑，都发现有铜的车马器。墓葬 I 区的车马坑位置，是在墓主人之南，而 II 区发现的车马坑位置则在墓主人之北。

在整个墓区发现的大、中、小型墓，不论在其规模，随葬器物，以及葬具上都存着一定的差别，这种现

象反应了墓主人生前社会地位的不同,尤其是众多的小型墓与大、中型墓同埋在一个墓地里,说明它们与大、中型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发现的墓葬的形制,葬俗,及其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这些墓葬都具有明显的商周时期的特点,只是在年代的早晚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就是年代相近的墓,也存在着先后的区别。由于墓葬的时代与古城修建的时间相吻合,这就为古城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历史上对燕的封地众说不一的最后解决,提供了确实可信的实物依据。

除墓葬与古城址在年代上的一致外,墓葬中发现的大量随葬器物。同样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有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玛瑙器、骨角器,以及原始青瓷器、漆器、蚌器、货贝等等,就其数量而言,光是青铜礼器就有百件之多,而且大都铸有铭文,如果加上其它质料的随葬品,全部出土器物已超过了万件。在众多的出土器物中,最能说明历史问题的是青铜礼器,及其器物上所铸的铭文,尤其是一些铸有“匱侯”铭文的青铜礼器,为确定古城址的性质和作用,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证据。除此而外,就其器物本身的造型,纹饰等方面看,对研究古代的铸造工艺,美术等方面内容,也有很高的价值,251号西周墓中出土的伯矩青铜鬲,通体饰满了浮雕的牛头形花纹,造形别致,精巧华丽,纹饰生动,铸造精细,在艺术设计和铸造工艺上,都具有很高的水平,是青铜礼器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这件器物在盖内和口沿上都铸有内容相同的铭文,记述了伯矩受到匱侯赏赐的情况。还有253号西周墓出土的青铜鬲,造型浑厚宏伟,纹饰古朴刚劲,给人一种庄重肃穆之感。通高62厘米,口径48厘米,重41.5公斤。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礼器中最大的一件。器内壁口沿下铸有铭文26字,记述鬲奉匱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保贡献食物,而受到太保(召公奭)的赏赐情况,铭文所记正好与文献上所载召公本人并未前往燕国就封燕侯,而“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一事相印证,同时也反映出了燕国与周王室的关系。

在一些青铜礼器中,铭文中明确记载人的名字和事迹的,就有十余件,大都是大中型墓里发现的,说明这些人是匱侯手下的有力人物,并得到过匱侯的赏赐和恩宠,所以才纷纷作器,以示怀念。因此,联系到一些铸有铭文,尤其是铸有“匱侯”铭的青铜礼器的发现,可知分布在黄土坡村周围的这批墓葬,应是燕侯家族很重要的一处墓地。而墓地中的一些大型墓,可能就是燕国的某一代侯王。死后埋于此,那么他们生前所居之地,就应是墓地西侧的古城,是古城的实际占有者。

从墓葬及其大量的出土器物以及古城址的存在,再加上遗址本身的范围来分析,可知在三千年以前,以古城址为中心的这一带地区,绝非是一般性的村落,应有过它的一段辉煌的历史。结合文献进行研究,可以肯定,三千年前这里应是西周初期燕国的封地,是燕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古城就应是燕国的都城。这样,由于考古的实践,从而解决了自汉代以来对燕的封地所论不一的争论。同时,也证明了《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的记载是可靠的。

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发掘,是建国以来,北京地区考古工作中一项重大的收获,在全国同类遗址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对北京古代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周初燕国历史的研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鉴于此,1979年将琉璃河商周遗址公布为北京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国务院公布该遗址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北京地区文物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随着人们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提高,琉璃河商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的价值和作用,将会更加明显的体现出来,这里将是人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作者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干部

镇江营遗址

陈光

镇江营遗址位于北拒马河西岸、南尚乐乡镇江营村北的一块高于河床十余米的台地上。台地平面呈椭圆形，南北长约220米，东西宽约140米，中间有一条宽20米、进深110米的東西向采石沟几乎横断台地。采石沟断壁及台地周围断崖普遍暴露出厚3米左右的灰土文化堆积，地表处处可见陶片。

这个遗址是1959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当时定为商周时代遗址，1986年上半年又一次调查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1986年下半年开始至今，进行了连续发掘，揭露面积已达500平方米以上。收获较大的是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及西周时期，复原陶器近百件，小件标本已有二千件左右。

新石器时代

这一时代的堆积较多地发现在遗址的西南部，由于本身的叠压打破关系，又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的遗迹较多，遗物丰富，能够较全面地了解文化面貌，所以，这里只介绍一下早期遗物特征。

出土陶器的胎质含细砂，屛有云母粉和云母颗粒。陶器中夹云母红褐陶最多，占80%以上，器表颜色不匀，常常红一块、褐一块、灰一块，这类陶质多属釜、支座、钵、盆、器盖等。其次为泥质灰陶，胎质细腻，薄而坚硬，叩之声音清脆，这类陶质多是红顶器类，有碗和盆。再次者为泥质红陶，多见小口双耳罐。大型器物采用泥条盘筑制器，泥条宽约3~5cm，小型器物多为泥片粘接。器形以大口圆底为多，器表大都素面。常见的器物组合有釜、支座、三是钵、带把钵、器盖、红顶碗、小口双耳罐等等。

石器一般为打制，有黑色燧石打制的小石片刮削器，石斧、也有用石质较好的河卵石加工而成石磨棒和大石片。

通过发掘得知，这一类遗存地层上早于后岗一期文化和雪山一期文化，遗物中未见彩陶，由于其文化面貌具有特色，年代又相当早，发掘者称之为“镇江营一期类型”。

镇江营一期类型的发现填补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空白，也为研究后岗一期文化、雪山一期文化的起源提供有意义的线索。

夏商时期

所谓夏代遗存带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特征，只在遗址中部、采石沟东侧见到，由于发现的遗存很少，其文化面貌还不十分清晰。目前发现的陶器多是细砂褐陶，少量的黑皮褐陶，器表普遍施浅细而杂乱的绳纹，罐肩部的绳纹被磨光，常见的器物为筒形鬲、折肩尊、圆腹小罐等。这类遗存叠压在镇江营商时期文化之下。

商时期文化的发掘成果是镇江营遗址的重要发现之一。陶器全为细砂红褐陶，胎质中屛少许云田粉，器形蔚为壮观，鬲的袋足均模制好，捏接在一起，裆外抹泥条加固，器表施交错绳纹、印痕深、纹饰细、高口沿、裆部、献腰、罐腹均施一周泥片堆纹加固。器物组合为鬲、罐、盆、簋等。鹿角制成的工具是这时期的一大特色，有镐、铲。这时期的灰坑壁上也留下鹿角工具的痕迹。

在商时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大批的园形直壁、底部平整的大灰坑,坑壁留有工具痕迹,坑底中间多有一个柱洞,有的坑底四周分布着几个小柱洞,估计与居住址有关,其中保存较好的圆坑深度在1.5m左右,而坑壁上未见台阶和踏坑痕迹,推测当时是使用梯子上下。

这时期遗存叠压在遗址的西周早期遗存之下,文化面貌上带有北方文化的特色,这就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既北京地区在西周时期是燕国的封地,封燕之前,这里的先燕土著文化是怎样的面貌,也就是说,相当于商时期,北京南部居住的是不是北方少数民族,后来又对燕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镇江营遗址的考古收获能够对上述问题有所说明,将是北京地区对燕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

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的遗迹、遗物发现得最多,叠压打破关系最复杂,整理之后是可能分成几期的。

在发掘未结束、整理未完成之前,只能笼统地看出文化概貌。

陶器的质地中均含细砂、少量云母粉和粗砂粒,表皮大都呈灰色,有相当数量的褐色胎质,泥质灰陶较少。簋、小罐等较细腻的泥质陶器均轮制成形,大罐、盆、甗、鬲等胎质略粗的陶器采用泥片套接法,在器物的折沿、颈、肩、中腹、靠底、鬲裆的部位都可看出接茬的痕迹。器物口沿的沿面有制陶工具留下的弦纹,器表一般都滚印整齐的竖绳纹,器物中数量最多的是鬲,其次为罐、盆,甗和簋较少。

西周时期的房址为长方形,地面用细砂铺平,灶靠墙,有出烟的烟道,有几处房址的灶都有两次使用的痕迹。

镇江营西周时期文化的面貌与琉璃河同时期文化大同小异,主要区别在于镇江营遗址的灰皮褐陶占相当的比例,这与当地先燕土著文化的胎质相同,说明镇江营遗址商周时期文化具有相承性。琉璃河不仅有西周城址,所发现的大墓也初步确定为燕国贵族的墓葬,那么,琉璃河无疑是燕国的一个重镇,而镇江营遗址的遗存则是当时的乡村文化了。

镇江营遗址的文化堆积内涵不仅是上述那些,还含有雪山一期、龙山时期及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象这样堆积层次厚、内涵丰富的遗址在北京地区为数甚少,北拒马河沿岸仅此一处,经过科学地发掘和整理,这样的遗址能够树立起北京地区的先秦文化编年,对于文化谱系的研究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

但是,当地村庄周围没有高台地,均为沙土地,农民只能从台地取土,台地的面积在逐年缩小,从而,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工作也逐年紧迫,否则,至多几十年,这块台地就会从地图上消失。

塔照遗址

塔照遗址位于南尚乐乡塔照村南约300m、北拒马河东岸的台地上。一条西南,东北向的侵华日军战壕破坏了文化堆积层,目前当地农民借以采石并扩大范围,形成了宽15m、长130m的采石沟,沟崖上暴露有灰坑和墓葬,弃土中夹杂着商及战国时期的陶片。虽经制止,遗址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

经过1986年、1987年,1988年三次小型试掘,发现一条南北向的沟,沟内堆积带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征。陶虽以细砂红陶褐为主,胎质中属合云田粉末,泥质灰陶胎质中不属云母粉,平底器的口、颈、肩、腹、底及三足器的足跟与袋足的结合部位可看出粉片粘接痕迹,然后在内壁或外表加一层薄泥片盖住缝隙。器物成形后,通身滚印绳纹,器表的薄泥片再用缠绳的制陶工具拍实,罐肩部、盆腹部绳纹被抹平,加划弦纹。可辨器形的有筒形鬲、折肩尊、卷沿盆。

这类遗存的年代上限在夏积年内,下限到商早期。

在1986年上半年的调查过程中，采集到相当于商代的陶器残片，因缺少发掘地层关系，故不做介绍。

塔照遗址地层堆积薄，遗物贫乏，但年代上却与传说中的夏代有关连，其发掘成果又可补充镇江营遗址夏商时期的薄弱环节。

塔照遗址的遗物带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特征，在北京西南区域中这类遗址也相当少见，因为这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的南缘，能在这个交界地带搞清夏家店下属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其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目前塔照村的采石工程在不断扩大，危及着这一古文化遗址，其保护工作亟应加强。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敕建弘恩禅寺

沈书权

京西古刹弘恩寺距良乡南十公里，西临京保公路，东依京广铁路。寺院位于窦店乡望楚村头，据明天启间吏部侍郎王舜鼎撰写的“护国大善弘恩寺碑”记载：万历壬寅年，汉经厂掌坛旧都府管事御马监太监杨用于此地为主上布施茶，始建茶堂。万历乙巳年，有昭陵神官太监赵良，汉经厂掌坛御马监太监卢永寿、张然合奏神宗皇帝孝定国母布施帑金建弘恩寺。工程于万历丁未年始，落成于万历丁巳年。以后，清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31年）又重修一次。

弘恩寺历来为佛教圣地，同时又是明末崇祯皇帝第三子（人称“朱三太子”）出家之地。当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推翻明王朝，崇祯皇帝从故宫北门逃至景山自缢而亡，朱三太子由王承恩背逃出城，从此在弘恩寺出家，削发为僧。李自成当皇帝后，在金銮宝殿上发现崇祯遗书，上写“能杀吾三宫六院，莫杀一个百姓”，觉得崇祯还算明君。后听说其三太子流亡他乡，便派人查寻，终在弘恩寺找到。使臣劝三太子回京，太子不允，宁愿为僧。后来，李自成赐给弘恩寺半副銮架，又割地三百六十顷做为庙产。弘恩寺的土地东至永定河西岸，南至立教村，西至夏村，北达肖庄。弘恩寺门前竖有“下马石”，上刻“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受过皇封的弘恩寺，从此更加兴旺了。

弘恩寺座北朝南，前后五进殿宇，规模宏大，雄伟壮丽，碑碣林立，松柏苍劲，四周围以高大的灰瓦红墙。远远望去，酷似北京紫禁城之一角，给人庄重雄浑之感。

山门为上下两层楼，下层辟券门。门楣镶嵌边缘浮雕莲花瓣的汉白玉石匾，长一点九米，宽零点三米，其上楷书：“敕建弘恩禅寺”，现置于第二层殿前。闪闪发光的红漆门上整齐地排列着横竖各九路的铜乳钉，这种门叫做实塌门。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建筑上的等级之分也是相当严格的。超过规定的等级就是“犯上做乱”，将招致灭门之祸。实塌门只能皇家建筑使用，或者经皇帝恩准才行。弘恩寺能够享受皇家建筑之待遇，这是一般寺院所望尘莫及的。

弘恩寺早期的山门并非向南，而是向西开。关于山门改向问题，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民间传说呢？

清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从保定去北京，弘恩寺是必经之路。传说李总督上任不久，进京奏本，快到弘恩寺时李鸿章对随从说：“弘恩寺的和尚好大的架子，竟敢不出门来迎接我了？”说完，即命手下鸣礼炮六响，一是显示威风，二是想让弘恩寺知道我李鸿章的厉害！

寺内方丈听到炮声，知道对方来头不小，即命寺内大小僧人摆出半副銮架，然后鸣礼炮九响，方丈才踏出山门“敬候”。李总督听到九响礼炮，知道事情不妙，赶紧下轿行至方丈前，跪请饶恕。此后，李每次进京，到此下马，悄然过寺，再不敢抖威风了。

为这事，李鸿章总感到窝囊。以后，他命人在弘恩寺东辟新路一条，再进京不从弘恩寺门前过，就免得下轿了。

又过了许久，李鸿章收买了一个人到弘恩寺游说“山门方位不对。弘恩寺要兴旺，必改门朝南”。方丈觉得有道理，便改开南门。这就是山门改向的经过。

山门往里是二道门，型制同前，规模次之。二道门往里有一口铜锅，人站立锅内露不着头皮。据说此锅是专供向穷人舍粥用的，过去寺内有舍粥厂。此锅不知失于何时。

第一层是哼哈殿，内供泥塑哼哈二将。面阔三间，前后出廊。殿前置夹杆石，左右各一。中间有古槐一棵，径粗两米。粗、壮的藤萝缠绕树干螺旋而上，爬满枝头。这是寺中一景，称为“龙缠古槐”。

第二、三层殿均面阔三间，前后出廊，顶铺灰瓦，调大脊。二层殿为天王殿，三层殿称弥陀殿。三层殿右侧过去露天放置一尊高丈余的千手千眼铜佛，造型生动，体态均匀，现已无存。

第四、五层殿已经拆毁，只存基础。四层为观音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前后各出一步廊。五层殿规模最大，为两层楼阁，上下均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前出一步廊。五层殿是释迦殿(俗称“白皋”)。

除了中轴线的建筑，两侧配以庑殿各二十七间。现存右侧十六间，左侧五间。

弘恩寺的东院有一座两层八角转角楼(俗称“黑皋”)，黑皋与白皋左右对衬。黑皋用料考究，雕梁画栋，是弘恩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在民国九年在末代和尚济道之手毁于一炬。

寺前是塔院，分为南北两院。南塔院有五十余座墓塔，北塔院有百余座。南北塔院可谓之“塔林”了。这些塔早已荡然无存，但当年塔院成行成排的松柏依然生机盎然，成为塔院惨遭劫难的见证者。

每年正月十五日庙会，这是一年之中弘恩寺最热闹的日子。寺内人来人往，香烟缭绕，寺外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这一天，还要把半副銮架摆出来。以壮寺威呢！

弘恩寺在四百年的发展中深受历代帝王的恩宠，曾受到多次赏赐。明神宗皇帝孝定国母不仅钦施帑金创建弘恩寺，且又“钦赐佛大藏经及诸佛经、千佛袈裟、钟、磬、彩幡”等。李自成建政后，同样赐给弘恩寺庙产地亩。到了大清时期，康熙皇帝于1713年圣驾亲幸，赐寺僧成悟龙袍一袭，御书“大愿慈州”匾额一方、心经一部。并作“幸宏恩寺”诗一首：

解夏清襟陌上尘，孟东大善见姚秦。
临风洗钵龙池雨，凝霜舒莲瀑水滨。
送节双轮应梦相，收成万物足深淳。
穷通莫问老僧语，一任平生今古津。

后来，乾隆帝也效仿其祖之法，御赐弘恩寺“慈缘垂荫”四字匾一方，悬挂于释迦佛殿。一座寺院受到众多皇帝的赐赏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弘恩寺在佛教界之地位是非常显赫的。

弘恩寺于1986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北京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谷积山院

薛宝华

提起潭柘寺，无人不晓。但说起谷积山，则知之者较少了。它和潭柘寺仅一山之隔，此地峰峦突起，如谷积堆然，所以得名曰谷积山。位于房山西北五十华里的坨里乡北车营村。

谷积山中有一组较完整的古建筑群。它包括灵鹫禅寺、圆通殿、塔、碑等。当年为佛教圣地。现在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灵鹫禅寺

灵鹫禅寺是一组古建筑群，建于元代，整体建筑建在中轴线上，南向。有山门，二进殿宇和四块石碑。一进殿宇已无存，而山门、第二进殿、碑还保存完好。

山门：建筑面积二十五点五平方米，高三点三米。灰筒板合瓦，调大脊。无梁殿，歇山顶，脊吻二，垂兽八。前檐是白玉石拔券过堂门，宽一点八四米，高二点二零米。台基高零点九七米。台级五级垂带如意。山门与第一进殿之间，左边有大明正统四月初八立“敕建灵鹫禅寺”碑记一块。碑方首龟跌，首浮雕云朵，额篆书“敕赐灵鹫禅寺”。碑高一点七六米，宽零点九四米，厚零点二二米。字迹刚劲有力，挥洒飘逸。

第二进殿：是正殿，系无梁建筑。面阔三间，长十四点六米，高三点五米。单檐、歇山顶，瓦石板。正脊吻及其它角兽已无。明间为汉白玉拔券门。石券上有浮雕宝瓶，造型华丽。据说，是金代的艺术佳作。门高三点一二米，宽二点一四米，厚零点九三米。后檐砖墙，台级为一级如意踏跺。

殿里面中间墙壁上原嵌有十八罗汉以及两旁的五百罗汉。这些罗汉像雕塑精致，造型优美。神态相貌，各不相同，显示出我国古代工匠高超的艺术技巧，是我国佛教艺术的佳作，现无。殿顶还留有一小部分“天花板”，做工精细。只可惜烟熏火燎，漆黑一团，面目全非。

东配殿面阔三间。硬山，箍头脊，瓦石板，条石板檐。长十三点五米，高三点五米。进深八点四米。白玉石拔券门。五抹双扇板门，次间条石镶边方形窗。

第二进殿后檐墙左、右立辽碑，元碑各一块。

辽碑：是大康四年四月十五日立。南向。螭首龟跌。碑高三点五四米，宽零点九四米，厚零点三三米。额篆书：“大辽析津府良乡县张君于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文载……张君讳文绚良乡县之编户也妻田氏皆性钟纯吉名闻乡闾家有余资靡好奢华之乐惟积善颇信浮图。……司空大师议于谷积山院请众僧侣读大藏经便从今季四月十五日启读之……而张君能去彼此取彼之难口矣是知富而不奢积而能施羲也舍今生爱求过去福智也虑身后事立石为约信也五常之中而有三焉所谓淑德善人者矣……南吕村张文绚妻田张氏……。”

碑阴首楷书：“师德华严七处九会千人邑碑。”

此碑在年代以及在研究谷积山的发展史上是极其重要的。

元碑：大元至正七年三月所立。南向，螭首龟跌。高二点四四米，宽零点九四米，厚零点二一米。额篆书：“大元敕赐上万古积山灵严禅寺碑。”

灵鹫禅寺东配殿东侧有正统五年四月八日立“敕赐灵鹫禅寺兴建记”碑一块。南向，方首龟跌，旁有小

石狮一尊。小石狮稳坐在须弥座上，眼睛注视前方，炯炯有神。狮高零点三三米。

圆通殿

建于明正统年间。南向。高三点九〇米，六角形。每面宽二点十五米，攒尖顶。匾额上有：“圆通殿”三字。白玉石拔券门，条石板檐。据当地群众讲，殿内顶正中雕有龙一条，做法采用大点金式。工匠雕刻得很生动，如同活龙一样。此龙俯视下面，好不威风。只可惜后来没有了。

殿左前五米处立有：礼部为乞碑，立于大明天顺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螭首龟趺。高三点四米，宽零点九四米，厚零点三一米。额篆书“皇明”。

螭右前立有“敕赐圆通寺创建记”，立于成化十一年三月吉日。螭首龟趺。碑的高度、宽度、厚度同“礼部为乞碑”完全相似。

塔

在风景如画的谷积山中，不但有无梁的古代建筑和辽、元、明碑外，还有古塔三座。它们以不同的型制，不同年代分别屹立在三座山峰上。远远望去，非常雄伟。

铃铛塔：座落在第一座山峰上。建于明代，南向，八角形九层楼阁空心式。全部采用汉白玉石砌成。选石精良，造型美观大方。与众塔不同的是每个角带铜铃。在微风吹拂中，就会奏出悦耳动听的铃声。此时此刻，美妙的铃声如同音乐一般回荡在谷积山的上空。塔身里每层内有回廊。可从一层台级上到塔的顶层。站在塔顶之上，可以俯瞰谷积山的全部秀丽风貌。这种型制塔在房山区仅有一座。现只剩下两层。

塔旁还立有明代“敕赐张若祥寺碑”一通。南向，方首方座。

鞭塔：座落在第二座山峰上，建于辽代，南向。六角形七级密檐式，通高七米。全部砖结构。须弥座塔基已残。塔身中部座落在莲花上。正面设有拔券门，可进塔内。内为穹隆顶。门楣上有名，但风化严重，字迹不清。其它五面开直棂假窗，方柱形塔身。上部为七级密檐，第一层檐下有仿木结构的砖雕斗拱。刹无。

东塔：俗称和尚塔，位于第三座山峰上。大明成化十五年所建。石结构，通高十三点二米。双层须弥座呈“亚”字形。在基座与塔身之间施莲瓣一层。塔身覆钵式。四方各有一龛，龛内设置佛像一尊，形制各有不同，覆钵上有十三天相接，做工精细。宝珠刹。

墓下一地宫，正面为“释迦涅槃图”，右为“宝塔记”。

太监墓

在鞭塔的左右两侧，还建有太监墓二座。左为张公之墓，并建有汉白玉石制双门。上檐带门簷。门楣横书：“揽篇内府供应库掌印南溪张公”。立门约四十米处，立有经幢一通，上写：“明皇乾清宫管事兼掌内府供应库印御马”。

右为王公之墓，也建有汉白玉石制双门。上檐没有火焰珠。墓旁立有碑记一通，方座，首雕云朵，但字迹不清。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云居寺被毁经过

赵润东

云居寺位于房山西南三十余里的白带山麓，它依山势建造，座西向东，原有五层院落六进殿宇，呈台梯式逐步升高，南北有两塔对峙，气宇轩昂。这里风景秀丽，是隋唐以来的佛教圣地。

1938年冬，平西抗日游击队独立二营一中队在南尚洛乡水头村驻防。队员们经常出没于这一带，但一直无暇观赏这里的风光古刹，阴历八月十四这天，队员金茂、陈树等二十余人早起动身去游云居寺。路程很近，他们转眼便来到了云居寺。

这时，嗡嗡嗡，天空一阵乱响。随后日本轰炸机出现在云居寺的上空。敌机盘旋了三圈以后，投下了重型炸弹。轰隆隆，地上浓烟顿起，残枝碎石四处飞扬。起初有三架敌机，接着是六架，后来增到九架。它们轮番疯狂地轰炸。正在云居寺中的游击队员，被困在殿堂之中。殿内殿外，浓烟弥漫，炸弹声响，震耳欲聋。突然，一颗大炸弹从屋顶砸下来直插地上。队员们一看，赶忙躲进里屋，心砰砰直跳，简直提到了嗓子眼儿。结果，炸弹竟然没响，大家庆幸免遭身亡。

这时再看云居寺四周的山坡上，一声炸响一片尘烟。牲口羊群满山乱跑。敌机穷追不舍疯了似的用机关枪扫射。就这样，敌机整整轰炸了半天时间。

在驻地的中队长王焕文同志从早上到午后敌机停止轰炸，心情始终都十分紧张，唯恐队员们发生不测。他一会儿出来望望，一会儿急着要去寻找。当时联系中断，情况十分危急。后来队员们一个个回来了，他们熏得黑头垢面，只露出两只闪亮的眼睛，连人是谁都难以辨认。中队长集合队伍查点人数，结果一人不缺。

傍晚时分，中队长带着队伍查看现场，只见老百姓正往回扛死羊。据统计，炸死四十余只羊，一个老百姓脚后跟被炸伤，他所放的毛驴被炸掉一只耳朵。云居寺六进殿宇破烂不堪，面目全非。坡上百年苍松翠柏，枝枝杈杈铺满一地，一个个炸弹炸出的深坑足有两间房子大小。寺中还有一个和尚被炸身亡……

日寇为何轰炸云居寺呢？后来了解，是因奸细报告云居寺内有老便、八路军。日寇于是派侦察机侦察。当时，云居寺周围的山坡上，天天有老百姓打柴、放牧。打柴的肩扛扁担，扁担磨得锃亮。扁担一头拎着绳套，走起路来一闪一闪的，远处一看，好象扛着大枪，而那山坡上的牧群，有黑色的，有白色的，黑白相间，从空中俯看也好像人群一般。因此，日寇轰炸机对准目标进行了疯狂的轰炸。真可惜，延绵千年的古刹云居寺一时间断壁颓垣，惨遭破坏，从此也失去了它雄伟壮观的景象。

之后，独立二营一中队为防日寇追击，当夜转移到涿县东城坊村。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贾岛原籍考

杨亦武

贾岛，是晚唐颇有名气的诗人，他与孟郊齐名，素有“郊寒岛瘦”之称。贾岛原籍何处，学术界尚无定论。关于贾岛原籍的记载，初见于《新唐书·韩愈传》，“贾岛，字浪仙，范阳人。”

范阳，在唐代曾为郡治，亦曾为县治。贾岛原籍是范阳郡，还是范阳县呢？为究其详实，请追溯一下范阳的历史沿革。

范阳，本是两汉涿郡故地。三国魏文帝改为范阳郡，晋为范阳国，北魏为范阳郡，隋为涿县。唐武德七年(624年)改为范阳县。天宝元年(742年)，唐一度置幽州范阳郡，未几复范阳县。大历四年(769年)，幽州节度使朱希彩奏请于范阳县置涿州，涿州始设，隶幽州都督府，领范阳、固安、归义、新昌、新城五县。其中，范阳、固安、归义三县原隶幽州，涿州设置后便割予涿州^①。

据专家考证，贾岛生于大历十四年(799年)，显而易见，贾岛原籍是范阳县，为幽州都督府所辖涿州治下。

唐代的范阳县，大致在今河北涿州一代。据此，有些学者就笼统地称贾岛是河北涿州人。其实，贾岛并非河北涿州人，而是北京房山人。清康熙年间房山知县罗在公的《创建贾公祠碑记》^②明确载道，“公(贾岛)，房人也！”说贾岛是房山人似乎和史书所载不符。其实不然，房山一带，唐时隶属范阳管辖，金代，为奉祀山陵设立万宁县，后更名奉先县，元代改称房山。故此，长期以来，在贾岛原籍问题上引起人们的误解与分歧。

《房山县志》^③有这样一则记载：“栗，唐时范阳以为土贡，房山旧属范阳，为产栗之区。”由此可见，房山一带确属范阳地面。房山石经山是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唐开元十八年(730年)，金仙公主奏请玄宗赐予石经山新旧译经四千余卷，作为经本。金仙公主塔铭^④记载了此事。其中有“允幽府范阳县为石经四千本”之语。据此可知，房山石经山在唐代属范阳县。这是房山一带在唐代隶属范阳的又一例证。

清乾隆年间房山知县张世法，在他的《莅住房山记》^⑤中曾这样谈论房山：“房山……余少游时意想不到之乡也，及披阅旧志并图载则又称为古涿州附庸邑。”此处云房山为古涿州附庸邑。房山地处涿州西北，就唐代而言，涿州西北之地为范阳县地面。因此，详而言之，房山在唐代为涿州范阳县附庸邑。是的，房山在唐代不过是范阳县的一个小乡邑，名曰，房仙乡。这是房山乡老及房山博闻之士所熟知的。

说房山在唐代为房仙乡，可谓信而有证。房山城东十余里有开古庄，该村的观音寺有唐贞观十年(636年)立的八角碑，碑文有“重修范阳县房仙乡开古庄观音寺碑记”的字样。房山磁家务有万佛堂古寺(原名龙泉大历禅寺)，该寺为唐代一个姓朱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出资创建。此人故里就在磁家务一带。《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⑥说他“家邻胜所，里接仙乡。”这里的“仙乡”指的就是房仙乡。总而言之，房山一带在唐代确属范阳县境。因此，说贾岛是房山人，和史书所载的贾岛为范阳人并不矛盾。在房山，有许多贾岛遗迹，它是贾岛原籍房山的历史见证。贾岛故里，在房山城西十余里的周口店乡贾岛峪。这一带在唐代属房仙乡范围。那么，贾岛在唐代该是幽府涿州范阳县房仙乡人。作为房仙乡人的贾岛，字曰“浪仙”，看来是颇有意味的。

据明《一统志》记载，贾岛峪“内有石室，世传为贾岛所居”。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于乾隆十八年特御制《贾岛故里》诗，首篇道：

闻说浪仙里，依然在范阳。
不因逢吏部，终是托空王。

幸有遗篇在，难寻宿学荒。

一家言自就，僻瘦定何妨。

《房山县志·古迹》^⑦“贾岛峪”按曰“房山城南门外有贾岛故里碑碣，今已无存。”房山城南门外贾岛故里碑毁于清末。此碑立于辽统和元年(983年)距唐亡(904年)仅七十九年，距贾岛故世(843年)也不过百数十年。辽人不把贾岛故里碑立在涿州，而立在房山，定然是据实而为之。这表明贾岛确系房山人。至于贾岛故里碑为什么立在房山城而不立在贾岛峪，那是因为贾岛峪僻居幽谷，房山城则是车毂交驰之地，贾岛故里碑立在房山城更为昭显。况且，贾岛峪不过是唐代房仙乡所属的一个小屯落，贾岛即是房仙乡人，在房山城为贾岛故里立碑亦可谓名副其实。

相传贾岛早年曾在云盖寺出家。云盖寺在房山东营乡次落村，据寺碑记载，云盖寺建于晋太康年间(280年~289年)。从时间上看，贾岛在云盖寺出家是可信的。贾岛有《过木岩寺日暮》诗(又名《岫山寺》)，木岩寺遗址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龙骨山西的木岩山上(亦名“岫山”，北距贾岛故里贾岛峪仅一岭之隔。房山二站村有贾岛墓。《长安客话》称：“贾岛卒于蜀，归葬房山。”所谓归葬乃指客死他乡而葬于原籍者。且不谈贾岛是否真的归葬房山，既言“归葬”，可见《长安客话》的作者认定房山是贾岛的桑梓之地。

自古以来，房山人就把贾岛作为乡贤奉祀。《房山县志》^⑧贤达一门第一个录载的就是贾岛。古房山人称他是“北方豪杰之士，范阳文达之先。”^⑨有文字记载的。明清两代都曾为贾岛立祠设祭。明永乐十年(1412年)，邑人致仕锦衣百户、镇国将军李祥创建了房山南郊贾公祠。清康熙三年(1624年)的上元节，房山县令周于漆在南部贾公祠中集会僚佐，开宴赏灯、饮酒、吟诗。问及贾公有无后人，吏员道：有个叫贾成的人，是贾公嫡裔，务农为生。现因拖欠租银，被押在狱。周令听了不胜感叹，立命释放贾成并替贾成交了租银^⑩。继南郭贾公祠之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房山知县曹俊又在房山乡贤名宦祠中为贾岛立龛，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知县罗在公又在房山二站贾岛墓南侧创建了房山二站贾公祠。顺叙一事，清顺治初年，户部圈地时顾念贾岛是房山乡贤，特留祀地五十五亩，后来归属了二站贾公祠⁽¹¹⁾。足见，贾岛原籍房山，本是朝野皆知的。

房山古语云，“一往不复者，古也，千古长存者，迹也。山河依旧，人杰而地自多灵；岁月如流，世远而名偏不朽，赖迹以存之也。”贾岛故去一千余年了，然而，房山圣水却铭刻着一代诗杰的不朽英名，斑斑古迹以永恒的语言告知莅临这块古老土地的人们，贾岛是房山人。

注：

- (1) 《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
- (2) 《房山县志》
- (3) 《房山县志》
- (4) 金仙公主塔在石经山顶
- (5) 《房山县志》
- (6) 《房山县志》
- (7) 《房山县志》
- (8) 《房山县志》
- (9) 李北岳《房山唐诗人贾公祠》
- (10) 王世桢《池北偶谈》
- (11) 今贾岛墓南碑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乐毅墓考

杨亦武

乐毅墓惯称望诸君墓。世称“管乐之才”，中乐就是乐毅。乐毅乃战国燕将，昭王二十八年(前 284 年)乐毅统率燕军破齐，连下齐国七十余城，使战国诸雄为之震惊。燕惠王继位，乐毅出奔赵国，号望诸君。所以乐毅之墓名望诸君墓。

乐毅墓址在官道乡黑古台村西北，占地近十亩，高约两丈，凸然蓊郁，苍槐环翳，为一方之冠，只是墓上建置均已无存。

墓碑

《魏书》记载：北魏卢道将为燕郡太守，表乐毅墓。所谓表墓该是树碑而表。唐柳宗元文中有“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乐生之墓”等之语。这些是有关乐毅墓碑最早的记载。

《胡祭酒集》载道：“近芦沟堤决，役夫與墓碑筑堤。”后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又载道：“今其墓大数亩，高丈余，题曰望诸君墓。”可见乐毅墓较早的墓碑被人载去筑堤，后人又立一碑，题曰望诸君墓。此碑亦毁于今世。

祭祠

乐毅祠在乐毅墓西南侧，北魏卢道将为燕郡太守表乐毅墓并创祠于此。乐毅祠历时千载几经兴废，民国末年倾圮，残基毁于今世。

墓坊

乐毅墓坊为汉白玉石坊，在乐毅墓西。民国四年，良乡县长王承毅立坊于此，并题“千秋景仰”额一方。民国十一年，良乡县长周志中为墓坊补撰石联：

偏师下七十城旷世奇勋往迹空嗟昙影幻

崇祠亘三千载而今遗爱此邦独系枣花深

周令称乐毅“下七十城”为“旷世奇勋”并非过誉，而“往迹空嗟昙影幻”却道出了世事沧桑的悲凉。

当年乐毅墓周是一圈枣林，春华黄碧，秋实丹丹，穿林吊墓别有一番幽情。所以周令联中有“此邦独系枣花深”之慨。

乐毅墓坊亦毁于今世。

轶事

王令题额“千秋景仰”，可谓名副其实。古往今来，乐毅墓深为世人敬仰。唐代散文家柳宗元有《吊乐生文并序》，序云：“许纵自燕来，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乐生之墓。其返了，与之文使吊焉……”柳宗元撰文付人千里为吊，足见这位散文大家对乐毅的至崇至敬。唐代另一位文豪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也曾寄语去燕地游宦的董邵南：“为我吊望诸君之墓。”

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曾亲谒乐毅墓，并赋诗凭吊。诗道：

昭王灵气久疏芜，今日登台吊望诸。

一自蒯生流泪后，几人曾读报燕书。

汤公此诗感叹象燕昭王那样的明主贤君太少了，感叹乐毅的耿耿忠心没于千古。

此公于万历十九年(1591)，因上疏抨击时政和廷臣，被贬往雷州徐闻县做典史。他谒墓赋诗或在此时。难怪其诗如此慷慨痛切。

与文人墨客相比，乐毅墓周的村民自有一番虔诚。听遗老们讲，早年间墓冢上孤獾为穴，村民以为粹灵，多来此焚香祷告。此潘蒙昧之举确也反映了乐毅这位一代燕杰在燕南黎庶心目中的位置。

譬如一颗巨星的陨落，形骸固然消逝在茫茫宇宙间，但它那辉煌灿烂的一瞬，却留给世人永久的思念，这该是乐毅万古流芳的原因吧。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郊劳台

杨亦武

郊劳台遗址在良乡大南关村东，乃乾隆二十五年(1760)初，富德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郊南劳师而筑。郊劳台为一方形石台，此台面南背北，台前一条御道向南延伸。从郊劳台正方沿御道北行，御道两侧依次是一对华表，一对石兽，一对石人。民国年间郊劳台尚存，而今仅存御碑残亭。

筑台劳师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将军兆惠、富德等平定准噶尔回部凯旋。清高宗携文武百官、王公大臣从京城出发到郊南劳师，劳师之前，君臣人等驻跸良乡北二里处的黄辛庄行宫。高宗降旨，命刚刚凯旋的富德在良乡南筑郊劳台。

二日二十七日，清高宗驾临郊劳台行郊劳礼。

劳师之前，在郊劳台北设一顶黄幄(高宗御帐)，黄幄东西，各设八道青幕。郊劳台中央设帝拜褥，供高宗行礼用，拜褥左右各设一根下马红柱。

郊劳伊始，把将军参赞得胜纛(军旗)立在郊劳台左右，行拜纛礼。高宗身著龙袞缓步升阶，台下螺号齐鸣，奏饶歌乐。兆惠及从征诸将士身披甲胄跪于下马红柱之外，高宗步临，众将士起立，向高宗行注目礼。高宗登上郊劳台，在帝拜褥前立定，兆惠等随高宗步升郊劳台，分别立于高宗左右。

此时，鸿胪寺赞礼官唱赞：“跪！”高宗及群臣一同下跪，赞礼官又唱赞：“叩。”君臣拜天，三跪九叩。

拜纛礼成，高宗退入郊劳台北黄幄升座，兆惠等进幄东青幕暂息。少许，随赞礼官进黄幄，趋至高宗座前行抱见礼，按清朝旧制，凡出征将领成功还者，行抱膝跪见礼以示优异。高宗各加抚慰，赐座赐茶。

劳师完毕，兆惠及出征诸将士扈从高宗回黄辛庄行宫。

当年，高宗对出征将士赏赐优厚，封兆惠为一等公，封富德为一等侯。其余封赏不一。

高宗特御制郊劳礼成记事诗，并勒石一方，立在郊劳台侧，又在碑顶建起一座石亭，此即郊劳台御碑亭。

十六年后，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月，将军阿桂等平定两金川凯旋。四月二十七日，高宗再度驾临郊劳台劳师，始末同前。高宗因阿桂为金川之役首功，特赐其四团龙补，并赐阿桂及副将军丰升额，参赞海兰察御用鞍马乘以扈行。

兵洗金川永不波，
潢池跋扈竟如何。
良乡近远多黎庶，
欢喜都来听凯歌。

这是乾隆四十一年，高宗劳师时御制十绝句之九。可以想见踌躇满志的大清天子凭台劳师，远乡近里的百姓齐集台下观瞻的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

两个多世纪过去了，郊劳故事化为一简青史，郊劳之台址在台亡。若非御碑残亭尚存，在世人何知此为清天子两度劳师之地？

御碑残亭

郊劳台御碑亭尚存内外八根汉白玉八棱石柱，乾隆御制碑亦完好无损。

遗址上，石柱成八角伫立，内柱与内柱间，外柱与外柱间，相对应的内外柱间各有一根汉白玉石梁相照。乾隆御碑座北朝南，立于亭基北侧靠近北二内柱处，御碑通体由一整块汉白玉雕制，碑沿碑座刻以花纹为饰，碑阳左端用汉文刊刻着乾隆二十五年御制二月二十七日郊劳出征将军兆惠富德及诸将士礼成记事诗。为乾隆帝御笔。末刊乾隆帝“乾隆宝翰”等两枚玺印。碑阳右端及碑阴用满蒙等几种少数民族文字分别刊刻着同样的内容立于碑前向任何一个角度观望，只能见到内柱而见不到外柱。可知每对对应的内外柱与亭中心均在一条直线上，足见御碑亭设计施工之精妙。

御碑亭原是一座富丽堂皇的石体建筑，内外双八汉白玉石柱本以四面八方之势承托着一伞形琉璃瓦顶。映日观之，辉煌夺目。亭外还屏以围墙以示庄严。庚子事变(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之手。

翘首西风送雁来，御碑拜读扫莓苔。
将军敌忾修长策，天子酬庸筑劳台。
自有功名光竹帛，反嫌亭榭没蒿莱，
夕阳独立思前事，一任虫声唧唧哀。

如今，郊劳台御碑残亭落寞于蔬圃之中，藜藿之悲，淹没了奏凯的余音。这一历史的陈迹显示过大清

帝国的赫赫武功，也记录着中华民族的耻辱与不幸，默默地把深刻的启示留给世人。

参考书目：

- 1、《清史稿》
- 2、《日下旧闻考》
- 3、《良乡县志》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青芝岫

杨亦武

颐和园乐寿堂前，有大石如屏。上镌乾隆御笔：“青芝岫”三字。东曰玉英，西曰莲秀，门楣上刊御题乐寿堂诗。

青芝岫的来历实在不平凡呢。

此石原生于房山大防山阴，长三丈，广七尺，首昂而俯，足而敛，濯之则色青而润，叩之则声清而越，琼材俊质，孤立山野。

明太仆少卿米万钟好石成癖，世称友石先生。他搜奇遇之，爱而不舍，决计将其运往自家北京城西的海淀勺园中。据《艮斋笔记》载：当年米万钟运石“车重轮，马十驷……，百夫曳之登车，七日始出山。”又五日，仅至良乡塔洼村北。至此，工力竭尽，不得已而弃之田野。葛一龙有诗道：“百步千人移数日，到此踌躇不能前，秦鞭无技楚力拙。”米氏浩举，终归废于半途。

米万钟恐日后石损，就石建草屋一座，又环屋圈起围墙，并作《大石出山记》以记其事。而后，薛冈戏作《石报书》，米万钟复《石见报书》，一时传为佳话。

岁月悠悠，房山奇石寂卧良乡，终明之世莫之能移，清乾隆十六年(1753)，爱新觉罗·弘历闻之，命人将其移置万寿山乐寿堂前，御赐“青芝岫”之名，并题字赋诗镌于石表。从此，这块大防山野的灵石终于得以享誉京华。

天地无弃物，
而况山骨良！
居然屏我乐寿堂。
青芝之岫含云苍。
崔嵬刻削衰直方。
应在因提疏乞以前劈元黄。
无斧凿痕剖吴刚。
雨留飞瀑月留光。

吟咏乾隆帝御制《青芝岫》诗，慨然有感于怀。青芝岫本大防山野一石，遇米氏慧识方得出山，逢清帝

垂顾始得不没。然而，世间之奇材异物何止一石耶？天地之大岂无见弃之物？苦哲光不临，纵万目而谁识，故太白有贱璞之讥，韩公有《马说》之叹！如此观之，米氏、乾隆可谓明矣。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金代“磐宁宫”地址简析

李北岳

清代邑人李纯庵，(咸一)所着的“大椿厂随笔”内，对于“磐宁宫”的地址，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原文是文言，现在把它译录于下：

1. 磐宁宫(瑞云宫)：

房山西北五里许的塔洼村北，有古寺一座，名曰“龙溪寺”。北魏时建，规模壮丽，著于北方。唐开元时重修，改名“洪恩寺”。(俗叫红门寺”，时近东南边大、小洪寺二村的名子，即源于此。)坐北向南，依山临水。茂盛木林，风景幽胜。四面阜冈环绕，矗立着大小不同的花岗岩石。星罗棋布，万态千姿。或如伟人卓立，或如武士执戈。五官清晰，神情毕肖。或如大鹏展翅，或如猛虎跃涧。或如馒首排列，或如危岩欲坠。诡状谲形，笔难罄述，构成一个天然的怪石园林。寺院红墙环绕，分作内外两层。结构周密严整。共有大殿三层，各附配殿。大理砌成的正门，高大坚固。重檐飞脊，雕琢精工。横额上刻着隶书：“敕建洪恩寺”五个大字。体势雄勋，谨严，深得蔡邕石经笔法。门外列着巨大的青石狮子一对，站在高约二米两层的长方形花岗石台上。四足落地，面目狰狞，凶猛生动。和后来的身子半卧，笑容可掬的造型，完全不同。二狮的前左腿，已经折断，存有修补的痕迹。经过考证，确是元魏初建寺时的遗物。还有青石的旗竿础石，大理石的上下马石各一对。左右古槐各四株，老干轮围，枝叶茂盛，树龄约有千年。进门两边，钟鼓二楼耸峙。鼓已败坏，钟为铜质，造形古朴，为“大元大德元年秋九月吉日”所铸。前殿用绿色琉璃瓦盖顶，飞脊重楼，鸱吻高耸。门上悬有隶书木匾，文曰：“法轮常转”。体势与大门的横额相同。大理石神台，云龙旋绕。上祀木质弥勒佛，肥短滑稽。旁列木质四大天王，各高丈余。雄猛威武，出自名手所制。院中有古柏四株。干逾合艳，苍翠可爱。

中院非常宽敞，有古柏八株，凉爽幽静。大雄宝殿建于大理石平台上。周绕雕龙石栏，气像宏伟。重檐飞脊，画栋雕梁，用黄色琉璃瓦盖顶。前有大理石台，上列铁质五供，香鼎高大，分为上下两层。云龙旋绕，精巧玲珑。二层作楼阁形状四面门窗，可以开关。香瓶、烛台各一对，都是“大德五年所造”。殿借东西，立着大理石碑七座。东边三座，一是“大元大德元年重修大都路房山县洪恩寺碑”，体势雄沉严谨，具有张迁碑神骨。碑文中有“……房山原为金之奉先，距神京百里而还。山水清秀，形势雄厚。古称幽然奥室。城西五里许，有古刹曰‘洪恩’，……金海陵庶人亮，迁都于燕，号曰‘中京’。贞元三年，建陵园于邑西北十五里许之大房山，以寺值到陵往来冲要，因撤寺改建行宫，以便谒祭时驻跸……”后世宗陵将莫，宫上庆云见，故易名‘瑞云’金亡寺又复焉……”另外两座是：“大元至元(顺帝脱欢帖木尔)六年重修大都路房山县洪恩寺碑”和“大明永乐七年重修顺天府房山县洪恩寺碑”。西边的五座碑计有：“大明正德四年”、“嘉靖十一年”、“万历三十年”、“大清康熙十二年”、“乾隆五十八年”的重修碑。还有大小不等四角、六角、八角

的青石经幢十多个，大半字迹已经剥蚀，模糊难辨，无疑也是北魏遗物。大殿门上悬有木匾隶书，文曰“彼岸同登”。中列大理石神台，云龙盘绕，都是五爪。在封建专制的时代，禁律森严。用龙作装饰图案，只有皇帝老子，才准用五爪龙。其余虽王公尊贵，便许用四爪龙。谁要胆敢违犯，那就是犯下了“大不敬”的罪名，要受到“夷其族”（灭门九族）的酷刑。估计这样的神台，乃是金代“磐宁宫”，要奉皇帝灵位的遗物。台上祀释迦牟尼，和阿难、迦叶三尊神像，旁列十八罗汉，都是铜质。铸造精工，庄严奇古，出自高手所为。东西面的殿壁上，彩绘“如来佛成道图”，每一幅图画的大小都不一样，借用画中的山川、树石、祥光、云气随着高低上下，作为界限。构思布局，巧妙自然。天衣无缝，别具匠心。画中的仙佛、侍女、金刚、力士，面目表情，衣冠佩饰以及珍禽异兽瑶草仙花，各种水族形貌、类别，万态千姿，不可名状。五色缤纷，高古生动，使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深得吴道子、周昉笔法。虽无款识，一定是名手所作。尤其名贵的是两边北壁上，各有山水画一幅。东边是“上方探幽图”，西边是“西塔(域)访经图”。对于上方山西峪寺二处的山川形势，寺塔的位置，途径林泉的分布。无一不一逼真，维妙维肖。烟云浩荡，殿阁峥嵘；卉木葱茏，人物高古。能够陶镛北宋米家父子（米芾、米友仁）笔法于一炉，又复有所变革。翠滴玉流，山青云白。阴阳晦明，千江万状。独抒机轴，生面别开。隶书下款是：“大元大德二年，岁次戊戌，重阳吉月。信士弟子高克恭熏浴敬绘”。体势古拙雄彦，深得汉礼器碑神韵，篆体印痕三枚，一是白文：“高克恭印”。一是朱文“彦敬”。一是椭圆形朱文：“房山居士”。在“访经图”的右下角，还有一篇短跋，文曰：“纵观历代祠庙画壁，多作圣贤神佛，无写山水者。今了尘上人，欲为山门留念，固请再三，奈予弗工斯道何！不得已，敢摹上方、西域二佛教胜境，用答雅谊云耳。房山居士并记，时年五十。”下面有长方形篆体朱文印痕，文曰：“不惑子”。

按高克恭字彦敬，号房山居士（1248—1325）。回鹘族，（今维吾尔族）官至刑部尚书。性情耿直，为官清廉，业绩平常，以善画著名。深得北宋著名书画大家米芾、友仁父子的笔法，自己又能有所创新发展。与当时既是大官，又是大名鼎鼎的书画家赵孟頫、虞集、李仲宾等人，都是好友，对于他的画，极为推崇。晚年辞官，隐居在房山城北八里的羊头岗（阜）村。姚庸赠诗有句云：“月射羊岗玉树林，山斋犹在白云深。”死后得谥“文敏”。墓在村后北岩下（县志作：“西岩”实误）。他的画传世的不多，这两幅壁画，可称为罕见的艺术瑰宝。

后院中有古松四株，堆积着太湖石假山。峰蛮洞穴，剔透玲珑，传说，金军攻打北宋都城汴梁以后，拆毁了“艮岳山”而移来的，无疑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耻辱掠夺罪证。大殿重檐飞脊，鸱吻高耸。门上悬着楷书大匾，文曰：“慧海慈航”。用绿色琉璃瓦盖顶，殿内大理石雕龙的神台上，祀“多面观音”（俗名千手千眼佛）铜像，铸工精细，面目慈祥。左右共有二十八只膀臂，每臂手中所拿着的法宝，造型精巧，各有名称。依墙分列着高大雕龙的樟木藏经橱，计北面四座，东西面各七座，一共十八座，内装善本佛经。香案上摆着铜质五供，和小型的钟、鼓、铙、钹、笙、箫等乐器。

2. 斋官：

洪恩寺对面的山麓，有一座宫院，沿着山势建成。共分五层，每层正殿三间，耳房两间，配两边殿各三间。围绕红墙，石砌成护基，上列石栏，坚固整齐。逐渐向山上延伸，每层渐高渐小，通体好像一只平放的喇叭。宫门用大理石砌成，耸立在十三级的花岗石阶上。重檐飞脊，雕刻精细。云龙绕边的横额上，刻着隶书：“斋宫”二大字，体势和寺门横额的笔法相同。中院的正殿，用黄色琉璃瓦盖顶，前后院的正殿，用绿色琉璃瓦盖顶。稍北建有花岗石的平台，上屹七层大理石塔，高约十余丈。塔座的四周，雕刻着仙佛、侍女，金刚、天王。神龙、采凤，瑶草琪花。瑞霭祥云，明月旭日，高古生动，气象万千。塔门上有铜匾，文曰：“灵峰塔”。登临纵目，豁然开朗。房山圣水，一览无余。这所宫院，据传乃是金朝的皇帝后妃们前来祭陵时的宿舍和御膳房，所以名叫“斋宫”。金亡后，洪恩寺重兴，把它改作禅院与香积厨。和尚们只占了前面

的两层院子，后边的三层，门悬关锁，无人敢住。传说他们原来本是曾经住在中院正殿里，要享受一下皇帝的威风。谁知道有一天，睡到三更半夜，朦胧中，觉得来了许多青面獠牙的大小恶鬼，狰狞可怕，哇呀怪叫。伸开蒲扇般的钢钩毛手，把这些秃头，一个个抓起来，一咕咚咕咚地全都扔到院里。摔得头青脸肿，半死不活。吓得他们屁滚尿流，赶紧搬到前院，再也不敢冒充真龙天子了。不过是一个滑稽有趣的神话故事。不必追究有无，妄言妄听罢了！

从中院大门的缝里望去，院中蓬蒿没延，蛇虻纵横。狐兔跳踉，非常荒凉。大殿门上悬着的“慎终追远”铜匾，和阶前北方的螭首龟趺大理石碑，全都能隐约看见。据寺僧说：“石碑是金世宗大定年间所立”。可惜没能开锁一读，真是憾事。

在禅房和香积厨里，摆列使用着两种瓷器。像香炉花瓶，香筒水盂，茶具酒具，盘碗罐缶等物。一种是较为粗糙，带着黑边，并有五个黑点，形如一朵梅花的。一种较为细薄精制的，上面带有山水人物，花卉鸟兽图案。真草隶篆，四体书法和题款印痕，可以辨认出，前者是金人自行制造的，后者是从宋朝抢来的。在题款与印痕内，有着“元丰”、“绍圣”、“建中”、“大观”、“宣和”等宋代年号，乃是真正的宋瓷，可惜多已残破不全。

3. 大东阁：

洪恩寺西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平顶山，山顶是人工凿平的。上边四周多用花冈石砌成护基。雕龙的大理石栏环绕，中建大理石平台，台上有三层高阁。雕梁画栋，鸟革翠飞。巍峨秀出，十分轩敞。门上悬有木匾，隶书“大东阁”三个大字，体势与斋宫横额笔法相同。盖因金人起自东北，踞有中原。取诗经、鲁颂，《閟宫》篇中：“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句义，以作阁名。内祀木质接引佛像，高约丈余。仪容庄严，右臂平举微昂，指向前方，表情灵活生动，出自名手所制。阶上有螭首龟趺的大理石碑，碑身断折仆地，阳面向下，未能阅读碑文。

依据上面的记叙，可以了解“磐宁宫”原来的大致面貌地址，并且明确地得知：龙溪寺、洪恩寺、磐宁宫、瑞云宫，四个名称，前后更换的沿革，它们实际上，本是一个地方。洪恩寺到了清代中期，还比较完整，有僧人看守。金代后裔完颜麟庆，于道光二十五年，来房山祭祖陵时，曾经住宿于此，后来大毁于咸丰十年，(1860)英法侵略联军进陷北京之际。连旷世国宝高克恭的名画，也同化劫灰，真是非常可惜。现在惟存残破基础，零乱瓦砾，一片荒凉，徒共游人凭吊而已。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明张北川墓杂记

杨亦武

北川墓的发现

明张北川墓在房山石楼乡坨头村西，为北川与其妻杨氏合葬墓。北川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九月初十日迁葬于此，嘉靖二十六年(1547)闰九月初四日自北川窆葬杨氏。历经四百四十余年，北川墓终没于世。

1990年6月6日。坨头村民在坨头砖窑西取土时，掘出两对对封的方石。7日晚，方石被取回坨头村民委员会收藏。8日，经鉴定，出土的两对方石一为明张北川墓志，一为北川妻杨氏墓志，墓志出土的位置即明张北川墓。9日北川及杨氏墓穴完全暴露。

北川其人

张北川，名瀚，字惟容，号北川。明顺天府，涿州房山县坨头村人。祖籍云州。弘治十年(1497)正月初四日生。北川高祖因军功授直隶兴州中屯卫百户。诰封昭信校尉。此人戎马转战曾屯营坨头，后代遂定居该村。

北川父生二子，长名仁、次即北川。兄张仁治理家业，北川进京游学。继为捐监。北川容貌魁伟，禀性刚毅，读书谈道每有大志。未几，兄以疾卒，北川辍学归里。

北川勤农俭财，增田辟第，张氏家业为之一振，成一方巨富。嘉靖二十四年(1545)七月初二日，北川以疾终。享年四十有九。

北川妻杨氏，出于良乡名宦之家，弘治九年(1496)七月十八日生。杨氏礼孝为先，仁爱为本，俭素持家，辟塾训子，张门之振，颇得其内助之力。嘉靖二十六年(1547)秋八月二十二日以疾终。享年五十有二。

北川有子五：长名栋，捐监，先北川卒。次名桐，倜傥不群，有乃父遗风。三名榘，四名梅，五名朴。有女五，均聘官宦之家。长为良乡宦族、监生侯赞妻，次为同卫后所百户王户侠长子钝妻，三为同卫指挥同知李浊妻，四为涿鹿左卫指挥同知李国柱妻，五为监察御史升陕西等处提刑金事王某四子一鸷妻。

北川墓葬制

北川墓和当今民葬形制略同。以木棺下葬，木棺前脸置一罐，俗谓抱罐。棺内置铜钱若干，俗谓垫背钱。可见，当今房山墓葬中，以木棺下葬，棺前置抱罐，棺内置硬币垫背的习俗是继四百多年前的明代沿袭下来的。

北川棺底铺以青砖，四周及棺顶灌以三合土(沙子、白灰、黄土)，其作用是棚护木棺。此则反映了明代房山民葬的独特之处。

三合土外围异常坚固，壁厚近二十公分。历四百余年，北川墓棺骨殆尽，而三合土外围几无塌陷。

北川墓志置于棺顶之尾。

杨氏葬制与北川同。

以墓址分析，当年下葬次序大致如此：先挖一长方形墓穴，穴底堰上青砖，将棺柩下葬，棺脸前置一抱罐；再用三合土灌筑封顶，下少许土，将墓志置于棺顶之尾。最后填穴起垆。

北川墓墓志

北川墓墓志由二方石对封而成，一底一盖，底以小楷镌墓志铭，盖以小篆镌铭题。底盖对文以二铁条平行封束，不打开铁封则看不到墓志铭。

北川墓出土墓志二：一为北川墓志，一为北川妻杨氏墓志。

北川墓志底高62公分，广61公分，厚10公分。上镌《明故北川张公墓志铭》全文，清洛程绅撰文，新昌愈得全书丹。盖高65公分，广62.5公分，厚10公分，上镌“明故北川张公墓志铭”九字铭题，成三、三、三排列，出自淮阳杜承宗手笔。

杨氏墓志高53公分，广53公分，厚6公分。上镌《明故张母杨孺人墓志铭》全文。上党郭秉聪撰文，

丹阳朱应奎书丹。盖成不规则方形，一高 54 公分，一高 53 公分，一广 56 公分、一广 55 公分，厚 10.5 公分。上镌铭题。“明故张母杨孺人墓志铭”十字，成三、三、三、一排列，新城崔峨手书。

现知标明墓志铭的方形墓志以刘宋大明八年(464)刘怀民墓志最早，东汉末年及两晋墓中或有与墓志相近的方版和小型墓碑，但都未名墓志。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成为定制，下底上盖，底镌铭文，盖镌铭题。至唐代，几十公分见方的小墓志渐为普遍。北川墓志，反映了墓志形制在房山的历史沿续。

房山出土的墓志不多，明代墓志尚属首次发现。北川墓志完好如初，在房山现存的墓志中，北川墓志保存最为完整。

附：

明故北川张公墓志铭

赐进士出身承职郎刑部陕西司主事清洛程绅撰文

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广西等处提刑佥事前湖广道监察御史，新昌愈得全书丹。

锦衣卫昭勇将军都指挥同知淮阳杜承宗篆盖。

张公讳瀚，字惟容。北川，其号也。北川先高大父，云州人也，以军功授直隶兴州中屯卫百户，诰封昭信校尉。曾、祖相继，生厥考，行二。考生伯仲二人，伯氏名仁，父命理家，北川从学都下，与予有同窗之雅，甚厚。

北川容貌魁伟，性禀刚毅，读书谈道每有大志。厥考谦抑，乃输粟以为国子生，其志益励焉。居无何，兄以疾先考而卒，遂束书篋归。

历年规治家政，继送考妣及嫂大事，大志竟不能伸。闻其居家也，勤农事、节财用，增田庄，开第宅、恤孤独、厚宾客、育佣仆，凡乡邑远近咸来称贷，以听其解息，兹家声益振，于前昔，父兄曾受乡人之辱，闻之泣不下食终日，奋然往诉，竟请法如律而后已。堂兄受祖职怠而废，经十数载不叙，乡人多忤之，又奋然率侄恳乞，奏言哀陈，当要职竟如初，乃祖屯营在房山东南八里许，村名坨头。邑有二尹新任，禄不能瞻，出十数金以济之。及谪归悯其囊空，分文不齿，且饯之。士大夫皆重焉。家置书屋，中藏典籍琴画，外植花卉竹石，超然有古人自得之趣，生平不嗜佛老之言。及卧病有功以祈禳者，乃曰：“命自有数，祷之何为？”其刚毅类如此。

北川娶杨氏名宦贤女也，生子五：长名栋，输粟国子生，学麟经将成，以疾先北川卒。次名桐，侗傥不群有乃父风，承家伟器也。三名榘，四名梅，五名朴，俱幼，皆性明敏，则读书事业后自有人。生女五，长适良乡宦族国子生侯公赞，次适同卫后所百户王公长子王纯，三适同卫指挥同知李浊，四许聘涿鹿左卫指挥同知李国柱，五适监察御史升陕西等处提刑佥罕王公第四子王一鶚。孙男一，从谦其名也，孙女二，未笄。

北川生弘治丁巳正月四日，卒嘉靖己巳七月初二日，享四十有九年。桐卜是年九月初十日迁葬祖圻之侧。

前期持乃伯省吾张君状，请铭。噫嘻！予与北川素敦友谊，见状痛哭不忍辞。北川来登第而充财产，未受爵而多子孙是亦荫福人也，夫何憾？特惜其年不少加焉。阅既与闻皆符，是铭有足征矣！铭曰：

古人云义，公其近之。古人云福，公其获之。

翼子克肖，孙谋用昌。存安歿宁，刻出永光。

附：

明故张母杨孺人墓志铭

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前通政司右通政翰林院庶吉士上党郭秉聪撰

赐进士第承德郎刑部四川清吏司署员外郎主事丹阳朱应奎书丹

赐进士第承德郎户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新城崔峨篆盖

嘉靖丁未秋八月二十二日，张母杨孺人以疾终，厥仲胤桐持庠生杨子汝静所为状泣请余铭，余素相识且重杨子之言征也，故弗辞而为之铭。

按状孺人杨姓，父瑛寿官，母李氏生孺人。家世衣冠为良乡望族。幼有淑质，克闲姆训，尤精女红，习闻父兄诲言，颇通经史大义。即笄，归太子生北川张公，熟执妇道，处奉舅姑，务得欢心，礼侍兄嫂，无间存歿。督僮仆、治生产，奉先祠，礼宾客，遇姻戚。品式酬应，悉有规绪。虽天性俭素，至以其余力济宗族、周寒馁，则不吝也。北川赖以游学，无内顾之忧。晚承夫君遗命，辟塾延师，训育诸子，渐底成立。自舅姑歿，张氏门户益振以闳，孺人内助之力居多。噫嘻！孺人内政斩斩，宗姻仰则，且丰产潘胤，宜享遐龄，乃甫命下寿遽尔长终。惜哉！距其生弘治丙辰七月十八日，得寿五十有二。子男五，长栋，太学生，先歿。次桐京卫武库生，肖父，承家允称伟器，次樾，次朴。五女，长适太学生侯公赞，次适兴州卫后所王户侠长子纯，三适兴州卫李挥使浊，四适涿鹿左卫指挥同知李国柱，五适前监察御史升金事王公季子一鸷。孙为一，从谦，孙女二未笄。卜以今年闰九月四日启北川公之窀合葬焉。北川事行备载程秋官志中，兹不赘。铭曰：

烨烨名宗，世德允修。

秀钟贤淑，是惟好述。

来嫔伟人，今德载流。

兰玉森森，多福是道。

昌后光前，族军其俦。

溘然以终，有闾斯丘。

勒文贞珉，家昭千秋。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重修三官庙碑记》发现记

戴家斌

1988年8月，由中日历史学家联合组成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团一行九人，来房山考察良乡地区义和团运动情况。这是中国国家教委与日本文部省的合作科研项目。房山区委指派我参与接待并陪同考察，任务是代表房山区政府协调考察团与当地乡、村的关系，帮助解决调查过程中的具体困难。

8月26日上午,按计划在紫草务乡肖庄村召开座谈会,参加人都已选定,他们大都是义和团民的后代或七、八十岁的老人。在等待村干部通知人的时候,我在村中走,无意之中发现一家院墙边角上横嵌着一方石碑,有一小半还埋在土里。碑文字迹模糊,且多处有刀划痕迹,但“重修三官庙碑记”几个字还依稀可见,印象中,这方石碑《房山县志》没有记载,1984年房山文物普查时也未发现这方石碑。由于我对房山文物的偏好,决计将碑文抄录下来。在征得房主人同意并保证不破坏院墙的条件下,我借来一把铁钎,将埋在土里的半边石碑清理出来,并用路边的麦草沾上清水,将石碑洗刷干净,使字迹逐渐清晰起来。由于石碑是横着嵌在墙角,只能将笔记本铺在地上,趴着抄写。时值盛夏,烈日当空。村民们以为我发现了什么宝贝,团团地将我围住,并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就这样,我趴在地上边辨认边抄写,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当我抄完最后一个字,从地上爬起来时,已经是浑身泥土,衣衫湿透了。晚上,倚在床头,用枕头顶着酸疼的后腰,翻看抄的歪歪斜斜的字迹,自信这两个多小时趴的值得!这方石碑,不仅补进了房山文物普查时遗漏的部分,而且对于研究房山地区的宗教民俗都是很好的材料。以后如有机会,将就此专文论述。

为了辑存房山文史资料,同时也为有志于房山文化史研究的同志们提供一点史料,现将碑文抄录于后,原碑中剥落的字均以“□”代替。由于原文无标点,加上字迹模糊,抄写匆忙,文中疏漏或错误之处,皆由抄录者负责,并请行家提出批评意见。

重修三官庙碑记

三官之名,见于真诰者三:有上圣之德受官,书为地下主,一说也;天有六官,凡二宫立一官,曰三官,如今刑名职,又一说也;其在周礼,冢宰曰天官,司徒曰地官,而月令注云:少昊氏之子曰修子曰熙,为水官。然俗所谓天官、地官、水官者,其名或此。以余所闻,有功德于民则祀之,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若夫三官,其亦敛福赐福以功德及于民,而御灾捍患者,与良邑城南肖家庄辟路之南,自国初以来,旧有三官庙正殿三间,禅房六间,山门一间,规模既助,灵武凭祭耐祷祠,桓无虚日,惟是日远年深,不无缺漏,风剥雨蚀,无易摧残。至嘉靖十三年,本村宋公□□荣,锐意重修。又有本村李公□,张公□汉,并三教堂主人春之师祖,各助资财,以劝厥缘。此庙业无主持,因工竣时,凡庙中地亩、香火之业,均归三教堂代为照管。于是,焚香奉诵历至今。兹春承先师之志,于同治二年复将禅房、山门一律重修。继恩正殿狭隘,未壮观瞻,垣墉即勤奚为也,因请本村首善,商耐展地,重建正殿。众首善素重春□,无不乐为资助,然工巨费繁,骤然举办,更以屡建歉岁,与工不果,延至本年二月,余爰取吉于念六日,经始坞工。庀材听夕率作,拓其地基,修建正殿一楹,粮塑□奉三官神像、左右侍童。复置耳房两楹以及墙垣屋舍,焕然一新。殿宇已觉崇高,地势愈形开展,神灵□昔有加,统计朴旧□□丹□之值,需银陆百余金。本村众善喜厥功成,共助银柒拾余金,未经外募十方也。夫神道设教,拓古如兹,快非灵应之常昭,安能用人之力不以为劳,用人之财不以为费,而不功成一举,若此其速哉?至六月工竣,□□石庙左盖以记方善乐施之心,以重千古不朽之□,尤望后人之宏□其模,两踵而增茸之也,是为记。

大清光绪□□□□月

附记:写完最后一个字,又一次查对普查资料和有关房山史籍,确信此碑文没有记载,我的兴奋是有点道理的。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房山出土文物年鉴

沈书权

1929年12月2日

周口店龙骨山第1地点，由裴文中教授主持发掘出土第一颗“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距今50万年。

1933—1934年

周口店龙骨山，出土三个头骨、部分肢体，代表了距今1.8万年八个个体的骨化石，定名“山顶洞人”。

1950年6月

窦店镇窦店村，出土战国晚期铜器，有铜铃8个。

1956年6月13日

窦店镇窦店村发现瓷器窖藏，出土宋代白釉小碗1件，高4厘米，口径13厘米。

1957年8月7日

南尚乐乡云居寺内，出土辽、金时期石刻经板10082块，定名为“房山石经”。

1958年春

崇各庄乡长乐寺村，出土明代墓志一盒，方形，边宽84.5厘米。志文“皇明乾清宫管事提督宫内两司房兼掌尚衣监印务尚膳监太监信吾王公墓志铭……崇祯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1959年4月13日

南尚乐乡水头村琬公塔前，出土宋代陶罐1件。

1959年4月30日

良乡城内，出土宋代兽耳铜洗1件，高10.7厘米、口径31.3厘米。

1960年3月

崇各庄乡焦庄村，出土元代铁器45件，有锄、铡刀、钩镰、镐、耘锄、斧、铁刀、叉、剪刀、锁、犁镜等。还有铜镜1面。

1960年8月

良乡办事处常庄村，发现东周时期瓦窑遗址3座。发掘时仅存底部，出土有板瓦，筒瓦、兽面纹半瓦当。板瓦长40厘米，宽30厘米。筒瓦宽18厘米，长度不明。

1960年8月

城关办事处丁家洼村，发现新石器至殷周时期陶窑址6座。发掘5座，另1座因只剩窑底部故未动。窑呈椭圆形，长2米、宽1.7米。清理时可见火膛、炉篦，出土有陶鬲、陶釜，陶豆和网坠等。附近还发现有灰坑、灰层。见《考古》1963年第2期《北京房山考古调查报告》。

1964年3月

石楼镇石楼村，发现三国时期古墓2座，发现时其一拆毁，其一尚完整。长方形砖室墓长3.7米，宽2.6米。穹隆顶。出土红陶罐、灰陶楼，猪圈、厕所、仓、灯、盘、案、奩、桶。还有铜带钩、铜指环等。

1964年6月

张坊乡广禄庄村东南，出土印花瓷盘1件，白釉小碗1件。

1964年12月23日

张坊乡广禄庄村,出土金代明昌三年(1192)赵公之碣1件,长54.5厘米、宽56.7厘米、厚7厘米。首题:赵公之碣。碣云:葬於奉先县白玉乡抱玉村。

1969年11月

良乡南街区药材批发部院内发现元代瓷器窖藏,出土瓷器35件,伴出铁器13件,铜器4件,这些器物装两口大缸内。较重要瓷器有:钧釉瓷盘13件,盘底外大多数有墨书“兀刺赤玉炯”五字;白釉黑花罐3件,釉乳白徽黄通体绣花等。其中1件底部有墨书“刘定安”三字;白釉梅瓶3件,其中1件肩部有“内府”二字。

1969年11月21日

良乡南街药材批发部院内,出土枢府釉印花瓷盘4件、钧釉瓷盘3件、钧釉双系罐2件、白釉黑花罐3件、黑釉罐1件、黑釉梅瓶1件、白釉黑凤纹大罐1件,伴出的还有双耳铁锅2件、三系耳铁壶1件,木把铁穿子1件、弯把铁铲1件。

1970年

紫草坞乡云居被服厂内多出土民国仿造明代宣德炉1件,高10厘米、口径9.4厘米。

1971年

琉璃河办事处董家林村北,发现1座唐代砖窑址,当时窑已毁,出土唐代砖。

1971年1月

周口店办事处坟山村,出土金、元时期由青石板构成的长方形墓葬,随葬品有1件合刀,残玉把有金叶小套。

1971年1月19日

周口店办事处坟山发现墓葬,墓葬深1米,石棺椁都是用六块青石板构成,接处无榫卯,均呈长方形。椁长3.6米,宽2.86米,高2.24米;棺长2.9米,宽1.76米,高1.46米。墓两部有盗洞,尸骨无存。随葬品仅有石础2件、无金套的玉合刀残把1件。

1972年4月18日

崇各庄乡焦庄村出土“唐贞元二年部氏墓志”,长41厘米,宽39厘米。志称:定于良乡县三此原,唐贞元二年(786)。

1972年6月2日

紫草坞乡大十三里村,发现唐代平底黄釉碗1件,高6.9厘米,口径15.1厘米。

1973年

根据1964年调查的线索在琉璃河商周遗址中,发掘十六座墓,其中殉葬墓两座,出土大量陶器、青铜器。

1973年8月6日

坨里乡上万村,出土枢府釉印花瓷盘1件,金皇统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志1件。

1973年9月10日

坨里乡上万村,拆塔出石函,有文“大金穀积山院故长老悟玄大师,皇统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志。”

1973年

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一颗距今20万年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定名“新洞人”。他是介于“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间的古人类。

1974年3月30日

城关办事处饶乐府村西南,发现明代砖室拔券墓一座。墓室呈方形,南北向;墓室两侧有墓道,墓室长

4.10米，宽3.90米，墓道长1.50米，宽1.35米。墓室后北部有护床，长2.8米，宽3.90米，高0.7米。墓室东南角有墓志一盒。出土瓷缸2件，一饰彩绘花纹、一饰雕花。黑釉缸一件，底有文字“万历二年四月初九日一分一”。

1974年8月10日

张坊乡西白岱村，出土白釉黑花罐1件，黑釉双系罐4件。发观金代石函1件、宋代石质小凤饰件1件。

1974年11月

良乡办事处纸房村，发现1个罐，泥质灰陶，轮制，火候较高，高90厘米，最大径70厘米，口径30厘米，底径28厘米，卷唇，直领矮颈，鼓腹平底，罐内遗存小孩尸骨数段。

1976年3月

官道乡富庄村，发现古墓13座。其中汉墓5座，均为长方形砖室墓，出土器物有陶瓮、缸、豆、碗，灶、猪、狗、井等；唐墓2座，出土有酱釉壶、绿釉盘、陶缸等。

1976年10月

新镇办事处401所，发现唐墓1座，深0.5米，随葬器物有灰陶罐。小瓷碗等。

1976年12月10日

南尚乐乡后石门村，出土元代小炉1件，龙泉双耳瓶2件。

1977年6月

周口店办事处坟山的山坡上，发现金代石椁墓，已残，东西长约2.6米，宽约1.1米。附近散存木灰及铁棺钉，还有残片及骨灰。另一座墓已毁。

1978年11月

坨里乡口头村，出土一批战国铜器，有豆、戈、勺、剑。

1980年1月3日

周口店办事处车场村北金陵区，出土三彩瓷枕1件。

1981年3月28日

窦店镇墩台，发现东汉墓1座，长方形砖室墓，长3.8米，宽1.45米，随葬品有陶盘2件，陶耳环1件，陶楼、陶灶、陶井，陶壶、陶圈等。

窦店镇墩台，发现东汉墓，长方形砖室墓，长4米，宽1.56米，出土有陶鸡、鸭、狗等。

1981年9月

琉璃河办事处立教村，出土2件西周早期铜鼎。

1981年

周口店办事处娄子水村西，发现2座汉代陶窑址，窑呈圆形，高2米、直径1.8米。出土大量陶片。同年平整土地时毁。

河北乡磁家务村北，发现瓷窑址，面积南北300米、东西200米。1965年在此修铁路时，出土大量瓷片和坩埚，主要有瓶、碗、盘、罐、灯、小动物和窑具等。釉色有白、黑、青、黄、褐、酱釉和钧釉等。纹饰主要有刻、划的莲花瓣纹，多仿定窑。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近年北京发现的几处古代窑址》。

燕化办事处北庄村，出土宋金时期铜钱35公斤，装在一陶罐内，上扣一个元代钣铁锅。

1981年9月

南尚乐乡南尚乐村西口，出土汉代铁权、铁斧头，铁耙尺、铁犁头等，伴出的还有口斗铁一件。

1981年11月27日

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内，在拜石下面石穴内发掘出套装的5个函，从外向里分别为：汉白玉函、紫色石

函、汉白玉函，金函、玉石函。在第二套的函盖上有“隋大业十二年安置佛舍利三颗”的铭文。玉石函内装佛舍利两粒。

1982年2月26日

坨里乡上万村粮库出土金代墓，器物有：龙泉砂胎釉小罐；黑胎酱釉小碗、龙泉小炉、“长命”铜镜和“长命富贵”镜、晶珠、油岩石盂托。

1982年4月

石楼镇石楼村南，出土海兽葡萄铜镜1面，直径9.9厘米，为唐代遗物。

城关办事处南关，发现一座金代砖室墓，因在住户院内故未清理。出土双鱼铜镜1件，直径19厘米；黑瓷双系罐1件，高13.8厘米，口径1.9厘米。

1982年5月

房山煤矿万佛堂孔水洞内清理淤泥时，出土唐代金龙7条，长14.5—19.5厘米不等。龙形似狗，做走或奔跑之态。

石楼镇二站村东砖厂，出土八瓣葵花铜镜一件，直径9厘米。

1983年4月

东南召乡常舍村东100米，出土铁六饭锅6口，出土时其中三口碎破，大小造型相同，高27厘米、口径37.5厘米。

1983年9月2日

周口店办事处南韩继村西，出土战国“明字”刀币约5公斤，出土时全部装在一陶罐内，陶罐破碎。

1983年11月

琉璃河水泥厂东厂宿舍区基建工地，发现元代砖室券顶墓一座，长方形，南向，长3米、宽1.2米、高0.95米。室内置木棺已朽，骨架仰身直肢。随葬器物有：鸡腿瓶1、双系瓶11、磁州碗2、均窑碗2、三彩盘1、小碟4、铁刀1、盆1以及数枚铜钱。

1983年12月19日

窦店镇窦店村东北，出土红、灰陶夹砂陶鬲各一，纹饰造型相同，高33厘米，口径12厘米。

1983年

窦店镇西安庄村，出土汉代红陶夹砂罐一个，高33厘米，腹径54厘米，口径13厘米。

1984年1月24日

窦店村西土城内，出土汉代灰陶夹砂罐1个，身有回纹，高30厘米，口径14厘米。

1984年10月

官道乡富庄村东北，出土鎏金铜牛角杯两件，其一破烂，高7.5厘米、长15厘米，口径6厘米，杯的正面雕成牛面形，整个造型似牛角。

1985年2月14日

房山城内服务大楼挖楼基，出土鸡腿瓶2个；双系黑瓷罐1个，高9.5厘米，口径8.3厘米。

1985年3月18日

良乡办事处北关处，出土唐“开元”等年号的铜钱44枚。

1985年3月26日

琉璃河办事处建材学校，出土灰陶罐1个，高29厘米，口径18.5厘米。罐内装“祥符元宝”铜币2枚。

1985年3月

张坊乡大峪沟村北，在元代窖藏的一个六饭锅内放有白地黑花梅瓶两件，造型相同，纹饰各异，高35

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12厘米。其一，白釉卧足，肩书“内府”二字；其二，白地黑花外罩孔雀绿釉。锅高27厘米，口径24厘米。

1985年4月

周口店办事处车场村，出土清代银元宝12个，分大小两种。大者每个重397克，小者35克，共计2438克。大部分上面印有戳记，记载了元宝的所铸银号，作坛，成色、姓氏，如“隆祥良作”、“盛德号”、“裕兴号”、“卫同志”、“王”等。

1985年5月18日

周口店办事处车场村北，出土金代铜镜1面。

1985年6月14日

城关办事处册册村西，出土元代磁州窑圈足碗1个，高4.8厘米，口径17.6厘米；酱釉瓷罐1个，高13.8厘米，口径11.9厘米。

1985年7月27日

南窖乡南窖村，出土金代晚期铜质“督统之印”一方，呈正方形，边宽8.5厘米，高4厘米，方柱钮上标明印的方位“上”、“下”。

1985年11月28日

石楼镇石楼村南，出土战国时期“明”刀币约400公斤，出土时全放在一个陶瓮内，上盖石板一块。

1985年

张坊乡北白岱村北1000米，发现汉代瓦窑，窑呈圆形已毁，残高1米，出土有青色板瓦残片。附近地表遗存战国绳纹陶片。

紫草坞乡小董村，出土墓志一盒，长47.5厘米，宽44.15厘米。志盖顶篆书“蔡君墓志”，四面线刻十二生肖象。志文“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瀛州别驾莫州刺史上柱国申国公蔡府君墓，唐贞元三年二月十六日”。

1986年7月

石楼镇石楼粮管所内，出土汉代红陶夹砂陶灶一个，陶面有三个锅，其一只坐带篋子的小罐。

1986年7月2日

坨里乡大苑村，出土明、清时期铜板一块，重59公斤。

1986年

蒲洼乡东村西，发现元代匣钵窑址，已残，可见窑壁，高1.2米，宽2.5米，主要烧制以耐火土为胎料的匣钵，圆形高27厘米，直径22厘米，两侧有三角形孔，底部有圆孔为窑炉内透热用。

1986年12月

周口店办事处娄子水村西2公里山上，发现瓦窑2座。窑呈圆形，残高1.2米、直径3.5米，内残留青瓦。该窑建自清代。

1987年3月7日

城关办事处西坟上村北，出土唐代墓志一盒，方形，边宽62厘米。盖顶篆书“史公志铭”，四面线刻十二生肖像。志文“大唐故徽史府君墓志，元和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1987年3月21日

琉璃河建材学校，出土金代鸡腿瓶二，均残，其一存上半部，其一仅存瓶底。

1987年3月23日

琉璃河建材学校，出土金代鸡腿瓶二个。

1987年3月24日

琉璃河办事处李庄村,距地表 0.4 米深发现砖室,内装钱币约 6 公斤,上有“开元”、“崇宁”、“熙宁”、“元丰”等年号。

1987 年 6 月 12 日

石楼镇二站村东,出土唐代白瓷一件,高 3 厘米,口径 9 厘米;双系酱釉瓷罐一个,高 12.17 厘米,口径 5.1 厘米。伴出还有铁斗、陶罐、照历镜等。

1987 年 7 月 29 日

霞云岭乡龙门台村南,出土战国“明”字刀币约 400 枚。

1987 年 9 月 5 日

紫草坞乡小十三里村,出土唐代海兽葡萄铜镜一面,直径 11.9 厘米。

1987 年 12 月 16 日

良乡办事处焊条厂,出土清代铜钱约 10 公斤,同时出土白玉烟嘴一个,器物装在酱釉瓷坛内。

1990 年 4 月 12 日

紫草坞乡焦庄村西,出土战国陶壶四件,红、灰夹砂陶鬲各一件。陶壶一件有盖,高 41 厘米,口径 11.2 厘米,其余三件无盖,壶上有几何纹、鱼纹等。

1990 年 5 月 18 日

崇各庄乡豆各庄村砖厂,距地表 1 米深出土红、灰夹砂战国陶罐 5 个,罐内满装“五铢”钱币,重约 600 公斤。

1990 年 6 月 4 日

岳各庄乡天开村天开塔,塔下地宫出土舍利(定名“应化舍利”)5 颗、铜净水瓶、铜镜、银钵、银筷、瓷碗、木桌、木椅等文物 28 件。

注:

1、此年鉴对于定点发掘的琉璃河商周遗址、周口店猿人遗址、镇江营商周遗址、塔照夏文化遗址、金帝陵未收录或甚少涉及,其原因是篇幅限制及资料尚不能公开。

2、为方便读者,历史上凡涉及“公社”名称的,一律使用了现行的乡、镇、办事处之称谓。

(《房山文史资料》第 4 辑)

玉石群雕皇后台

邢一中

位于房山西南三十华里的岳各庄乡皇后台村,有一组保存尚好的清代石雕群——伊桑阿墓。

站在东南的山岗上,那乳白色的伊桑阿墓汉白玉群雕,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此墓地座西向东,占地约 30 亩——华表、墓碑、石狮、牌坊、华表、墓碑、宝顶依次而建,给人以庄重肃穆之感。

这组石雕建筑,设计精湛,作工考究,镂刻绝妙,是我市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珍品之一。那两柱对称的华

表，约高八米，用汉白玉精雕而成。柱顶处，各坐立望天吼，威威雄风，仰天怒嘶，好一付目空一切的尊容。

伊桑阿墓碑，螭首龟趺。通高丈余、宽近4尺。额篆书“御制”。碑文为满汉合璧。楷书碑文“原任文华殿大学仕兼吏部尚书加二级谥文端伊桑阿碑文：

.....在盖职十五年而秉心者如一日

.....

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公元1703年)

仔细通览碑记，伊桑阿：“……受事之后，益天靖共，宅心一本，于和平处事，弥形其宽裕。夙夜匪懈，左右无违……”评价极高。

伊桑阿墓碑与大型雕刻石牌坊之间，有一对头东尾西的石狮，毛发抖擞，体魄雄伟，大有墓地卫士之雄姿。

这对石狮后面，便是矗立于墓地各组建筑之上的大型雕刻石牌坊了——石牌坊选料精细，构思独特，别具一格。它面东背西，面阔六丈，五门六柱。不论是门柱上的层层浮雕云朵，还是那柱顶端的斗拱挑檐，均是用汉白玉精雕而成，使人看后惊叹不已。石牌坊间横探上楷书：“崇祀贤良”，下侧石垫板楷书：“大学仕伊文端公之墓”。笔力道劲，刀法雄健，耐人品味。

总之，伊桑阿墓这组石雕石刻，不仅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高超技术，而且也为研究清代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实物史料。若稍加整理，也可开辟为我区又一处较为新颖的旅游景点。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作者系原云居寺管理处主任

燕山得名的历史渊源

王德恒

当编辑的朋友见告，编辑部经常接到读者来信询问：“燕化公司的“燕”字是读作燕(烟 yān)呢？还是读作燕(雁 yàn)？”我们背倚的大房山、猫耳山均属太行山脉，北京东北部的密云、怀柔境内的山才是燕山山脉，为什么把我们命名为燕山石油化工公司？

1984年，我曾就国务院批准北京石化特区改名为燕山区，写了一篇《北京市燕山区命名的历史渊源》，(发表于《地名知识》杂志1984年4期)对上述两个问题有所涉及。现问题重又提出，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加以阐明。

何处古燕国

燕山位于北京西南郊五十公里的地方，距北京猿人的故乡周口店只有五公里，境内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证明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早期，这一代是山戎、獫狁、肃慎等少数民

族活动的地区^①。在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里，记载了北京地区有一称为“晏”（亦作偃、晏、郾），的方国。

“偃来，……佳方囚”。（《甲骨续存》一、五二九）。

“乙巳卜贞，帚晏……”（《殷墟书契前编》六、四四六）。

这两条卜辞记载的“晏”不但和商朝有来往，而且还有婚姻关系。帚，就是现在的妇字。妇晏，按甲骨文的读法就是姓晏的妇人，当时只有以国为姓的妇人才能记录于甲骨文。那么，这个国确切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呢？查商代，只有两个燕姓国家，一是在商朝发祥地一带。商的始祖契，其母简狄是吞燕卵而生下他的，所以燕子便成为商的图腾。在山东这个商民族发祥成长的地方，建立了一个被后世史家称为“南燕”的方国^②。当商朝强大起来后，有些家族开始向四方移民，这种移民有时是以经商的方式进行的。在灭掉夏国和盘庚迁殷以后，这种移民的规模更大了。其中有一支向华北挺进，来到现大房山下大石河畔定居下来。他们征服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将商的先进文化带到了这个地区，并将本民族的燕图腾祭祀起来。其祭祀处称为“亳”，同时亳也具有都城的性质。以亳为中心，建立了称为“北燕”的方国。在《史记》中，还曾以“燕亳”相称。

北燕亳的具体位置，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就是现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目前这里已建立了商周博物馆。董家林村的商代遗址有东西长八百五十米的故城（其南北长度因河水冲刷已测不出来），有几十座具有商代晚期特征的墓葬。墓葬的特点，随葬器物的组合以及纹饰等，均和河南安阳殷墟的相同。可以充分证明这里就是北燕的“亳”所在地。

周灭商后，武王（或成王、周公）封召公奭于商北燕故地，召公在朝辅政，由其长子主政。亳在此时改称“圣聚”^③。遗址出土了大量带有“偃”（或偃）字的西周时代的青铜器。有的青铜器铭文还记载了偃侯派人到国都为召公送食物等等，并有六匹马的车马坑和许多奴隶殉葬墓。还出土有西周时代的板瓦，证明西周在圣聚修建过宫殿。

《史记·周本纪》记周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左传·昭公九年》记述周武王时的国土，“燕，亳，肃慎，吾北土也。”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互印证，说明西周初年北燕已属于周王朝的一个方国了，这个方国的都城就在董家林。《太平寰宇记》说这里“在燕为中都，在汉为良乡县”。是十分正确的。

战国时期，燕成为七雄之一，燕的名字更显赫于天下。

为什么甲骨文和出土器物上的是“晏”字，或是偃、郾、偃，而文献却写作“燕”呢？原来，在秦统一以前一直是用“晏”或偃、晏、偃的。一九五四年出土的“郾王喜铜剑”，一九六六年出土的“郾王喜铜矛”，还不用“燕”字而作郾。燕王喜是燕国最后的一个国君，也是秦统一以前的最后一个诸侯王。郾改燕当是秦统一以后的事情。有人考证，“郾”和秦始皇的姓“嬴”是一音之转，为了避秦始皇的讳，秦灭燕后，便把郾改作燕了^④。这个说法不无道理。

从上述我们知道了以董家林为中心的古燕国的简要历史和地理位置。现燕山距离董家林只有十多公里，那时当然属于其辖境之内，而且是近畿，使用这个“燕”字是理所当然的了，“燕”是该读作 yān 声的。

何处是燕山

现在的燕山从潮白河谷一带向东延伸约略成一弧形，一直可达渤海之滨，是东北和华北的天然屏障，山海关就是这架巨大屏障的一处隘口，成为关内外的交通要冲。北京北部的军都山属燕山山脉，其中有著名隘口居庸关。

太行山则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山，进入北京后，称为西山，在房山一带亦称中条山。其较高的山峰百花山、猫耳山、笔架山等都在房山境内。燕山则背倚猫耳山、陵山（因有金朝皇帝陵墓而得名）。百花

山、猫耳山、陵山等这一段山脉统称大房山，而在战国以前，这段山脉是叫作燕山的。

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山海经》记载：

“高氏之山多滋水出焉，直流注于溥沱，……又北二十里曰燕山，其山多燕石，燕水出焉，东流注于河（黄河）”。

“高氏山”在《水经》里作“高是山”，即现在的五台山。滋水发原于南坡，现名滋河，经新乐、灵寿与沙河汇流而称潜龙河。它北面一百二十里处的“燕山”正相当于现在的大房山。徐才的《宋国都城记》载：“周武王封召公奭于北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名取焉。”前面我们已知召公奭所封的北燕地在董家林一带，这一带的山只有大房山。所谓“燕山之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房山下的平原”。由此知道大房山就是古代燕山。

由于商朝移民，燕国初创，召公继封，绵延日久，其居临的山、水、地，以至物产，以燕为名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燕水，是今日的大石河，由于流经周代北燕都城圣聚，所以又称圣水。燕石，《山海经》又以“白珉”呼之。《韵会》曰珉“珉似玉而非也。”就是房山盛产的汉白玉，北京市著名的亭台楼阁几乎都使用这种石头作栏杆或作艺术雕刻材料。古人把汉白玉称为燕石，这和把云南大理产的石头称为大理石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论证说：“……燕山为房山之本名，召公北燕国曾都此燕山东野、大石河沿岸之燕城^⑥。”

从上述知道，燕山石化公司所倚临的大房山和其峰猫耳山，古代就叫“燕山”。燕山石化公司以“燕山”命名，正是本之于历史。

燕名为何东移

既然在战国以前北京西南的大房山是燕山，大房山脚下的董家林是燕都，为何现在北京市东的山以“燕”相称呢？这要从春秋战国时动荡不安的社会时代说起。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指出：“周封，以五等之爵。燕蓟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以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今幽州蓟县，故燕国也^⑦。”

从这段话我们知道，周初，北京地区有两个诸侯国，即燕国和蓟国。燕国，如前所述。蓟国国址为现在的北京市。《说文解字》曰：“周封黄帝之后于蓟，上谷有蓟县^⑧。”

周初曾“服国八百”，“封国四百”，召公是和周初周公、太公并列的三大重臣之一，子封在北燕，系周朝的同姓封国。而蓟呢？虽是帝尧之后，又能上溯以黄帝为祖，但不是周的周姓，属“服国”之列。所以当燕站稳脚跟强盛起来后，便把蓟吞并了。这就是“蓟微燕盛”的真实历史。后来，燕决定迁都于蓟，从而开始了以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蓟城三面环山，一面是平原，河渠纵横，交通方便。燕并蓟而都蓟之后，原来的燕都就废掉了。他们把新都蓟叫做上都，旧都圣聚叫做中都。后来由于经常经略南部诸国事，又设一下都，即河北易县燕下都。

现在的燕山和军都山在蓟北和东北，古称碣石山。《山海经》云：

“（高氏山）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黄河）”。

《史记》记燕昭王在蓟（今北京市）为邹衍筑“碣石宫”，同时又称蓟城为“勃碣之间一都会”。十分明显，这里的碣石不指北戴河的碣石山。东迄渤海，西至碣石，都会在其中，就是指的军都山。前燕主慕容俊迁都蓟城后多构筑的宫殿也以“碣石”为名，而古燕、前燕的两座碣石宫都在军都山东麓。碣石山在秦始皇刻石纪功以后，则专指今北戴河一带的山或某一座山。

燕都迁蓟后，把原来燕的名字也带到蓟。环绕蓟东北的山此时开始以燕山为名。久而永之，旧都荒芜了，人们逐渐忘掉了它而新得名的燕山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名声越来越大。随着人们认识眼界的扩大，地理

知识的丰富,发现新得名的燕山和旧名燕山虽然都处于燕京近郊,却属两大不同系列的山脉。燕山之名应只保留一个。京东北燕山是燕京的天然屏障,南北的交通要道,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们和新得名的燕山打交道的机会及利用的机会更多一些,所以,燕山的名字就给了它。京西南的“燕山”,虽然土地上留有古燕国的遗迹,但随着燕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它的燕字被忘却了,并从地理上溯其脉源,发现它属于太行山的北段,便以太行山呼之了。这当然是地理意义上的命名。然而,从历史上看,燕山这响亮的名字还应属于北京西南的群山,依此山而建而命名的燕山石化公司,正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一段不可忽略的历史。

注:

①《逸周书·王会篇》载国初北方有山戎。《史记·匈奴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史记·五帝本纪》载尧舜时,北方有“山戎、发、息慎。”

②《史记·燕世家》燕庄公十六年时,南燕还存在,曾逐走周惠王。有说南燕为黄帝之后。

③《水经注·圣水》。

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⑤常征《召公封燕及燕都考》。

⑥顾云庵《燕京记》。

⑦《说文解字注》。

⑧《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引《世本》:“桓侯徙临易”。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作者系原燕山文化馆干部

第一个“北京人”头骨发现经过

裴文中

“北京人”第一个头骨发现,结束了上一世纪发现的爪哇猿人是人还是猿的争论,确立了猿人阶段的存在,在古人类学的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裴老生前在《龙骨山的变迁》一文中记述了“北京人”第一个头骨发现经过。下面将此文略加删节后刊出,以纪念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教授。

龙骨山位于房山周口店,在距周口店车站西北二三百米远的地方,是一个馒头式的低平小山。

龙骨山这个地方出产动物骨骼化石(中药中称龙骨),是瑞典人安特生于1920年前后发现的。1921年,安特生聘请了奥国人师丹斯基来中国挖龙骨,1927年师氏在周口店龙骨山挖掘的化石中发现,有两颗牙齿很象人类的牙齿。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私立协和医学校协议去龙骨山继

续挖掘化石，以求多得些“人类”的材料。

龙骨山挖掘工作以后，瑞典人步林博士发现了一颗牙齿。他认为这是介乎于猿与人类中间的一种原始人类牙齿，他给这一新发现的原始人类起名叫“中国猿人北京科”，俗称“北京人”。但是，当时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1928年，我开始参加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当一名助手。到了1928年底，我们挖掘到一层最坚硬的石层，里边动物骨骼化石非常稀少。许多人都认为我们在龙骨山的工作已经到了尾声，下边不会再有什么“北京人”的化石。于是到1929年，外国基金会的代表和中国代表都另去寻找远古人类的遗址去了。这个在周口店龙骨山挖掘“北京人”的事，就交给了我。

在困苦艰难中开挖完了这一层最坚硬的石层之后，出乎意料下边露出了较软的土层，里边龙骨还很丰富。到了12月初，已经降过小雪，天气寒冷，北京命令我立即停止工作。但是我见只有几颗“北京人”的牙齿发现，没有重要化石，不肯死心停工，又坚持了两天。

12月2日那天，我在开挖地方的北部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我很兴奋，用绳子将腰系住，由几个工人接住绳子，鼓起勇气下了洞。我看见洞里各种动物的骨骼化石都很多，就让工人将我拉到洞上来。我一边上洞一边用手电筒向洞壁上看。在将出洞的时候，离洞口不远的地方一个黑黑的、圆圆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出到洞外，我与工人们又将洞口开大了一些，露出了我方才看见的那个黑黑的、圆圆的东西，原来是“北京人”的一个很完整的头骨，露出了一大半，其余尚埋藏在坚硬的沙土中。这个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洞中光线不足，我们点上蜡烛工作，但还是没有挖出来。到了下工的时候，我怕夜间在野外放着不安全，决定用铁撬把这个头骨取下来。我知道，这个方法是危险的，但时间不允许。果然用铁撬一撬，“北京人”的头骨震碎了。由头骨的破处，我们测到“北京人”头内的厚度，由此知道“北京人”的头骨许多部分厚度都在十毫米以上，比我们现代人的头骨厚得多。

我们把“北京人”的完整头骨由土石中取出后，立刻打了一个电报到北京。第二天接到回电，令我急速停工，将这个标本带回。后来听同事告诉我，当北京接到我们的电报时，大家都一致认为我们发现的头骨，很可能是近代人的头骨，从洞口中漏入。

当我将这个标本带回，大家一看，确认是“北京人”的头骨。这一发现使大家都兴奋起来。

这个消息传播得很快，传到全世界，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有了这个发现，龙骨山的命运就改变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将这一块山地购买过来，成了国家的公产。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由于战火纷飞的混乱，“北京人”第一个头骨在转运中下落不明，至今尚未找到，成为世界科学界的疑案。

注：本文转自1989年12月2日《北京日报》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房山(南郭)唐诗人贾公祠记

李北岳

祠在邑南郭半里许，北向，明永乐(成祖朱棣)十年，邑人锦衣百户镇国将军李祥(字吉甫)出资创建。规模宏敞。松柏蓊郁。前殿祀韩愈，匾额文曰：“千古孙阳”。殿柱联曰：“贵贱一朝看遇合，推敲百世抚风流。”大殿中祀贾岛，左右祀孟郊、姚合。匾额文曰：“同气同声”。殿柱联曰：“普郡长江遗德泽，房山圣水著嘉名。”神像皆大理石雕坐像，仪容端肃，服饰简古，出自名手。匾联皆篆书，方正谨严。雄厚圆劲，深得李少温(阳冰)笔法之神韵。东西配殿各三间，院中东北方，有大理石“创建房山贾公祠碑”，高丈余，螭首龟趺，雕镌精巧。撰文并书丹，皆李公自为。略谓：“巨唐一代，诗道大兴，凌铄古今，圣哲竞出。浪仙起自寒微，而能异帜独树一帜，奇军别张，卓然为中晚名家。可谓北方豪杰之士，范阳闻达之先。爰以南郭先莹东南私田二十亩，创建祠宇。采黄龙山琪珉，敬造公像，配以退之、东野、同伯。俎豆崇祀，用志知音。诗云：“颀颀印印，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垂芳千古，启牖后昆……”云云。

祠之东西，各有侧院。西院更为宽大，中筑花冈石平台，上建殿堂三间，垂檐飞脊，画栋雕梁。前后出廊，两面辟窗。大房景色，尽收坐上。颜曰：“月下斋。”殿柱联曰：“一联刻削房山瘦，二字推敲圣水长”。皆篆书，与祠内之匾联同出一手。室内北壁，悬有铜匾，文曰：“骚坛异帜”。隶书圆劲豪放，具有张迁碑风骨。院中苍松翠柏，高柳古槐。茅亭苔井，假山石洞。春兰秋菊，腊梅牡丹。清渠蜿蜒，自西垣下石窦引入沙河活水，北注芳池。岸立大理石碣，上镌“赏音”二大字，亦隶书。荷菱浮香，鱼虾游泳。禽鸟和鸣，蜂蝶飞舞，佳景天成，清幽绝俗。每岁良辰佳节，邑中耆英多集于此。饮酒赋诗，击剑较射，投壶对奕，长啸高歌。悦目赏心，升平乐事也。

满清入关前后，迭遭兵燹，守护无人，日就倾圮。石像被窃，祭器失散。至清中叶，乡绅陈某，愚而多财。天性佞佛。竟尔毁去碑记，加以修葺，改为佛寺，招僧住持妄希获福。地方有司，亦未过问。先贤祠祀，坐视沦湮，曷胜浩叹。安得有力好事者，一朝复旧，永藉瞻仰！

注：此记据刘琴斋(青绶)先生所著：《房山景物考》。形容词句，略有润色。二站村贾公祠，三教殿匾文曰：“殊途同归。”篆书。大殿匾文曰“推敲佳话”。殿柱联曰：“万古文章配东野，一生知己属昌黎。”楷书。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北京猿人遗址

李北岳

北京猿人遗址，在房山周口店(原名周口里)之西北约里许。东、西、北三面群峰环绕，中间形成一个宽阔的盆地。坝儿河从西北方向东南流过，山环水抱，地势雄胜。煤与灰石蕴藏丰厚。遍地俯拾即是。自满清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平汉铁路支路建成后,成了由房山去北平的交通要道。煤厂灰栈以及各种商店,纷纷建立,于是,周口店逐渐繁荣起来。

“北京猿人遗址”在该村西北“龙骨山”上,早年山上下及附近,零乱隐现地堆积着许多赭红色的人、兽骨骼化石,研成粉末,可作药用。治疗外伤,据称有效。当地人叫它“龙骨”,因此,该山就取名为“龙骨山”。

民国七年(1918),瑞典人安特生,来此旅游。首先发现,所谓“龙骨”,实际上是各种古生物化石。具有极其重要的考古价值。以民国七年(1918)到十年(1921)之间,安氏曾来过两次。采掘了许多化石,其中最珍贵的是两颗猿人牙齿化石。全部运回瑞典,从事研究。

自民国十六年(1927)开始,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担任开发研究工作。挖出了极其完整的左下臼牙化石,经所长步达生研究鉴定,此种猿人,为一新属,定名曰:中国“北京猿人”。大概生活在五十万年至一百万年以前。民国十七年(1928),继续挖出一个少年猿人和一个成年猿人的下颞骨化石。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民国十八年(1929),在裴文中的领导下,挖出了一个极其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民国十九年(1930),又挖出来一个。二十年(1931),在山上的鸽子堂(洞名)里,挖出了大批的石器和猿人用火的遗迹。石器中有石斧、石凿、石刀等。各种生物化石中,有肿角鹿、耗象、鲇鱼、犀牛、鸵鸟卵等。尤为珍贵奇特的是:一枚一头有孔的用角骨制成的骨针化石,想是猿人用来缝制树叶兽皮之用物。二十二年(1933),在山顶洞里,挖出了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遗骨化石及遗物,以及许多猿人生活遗迹。经过研究鉴定,已经发掘出来的猿人头骨、牙齿等化石是二十四个猿人的,其中老少男女各为十二人。这真是一件天然巧合的异事。后在山前的空地上,建立了陈列馆,供人参观研究。

关于中国“北京猿人”的发现,在人类历史和科学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可称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发掘工作,直到七七事变才被迫停止。因其地势幽僻,接近山区。日寇借口在该处工作的人员,与我抗日工作人员和八路军有联系。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他们和附近的老百姓枪杀刀挑了数十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周口店龙骨山惨案”。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这个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古迹,非常重视。拆迁了前面的部分民房和商店,把原来简陋狭隘的陈列室,扩建成宽敞明亮富丽堂皇的展览大厅。

开辟了宽阔的停车场,恢复了研究发掘工作。并且增建了凉亭水榭,开凿了莲沼鱼池,叠假山,置喷泉,栽种各样果树和花草,把它点缀成一座美丽幽静的花园。郭沫若又给题写了匾额。前来参观游览的中外人士,一年四季,络绎不绝。又把“猿人遗址”列为北京新十六景之一。

最可惜的是:在民国十八年(1929),发掘出来的一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于抗日战争时期失去。日本投降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此十分重视。经过多方调查寻觅,迄今尚未找到。房山区的名胜古迹颇多,而“北京猿人遗址”因发现较晚,所以歌咏它的诗词作品,也就前无古人了。昔年我曾嫌明代的马永亨,清代的佟有年两位县令,他们所制定的旧、新房山八景,在遴选上,轻重取舍,稍有不当。冒昧地另拟了《李氏房山八景》,把“猿人遗址”,列为八景之首,系以七律诗一首。格虽浅俚,重在纪实。附录于后,敬祈海内高雅,俯予匡正。

人类源头未缈然,洪荒遗迹大房前。
笑以旅月升星日,数到茹毛饮血年。
麋象鲇鱼形诡异,角针石斧质良坚。
惊心瑰宝无端失,引领真型早璧还!

己巳菊望重校。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天开舍利塔记

赵润东

天开塔座落在上方山下天开村东南黑龙潭北岸，它历经隋唐，直至明清，有着悠久的历史。清末以前，塔座周围有众多古迹及宏伟的建筑群，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有朝顶进香的古刹天开寺，西有瓦砾生辉的娘娘庙，南是碧波荡漾的黑龙潭、元宝山以及脚下的龙王庙、观音庙等。

当年，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文人墨客，云集至此，虔诚僧侣，进香佛拜，人群熙攘，络绎不绝。的确是一个别有情趣的好去处。民国以后，该塔拆损严重，残存的二级塔身顶部坍塌，杂草丛生、远近观之，已失去其宝塔秀美挺拔之姿态。然而，其残存部分之景观仍不减其古朴壮观，巍峨凝重之神韵。

多年来，人们对天开塔众说纷纭，给天开塔蒙上了许多神秘色彩。然而，说天开古塔被风吹至口外或金粟山上，皆不足置信，谓其“塔上有蜘蛛，后遭雷劫而去塔之半”，更为荒谬。其实，塔是保存或埋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舍利”用的建筑物。在佛教中，舍利被尊为一种至高无尚的神圣物，尤其被称作释迦牟尼的舍利，更是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对象，如佛在此。据《房山县志》记载：天开塔即天开寺塔。而确认该塔为埋佛之土冢也可信无疑。元代集贤学士魏必复于天开中院碑阴记曰：“天开古名刹在房山之麓，規制始于汉，历晋隋，迄五代，盛于辽，废于金，至元十年应公禅师始来主持。”由此可见，古塔建于辽或辽以前，隶属天开寺也可作一依据。

由天开古塔现在残存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出，该塔最初整体建筑应该为三个部分，即：塔刹(表相部分)、塔身(主体部分)、地宫(又称“龙宫”或“龙窟”，以埋藏舍利和器物等)。天开塔表相部分“塔刹”早已失落，塔身亦残存二级。但莲花须弥座上的盘龙戏珠及浮雕佛像清晰可见。解放后，天开古塔天然风化严重，加上人为破坏，塔身开裂，摇摇欲坠。“文革”时期，塔座四周凿了炮眼，准备炸毁。其凿痕至今犹存。而须弥座上的青砖被人拆毁。当地村民常牧牛羊于塔坡四周且攀缘塔上，远眺四方。截止1990年秋季，古塔一级的南侧不断塌落，呈废墟状。继而塔心通气孔露出。此时，当地有三村民认定塔底有宝物，于是多次窥探，并撬青砖、阔穴孔，直至地宫显露出来。

1990年6月3日，市、区考古队正式挖掘。塔内地宫正南辟门，作拱券式。成人可屈身而入。地宫距地面约60厘米深。地宫墙壁均为青砖砌制。宫内直径不足3米，上下高2米有余，顶部斗拱呈锅底状。其墙壁有青砖浮雕和沿袭唐代绘画技艺的精美彩绘。地宫正中与顶部通气孔垂直竖立一座小舍利塔(即经幢)，又可称为塔中塔。该塔高约1.9米，呈八角形，每面均有铭刻。其文记曰：“大辽燕京良乡县金山乡乐深村西约一里地有古严陵洞，洞北约五十步有旧塔破摧遗址处。”须弥座上为石函，函上亦有铭刻。再上为塔身、塔刹共九级。这是一座辽代完整经幢。在这座小舍利塔前面，放有一张辽代完整的木供桌，其做法过去只在辽金时期的墓葬壁画中见过。这张桌子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实物。据推测，是摆放祭品用的供桌，属于珍贵文物。木供桌上安放着精制石佛、寸许小木佛像、铜香熏各一。此外，在地宫中还贮有白釉碗、白釉赭花高足碗、银钵、银筷、银勺、铜镜、铜盆、铜净水瓶、莲瓣饰件、小银火球净瓶等二十余件。在地宫的石函中贮有一银函，函内有一水晶玻璃瓶，内贮佛舍利。其舍利白日呈灰白色，夜间呈白色且发光。据专家鉴定，“天开塔舍利现在看石刻铭文不详，资料不足，舍利不象骨质，因此不能确认为佛舍利，但具有文物价值”。按照该舍利石函铭文说法，将其舍利定为应化舍利。即应佛教众生之机缘而化生的舍利，意思为复制、代用的舍利。

那么，天开塔始创于何时呢？这个问题要看天开寺建制年代，因寺与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钦定四库全书·旧唐书·地理志》记曰，“国门之西，两舍之地，有山曰六聘，中有伽蓝曰天开，燕易间一巨刹也。自后汉迄有唐，经五代历辽金，废兴难具载。”从这里可以看出天开寺建制年代已久。

《房山县志·艺文》记载：“至元十年岁次癸酉，应公禅师从檀那比邱众之请，住持涿州房山县之天开寺，寺盛于前代，由唐以来历兵燹，始荒废，师贮锡慨然，有兴坠起废之意。”于是剪荆棘、除瓦砾，没过多少年便筑起殿宇及僧房库室。香薰烟火不断，寮舍金碧辉煌，很快成为佛门圣地。

自应公禅师始来主持后，又相继建了栗园寺、皇后台东西两寺以及涿州的设济寺等，其规模庄严，均拟于天开。为了供给众僧日饌费用，还在流经而下的河之上游安上三盘水碾。到了至元二十年(1284)时，世祖皇帝闻而嘉之，特赐圣旨护持，应公既圆寂，遗教弟子赵显仁主持寺院。

由碑记和史书资料得知，天开寺最早创始于汉代，鼎盛于辽代，废于金季之兵。那么，天开寺的建制、规模盛于辽，天开寺塔巍峨挺拔之状也自然很清楚了。斗转星移，历经千年，随着古刹的荒废，古塔年久失修，塔身颓落亦在情理之中。

关于天开塔和佛舍利的有关情况，地宫中出土的石函上有较为明确的铭刻。其中记曰：“匪果辞世门人继业至龙朔三年(唐 663 年)辽浮图九级，开元七年季，独曾修补。尔后时深岁远旷野唯痕。”这段铭文记载了该寺僧徒继承佛门大业直到龙朔三年以及修补古塔的时间。当时，这座古塔共有九级，开元七年(唐 720 年)间曾进行修补。

在地宫经幢上记有文字：“该口者良乡口世寺僧法询法艺等建，辨此塔至大唐贞观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其僧法询春秋七十有五迁化，遗囑下门资令口僧尼四众等同口。至龙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九级塔成口，内有舍利一十五粒。”由上文可以看出，该塔应为良乡护世寺僧人法询、法艺等所建，辨别分析这座塔到唐贞观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公元 640 年)时，法询法师已度过七十五个春秋，是年迁化并留下遗嘱。到了龙朔三年(公元 663 年)三月二十八日，僧徒们遵囑在塔内放置舍利一十五粒。

据历史纪年分析，唐朝经历了近三百年(公元 618—907 年)，唐贞观十三年(公元 640 年)时法询法师七十五岁且寿终。按情理言，法询精力充沛之季应在三、四十岁，而此期间正是公元 610 年至 600 年间，即隋代。由此看出天开塔创建较为准确的时间，应在隋大业至唐贞观年间。由于天开塔地宫及佛舍利等文物的发现，天开古塔千年以来的奥秘终于揭示了。

天开古塔，历经沧桑。现在塔身还残存一节有余，且半边塌落。瓦砾遍地，蒿草满坡，真可谓“欲寻遗字迹，荒落不堪登”。地宫挖掘后，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尤其是地宫内石函中珍藏的“释迦佛舍利”，得到区文化文物局、文物管理所的重视和妥善保管。为继承、弘扬、保护、利用现存文物，宣传文物保护法规，提高人们的文物意识，从 1991 年 5 月 19 日开始，“房山区天开塔出土文物精品展览”在著名的佛教圣地云居寺举办。闻此消息，各地专家学者以及众多的群众纷纷而至，对石函中珍藏的“释迦佛舍利”及二十余件珍贵文物进行了观瞻。在北京市首届文物节(1991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0 日)期间，云居寺又成了活动中心和游览地之一，而天开塔出土文物精品展览，则更为人们所瞩目。

现在，天开塔地宫拱式券门已用碎砖石封固，作为佛教文化遗产，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天开古塔，“释迦佛舍利”及出土的珍贵文物将成为佛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期望诸位专家、学者进一步探究，作出更为准确科学的分析。

附：

天开舍利塔石函刻文

石函盖上铭刻：

请到放戒

内有释迦佛舍利壹拾颗，随从门人悟遐、悟枢、司非、圆信、司崇、顾陀。

五侯香林智朗等，智净，智初，智林。

石函第一面刻文：

严陵洞再建塔舍利匣序

于戏圣人示之是也神仪有轨权化无隅莫限舍零岂虚愿力利缘正契像何不在镜中感器未从月还非离水内
当释迦拘尸唱匹传教藏于尘方鹤树收光遗身骨于沙界群生备济孰可称乎无斯

舍利一十五粒罔云是谁化身外石匣记但言香林尼寺塔缘成辨询艺二僧

第二面：匪果辞世门人继业至龙朔三年辽浮图九级开元七年季独曾修补尔后时深岁远旷野唯痕每阴夜光
误为鬼火遇我辽善俗乐深村刘诠等于乾统九年季二月二十一日疑掘方扣歇然降黑风皓雪制电震雷闪内银匣
中庆获瞻礼续放异光现无定处由是归心者云奔雨骤念佛者地吼天鸣闻恶

第三面：守令良乡知县进讫

吾皇复往葬所殊获一颗其数日增得十三粒莫测是由有五侯村重佛乘抢勇义应运刘孝贞邑举为都维那胜
缘大响班工加妙塔度如留请予序因直书其事岁次十季九月八日卒

时藏记 韩孝成 刻

书撰僧 慧冲

共辨讲经沙门 融辉 义通 法云

第四面：再建塔邑人名记

五侯村周议达，周议深，周克谨，谢净，谢俊，周俊，王□俊，崔干，崔仁，杨诠，孙义宝，□铎，岳诠，
刘昭庆，刘昭吉，葛顺，宋清，张公亮，张清，吕仲贵，董辩，吕公庆元村刘谓，张约，张谨，甘池张思孝，
杨消，张公翰，北金阁王知儒，周子言，周清、郑常。瓦井村周秀，贺秀，刘师鉴。次乐村王永、王嗣融。

曹章村梁楫、西董村涧筒

七贤村成为真、王诠

南金阁王栋、丁仲颜，王颜

支零村张十公

参考书目：

1. 《房山县志》
2. 《钦定日下旧闻考》
3. 《光绪顺天府志》
4. 《中国古塔》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景教遗址十字寺

赵思敬

在燕山地区车厂村西北三华里的山坡上，有一处寺院的遗址，当地人称它为石佛寺或石塔寺。其实，它是北京地区绝无仅有的景教遗址——十字寺。

景教及其在中国的兴衰

说到景教，大多数人都比较陌生。所以，有必要追溯一下它的发展及历史，从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我们知道，景教就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但它不是基督教的正统教派，而是其中的一个支派，即聂斯托利派。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得知，该教派的创始人聂斯托利（？—451年）原是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大主教。他主张耶稣既是人，又是神，即“基督二性二位论”。这就违反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大会会议上被谴责为异端，聂斯托利也被流放到阿拉伯境内的皮特拉。此后，追随聂斯托利的信徒就逐渐形成了聂斯托利派，但由于罗马皇帝对聂斯托利派的迫害，使得许多教徒向东逃亡，他们边逃边在叙利亚和波斯一带传播本派教义。

约在公元635年即唐贞观九年，聂斯托利派从陆路由波斯传入中国并到达京城长安。这个教派首先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礼遇和赞助。他曾允许传教士在皇帝的藏书楼翻译《圣经》，并在皇宫内讨论福音的道理。公元638年，李世民允许聂斯托利派传播，并由朝廷资助在长安建造了一所礼拜堂。聂斯托利派在传教时为何称为景教？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可见，景教就是“正大光明之宗教”的意思。由于景教僧人迎合了唐帝国利用宗教控制人民，特别是控制边疆少数民族的需要，所以，受到了自唐太宗至唐德宗六个皇帝的重视。在此期间，景教发展迅猛异常，唐朝当时把全国行政区划为十道，几乎每道都有景教寺院，以至于达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境地。其中不少景教教徒还担任了朝廷和军队中的重要职务。在景教传播了210年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内讧和人民的反对，唐武宗于公元845年毁灭佛教时，也废止了景教。《唐会要》中曾记载，其时“勒大秦穆护袄（信基督教者）三千人还俗。”由此，景教在我国内地被禁绝，但在唐武宗鞭长莫及的边疆地区，景教仍保留着它的残余势力。

到了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们的统治横跨欧亚两洲，客观上贯通了东西文化的交流，由于元朝统治者的提倡，西亚的景教又恢复了在我国内地的活动，同时还引进了罗马的天主教。元朝统治者把这些教派统称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是蒙古语“有福之人”的意思。于是，景教再度兴起，在北京、宁夏、扬州、泉州等地都设有教堂，但这时信奉景教的人，多半是蒙古人或迁居于中国的西亚人了。

随着元朝的灭亡，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就消亡了。这其中散落在各地景教遗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大都毁坏或不知去向，所以，从研究基督教传播发展的历史看，景教在中国的遗物也就变得越来越珍贵了。

十字寺遗存及修建缘由

据《大清一统志》记载：“三盆山在房山县西北十五里，山巅平广，约十余亩，下有流泉三曲，状如仰

盆。”十字寺就座落在三盆山前。寺院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占地面积约 200 平方米。原来的殿宇不知毁于何时，现存破旧房屋十余间，尚有护林人员居住。院内有一棵银杏树枝繁叶茂，树围 524 公分，高约 30 米。紧靠树的西北面还有一棵碗口粗的柏树，依附于银杏树下。据当地人说，银杏树原是两棵，相距 10 米左右。解放后因不慎失火而被烧死一棵。近几年，在两树中间又长出一棵小银杏树，现已有 3 米多高。

银杏树的西北面有汉白玉雕的赧赧残座基一个，树东南面有汉白玉石碑两通，一为“三盆山崇圣院碑记”，碑高 204 公分，宽 91 公分，厚 20 公分。为辽代应历八年立，此碑已被砸为两截，但碑文尚可句读。一为元惠帝二十三年所立“大元勒赐十字寺碑记”，碑额雕有双龙衔碑，十分精美。碑宽 92 公分，碑身被砸为三段，第一截碑额高 104 公分，第二截高 88 公分，第三截高 115 公分，三截加起来，原碑应高 307 公分。残碑附近有汉白玉雕刻的四方形石柱础 4 个，柱础边长 78 公分，高 20 公分。柱础上刻有葵花形图案，花盘平整无刻划，直径为 54 公分，花盘周围刻有花瓣 16 个，花瓣上刻有团状云纹。另有直径 48 公分的圆柱基 1 个。此外，在院内的废墟中还可找到黄色的琉璃瓦片及汉白玉雕刻的残石。

在陈述辑较的《全辽文》中，可查出“三盆山崇圣院碑记”的碑文，只是与原碑相比略有出入，现按原碑重新标点如下，《全辽文》中所无文字用[]括起，与原碑中有出入的字也在[]内加以注明，原碑中没有的文字用< >括出，以示区别。

<大都>崇圣院碑记

[朝凤朗守司农少卿、范阳郡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绯鱼袋]王凤鸣(撰)。

[涿州学稟膳生员卢达书]

大觉垂慈，圣人利物，是故发源西国，则优填创其始。移教东域，则汉明肇其礼。导四生于宝所，运三有于大乘。巧使现权之教，以救未来蒙迷。时有范阳僧人惠诚，俗姓张，母孙氏，卯岁礼惠华寺玉藏主为师，授以天台止观。赐携纵游，经过此一处。地名三盆山崇圣院，见其山明水秀，地杰人丰，林树郁茂，菓株滋荣。殿宇颓毁，古遗犹存。石幢一座，乃晋、唐之兴修，实往代之遗踪。惟见一僧，耆年老迈，病患相仍。叹之不已，嗟之不息，遂迺发心，募化众缘。郡公王希道、张仲创、萧名远、杨从实等同发诚心，各舍己资。于大辽应历二年戊辰岁三月内兴工，至应历八年甲戌岁八月中秋，营理大殿三间。中塑释迦牟尼佛，左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大行普贤菩萨，两壁悬山应真一十八尊罗汉。东西伽蓝祖师，二(三)堂两廊，僧舍二楹，钟、鼓二楼。晨昏梵吹，用宣佛化，引导群迷，上祝皇王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今创殿宇一新，金碧灿烂，山门廓庑，俱已克备。厥此真石，永为千古之丛林，万代之不磨者矣，是为记。

铭曰：

应历年间重建，多亏众信施财。殿宇金殿交辉，圣容灿烂争鲜。钟声朗朗响山川，鼓韵咚咚霄汉。碑石万劫不磨，英名古代流传。人人瞻礼福无边，鸢峰灵境不换。

大辽应历十年丙子岁四月吉日立碑。

(住持惠诚同徒：清良、清真、清宝、清实、清江、清彤。徒孙：净堂、净受、净铎、净山、净海。)

(檀越芳名王希道、李氏，张仲创、刘氏；萧名远、郝氏；杨从实、卢氏；李伯通、韩氏；刘字栾、邵氏；郝少达、钱氏；卢进学、崔氏，王古文、盛氏；田福通、康民；崔福铭、乐氏；史永诚、高氏。)

(镌石石匠：段得聪)

以上为“三盆山崇圣院碑记”全文，据《全辽文》附记说，文中应历十年应为庚申，而非丙子，当年立碑为何误记甲子，殊不可解。辽时燕京虽亦称大都，但应历二年岁次壬子，碑作戊辰岁，八年戊午，碑作甲戌，亦不合。碑中如此严重的年号错误因何造成，还有待于识者探究。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在一千多年前，有个叫惠诚的僧人云游到崇圣院，看到此地“山明水秀，地杰人丰，菓树滋荣”。觉得是个好地方，只是寺院的房屋已损坏，一个年迈多病的老僧伴着一座刻有十字的石经幢度日(经幢原是印度佛教产物，唐永淳年

间即公元682年传入中国，为佛教的重要刻石。寺院“乃晋、唐之修，实往代之遗迹。使惠诚不由得“叹之不已，嗟之不息”。遂发心诚愿，号召众人施舍，才有“王希道、张仲创、萧名远、杨从实”等夫妇慷慨解囊。于“大辽应历二年(公元952年)兴工”，到“应历八年(公元959年)”中秋完工。建成大殿三间，中殿塑释迦牟尼佛，左右塑大智文殊师利和大行普贤两菩萨，两壁悬山塑了十八尊罗汉。另外，还建了两廊僧舍，钟鼓二楼，修建后的寺院是：“殿宇金壁交辉，圣容灿烂争鲜。钟声朗朗响山川，鼓韵咚咚霄汉。”这是崇圣院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修建，距今已1032年了。至于寺院重建前是否为崇圣院，已不可考。但此时长安城内有一座大秦寺，原名也叫崇圣寺，二者与景教有无关系，还不敢妄断。

由于辽、宋、金年间频繁的征战，崇圣寺几乎被毁掉。从“大元敕赐十字寺碑记”中得知，在元顺帝至正年间，有一帮朝庭官员和僧人游玩至此，宿在三盆山崇圣院内。一僧名为净善，他“临幢独坐，晏然在定”渐入梦乡。忽然看见刻有十字的经幢上发出耀眼的光芒，继而见到一神“绿服金铠，青巾皂履，赤面长须，厉声而言：“和尚好住此山，吾当护持。”第二天，他将梦中所见告诉了众人，大家都认为这是罕见的事，在加上元朝统治者信奉景教，于是在半官助半集资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第二次修建。这次共修整扩建了五间大殿，增加了一个厨房，并在碑上留一偈，以记其事：“持来游此山，空中遇神言，十字发光现，此地大有缘。”碑文下边尚有“文惠”、“从惠”两代僧人和“脱脱不花”等人的姓名。这次修建完工于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距第一次重修相隔438年。

1983年，我曾在院中见过“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第三次重修十字寺的残碑(上部)，因当时碑阴朝上，只见上面刻满了施者的姓名及所在村镇，而不知正面碑文是否书写了修建十字寺的缘由。此碑目前已不知去向，估计被埋在院中的废墟中。

见于有关书籍中的资料

十字寺作为基督教派在中国内地传播的遗址，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现将所搜集到的有关资料摘编如下：

在《1952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一书中，对1917年发现于十字寺中带有“十”字的刻石发出了惊叹，文中写道：“这些景教徒的最确实的最有价值的遗物，是十字寺或称崇圣院中的两件石刻。”并描绘十字寺周围“环境优美，地处三盆山麓”。同时记载十字寺的匾额为“古刹十字禅林”。两件石刻发现后，不知怎的，被当地人埋藏或转移了，见到石刻的哈了先生第二次来到寺院时，利用了种种逼迫手段才从人们手中得到了石刻的下落，并印了拓本。

哈了先生见到的带有十字的石刻只是两件，而在《唐朝基督教之研究》一书中，却记载了三件带有十字的刻石，文字不多，抄录如下：“某德国人曾在北京西南郊外发现了一块景教徒大理石墓石(发现年月不详)，拾得后送给北京辅仁大学。据佐伯氏亲往该校研究之结果，知道此石长约四尺，幅约一尺，厚约四寸五分。从大理石两侧看来，有四个雕刻，在这四个雕刻之中正面的十字架之两侧，各刻有十字架与白云，其他三个浮雕是劳花、石榴、及雏菊模样。可惜的是，我们不知道这块大理石是原在北京郊外，抑或是由别处被搬至发现处的。”在此文下，又列举了两个十字架的刻石：“一九一九年在河北房山县三盆山十字寺中被发现了两个景教大理石，后被收藏在北平博物馆中。这两块大理石正面刻有美丽的莲花，其上且亦置有十字架，被推定是元代的出品。”

在《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十字寺”条目下，对这座寺院的介绍颇为详细：“房山区三盆山，因有三座自然天池，状如盆，清泉四季盈满，故曰三盆，山亦由此得名。”三盆山之前是古刹十字寺。十字寺原为“崇圣院”，是佛教圣地，到元代，改为景教的圣地了。“十字寺做为基督教之一派——景教的现有遗物，就全国而言，也是仅有的。因此，它有极为珍贵的价值。十字寺的匾，被国民党南撤时运至南京，现藏于南京博物馆。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十字寺作为重要的景教文物遗址，的确应加以保护。

余论

根据上述记载,三盆山崇圣院即古刹十字寺应建于晋代,唐朝时为景教寺院,辽代后改为佛教圣地,元朝时又改为景教寺院,明代复为佛教圣地。历经劫难,十字寺中的景教文物及刻石已流落四方,给研究这座寺院的沿革及历史带来很大困难。就目前而言,十字寺中的辽碑和元代断碑,亦为劫难之余的重要文物,应当设法加以保护,以免再遭破坏。

参考书目:

- 1、《唐会要》
- 2、《全辽文》
- 3、《日下旧闻考》
- 4、《光绪顺天府志》
- 5、《唐朝基督教之研究》
- 6、《宗教通论》
- 7、《世界三大宗教》
- 8、《房山县志》
- 9、《一九五〇年前的基督教》
- 10、《宗教知识宝典》
- 1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 12、《北京名胜古迹辞典》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黑龙潭小记

张玉泉

沿着弯弯曲曲的大石河北上,便发现河水逐渐增大,到东班各庄乡的黑龙关村下,大石河向右拐了个九十度的弯儿。便出现一个清幽幽的大水潭,这便是有名的黑龙潭。

据《房山县志》记载:“黑龙潭,县西北五十里,左右皆山,下临绝涧,山上有关城遗址……深不可测。”可见黑龙潭潭深水量充足,据当地村民讲至大旱之年也未曾断过水,是大石河的源头之一。

这里山水环抱,山青水秀,潭的南侧是一片狭长的树林草场,常有村民在这里放牧牛羊,水里有鸭群游荡。自元朝以来这里就成了一处著名的风景胜地。明代曾有诗人赞美过它,把这秀丽的风光比做浙江的天姥山,诗中写道:

阴云袅袅黑龙湾，瑶草丹崖不可攀。

越客漫夸天姥胜，渔阳还有大房山。

潭的西北一侧山崖上尚存一段古关城墙旧址，它建于唐朝末年。据有关史料记载：唐朝末年的节度使刘仁恭反叛朝廷，另立皇位，在大安山建立皇宫，又在这里建立城墙和烽火台，这里是军事要地，进能攻，退能守。

潭的北侧是险峻的悬崖峭壁。崖下一块平坦台子上修了一座龙王庙。据县志记载：“龙王庙各乡多有之，惟黑龙潭之庙为最著。”潭水从庙前流过。从对岸公路眺望恰似碧绿的潭水里浮出的酡红的仙阁。这座龙王庙与其它各地庙宇不同，是三合院，靠山崖的为三间正庙，坐北朝南，现只存有房基。东西配殿各一间，主体尚完好无损。院内有四棵侧柏，枝干挺拔，郁郁葱葱，站到院内密不见天日，紫红的建筑衬托在一片丛绿中，给这里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西配殿后的小山岗上还有座塔坟，高约三米，砖瓦结构，不知建于何时。

黑龙潭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求龙神焚香朝拜祈雨的处所，是“邑人祷雨处”。据涿州志记载：“元至正中，京师大旱，遗留守都事萨里默色祷之大雨沾足。明宣宗实录曰：宣德十年五月，天久旱不雨，房山民言县北七十里有龙潭。历宋元明以来祷雨辄应。上命遣官祭之……”可见每年一遇天旱不雨，不仅仅是这一带的村民从四面八方聚拢这里向龙神祈雨，而且朝廷和当地的官府也“遣官祭之”。常常使龙潭上空烟雾缭绕，热闹非凡。

这里还流传着许多龙神降雨的神话，以及许多美丽的传说。元至正十年建有碑记记载“范阳芦文进，少从军，身長八尺，姿貌美妙，名振燕蓟，与庄宗屡战获胜，一夕忽败，夜走马坠涧中，才及水一跃而出。明日视之乃邵之黑龙潭，绝岸高险，深不可测，文进知有神助己，气复振……”

传说中的黑龙潭更是神乎其神，“世传有黑龙君居之”（《日下旧闻考》）。据传很久以前这里本无水，也无庙。后来有人发现一只黑羊与一只白羊在滩里顶头，顶了很久，黑羊抵顶不过，便一头扎进山里，接着就冒出一股黑水来，积成深潭，人们才发现这是一条黑龙钻成的潭，管这里叫黑龙潭。

那么龙王庙又是怎么建的呢？相传黑龙潭附近的村庄有个叫赵员外的，他雇一个英俊的青年种地。这年大旱，赵员外让他担水浇地，第二天一早，赵员外发现他家数百亩地全是湿漉漉的。员外发现这青年实干苦干又心灵手巧，便决定把自己聪明伶俐的女儿许配给他。等接亲那天忽然电闪雷鸣，员外让女儿上房收拾晾晒的粮食，她一下掉下来摔死了。死前她对父母说：“女儿跟他走了。”不久赵员外夫妇同时做梦到黑龙潭见到女儿。对他们说：“我们虽已成婚但无房住，请父母建一所。”于是赵员外请人在潭边山崖下的台子上建了这座龙王庙。此后每逢久旱不雨，乡亲们便请赵员外到庙前祷告求雨，不出三天便会下场透雨，所以当地流传着“要把田灌溉，去请赵员外”的顺口溜。

这些美丽的传说，虽无从考证，但是它做为民间故事、口头文学，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给黑龙潭增加了诱人的魅力。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西汉将军纪信墓记

李北岳

遗墓

墓在县城西南韩村河村西北，右邻龙泉寺，前临潞流河（俗称牯牛河）。汉时建筑，早已无存。现有墓碑，乃明永乐（成祖朱棣）十年时，邑人锦衣百户镇国将军李祥，（字吉父）与邑人士出资重修而立。碑用大理石制成，螭首龟趺，雕刻精工，正面刻“大汉将军纪烈侯讳信之墓”字为楷书，雄浑端重，宗颜鲁公（真卿）笔法。碑阴刻“重修墓记”，楷书，体势与正面相同。撰文并书丹，都是李公自为。略谓“纪侯当楚汉存亡之际，毅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英风浩气，震烁寰琅。诗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公足当之。遗墓荒废已久，残碑仅存，兹与邑人集资重修，另树丰碑，公上谥曰“烈侯”，永垂芳躅，昭示来兹”云云，土坟高大，形同小山。坟前有大理石供桌、石香炉各一个，烛台、香筒各一对。墓道前右方，有明万历（神宗朱翊钧）时，房山知县，关西李廷翰（字子楨）所立的题诗碑。“过大汉诳楚将军纪信墓”，诗为七律二首，字为草书。诗格苍劲拗折，硬语盘空，章法飞舞变化，崛强险侧，具北宋黄山谷（庭坚）之风神。

身世

纪信字子立，燕国范阳（今北京房山一带）人。幼时家贫，身高八尺，丰颐广额，雄武绝伦。秦末，投汉王刘邦军，骁勇善战。由士卒积功至将军。项王（羽）围荥阳势急。纪信冒充刘邦，坐着黄顶高车，打着蛟龙大旗，夜间从东门出来诈降。趁楚兵集中观看之机，刘邦得以从西门逃走。当项王知道是纪信代替时，称赞他为忠臣，劝他归顺，遭到拒绝。项王大怒，用火把他烧死。

在韩村河村的東西两边有东营、西营二村，传为当年汉兵的驻地。东营村中姓纪的很多，传为纪将军之后。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和地方伪保安队，把墓上的碑碣石料，拆下修了岗楼，致使遗迹无存。

题诗

明李廷翰《过大汉诳楚将军纪信墓》

当年鹿走暴秦台，赤火随炎丰沛来。五载金戈凝汉鼎，八千铁骑覆江垓。
志切酬君轻一死，功成昧敌震三台。逍遥官真归华表，万古芳垂青史裁。
三尺遗临古道遥，荒芜四野剩榛荂。翩翩侠骨香犹郁，耿耿忠魂烈未浇。
泉下蒿薰殊甚怆，树头猿泣岂胜寥。那堪肠断经过处，呜咽疑听洞壑箫。

邑人玄岳外史《拜吊汉将军纪烈侯墓》

潞流河水日潺湲，赫赫忠魂寄此间。一头铸成炎汉鼎，千秋名垂大房山。
枞公周苛同芳躅，季布章邯自汗颜。麟阁未闻标姓氏，寡恩刘季恨多端！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凤凰亭今昔

贲麟

凤凰亭，位于房山区燕山办事处凤凰亭路北侧的小山坡上，距房山县城西北约八里。它是一座重檐攒尖的石砌碑亭。亭高约8米，宽4.2米，上部以筒瓦盖顶，正中有蟠龙藻井，在下檐的四角有四个方套兽。亭四周各开石券门，门额上浮雕图案是浮云飘带，看去有临风而动之态。碑亭内竖有清雍正九年(1731年)汉白玉石碑一方，碑身高3.5米，宽0.93米，厚0.33米，螭首方座，碑额上雕座龙一条，四周刻有精美花纹，多为宝相花和莲花叶片。正面阴书“圣德先昭西山仪凤碑铭”。碑文为清雍正帝侍卫大臣内务府总管常明所书。碑文载：“至昔至治之世，百职修奉，和气充盈，黎民徧德。天用锡以嘉祥四灵徵，诸福之物莫不毕至，其绩之也……雍正八年正月二十日，房山县西山之上，朝阳方升，有彩凤翔然来仪，高数尺，尾长丈余，五色缤纷，众鸟拱卫。官吏及居民观者千余人。碑文还追溯到上古仁德皇帝当政时，必有这种祥瑞之禽的出观，借此以称颂雍正时期的政绩。”

据查，北京地区清代有文献记载的“有凤来仪”仅此一处，它发生在“康乾盛世”的雍正年间。通过对当时有关历史文献的了解，我认为“有凤来仪”的发生和随后凤凰亭的建立是雍正皇帝大力倡导“祥瑞之兆”的产物。

雍正帝自1722年岁末即位，共做了13年皇帝。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政策，对巩固国家统一，抗击外来侵略，发展社会经济，加强专制皇权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可以称为上承康熙，下启乾隆的清初三个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在临终前曾自述：“十三年来，竭虑殚心，朝乾夕惕……虽至劳至苦，不敢以一息自怠”。(东华录·雍正二十六)这完全是他的真心话。但由于他是康熙第四子身份，在二十余皇子中继承统治大位的，其内幕扑朔迷离，加之当政后对自己弟兄及反抗者进行过残暴的镇压，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造成自己的统治地位相对不稳。因此，借用神道来进一步神化皇帝的权威，为自己统治，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可以说，出自于雍正为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这个方面很明显地违背了他的父亲——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老皇帝康熙的教诲，康熙曾亲自告诫雍正和各级官员说：“八龄践位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祲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殊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东华录·康熙一百)，但雍正上台后就自行其是，借助各地方官上报的祥瑞之兆，说成是祖辈和他的政绩感动了上天，使上天显露嘉祥，是上帝降下的符象，如雍正三年二月，钦天监奏报：“本年二月初二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请敕付史馆。”雍正说：“皆由我皇考六十余年圣德神功，际天蟠地，为千古不世出之君，为上天第一笃爱之子。所以纯禧骈集，历数绵长，赐祚重光，至于今日。”(东华录·雍正十六)由于皇帝的大力提倡，中央和地方官员相竞大报祥瑞符应，来歌颂雍正的功德和自己的管辖地区的太平兴旺，以求得主子的赞赏提拔，仅雍正上位十三年，中央和各地有文字上报记载下来的祥瑞之兆达五十余起，达到封建统治千年少有的程度。这些祥瑞之兆，多是罕见的自然现象，如“黄河水清”，“瑞泉涌现”，“冬降甘露”等。(清朝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八卷)。有的则是中央和地方官员相互勾结，不务实政，弄虚作假，用报奏祥瑞取得皇帝的欢心和信任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房山县“有凤来仪”则属后一种类型。

据大清一统志所载：“雍正八年正月二十日，凤凰集于房山县之山沟。”可根据当地一带故老相传，当时落下的不过是一只很大的五色野雉。而大臣们是怎样向皇帝禀报的呢？首先是当时任总理石道事务散秩大臣常明和侍郎宗室普太奏称：“据石工监督司官田周呈报：正月二十日，房山石梯沟中，见瑞凤集于千峰顶，五色俱备，文彩灿然，工匠樵牧居民千余人，莫不共见。”说的可谓活灵活现，紧接着总兵官管承泽，顺天

府尹孙嘉淦又呈奏相同内容的奏折。当雍正帝尚未最后确信并发布谕旨时，直隶总督唐执玉又亲自报奏此事。这使得雍正不能不真的想到象征着王者之嘉祥是否真的降临在京畿之地，他最后发谕旨说：“朕思古称凤为王者之嘉祥，朕抚躬自问，功德凉薄尚不足致凤仪之瑞。”自己政绩功德与老祖宗们相比差的很多，所以最后他说：“此事犹疑未信也。”（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六十八）既不肯定，又未加以否定此事。但是，有一件事，雍正还是承受了，就是动用了当时拨付兴修水利工程的款项来修建纪念“有凤来仪”的碑亭，而这正是当时负责全国水利工程的大员常明、田周等需要的，一方面修凤凰亭可使此祥瑞之事千古传载，使得雍正龙颜大开。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负责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因贪污、浪费亏空数十万钱，可借凤凰亭的修建，把亏空补齐，堂而皇之地向雍正帝交差。（石工大臣，侵蚀国帑数十万，不能抵辅，因假凤仪为名，监修此亭，始得弥缝入奏。见房山县志民国十六年版）博得上下都欢喜，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细观凤凰碑亭修建的始末，使后人想起来这个题目之大，手段之巧，又能运用总督唐执玉、顺天府尹孙嘉淦这些朝廷命臣连连上奏，其神通广大，真令人不可思议。“为虚为实，不敢臆度。”（房山县志民国十六年）解放后，特别是燕化公司在这里建厂后，古迹凤凰亭受到重视。1985年原燕山区人民政府将凤凰亭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又于1986年拨款对亭身进行修缮。1988年房山区燕山办事处、园林局在这里以植物造景为主，进行了大面积的绿化和修整。以亭身为中心修建了250平米的坪落，方砖铺地，围栏环绕，还设立了供游人休息的石凳。在坪落四周，种植了油松、火炬树、黄栌、银杏、合欢等树木共计660棵，榆叶梅、莲翘、碧桃、柴叶李、白花木槿等灌木131株，绿蒿1200株，草坪500平方米，从公路到亭身还修建了曲折的水泥石阶。从此，凤凰亭真正成为房山和燕山石化地区的人们休息、娱乐和锻炼身体的好地方。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郊劳台

房山公路分局路史办

良乡城南的“郊劳台”，建于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是清朝皇帝出都迎接和犒赏出征凯旋将士举行郊劳盛典的地方，筑台以表仪礼之隆重。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朝史料中有关郊劳台的记载：台为圆形，台高五尺，直径五丈。通过甬路正北面有大理石碑亭一座，上有盖，下有基，中有石碑，上刻乾隆郊劳诗。外围四周筑有围墙，墙高七尺，厚一尺一寸，东西宽十六丈，南北长四十八丈，东、西、北三面各有大门一座。墙外四周种树三层，葱茏茂密。墙之两侧还建有规模很大的寺庙一处，名为“有庆寺”。

所谓郊劳礼，就是皇帝“亲幸”京都百里之外，迎劳出征凯旋将士的国家盛典。乾隆二十五年，大将军兆惠等率军平定了新疆准噶尔部上层贵族勾结沙俄破坏祖国统一的叛乱后，奏凯回朝时，乾隆皇帝率王公大臣，在此举行郊劳礼，犒赏三军。后来两金川也搞分裂活动，乾隆皇帝派将军阿桂等率兵平乱。阿桂等于乾隆四十一年（1775年）奏凯回朝，乾隆皇帝在这里又一次举行郊劳礼。据乾隆纪事诗的自注说：“郊劳之仪，陈将军参赞等得胜纛于台上，朕亲率成功将士及王公大臣等行礼，是时台下鸣螺，饶歌乐作。……效劳时将军等俱甲冑觐谒，随行奏凯而还，俾众观仰军容之盛……”^①试想当时一方面是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从大西

南沿着官马南路向京师北京回朝奏凯：一方面是皇帝率王公大臣，旌旗遮天，轮蹄震地西出都门“亲幸”郊南百里，双方相会于良乡城南郊劳台犒赏三军，盛况可观！

然而，物换星移，沧桑变易，昔日旨在耀武扬威，靖边安内的效劳盛典，已成历史陈述，而祭纛告天，论功行赏的郊劳台也已荡然不存，如今只残留一座没有顶盖的碑亭。

这座残亭基底为八角形，对角线长9.2米，亭柱为八棱形，共16根，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八根高4.75米，外层八根高3.70米，柱之上部均有石额坊互相连接。碑亭构件，除现已不存的顶盖为琉璃瓦的以外，其余全用汉白玉制成。外榫严密，其建造之精巧细致，实属罕见，虽经二百多年雨打风吹，至今兀然屹立。碑亭中央有一幢高2.74米，宽2.25米，厚0.28米的大理石屏风式的石碑，上面镌刻着乾隆皇帝使用汉满等族四种文字书写的碑文，内容是乾隆二十五年迎接兆惠将军等西征凯旋举行郊劳盛典的纪事诗。^②诗甚得体的，字颇秀丽，从诗的内容可见有清一代康、乾时期文治武功之盛，对于考察清代史实颇有助益。碑亭之设，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这幢御制石碑的，无怪乎它的建造艺术那样精湛，时至今日，古代封建王朝这个盛典的遗迹即使不存，尚有不少古籍（如《清史稿》、《日下旧闻考》、《良乡县志》等）可供查证。而这座绝无仅有的残亭却被长期遗弃于荒郊野外，任遭无情的风雨剥蚀，一旦倾颓破坏，将追悔莫及，建议文化部门及早设法加以修葺，既可保护历史文物，也可为我区增添一处游览景点。

注：

①《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三京畿 2136、2137 页

②《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三京畿 2136 页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晋征君霍原祠墓记

李北岳

祠墓

西晋征君霍原祠墓，在县城西南天开村西北，六聘山南麓。山势左右开张，回环宛转，好像一座大屏风，所以又名“绿屏山”。湖水前绕，山水环抱，形势雄胜。当地人称其地为“霍墙子”。魏时，燕郡太守卢道将，曾为其重修坟墓，建祠堂，树墓表。土坟高大。坟前有青石碑，上刻“大晋征君霍原之墓”，碑阴刻着晋史霍原本传。都是隶书，苍劲挺拔，深得汉礼器碑笔法之韵。青石供桌一个，上列石雕五供。前有祠堂三间，已经塌坏。仅有房基。花岗石阶石和青石柱皆很粗大。墓道之左方，树青石墓表，形制高大，雕琢精工。下为方形柱础，上雕圆形双龙旋绕之鼓盘，如同给表柱拧上了一个镙丝，起加固作用。中立四边稍加圆的方形表柱，柱身下面大半部分，每面刻着四道凹槽，分布均匀。使人望去，能减轻孤单呆板之感觉，增添柔和优美之气氛。造型之妙，匠心之巧，令人叫绝。表柱上段，刻着连钱花纹，两段中间，飞龙环绕。再上是方形平板，云龙绕边，中间刻着“於戏！有晋征君霍子之墓”。笔法与墓碑相同，最上刻着垂莲形的圆盖柱

顶，顶上面矗立一只小石辟邪(兽名)。在墓前不远的东南方，有九间大殿的遗址，阶石和柱础，都很巨大，传为霍原当年教学时讲堂之遗址。(关于墓表的形状，见于清人李咸一所著的“大椿庵随笔”中“霍原墓记。”)

身世

霍原字休明，又字休父，西晋燕国广阳人。(广阳旧城在今良乡镇东十里许。晋时地属范阳)，幼有志力，十八岁，入京师太学行礼，留校学习，成绩优良，同学多贵族子弟，对他很尊重。叔父被人诬陷，入狱当死，他以身相代，备受酷刑，后终得雪冤免罪。元康(惠帝司马衷)时，与王褒等人，以贤良被征召，不肯出。安贫乐道，不慕荣利。隐居于六聘山里，建立讲堂宿舍，教授学生，有数百人。燕王按月赠羊酒，时人称其为“冀北夫子”。后，幽州都督王浚，骄纵不法，妄想称制僭位。遣人聘请，希出山相助，前后六次，全被拒绝。王浚大怒，当时有一首童谣，歌词是“天子在何许？近在豆田中”。王浚以豆作霍，收杀了他。很多学生知道后，悲愤痛哭，窃回尸体，葬于六聘山西南方。邑人公上谥曰“孝”。晋史及房山县志皆有传，从祀乡贤名宦祠。后人为了纪念他，将“绿屏山”改名为“六聘山”。

原墓因年代久远，逐渐毁坏，墓碑与墓表，于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略军进陷北京时，勾结汉奸，强行窃拆运走。六朝珍贵文物，一旦失去，至为可惜。到“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和伪县保安队，又把石桌和其他石料拆去，修了岗楼，致使遗迹荡然无存。

题咏

《霍原宅》宋刘因

西山霍子宅，遗迹犹可稽。重吟豆田谣，愁云落崩岩。
知几在明哲，何事继尘羁。君看括囊戒，无盈庶几亏！

《六聘山拜吊霍子祠墓》玄岳外史

运当闇后昏愚际，时宜夷戎割据天。
纍继代亲昭孝行，岩阿讲学继前贤。
却征有见追巢父，罹难无端唱豆田。
恨煞乱邦难早去，智输子幹后人怜！^①

注：

①指西汉卢植，谗道以免董卓贼害事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镇江营今昔

常守道

房山西南远郊较为古老的镇江营原名镇紫营，是地处太行、燕山脚下拒马河出谷后的第一村。据考证这地方早在商周以前就有人居住了，甚至已经有了烧制陶器等早期的古代艺术。这些人类生活的早期遗迹，有的已经被尘埃覆没，有的至今还残留地面之上。这里随着河床的断裂变形，地下岩浆岩的显露，再加人们对较深土层的挖掘，出土大小鹿角，大小块不等的蚌壳，以及较大尺度的人骨、石器、陶器，以至殉葬的铜器等生物生活的迹象，说明这里原是一块临近水域的陆脚地，而且经历过较大水患和地震。

镇江营是拒马河冲积平原的第一块沃土，这里处在四面环水，下有岩层，上有黄土，既避风又向阳的断层制高点上，自高而低呈脊梁势相继落居下来。地势独特，断裂的地形呈犄角之势砥柱于拒马中流，其势如苍龙昂首。传说：“这一风水景象，也正迎合了当时皇家的意境，因而在这苍龙头上修建了古塔——镇江塔。意欲以塔之灵气镇住苍龙，使之顺应天意，不再造次殃及方民。”又有人说这塔是和尚塔。塔旁的国槐可以作证，它已有三百年的历史，成为当地人们夏季乘凉的好去处。镇江营是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村南原有旧时北京去山西的皇家官路——黄差道，沿途拒马河西岸设有古时皇家传急讯的烽火台一处。清朝时又比肩而开了一条白差道，是北京沟通东、西陵皇家往来上坟祭祀的专用路。由于两路人马往来，当时，亦属繁华。又原过去拒马水大滩宽，水势不稳，道路桥梁年修年去，有时需要摆渡。修桥填路需要大量人役。而镇江营位于拒马中流。这样官差，工役，人来马往，长年屯扎也是不言而喻的。当时镇江营的所谓兴盛时期，以及镇紫营尔后又更名镇江营，村北之塔为镇江塔其缘由也就不外于此了。

这个村曾是一个由回、汉两个民族的人民共同寄居的古村寨，村东南部是回民，并建有回民井（现存）、回民坟。村西北部大都是汉民，街中心植有象征民族团结的千把年的古国槐。槐荫下现今还保存着两个共同捣米用的古石臼。沿主街先后建有五道、龙王、地土、娘娘、菩萨、瘟神、山神、天公，大小庙宇七、八座。依村西南设有较大面积的和尚坟冢。拒马河水清而多矿质，可谓得天独厚。人们利用拒马河水，以水养田，把四面石滩的地质改造成大片良田。同时，根据不同土质的特点，在河西腐殖质多的套地上培植红果。而河东地含沙量大，土质较松软种大枣，区别地势大搞果粮兼作。真是有红有绿满目青纱，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房山小乌克兰”。这里所产的红果味甘耐存独具特色，打开一个看果瓤，红中透着粉白色，吃一口酸中有甜透人心脾，鲜果保存起来能到第二年开花时。这里所产的大枣，皮薄，核小内厚，咬一口拉丝儿，甜密而爽口。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又把这些果品精制加工成多种风味的果脯、罐头，曾一度出口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

镇江营前景广阔。是通往山西的最佳捷径，也是去清十三王坟（已开始开发），西陵观光旅游的必经之路，它已孕育了人、时、地的优越条件，就此也正有待我们去认识，去开拓。

（《房山文史资料》第5）

石楼金墓考

杨亦武

发现经过

石楼村，位于房山城南15华里。一系列文物出土表明，此地为金代官宦贵族杨氏墓地。

1975年，石楼村平地时，于村西出土了华表及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等石象生，村民不知何物，将其填入坑中，唯余一对石虎存放于小学校内。1987年，该村增建民宅，又在华表、石象生出土东北处方向，出土了一通盘龙断碑。村民误认为庙碑，将其弃置路边。1990年，房山区编修地方志搜集资料时发现此碑。经鉴定，为金奉议大夫签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杨瀛神道碑，大安三年(1211)四月十六日立。神道碑述：“夫人苏氏奉公(杨瀛)之柩，葬于涿州奉先县石楼聚之古原先莹之次。夫人马氏附焉。”既葬于“先莹之次”，那么石楼当为杨瀛家墓所在。故初步断定，在石楼出土的华表、石象生属墓地神道建置。

杨瀛神道碑与墓地华表、石象生出土的位置，揭示出杨瀛家墓的大致范围与规模。从遗址的情形看，此墓地约数十亩，原有庞大的神道，神道上树有神道碑华表、石象生等物。可以想见当时杨氏家族的显赫。

杨氏家族

杨瀛，字彦深，祖籍真定藁城(今河北藁城县)。九世祖彦稠，后唐清泰(934—936)中授银青光禄大夫定州兵马指挥使，后随晋少帝北迁入辽。遂赐田产于兴城(今辽宁兴城县)，仍世袭临海军节度副使银青，昆季三人，辽主忌其枝叶浸大，分置临潢(今内蒙巴林左旗境)、平卢(?)、辽东(今辽宁东部境)。杨瀛乃临潢之胤。其神道碑铭曰：“西楼即家”，那么杨瀛原籍为临潢西楼(今内蒙巴林左旗西南)。瀛之曾祖永，为辽朝列大夫。永子三，皆业进士。长子丘文。乾文阁直学士中书舍人；次子丘行，通奉大夫太子左卫率府率；三子丘忠，大秘书少监。丘行即瀛祖。

入金，杨氏家道益隆。可考者自丘行以下四代十一人，历世宗至卫召王六朝，皆官职显赫(详见附表)。

丘行历太宗、熙宗、海陵三世；皇统四年(1144)海陵留守中京，丘行在其幕府成为近臣。丘行子四，长子伯元，少中大夫同知定国军节度使事；次子伯杰，中奉大夫北京路都转运使；三子伯雄，四子伯仁。伯雄与伯仁同重海陵、世宗两朝，《金史》有传。《金史》本传略：伯雄，字希云，皇统二年(1142)进士，丘行在海陵幕府，伯雄省亲，海陵召见，深加器重。久之，调韩州军事判官，再迁应奉翰林文字。海陵执政，自以旧知伯雄，属之使时时至其第。海陵篡立，数月，迁右补阙，改修起居法。后迁至右谏议大夫，兼著作郎，修起居法如故。世宗在位，迁礼部尚书。世宗对近臣道：“群臣有干局者众矣，如伯雄忠实，皆莫及也。”后徙河中尹。率于官，年六十五。谥庄献。

《金史》本传略：伯仁，字安道，皇统九年(1149)进士。天德二年(1150)，除应奉翰林文字。海陵夜召赋诗，未二鼓奏十詠，海陵喜，解衣赐之。丁父忧，起复。赐金带裘衣，及赐白金以奉母。政左拾遣。海陵嘉其慎密，转翰林修撰。

伯仁久在翰林，文词典丽，世宗盛赞之：“韩昉、张钧后，则有崔永固，近日则张景仁、郑子聃，今则

伯仁而已，其次未见能文者。”官至左翰林侍讲，礼部侍郎、左谏议大夫、太常卿。

大定二十年(1184)，从世宗幸上京，二十五年(1185)感疾还中都。二十六年(1186)世宗还都，遣使劳问，赐丹剂，是岁卒，谥文昭。

杨瀛，伯雄之长子。仕章宗朝，弱冠以荫补官，登明昌二年(1191)进士第，历任住国子教授加文林郎、西京路词赋贡举、监察御史、南京路转运使等职。太和五年(1205)，章宗因其前任监察御史称职，召赴阙。瀛陈以时务利病，奏对称旨，改授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六年(1206)十月以疾卒于任。积阶奉议大夫。年六十一。

瀛子济，太常寺检讨官。子瀚，枢密院译史。

墓地葬者

石楼杨氏墓，在金大房山陵东南十余华里处，就堪舆而言，乃是占金陵余势。金帝允杨氏于此建墓既对金陵形成拱卫之势，又显示了对世臣的恩宠。

据杨瀛神道碑记杨瀛与夫人马氏葬于石楼，且葬于“先茔之次”。那么，瀛父伯雄及瀛母势必葬于石楼。而石楼杨氏墓的首葬者当是瀛祖丘行。其一，杨氏家族自丘行始仕金，丘行先人为大辽一统下之臣民，故石楼杨氏墓葬者不会早于丘行。

其二、丘行卒期与海陵迁祖陵于大房相吻合。

《金史·杨伯仁传》：“天德二年(1150)，除应奉翰林文字……丁父忧，起复、赐金带袭衣。”

《金史·杨伯雄传》：“丁父忧，起复翰林待制兼起居注……皇子慎思阿不薨，伯雄坐与同直窃议被责。”考《金史·海陵传》，事在正隆三年(1158)。

可见丘行卒于天德正隆之间的一段时间。

又《金史·海陵传》：贞元三年(1155)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丙寅如大房山，营山陵。十一月戊申，山陵礼成。

正隆元年(1156)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闰月亥亥朔，山陵礼成。

其三，丘行父子两代见重于海陵。如前文，丘行曾为海陵幕府近臣。子伯雄与海陵颇有私谊。海陵篡立，伯雄、伯仁成为左右重臣，伯元与伯杰亦居显位。

海陵迁葬之际，丘行辞世，于是命葬之于帝陵之乡，以示对杨氏两代的殊遇。如此颇合情理。如果丘行首葬石楼，那么依古代葬制和杨氏的政治背景，丘行四子伯元、伯杰、伯雄、伯仁势必葬于丘行之次。众人之妻亦当附葬之。

而石楼杨氏墓的最后一位葬者当是杨瀛。杨瀛卒于泰和六年(1206)，大安三年(1211)四月立碑完墓。大安三年九月，蒙古元军即破居庸，临于中都城下。此后，大金便坠入与元、宋旷日持久的战争，亡师失地终至灭国。值此国破家亡之秋，正可谓死无葬身之地。其间杨氏子孙或有亡者，亦难归骨家茔。大元一统，石楼杨氏墓便成了前朝遗迹。

杨氏墓之毁灭

从出土的文物看，杨氏墓地有明显人为捣毁痕迹。其神道的华表、石象生和杨瀛神道碑均被深埋，且从碑首断为两段。很久以来，石楼人对杨氏墓毫不了解，房山史料也未载及。如果说金元两季之兵曾损及此墓，

亦不当使其消声匿迹。在房山，战国乐毅墓，西汉纪信墓，西晋霍原墓，唐贾岛墓皆有迹可寻。独此规模庞大的金墓泯于后世。除杨氏墓外，其他金墓也未见记载，未有所闻，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房山的金墓不只石楼一处。如此看来，石楼杨氏墓不似夷于战事，而是有某种特殊原因。

《康熙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当我师克取辽阳，故明惑于形家之说，谓我朝发祥渤海，气脉相关。天启元年(1621)，罢金陵祭祀。二年(1622)拆毁山陵，削断地脉。三年(1623)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厌胜之术”。那么石楼杨氏墓之毁灭当与金陵的命运相关。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百花山的古庙及其民俗轶事

任正通

百花山，绵亘于房山区境之西北，其最高点海拔2035米，属太行余脉。东临首都，北界门头沟。百花山距房山城约九十里。山上草木繁茂，物种丰富，山顶地势平缓，方圆有两平方公里左右。在山顶及山腰上有两座古庙。正顶偏东，有一处庙宇，名为显光护国禅寺(简称显光寺)。山门前有十一棵落叶古松，径一围有余，高十五至二十米不等，估计树龄均在数百年以上。山门里曾建有佛殿，如：下娘娘殿、上娘娘殿、老爷殿及皋殿等。皋殿为两层，是全寺的一座最高建筑。显光寺最后几代传人，依次为：长安、东海、新友、大井。新友和大井在土改后还俗，据说仍健在。

据传，那时每逢阴历五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是山上的庙会时节，四方善男信女，结队纷至沓来，远的来自宛平、海淀、涿州、涑水、易县、涿鹿等地，近的来自附近几十个村庄。焚香拜佛，布施求渡，许愿还愿，虔诚倍至，有的布施骡马牛羊，有的施舍油、盐、糕点，无多有少，各尽所能。每逢庙会，都有许多人帮庙里写账、收供，做饭、扫院，在这偏远山区，一年一度的庙会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净化心灵，凝聚思想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兵工厂迁到这里。百花山地区成了抗日根据地。肖克、杨成武、焦若愚等都来过这里。

土改后，僧人还俗。1961年，山前山后的村民，为建礼堂，把庙上的砖、瓦、条石及木材等拆走挪用。从此，庙宇成了残垣断壁，只剩门前的十一棵古树。尽管如此，直至“文革”前，有一些远近村民，每值庙会时节，还来这里焚香许愿。

1991年5月，笔者在山下莲花庵村一农户家，发现了五八年吃食堂时，从山上运下来的一口大磬，是当时为了掌握开饭时间用的。该磬为生铁铸造，厚两厘米，直径约六十至七十厘米，高约五十厘米。用木锤敲击，声音浑厚，能传十里开外。磬的外壁铸有九行隶书文字。略谓“系浙江人氏，在京西百花山护国显光禅寺重修新造佛殿，禁足拾有数年，永无下山募化银钱，至于今日造大磬一口，开山第一代传曹洞宗第三十七世讳(上)昆(下)洪和尚。”其后有“儒徒赵廷云法名福璋”等十二个人的名字。最后还有“道光四年吉月

吉日”字样。

曹洞宗为佛教禅宗五家之一，为良价(公元807—869)及其弟子本寂(公元840—901)于江西创立。当时正值晚唐时期。自此后推一千年，恰好是清嘉(庆)道(光)年间。所以说，洪和尚为曹洞宗第三十七代传人，可信。至于显光禅寺何时始建，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所铸大磬之文字上看，肯定在道光四年之前。从“拾有数年”字样上看，可知昆洪入主显光寺，应在嘉庆中期，且由“始建”至“重修”的时间差距及“古松”树龄上推断，说显光寺创建于明末清初，似乎是可以站得住脚的。再往前追溯，即苦无资料可供佐证。

二

在百花山下的山腰上，曹家坊村迤北，有座叫瑞云禅林的古寺，(后称瑞云观，)经多次重修，现在寺内建筑，(除佛像及壁画已破坏)基本完好。据当地老人讲，寺里最后两代住持为长明和乐山，由于一度香火不盛，又因与附近村民发生过争执，感到难以维持，遂将整座寺院卖给了当时在柳树水北山堂上修行的蔡老道和道姑小支莲等。蔡老道和小支莲带领二十几个徒弟经营瑞云寺之后，勾结当时北洋军阀，压制附近村民，广置田产，仅庙前庙后就达一百二十多亩，且附近各村均有所辖土地。他们还养殖牛羊，备有枪枝。当时军阀曹锟、吴佩孚、段琪瑞等及京剧名流杨小楼都来过此处。曹锟还题写了“瑞云丛林”匾额，嵌在了山门上。他们的光顾，为这深山古寺“增光”不小，也使瑞云寺又达到了一个香火鼎盛时期。瑞云寺，庙宇座北朝南，占地约五千平方米。寺后清泉汨汨，庙前溪流潺潺，南北青峰壁立，东西丘壑相连，整个庙宇青砖白墙绿瓦，古朴典雅。庙前四棵古松(原为五棵，1964年被风吹倒一株)挺拔俊秀，山门高十米宽五米，巍峨大方。进山门，迎面有个小牌楼上写“小西天”三个大字。前院呈长方形，青砖墁路呈田字形，两侧为东西坛场各三间，带前插廊，正面为过佛殿，三间，前后插廊。过佛殿两侧为东西禅房供人居住。穿过佛殿为后院，为正方形，青砖墁路呈米字形，两侧东西禅堂各五间，带前插廊。正殿三间为前后插廊结构，建于高台之上，高于所有殿堂，威严肃穆，东为老爷殿，西为药师殿。整座庙宇建筑：中轴对称，古朴和谐，错落有致。

在庙宇东墙外，有残碑两通，一通正面朝下，半掩于地面，另一通则靠在墙上。上有篆额“功德碑”字样。下面碑文近五百字，由于剥蚀严重，很多字迹已难辨认。碑文首三行依稀可辨，略谓：“大明京都顺天府宛平县清水社百花山古口”，“谷积山赐瑞云禅寺住持崇安领口众口焚修祝延”，“圣寿今上皇帝致此”等等。碑文完全清晰者为第八行、第九行，文曰：“近于大明正统二年钦奉”、“圣旨安太监主重修三十口次又嘉靖三年口口口。”全文最后有：“口大明嘉靖八年岁次己丑十月十五日立”字样。从以上碑文，可判断，瑞云寺于大明正统年重修，且非首次，那么该寺始建应在明初或明以前。

此碑中间部分，第六行第五字开始为：“此寺口口王帝任口口圣言之如口口建至……”第七行有“汉明口帝修完”，接着有：“又至唐明帝重翻三次又於元口元口二……”第八行：“口住持活佛祖又重翻……”从这些文字中，也难做出瑞云禅寺始建年代的判断。首先汉有明帝而无汉口明帝，而后唐有明宗李。其次，“元口元口”中经仔细辨认，疑为“元祐”、“元贞”。若是，则“元祐”为宋哲宗赵煦的年号，“元贞”又为元成宗铁穆耳的年号。经与专家研究，认为一般碑文中不直称“××帝”，只称年号，以免犯讳。又依惯例，在碑文中，不可能不记朝代同时出现宋、元两朝年号。据此，这点只能存疑了。

在专家踏勘中曾在残砖乱石中发现“辽砖”残块。又参照庙后又一通“明碑”的碑文。说瑞云寺创建于辽、金时代，还是可信的。

在瑞云禅寺东北一华里左右的梯田里有一通完整的“功德碑”，碑高三百厘米左右，宽约一百二十厘米，厚为二十厘米，由一青石驮托，碑首双龙盘绕，中有篆额“大行禅师通圆懿公功德之碑”十二个字。碑文约二千五百字。“为涿郡范阳乡贡词赋进士武诞实撰序书丹篆额。”文末有“大明癸巳口文月日口化建塔立

碑……”等字样。碑文记述了大行禅师的生平及功德业绩。大行禅师俗姓刘，祖籍易水，后迁于德兴府矾山，七岁出家，随师修行，“游历二十余载”。“凡有所行，在人意表，至大定己亥，公年三十，具戒奉师，住釜水大明寺”。按大定己亥，即金大定十九年。(公元 1179 年)釜水，地址未考。又据：“迨至宁改元，癸酉，公年六十四，赐紫衣口贞祐乙亥，复赐紫衣并能圆大师法号”可知。时至“至宁癸酉(公元 1213 年)贞乙亥(公元 1215 年)大行禅师六十四岁、六十二岁时德行之高声名之显，已达一定程度。但此时大师是否已入主瑞云寺，仍难推断。唯一可供参照者，为第九、第十和第十一行碑文。记有：大行禅师的师傅“年七十四，有疾弗豫”而命曰：“汝居白峪去者，公曰：诺。”后师傅元寂，大行禅师“观瑞云形势甚可爱也，比□□大寒，南带龙泉，松桧阴森，果栗荣茂，千变万状，丛华目前，山路险阻，人迹稀少，真道人所居也。位十年，居禅僧二百众，洞风远播，四方檀信作斋送供，不知具几也”。依这段碑文，如果认为：大师遵师命而在“白峪”(疑为百花山一带之地名)创建瑞云寺，若确，则瑞云寺始建于辽、金时代，即为可信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 6 辑)

庄公院

李德华

大房山——以它历史悠久，古文化文物资源丰富、数量之多居京郊之首。据《房山县志》记载坛庙寺观达 88 处之多。其中佛教寺庙 70 余处，道观 10 余处。

庄公院座落在周口店地区办事处娄子水村西北半山腰中。据《房山县志》及该院石碑记载，自元代时有僧人看中此地风水，始建寺名超化寺。至清康熙年间，有道家龙门派高师王太定者云游来此，认为此地景观非同一般，是修炼的宝地，从此长住并授徒。此后为僧道混居，再后即纯为道家所有。据娄子水村人回忆，解放后直到 1966 年，尚有 3 名道人在此居住。“文革”中三清殿及有关文物遭毁坏，“学大寨”时，娄子水村组织林业队在此居住植树造林达 8 年之久。

庄公院现存殿堂仅 10 间，主殿三清殿为二层阁楼式样，高约 10 米左右。有 3 个圆形拱门，雕有龙凤图案纹样，线条流畅造型优美，二龙戏珠，鸾凤飞舞，大有呼之欲出之感。上下二层各三间，下层原供奉三清圣像。整个建筑气势宏伟，浑为一体。西侧原有四间配房，现仅存二间较完好。右侧配房早已荡然无存。现仅存林业队盖小房一间，院前现有原知青住房二间，均为后建。院外当年鼎盛时期的上、下客堂及知客堂均已无存。值得欣慰的是，虽历经沧桑，但院中尚存三松一柏，雄姿不减当年，树龄均在 400 年以上。一古柏三人才能合抱，三株松树高 4 丈有余，树干挺直，树冠如伞，蔚为壮观。这些古柏和松树被定为市一、二级古树名木并安排两名护林员专职护林。

院中古迹尚有清刻石碑四座，虽经风雨，字迹可辨。其中三座为重修三清殿堂碑记，正面为当时房山县令罗在公撰文，背面为捐款人姓名；另一块记载为持受该院房地产交接事宜之事。

出此院向西近 30 余米半山腰有元代砖塔一座。传为尼姑灵骨塔。院外东山坡下青松林深处，有老道坟和当年修建殿堂时烧砖的窑址。据碑文记载，为防止侵吞院产，规定此山有近 40 亩地为该院所有，供院内道众香火之费用。

最为奇特的是，在三清殿东山墙崖根下，有一泓清泉，经历多年永不干涸。在大水池东南角有砖砌小水井一口，该水供饮用，大水池中水用于洗浴浇灌。小水井深约一米，高于外面大水池水面 30 厘米。当地民谣赞曰：“庄公院的水用瓢舀，娄子水的井深十八讨。”道出了此池水之妙，泉水甘甜爽口，喝上一口，沁人心脾。

据院内现存石碑记载，道家龙门派从第九代至第十三代弟子在此修炼。到 1966 年尚有道人在此，当推为第十六、十七代了。龙门派，乃是丘处机所创立。目前，此山作为北京市林业局和区林业局绿化重点，其胜景很有开发价值。

附碑文：“盖闻洞天福地壮五岳之奇观；羽驾飚车泛三山之怪迹。终南太乙之境，每多仙居；函谷令尹之关，曾浮紫气；秦皇鞭石，不发人工；汉帝望仙，特崇楼阁。盖穆穆群仙之府必霄汉乃而煌煌，太上之尊非琼台不驻。惟兹庄公院者，房邑之胜境也。高可卧云，广惟容睐，山腰古木坐来处处生凉；石径岫，踏去层层洁净；冬有凌雪之竹，春多耐寒之花；门拥白云，远接沧海之日；茶香丹灶，近汲石窟之泉，固已大殊尘寰，迥别人世矣。有炼师王讳太定者，勤行不怠，诚恪为怀，教本希夷。窥至道之奥妙，功常抱一透元关之精微。居院十年补葺外，更无余事，诵经万卷，应酬中咸有道心。谓地以最上为贵，以无极为尊。此院前俯尘寰，尚有未了彻之色相，后拥丹崖，尽可供太上之神明。爰募金钱，共图美景，斧凿并用，劈开混元之天，功力兼施，平成妙有之地。中建三清一殿，辉耀入云。旁列方丈两居，爽朗映日。癸酉经始，甲戌造成。下官盖常游而览焉，丹梯数仞如登子晋之台，微寂一门恍入长房之室，立危崖而寓目俗骨为惊，倚洞口以乘风，尘心顿濯；香烟缭绕玉皇帝座，匪遥磬声悠扬，钧广乐听坐羽士之榻。忽悟前身。遂向平之怀要诸。异日念王师之功不可没，而众姓之善难以湮，爰搏俚文用垂不朽。”

（《房山文史资料》第 6 辑）

作者系原区房屋土地局副局长

张坊古地道

苏宝敦

张坊位于京郊西南边陲，巍巍太行山从西北方向飞峙而至，拒马河沿西、南边缘滚滚向东，南临涑水，西通易县，十渡山水小桂林的一渡就起步于张坊境内的片上岭。

张坊古镇，地处咽喉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房山县志载：“县西南七十里张坊街北楼三层门南向高可数丈下层空其中甚暗下有隧道向西北约二里通任家坟俗传为任阁老由下层楼上中层半途转折处有井一相传其井中设有刀山剑树颠而入无生理中塑碧霞元君像上层可远眺上中两层亦通隧道。”

据这里的老人讲，早年间，张坊有个华北屈指可数的镇楼，共三层，下面两层是砖石结构，顶层是木结构。镇楼内有三尊佛像，要进镇楼有讲究，因为底层有翻板，内藏刀枪剑戟，不懂规矩的人，踏上翻板，小命就玩完了。镇楼下，还有一洞，正北方向，并排走两个人还富余，伸手摸不到顶，往北走二百米，可见一石门，谁也推不动，可能内有机关，有个金头颅就藏在石门内。

传说镇楼是明代任阁老所建。任阁老是皇帝的亲戚。有一古诗，刻在顶层柱子上，诗云：“之涣徒知鹳雀优，谁云五凤胜此楼。南临大水一招手，北映青山可纵眸。”因为镇楼内设有地道，有人向皇帝举报，说任阁老企图“养兵造反，谋权篡位”。皇帝将任阁老问罪斩首。后来查明任阁老这是镇守边防，为拒敌所建的军事地道。皇帝错杀了无辜，惋惜中赐任阁老一个金头颅，随葬墓地。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先是轮番轰炸，把顶层轰垮了。日本进驻张坊后，修据点，将镇楼下面的砖全部拆掉修了炮楼。

1958年修“三·八”大渠时，在张坊村正北，也曾发现过古地道遗迹。据老人们回忆，三十年代，有人曾举着蜡烛下去过，走了一段，因严重缺氧，不敢再走了。

按照县志记载张坊地道，现在已经挖开一部分，打开道口房门，顿觉寒气袭人，顺阶而下，深约四米，方见其洞。地道为青砖结构，顺砌，上下错缝，顶部为立砖顺砌。这种砌法与宋代营造法式吻合。整个地道用砖，规格一致，为素面青条砖，石灰砂浆，含糯米汁。顶部为楔形砖，预制型。青条砖硬度高，无砂眼，乃高温烧制而成。古地道宽约两米，并排可立三人，高度为两米三左右，下面青砖墁地，并有流水槽。墙壁有灯台，顶部有通气孔。古地道呈南北走向，东西两侧均有藏兵室。藏兵室宽约两米，深近三米，室内有灯台、通气孔，离此不远的地方还有厕所。

关于张坊古地道的来历，说法不一。

第一种意见认为：宋辽时期，宋的防线可分两段。一段在河北省，即今海河——大清河——白洋淀——白沟河——南易水；一段在山西省，即恒山——雁门山——云中山——芦芽山。如果把这两段防线看成是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那么，张坊恰好位于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上。辽国军队打仗英勇，但也讲究策略，也曾有过“穴地进城”的先例，这条南北走向的古地道，是否可以看作是辽兵所筑呢？应该考虑。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坊地区是古代战场，宋辽时期，宋王朝曾经利用江河湖泊搞“水田”以限敌骑，杨六郎镇守的三关，无疑是北方前沿阵地。但是，史书记载杨六郎曾一度挥师北上并驻扎在房山地区，迫使幽州(今北京)一带辽军专心固守，不敢南下。如果张坊古地道确实是杨六郎所建，那么可以看作它是河北永清古战道的北移和延伸。

第三种意见认为：张坊古地道建于元、明。但是，地道一般属于军事工程，而且是交战双方胶着状况下的防御、进攻功能兼具的军事设施。有的学者曾经这样提出，明迁都北京后，元末的少数逃亡将领兵卒不甘于自己的失败，经常起兵犯境，做为古战场的张坊镇兴建军事性地道，也是大有可能的。总之，张坊古地道是北京地区到现在为止发现的唯一地下军事设施，价值不可低估。

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人们详细了解宋辽或元明时期正史未见记载的战争历史，而且也丰富了北京特别是房山区文物旅游业的景观内容，为北京西南郊区黄金旅游线增添了一颗地下明珠！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作者系原区文化文物局副局长

房山贾岛祠、墓记

李北岳

编者按：北岳先生，年届耄耋，早年曾目睹贾岛祠、墓遗址全貌，今又依其先祖所遗《大椿厂随笔》（注：厂同庵）所记之祠墓原貌，整理而成此文，无疑，当为三亲（亲闻、亲历、亲见）资料。贾岛祠、墓，今已荡然无存。将来若有修复之议，本文颇具参考价值。

唐代诗人贾岛的祠墓在房山东南十五里，二站村的西北。为清康熙时，房山县令罗在公所创建。座北向南，红色高大的祠门上，嵌有大理石横额，上刻楷书“贾公祠”三个大字，雄劲端重深得唐人颜鲁公笔法。进门是一间倒座的小殿，内祀木雕韦驮立像，身披甲冑，手持降魔杵，雕工甚精。再进是三教殿，祀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三位泥塑坐像。神龛上悬有木匾，文曰：“殊途同归”。篆书，古朴谨严具有唐人李阳冰的神韵。这是因为贾岛早年曾经出家当过和尚，后来还俗作官，取佛道儒三教归一之义。再进是正院甚宽阔。东西禅房各三间，大殿三间。飞脊重檐，庄严壮丽。门上悬着木匾，文曰：“推敲佳话”。殿柱悬有木制对联，文曰：“千古文章配东野；一生知己属昌黎”。都是楷书，欧里颜面，富丽雍容，乃明清时期流行的殿阁体，下款题“剑南罗在公书”。用典确切自然，可称佳作。殿内正中神台上祀贾岛泥塑坐像。颀长清曠，须髯甚伟。冠服垂绅，栩栩如生。两旁立侍者四人，分捧剑印书卷。造像生动奇古，出自名手。神案上陈铜香炉一个，香瓶及烛台各一对。云龙花纹旋绕，古色古香，铸造精巧。四壁上题咏很多，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附：

于役易州路谒贾公祠^①

清·德保

早悟禅机晚赋诗，诗名虚被九重知^②，
推敲句每从韩定，寒瘦评惟比孟宜。
千古青山堆傲骨，七言黄阁表穹碑。
荒祠愧乏溪毛荐，月下池边系所思。

注：

①此诗是刻在一块长方形的大理石上，四周雕有云龙花边，嵌于大殿的东墙上

②唐文宗(李昂)微行，在禅房读贾岛的诗卷。贾岛不认识他，夺下诗卷，大声呵叱

贾浪仙祠

杨 御

苦吟踏遍郭西山，一去长江竟不还。
谁把香花供岛佛，更无李洞在人间。

贾公祠题壁

阿尔经额

满壁墨痕湿，诸公莫写诗。
他人浑不解，只怕浪仙嗤！

贾公祠墓

甘运源

落拓长江簿，房山旧有村。
当年冠盖客，遗迹几人存。
不见骑驴者，清风满墓门。
欲携一杯酒，松下酹诗魂。

拜谒贾公祠墓次明李东阳韵

玄岳外史

偶吟落叶动西京，早皈维摩太瘦生。
驴脊行歌心自逸，长江远滴恨难平。
良朋韩孟三生幸，佳话推敲万古名。
贵贱尊卑看遇合，房山圣水发幽情。

出祠堂后门不远，就是贾岛墓。土坟高大，苍松翠柏，白杨老槐，四面环绕，郁郁葱葱。坟前建有石亭一座，巍然屹立。亭中有大理石碣，是明代弘治(孝宗朱祐樘)时，房山知县曹俊所立。碣额上刻着《唐贾岛墓》四个篆字。体势方正，刚健古朴，颇具秦人李斯绎山碑的笔法。碣面上刻着，大学士李东阳草书自作七律一首。字体变化飞舞，雄沉流走，深得钟云笔意。诗曰“百里桑乾绕帝京，浪仙曾此寄浮生。葬来诗骨青山瘦，望尽荒原白草平。无地椒浆供岁祀，有人骢马问村名。穹碑八尺标题在，词赋风流万古情。”

祠堂里有大理石碑三座，大殿前面，东西各一座。皆高丈余，螭首龟趺，雕刻精细。东边是《创建房山贾公祠碑》，(碑文见县志《艺文志》)奉直大夫、举人、房山知县、四川营山罗在公撰文并书丹。康熙三十七年立。西边是《重修房山贾公祠碑》良乡知县孙锦撰文并书丹。东跨院中还有碑一座，高约七尺，方额方座，是《房山贾公祠祭田碑》，也是罗在公撰文并书丹。嘉庆二十三年立。

祠墓因年久失修，又屡经战乱，逐渐破坏，遗址仅存。应该及时加以修复，作旅游风景区。

千年古刹复庄严

——房山云居寺修复绿化侧记

段汝连

在北京西南郊房山区境内，闪烁着一颗璀璨的古代佛教文化明珠，这就是被誉为“北京的敦煌”的房山云居寺。五月的云居寺风景区，春意盎然，苍松翠竹与层层殿宇相映生辉，重峦叠嶂和淙淙清流天工成曲，每值游人云集，阵阵欢声笑语，给千年古寺平添了勃勃生机。谁能想到八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墟。

不倒的山门

云居寺又名石经寺，隋大业年间，有一位很有远见的和尚法名静琬，他鉴于南北朝时发生过两次“法难”，大批纸帛经卷化为灰烬的历史教训，发愿刻石经收藏。加之云居寺周围“层峰灵迹，岩若天竺”有丰美的石材可供刻经之用，便从这里开始了巨大的刻经工程。自隋开始，历经唐、辽、金、元、明延续六个朝代一千余年，刻石一万四千余块，藏于石经山九个山洞和云居寺内地穴之中。

随着刻经事业的发展，云居寺经过历代修葺扩建到清初已发展成为占地百亩，五层院落，六进殿宇，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僧人 500 余众的大型寺院，刻经事业得到了历代上到帝王，王室成员、下至州县地方官吏、行会首领、民间善男信女的捐助。据史料记载：唐元和年间每年四月初八浴佛节，人们争相到云居寺进香拜佛，捐资刻经“遐迹之人如蚁术焉”出现了一人作念万人齐力的盛大场面。天有不测风云，本世纪四十年代，劫难降临，侵华日军炮火炸毁了寺院。到建国前夕，已是一片废墟，只有石刻拱形山门和一对伤残的石狮不屈地挺立在那里。又过了三十年，它仍依然屹立。传说产生了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山门不倒，寺必重修。

同心协力的歌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文物保护。1956 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由中国佛教协会对云居寺石经进行了全面发掘、整理、拓印，历时三年。之后，中国佛协建立房山石经研究小组，相继出版了《房山云居寺石经》、《房山石经之研究》、《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等专著。

1961 年国务院公布云居寺石经和塔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 年在谷牧同志关怀下，修建了石经库房和陈列室，同年收回了已变为耕地的寺院遗址，修筑了围墙。1984 年 4 月陈希同市长在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亲自主持现场办公会，决定修复云居寺，并成立了修复委员会，近 10 年来陈希同等市领导在云居寺开了七次修复绿化现场办公会，市、区、计划、规划、绿化、林业、园林、旅游、公路、电讯、水利、公安、文物、侨务、宗教等部门，大力支持。赵朴初代表中国佛协带头捐资 10 万元人民币，台湾佛协会会长刘士伦已年逾七旬，为云居寺募集修复资金 30 万美元，新加坡居士何蕙忠捐资 100 万元港币，美国华侨总商会会长应行久应金玉堂一家捐资 3 万美元，香港金利来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现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宪梓先生捐资 8 万元人民币……。几年来海内外集资 3500 余万元，用于修复、文物保护、环境改造、

旅游交通, 通讯等设施建设, 现在云居寺修复工程已基本成型, 千年古寺又复昔日庄严。

众手描绘的画

在云居寺院内, 清代嘉庆皇帝的御笔云居寺瞻礼碑上有“信马陟坡陀, 回首林烟漠”诗句, 可见当时云居寺周围是一派林烟如漠的美丽景象。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后, 几经战乱茂密林木已荡然无存。

1983年7月胡耀邦同志视察云居寺时在碑前读了嘉庆写景诗以后, 风趣地用手指着云居寺遗址说: “回首尽石头。”并指示要绿化要植树。首都绿化委员会、房山区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云居寺风景区的绿化工作, 自1982年起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组织全区、驻区中央市属单位和区属86个单位3.6万人, 坚持每年到云居寺义务植树, 实行责任制, 保种保活, 到现在已经在荒山植树1万余亩, 保存活树1200万株。李锡铭、陈希同, 王宪等市领导同志连续七年到云居寺参加义务植树劳动, 万众一心描绘“回首林烟漠”的美好图景。

有缘的学者们

佛教理论中讲“缘份”, 本世纪三十年以来就有那么几位外国的和中国的学者与云居寺结下了缘。

三十年代一个下雨的天气, 日本学者冢原本善隆博士对云居寺石经进行考察。那时的云居寺还处在兴旺时期, 主持热情地接待了他。回去以后这位博士写了《石经山云居寺石刻大藏经》一文, 发表于日本东方大学学报云居寺专辑之中。该文称: “保存于幽燕奥地一处的石刻大藏经是超过敦煌石室遗书和日本奈良写经的重要原典”; 1986年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雷德侯博士有缘考察云居寺。这位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的教授考察以后说: “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很了不起, 它是属于全人类的。”

在国内有缘的学者中首推中国佛协文物图书馆馆长黄炳章先生。现在已经七十多高龄的元老, 1956年当时才30多岁, 从周口店火车站步行八十余里到云居寺, 住在山洞和工棚里主持云居寺石经发掘, 拓印达三年之久。著有《房山云居寺石经》、《房山石经辽、金两代刻经概述》等专著。北京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梦麟, 1989年积极向全国政协委员李希泌先生反映云居寺修复的重要意义和清代“龙藏”木版保护的迫切。李希泌先生在全国政协开会时写了提案促成云居寺南路的修复, “龙藏经”版在大兴县刷印后也运到云居寺保存。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焯博士, 1981年还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博士生时从北京城里骑自行车到云居寺文管所一间小屋里写毕业论文。业余时间研究云居寺碑刻文献。隋大业年间安置于石经山雷音洞拜石下的佛舍利被他发现。次年佛舍利在广济寺供奉三天, 已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班禅大师专程前去朝拜。有缘的当然还很多, 象北京古建研究所所长王世仁总工、沈阳等同志一直主持云居寺修复勘测设计等工作。北京规划局工程师王东主持了云居寺修复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这些有缘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云居寺的科学价值, 帮助人们认识云居寺。

赵朴初的《修复云居寺颂》诗, 生动、形象地对云居寺修复绿化作了艺术括概, 抄录如下, 作为本文结束。

锲而不舍历千年, 石经宝藏冠人间。
云居昔日何巍然, 护持文物集群贤。
一朝颓坏哀烽烟, 空留碑碣对尘寰。
今逢盛世希有缘, 愿观众力复庄严。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红螺岭

赵润东

红螺岭，旧名幽岚山，又叫宝金山，位于京郊房山城西南四十里的黄山店域内。多年来，人们很少知道京西还有这么一处旅游胜地。据《帝京景物略》记：“上方山之峻僻，未险僻也。东去三十里，有红螺岭焉”。峻者，即指关隘，山路危险，行走艰难，不易通过之所在。所谓红螺岭，传说当年在上岭红螺洞中曾有红螺出现，且释放光芒，故名。

红螺岭，群山环抱，东临巍峨嶙峋的黄岩山，西倚风景秀丽的上方山、涑沥水，沟谷纵横，悬崖险峻。居其中，“山间苦喧，耳不给聒”，缘其行，“山路苦陡，趾不给错。”《房山县志》上记：“红螺岭，山势歧山峻山曾突兀，诸峰罗列，如剑如戟，北自蔡树庵，南至对子鞍，皆其脉也。无东南支出之山，其西北分布甚广，然地僻人少无著者。”其间，殿宇层迭，宏伟壮观。黄栌、红枫漫山遍野，古松古柏参天蔽日，因其峰险景奇，幽雅静僻，且有寺、观，历史悠久，故被世人称为房山八景之一——红螺三岭。

红螺岭分上、中、下三岭。顺着宝金山的出口向里走，或踏河床卵石，或攀山腰羊肠小径，披荆棘、越险境，约七、八里，旧时所筑砖石路基便隐约可见。继而攀登，有古藤缠绕，荫翳蔽日，酷似天棚。不远处，两峰之间有地平坦，尚存殿宇残垣，旁有水井，周围榆、槐、柿树生长繁茂。此处坡度较缓，行走也较方便。据《房山县志》载：“循九龙峪，度八达岭，入桃叶口为下岭。”此处盖为下岭。

沿山阴小径继续登攀，且陡且险。曲折蜿蜒，或山腰，或峭壁，有砖石台阶，山石有凿刻痕迹，因年深日久，人迹罕至，故尔苔痕累累。约上千米左右，半山腰凸出悬崖，上有石碑和殿宇遗迹，远观其景，犹如悬空寺，十分壮观。此即为红螺中岭。

据中岭碑文记载，此处有极乐寺，登上中岭俯视四周，“苍然一色诸峰难陈，琐细莫辨”。“此山可望而不可登。此寺可仰而不可近”。极乐寺由释伽弟子“每每募化重修”。明朝万历年间内监总理张公禎因公差路过这里，捐资修复。极乐寺左侧有竹林，牡丹园，有石碾，磁陶残片，可以见想当年香火之盛。

从中岭再上半里路，左面有松棚庵，再右是观音洞，“曲而客坐，深而朗朗，如是者上岭”，此处“意渐弛，僧渐拓其宇，峰蹙者渐列，面面见其巧，然势仍仄逼。直上视，莫及列峰之顶”。（《帝京景物略》）。清人佟有年作《红螺岭》诗曰：“奇险天开列九岚，幽人随意结禅龛。几番径绝烟云路，每夜龙归风雨潭。千人石梯悬上界，一枝松影盖茅庵，山僧尽日无他事，野鹿闲游一样憨。”

综观红螺岭，景致奇巧。到这里观光探奇，的确别有一番情趣。

附：

重修极乐寺碑

夫人寓形寰区所为记载垂不朽者必日记顾州有□忠贞记者有以勋庸记者旗常□□非不赫然耀耳目然昭昭之表见终不若冥冥之功德足以培善果种福缘

然峨就相错如绣盖京西一胜望也中山有极乐名寺者登险而谒则俯视四极苍然一色诸峰难陈琐细莫辨危哉高平脱非设诚振志谒尔虔恭则此山可望而不可登此寺可仰而不近耳第寺惟建立年久倾圮敝坏释伽子辈每

每慕化重修无与见相作福音万历癸巳岁内监总理张公袞因公差近此素慕复萌□□上之无参礼极备见其毁谢坍塌□□良久而改容回即白于

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内官监印务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公城同捐捧金抡材料工殫厥擘画不逾年而落成但见圣容饬整昭其象也殿阁壮丽盛其宫也门垣恢扩大其规也钟鼓声喧经教大播日霏香烟于八极朝颂

皇恩千万年庙貌□新华峰增重苦海大渡以慈航善行阴施干极此险此寺亘万古不磨而公之功德自默受无穷之极然则公固梦幻世尘超然障外者以故设施如此况其忠贞勋庸别有所镂记以垂不朽哉兹举有乐善捐出己资共成厥美者威书旁石是寺也住持僧广通由任丘县□惠寺出家此僧慕有成劳义得并书且以劝后之续住持者日记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徽歛程金撰
万历二十二年岁次甲午五月望日立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玉虚宫

赵润东

道教圣地玉虚宫位于房山西南黄山店村宝金山沟口约2公里的山腰上，是京郊建筑宏伟、规模最大的道观之一。它依山而建，坐西朝东，后宫及塔院三部分组成。两进殿宇前低后高，错落有序。周围古松郁郁葱葱，清幽静雅。

据《北京名胜古迹辞典》记载：“邱处机原是道教全真教道北七真之一”，“邱处机因大谈养生之道，治国方略，颇得成吉思汗赞赏。遂命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以后全真派盛极一时”。玉虚宫创建年代不详，但从“宝金山碑”记上可以得知，它历经明、清两代并重修。此宫又称三清庙，是地地道道的全真派道教。

去一层殿宇，登三十二层石阶，有砖砌发券山门。门额题字虽难以辨认，但左右那些刻功精细、玲珑剔透的梅、鹿、松鹤图案却清晰可见。门墩两旁一对石狮把门，院内有砖墁甬路和四株古柏，正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前出一步廊。其结构为五架大梁，硬山调大脊，灰瓦铺顶。正殿内有精美细致的道家活动内容的苏式彩绘。如灵芝、仙鹤、八卦、八仙等，富于层次和变化。两侧配殿各三间，也是前出一步廊、硬山清水脊，用石板盖顶。可惜的是，因年久失修，殿堂门窗失落，亟待修葺。正殿前有石碑两通，字迹清秀、遒劲。其中一通为“万历二十二年岁次甲午五月望日立”。上记“房山县西乡宝金山之麓有三清庙”，“林壑之胜，松涛聒耳，岚光掩日”，“幸游踪之，可寄静观自得挹爽。非遥游斯地者，其亦对泉石而流连抚之，梦而眷恋”。另一碑为光绪五年建立，上记“京都顺天府房山县西乡宝金山护法众善人长春宫四品花翎总管李莲英、钟粹宫六品蓝翎首领高诚义和钟粹宫六品首领落录启”等数十捐资者姓名。

由前堂左山甬路穿过一道侧门，向西行走再登三十二层台阶又是山门，此为后宫。后宫地势与前宫殿脊齐平，其建筑规模同前宫一样，也是一座四合院格局。院内砖墁甬路、殿前古柏挺拔。墙壁彩绘也堪称精品。因表面贴满废纸，已模糊不清。

据《北京名胜古迹辞典》记载：后宫 50 米有塔院。基中三座相隔 7 米并排形成“一”字。这三座塔是清宣统元年(1909 年)所建。另一座距此塔 30 米远，高约 7 米，塔下露出砖券地宫。建筑形式相同，八角形，砖结构，高约 7 米。叠压的双层须弥座，塔身正面为发券龛门，塔再上建须弥座。其上逐渐收拢攒尖，宝珠封顶。总观玉虚宫胜景，松相掩映，荫翳蔽日，确是一处三清胜境，怪不得道家们都来这里修身养性呢。

附

宝金山三清庙碑记

房山县西宝金山之麓有三清庙□□庑崇闳房廊轩□林壑之胜环币户牖境寂忘暑风一来□□□吾送松涛聒耳□当疏林霁老屋云归花骨谷清馨□□□□湍岚光掩日凡清修奇士揽胜名流靡不对景神□□□□诚修甚之别业餐秀之名区也岁阮以风雨渐侵山□□人云泉天爱略加茸沼俾复旧观异领烟霞勿崇华靡泉流穷屋松影当窗香篆云迷经声樵和又何必张卧游之图夸济胜之具方足以笑傲林泉探奇邱壑哉嗟呼软红十大观名迹之火经空翠千秋幸游踪之可寄静观自得挹爽非遥游斯地者其亦对泉石而流连抚之梦而脊恋者乎县为记

光绪五年孟夏二十一日

(《房山文史资料》第 7 辑)

金门闸

奉友鹏

永定河上的古河工建筑，遗存至今的，除卢沟石桥外，就要算位于房山区窑上村东南，永定河右岸的金门闸了。

金门闸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年(公元 1701 年)，在固安县北村附近右岸上建有草闸，六年后，于康熙四十六年(公元 1707 年)改为石闸，定名为金门闸。当时是为了引牯牛河之水，藉清刷浑，以加深永定河槽，后因永定河槽，逐年淤积而高于牯牛河，致清水不能复入，而闸遂废。

永定河洪水挟沙量大，为了防止汛期漫决，就要加高堤防，但过不了多少年，河道又复淤高，相对的堤顶重又变低。自乾隆三年(公元 1738 年)起，为了有计划地分泄洪水，先后在两岸设置了减水坝十七处。其中便有原北村附近的金门石闸，移至现在的位置(窑上村东南)，改建为减水石坝，仍袭旧称，还叫金门闸。但这些减水坝，建后不久就废弃了。截至清末，仅余卢沟桥减坝，金门闸石坝及南上汛、求贤两灰坝等四处。金门闸(实为坝)在宣统元年(公元 1909 年)经过大修，将坝又改建为石闸时，两灰坝即已废弃，卢沟桥减坝就改建为小清河分洪闸了。

经过改建后的金门闸，口门总宽三十二丈，分为十五孔，孔高八尺，每孔净宽一丈四尺(清制一营造尺为 0.32 米)，闸上有桥，以利往来。1937 年改建南端两孔为铁闸门。1971 年复加改建，作为灌溉用闸门，其余各孔均填废，闸板及桥板已丢失，但仍存原来残迹，这就是今天看到的金门闸的原状。

在金门闸南石岸上,据史料记载,还立有八通碑,详述金门闸的修建经过。解放初期,这里尚存的五通碑还有碑亭。“文革”后,这五通残碑已置于露天,遭剥蚀断裂。后经房山区永定河办事处与涿县永定河办事处联系,打算保存这些珍贵文物时,河北省文化厅才出资盖了几间房,将尚存的五通残碑,移至室内。

这五通碑为:乾隆年间的两通,道光年间的一通,同治年间的一通,宣统年间的一通。除了乾隆的一通碑是咏“堤柳”和“阅金门闸作”两首诗外,其余的均是记载历代浚淤、修整过程的。其中宣统元年的《重建金门闸记》记述的最为详尽。这些碑刻的书法也极好。其中咏堤柳的还是乾隆的御笔亲书。(碑文附录于后)

自乾隆三年,将闸改建为坝后,至宣统元年,将坝复建为闸之间,随着河床淤高,还经过多次加高和改建。其间有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道光三年(1823年),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多次维修。

金门闸的位置,正处于全河堤距最窄处,仅540米,又当凹岸,所以多次加高改建用来分洪。其历久不废的原因,是由于位置选择适当。历次的改建,主要是由于河道淤垫加高的缘故。

金门闸由闸改坝,而后又恢复为闸,历经171年,实践说明,闸比坝优越多了。正如吕佩芬在《重建金门闸记》中所说:“且夫闸之为用,岂独藉清刷浑云尔哉;水小可用之以遇其轶,水大可启之以杀其怒,宣塞随意而施,其功过于坝远甚,奈何废闸而又改之为坝也乎?况永定河水性湍悍,挟沙而行,沙日淤则河日高,河日高则坝日下,若不时加修治,纵不夺溜,亦无以东水攻沙,而金沙腐矣,故由乾隆下至光绪,必数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每一大役兴,费必以矩万计,而仍不保数岁之安何也?坝有定型,不若闸之启闭由人,可因水大小以为宣塞也。”用白话来说:闸,在河道防汛中,可以起到调洪作用。而今天为什么不恢复它用来调洪呢?主要原因是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上游卢沟桥已经修建了拦河分洪闸——小清河分洪闸。卢沟桥以下的流量已经得到了控制,超过设计流量1500m²/s时,便由小清河分洪闸分泄了。但作为水利上的古建筑文物来说,如果国家财力允许的话,加以修复和保存,还是很有意义的。第一,可以用来控制两仟伍佰个流量以下的洪水,以防不备;第二,可以作为研究水利史,尤其是水工古建筑的实物资料;第三,还可利用其建筑本身和历次所立碑刻的观赏价值,开展旅游。

金门闸虽在房山区境内,但其管理权却归河北省涿州市。造成堤防管界与边界不一致,是有其历史原因的。1957年以前,良乡县属河北省通州专区,涿县属河北省保定专区,当时永定河内水量较丰富,涿县里渠、义合庄两乡部分村庄从金门闸引水,经金门渠灌溉农田。为了便于调配水量,保证下游用水,1956年经保定专区水利局与通州专区水利局协商同意,将原良乡县管理的金门闸,连同金门闸下游的堤防,均划归涿县管理。1958年通州专区撤消,良乡、房山两县合并划归北京市,但此段堤防和金门闸,未收归北京市管理,问题遗留至今。目前永定河已无水可引,韩营至古城的大坝又切断了金门渠,故金门闸做为引水闸门已失去作用,理应收回北京市管理。

目前的金门闸,已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1984年5月18日《北京晚报》曾报导北京水利史研究会的研究人员,到金门闸进行考察时,以《北京地区古老水利工程遗迹金门闸亟待抢救为题》,进行了呼吁。但迄今几年过去了,而金门闸呢,依然残迹如故!

附:

金门闸堤柳一首(乾隆年间三十八年)

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
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
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
此理本易晓,倒置尚穷在;

而况其精微，莫能这奚怪。
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赖；
治标兹小助，探源斯岂逮。

乾隆癸巳暮春月上瀚御笔

阅金门闸作

浑河似黄河，性直情乃曲；
顺性防其情，是宜机先烛。
而此独所难，下流阻海属；
杀盛蓄厥微，在泄复在东。
金门仿毛城，减涨资渗漉；
然彼去路遥^①，此则去路促。^②
遥者尚回澜^③，促者横流速；
斯诚非善策，惊见心粥粥。
亟筹救急方，谓当挑坝筑。^④
倒抵抵金门，余溜俾归谷。
非不图屡阅，终弗为亲目。
然予试洁矩，九寓廓员幅；
一人岂偏及，滋用增惕忽。

注：

①谓毛城铺。

②闸下城河自黄家河分支，由洼水达淀，仅一百四十余里，路近势促，故沙易停淤。

③毛城铺去路既远，且有倒勾引河，使减下之水，澄清缓泻，故资宣泄之利而无他患。非若此浑流直下，下往莫遏也。

④水既直下，势难骤挽，命于闸上，作挑水坝，通其回流，成倒勾之势，然后徐徐归淀，庶几补偏之一策耳。

重修金门闸减水石坝（同治十一年）

金门闸石坝建自乾隆三年，每于大汛盛涨之时，分减水势，法至良，急至美也。嗣因河底积渐淤高，乾隆三十五年，道光三年、十一年、二十三年，逐将龙骨加高至八尺七寸，尚可泄水。迨又将三十年，河底淤高已与龙骨相平。同治五年以后，筑埝堵闭，涓滴不能启放。十年冬，钦命太子太保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奎勳全河，至金门闸，谓不可以废而不治，饬令估修。朝仪等详加勘议，将旧龙骨中段二十丈外高四尺，两旁十八丈各外高五尺；所有旧龙骨之高八尺七寸者，全行拆卸，新龙骨放长进深六丈；下接旧海堰。上做坦坡之形，使水势平缓过闸，方无跌坑掣溜之虞。北坝台东面移建九丈，与新龙骨紧接。坝台内外银做埝段，仍于龙骨上添设栏水埝一道。其减河工长四千一百七十丈，一律挑浚深通。又重建御碑亭、汛房等工。通盘核计，共需银六万四千七百四十二两七钱九全二厘。蒙批准在秋灾赈抚项正如数筹拨，购备灰石料物，及时兴办，以工代赈，俾穷民藉以佣趁。入告得者谕允。遂于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开工，至四月底止一律完竣。

同治十一年岁，在壬申五月

重建金门闸记(宣统元年)

永定河南岸之有重门闸也，始于康熙四十年筑草坝于竹络坝北，越六年而易以石。其时为引忙牛河之水，借清刷浑而已。厥后河高于忙牛，清水不复入，而闸遂废。乾隆三年，移建于南二工今之九号，改减水石坝，仍袭旧称，以闸名之。余初不解其何以名，近览畿辅安澜志而后得之。且夫闸之为用，岂独借清刷浑云尔哉？水小可用之以遏其轶，水大可启之以杀其怒，宣塞随意而施，其功过于败远甚，奈何废闸而又改之为坝也乎？况永定河水性湍悍，挟沙而行，沙日淤则河日高，何日高则坝日下，若不时加修治，纵不夺溜，亦无以束水攻沙，而全河病矣。故由乾隆下至光绪，必数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第一大役兴，费必以矩万计，而仍不保数岁之安河也？坝有定型，不若闸之启闭由人，可因水大小以为宣塞也。溯自同治十一年，李文忠公奏请大修之后，今又三十余年矣，去夏五月，余巡河至此，测其坝之龙骨，宽五十六丈，外高于引河不及二尺，而内低于河滩者且尺许，仅恃一小埧模障之，一旦埧不足恃，势必悬流直泻，其患将不可胜言。余深忧之，于是乎复建大修之议。乃历稽成案，凡大修之费，无不过六万金以上者。今因财政方□，当委员勘估时，谆谆以掾实博节为戒，然犹估需五万二千余重，谓如是则已节无可节矣。时杨文敬公总督直隶，九月往见，语以此事，文敬难之，余力争乃得请。岁终遂奉部议准行。斯时余尚未知金门闸之旧非坝也，故所请者仍坝之费耳。建德张黼廷观察恺康久历河防，且承修石工者屡矣，余心钦其才，请致敬以为助。正月黼廷至，遂语余曰：“金门闸以坝而称闸，名实既不相符，且坝有定型，不若闸之启闭由人，可因水大小以为宣塞也，倘乘此改而为闸，不亦善乎？”余喜其识与己合，曰：“策固善矣，但所请者修坝之费也，以之建闸足乎？”黼廷趣坝上相度形势，会计竟日而复于余曰：“闸，所以分泄盛涨者也，其龙骨无需甚宽；今缩为三十二丈，而辟闸洞十五于其上，洞皆高八尺，宽丈四尺，是亦足以畅其流矣。又于闸洞之上，平板为桥，复之以土，大汛时可以利用往来，行者不致于病涉，则尤便民之道也。规摹若此，预计所需之灰土木石与夫大小匠作之工，其费当与修坝等。纵有不足者亦仅矣。”余素信黼廷之精能也，于是议遂决。历城汪直黼延庚、桐城张大令荣凝，皆起家河员，老于工程之学者也，余檄二子董其役，黼廷又驻工次监督之。经始于二月初，中更闰月，告成于五月之末。盖闸废而坝者百七十年，今而后复还其闸之旧矣。余观夫黼廷之在工也，与二子者夙兴而晏息，终朝于风沙烈日之中，巡历往来，发纵指示，勤者劳之，惰者惩之，凡呈现月如一日。役虽数百人，从未闻译门之谤。是非不宽不迫，程督有方，何能使之劳而不怨若是乎！工既成，怎掾其所费，适如吾所请之数而止，又非有精核之才，忠实之志，何能不回费而成功也乎？呜呼！今之董理工程者众矣，求如黼廷之勤明廉干，工烦而费简者抑亦希矣。余故乐记之以告于人，并使后来者知坝还为闸之所自始也。若夫建造之事，引河之工，张令已详记于碑阴，遂不更述焉。

赐进士出身、诰授资政大夫、二品衔总理直隶永定河道、前翰林院侍读、加二级纪录八次、旌德吕佩芬撰并书。

大清宣统御极之元年太岁在己酉季夏之月，建于闸之南坝台。

另有的两通碑，因遭风化剥蚀，文字已无法辨认，故未录。

注：本文资料来源于《北京水利志稿》及金门闸现场之碑记。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作者系区政协一、二届常委，原金门闸管理处主任

古刹常乐寺

赵润东

常乐寺原名常业寺，位于房山区崇各庄乡晓幼营和西石府之间。它地处丘陵地区，北倚青山，东临河道，林峦叠翠，溪涧清流，瓮形围墙犹如城池，农家屋舍参差错落，其景清幽静雅，意趣天成，确是一处福地幽居，山环水抱之胜境。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圣岗在卢沟桥西二十里，北有姚少师塔，塔前有御制碑文，右为常罗寺司礼太监王安墓在其后。”常乐寺创建于明代，寺依山而建，座北朝南，占地面积约150亩，寺的南端两侧有东西两座高大砖砌券门，形似城门，两门间相距约500米。当中有古槐古松各一株，树干粗壮，枝繁叶茂。东门门楣汉白玉匾额刻有“凤诏旌忠”字迹，门的两侧嵌有七言楷书楹联。因年久失修，日蚀风剥，门的顶部生有杂草，由于人为毁损，楹联字迹被污泥涂抹。顺着两门向北为环形围墙。墙高达8米，依山势而建，随高就低，曲折蜿蜒，酷似城池，十分壮观。整个寺墓，座落其中，左侧为常乐寺，右后方为墓区，其布局别有一番气派。

寺内筑有二层殿堂。前殿为三间无梁殿建筑。面阔三间9.3米，进深5.1米，门窗用汉白玉发券，重檐歇山顶，上抹白灰。明间做穿堂门，前后各砌五级汉白玉台阶。沿无梁殿东侧而进，院落宽广，两旁有旧时石刻及残砖碎瓦。由无梁殿向北约30米又一院落。正中大殿即常乐寺主殿大佛殿。大殿面阔三间长13米，进深二间8米。硬山调大脊，棋盘心，双扇门，一马三箭隔扇窗。两侧配殿各五间。殿前有宽敞的月台。正殿瓦当面铸佛字。殿内佛像已不复存，但彩绘壁画清晰可见。在东墙上，有民国二十一年三月楷书文记：“内有古刹常乐寺一座，传载不记，数百年矣。由民国二十年一月初三日忽然怪风大，在上午九点余钟起将大佛殿东西二山墙刮塌，殿前右边有古卧龙松一株，斤约三尺有余亦被风所拔矣。二十二年春起时众会首商酌无力修补，将大松树卖大银元三十元零五毛，不足修葺。有本村李鸿模一心募化施泽元人开列于右……择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开工整理，不数日告竣。写书于墙，流芳千古。”

据《房山区地名志》记载，常乐寺后有司礼太监王安及一太监墓。按明代典章规定：“明代内宫有司礼太监。由宦官担任官职，负责宫廷礼节，内外奏章。明代中叶后，皇帝多不见臣下。因事降旨都由中官先写事目，送内阁票拟，由司礼秉笔代书，权势极重。”王安墓区曾出土万历年间“皇明乾清宫管事、提督宫内两司房兼掌尚衣监太监信吾王公志铭”一合。由此得知，墓中王安生前在宫中也有一定权势，故死后有宏大墓葬。墓后，现有宝顶两座，一座高3.5米，直径4米。另一座高4.5米，直径5.1米。“下用大理石垒1.5米高大理石垒，雕饰叠涩檐与瓦垄。其上接夯实的三合土”（《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因年深日久，保护不当，原来院内数座碑记于“文化大革命”中垒砌井台。大佛殿现用于水磨石企业。

常乐寺历史悠久，风景秀丽，且有周围古迹姚广孝墓塔等朝夕相伴，若修葺整理，的确是一处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大南峪奕绘园寝

赵思敬

在坨里乡大南峪北京矿物局水峪化工厂炸药库区的山沟里,有一座清高宗乾隆(弘历)的曾孙——奕绘贝勒园寝。这里山明水秀,林木滋荣,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

民国十七年编修的《房山县志·古迹》条载:“清绘贝勒,有(墓在)上万村西。”从民国年间臧励和等编纂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和姜亮夫著《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得知:奕绘,字子章,自号大素道人,又号幻园居士。生于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卒于清宣宗道光十八年(1838),享年40岁。奕绘于嘉庆中袭贝勒,累官正白旗汉军副都统,笃好风雅,寻致仕卒,并有《明善堂集》刊行。《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有关于奕绘宗室的详细介绍,为方便读者,特全录如下:“荣纯亲王永琪,高宗(乾隆)第五子。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封荣亲王。永琪少习骑射,娴国语,上钟爱之。三十一年三月,薨,谥曰纯。子绵亿,四十九年十一月,封贝勒。嘉庆四年正月,袭荣郡王。绵亿少孤,体羸多病,特聪敏,工书,熟经史。十八年,林清变起,绵亿方扈辟,闻警,力请上速还京师,上即日回銮,因重视之,宠眷日渥。逾年,薨,谥曰恪。子奕绘,袭贝勒。卒,子载钧,袭贝子。卒,子溥楣,袭镇国公。”由此可知,奕绘为清高宗乾隆第五子永琪之后,可谓地道的皇室后裔。“贝勒”,是皇室中旗人作为爵位而设置的,梁章钜在《称谓录》中引《会典》之语曰:贝勒“宗人府封爵等级:王,多罗贝勒。”又据《封爵表》载:“夙贝勒袭贝子。”这里所要指出的是,“贝勒”作为满语,最初是指贵族,复数是“贝子”。清于入主中原前的崇德元年(1636)才将“贝勒”定为封爵,置贝勒于亲王、郡王之下。“贝勒”身份的高贵,自不待言。

奕绘贝勒园寝所在之大南峪,因处地偏僻,且近年为防火重地,故鲜为人知。现虽有许多遗迹,但至今已隔了153年,原貌及修建缘起实难窥测。近日幸得友人搜来金启葆先生有关大南峪园寝文章一篇,加之实地勘察,方晓百余年前面目。大南峪四面环山,中间平阔,恰如天然山圈。明神宗(万历)生母慈圣李太后曾为宝珠禅师王能贵建天台寺于大南峪中,由此大南峪方远闻内外。至道光年间,天台寺颓败。此时,奕绘方袭多罗贝勒,正派府员访求莹地,他因爱此山林茂盛,随即用府中采育地两千亩换得大南峪。清道光十四年(1834),奕绘命二等侍卫阿禅泰、鄂克陀为正副监督兴建园寝。历时5年建成,费用为白银27000两。是奕绘向清廷户部预支的自己10年的奉禄,后分20年扣还。房屋大小计64间。园寝内计有10景,今多不存,其余也面目全非。

大南峪山口,原有杨树林,今有关门一座,现为仓库大门。雉堞、望楼皆备。经测量,城楼长533公分,高(瞭望楼)438公分。穹门高278公分,宽290公分。关门内左侧有青砖所砌台阶上通望楼。门已无存,门上石额原有奕绘所题“杨树关”三字,今亦不知去向,进杨树关西行50余米,即有一三孔石桥,称“第一桥”,桥为汉白玉拦板,长约900公分,宽540公分。涧深逾丈,溪水淙淙,草木繁茂,令人沉思。桥头附近尚有汉白玉雕石鼓和石望柱。过了第一桥,向西行210步,即是园寝宫门(现宫门前有后建平房两排。房前为菜地),宫门东约50米处,有白果树4棵,树高都在40米以上,最粗的三棵树围分别为460公分、375公分和250公分。树龄都在七八百年以上。宫门后为正堂,奕绘逝后又改为飨殿,内供奕绘和其妻贺舍夫人及与他共同设计园寝的西林如夫人神位。山堂后的“垂花门”已残破不堪,门后的排水沟已露出地面,深不可测。院内方砖铺地,也挡不住丛生的杂草。院内白皮松高大挺拔,清风徐来,沙沙作响。

穿垂花门，即为一小四合院，现东西厢房已辟为仓库，穿南房而过，即是“霏云馆”，正室五楹六柱，内有抄手游廊穿山。原有绘贝勒书“霏云馆”额，今亦无存。房之两边皆有倾斜而上的马道，道宽 128 公分，馆前台阶二层，保存完好。月台前原有日晷一个，今无存。院内砖石遍地，阴风森森，令人惶恐。穿霏云殿，迎面就是“清风阁”，这是园寝中保存最好的建筑，阁为两层，上下各五楹。阁两边稍后高地建有“鹿顶”（即小屋），登阁远眺，但见满目青山，神爽超然。阁内原有匾，上书“清风阁”。阁上南室为“栖神宇”，北室为“延年行馆”，今隔墙已毁，四壁空旷，门窗亦毁。沿清风阁后石阶缓缓而上，迎面高山突起，古松盘缠。山前与台阶间有平阔地面 20 余米，杂草丛生，久无人迹。此即奕绘园寝所在地。据记载，园寝“宝顶为朱红色，四周绕以石柱，石柱四角，尚有宝顶四，为贝勒幼殇子孙载同、薄棣、毓守、毓乾之墓。”从进宫门到园寝计有台阶 123 阶。

原来绘贝勒园寝中的“牛羊砦”、“菜圃”、“红叶庵”如今已无迹可寻。大槐宫已改为吕祖庙，保存最好的，当属建于园寝正北山沟中的“东坡小石城”了。这道用花岗岩砌就的石墙横跨在两山之间，它高逾两丈，有雉堞 15 个，每个高 95 公分，长 62 公分，远远望去，的确犹如一道小石城，为山野之中平添了许多游赏的情趣。行走在园寝之中，只觉得这里的树木种类繁多，数不胜数。据说，园寝修好后，奕绘曾命“侍卫鄂克陀移家峪中，屯田、种树。因而峪中古树新植合计六百余株，松、柏、榆、槐、椿、樗、楸、杏、桃、柿、栗、梨，以至胡桃、银杏、黑枣、合欢、白杨、海棠、玉兰、木瓜悉备。”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繁衍，现在大南峪更加迷人。难怪邑人刘树铭在《大南峪记》中说：“大南峪山脉……春则野花吐秀，满谷幽香；夏则流水潺潺，垂竿可钓；秋则半山红叶，艳似春花；冬则雪积苍松，林挺琼树。四时之景，无不可赏心悦目也。”

（《房山文史资料》第 7 辑）

谷积山院游记

张玉泉

谷积山院位于房山城东北部 50 华里的坨里乡北车营村西北部的群山中。寺院被群山环抱，四周的山头连绵起伏形如谷堆，故此得名谷积山。山前小盆地上有一组较完整的古建筑群：寺、塔、碑、坟，分布匀称，十分壮观。夏末一日，我们在村干部老瞿的引导下，爬了一段弯曲的山路，才来到谷积山院。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两进寺庙，创建于辽代，始称谷积山寺院。到元代改称谷积山华严禅寺，到明朝正統年间重修后又改称灵鹫禅寺，寺院的山门尚完好，高约三米左右，汉白玉拔券的过堂门门前有五层高台阶，宽近两米，高两米半许。山门后左侧，立着大明正統年间的碑，标有《敕建灵鹫禅寺碑》的字样，碑为方首龟趺、浮雕云朵，镌刻极为精致。第二层殿为正殿，明三暗九的无梁建筑，殿顶铺白云石板，约有五厘米厚。殿上的脊吻及其它垂兽已无存，从汉白玉的券门券窗和正门门框镶嵌着的精美的浮雕，可以看出辽金时期的工艺水平。殿内正面墙壁上原嵌有十八罗汉及五百罗汉的龛窟，均遭破坏。殿内四壁及门窗被烟火烧得面目皆非。据导游老瞿介绍，抗日战争时期，我平西抗日游击队耿子华部常来此地，偷袭驻扎坨里的日军和国民党伪军据点。敌人曾三次进山“清剿”，两次烧殿，因殿全部是灰石构筑，烧不着就令百姓往里抱棒子秸浇上煤油点燃。除供桌外，整个殿宇无恙，只落得黑头火脸，有的是在解放后被毁。老瞿说，正殿前有棵白果

树，十个人也搂不过来，枝叶葱郁，呈伞状，能遮盖整个寺院，入冬时白果落满地，可惜解放时被村干部砍伐，做24口棺材卖了。正殿后面排列着两块青石碑，负重的龕顶已被泥土吞没，只剩个头高昂着，两碑左为辽代时立，右为元代时立，两块碑的高、厚、宽基本相同。辽碑，立于大康四年四月十五日，正面篆书为：大辽析津府良乡县张君子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碑文载：“张君，讳文询，良乡县之编户也。妻田氏皆性钟纯吉，名闻乡闾家，有余资靡好奢华之乐，惟积善颇信浮图……”据说此院当时佛事兴盛，香火极旺，远近百里之内的僧人和善男信女，曾分批云集这里读藏经、受训戒。据传，此院建立还早于门头沟区的潭柘寺和戒台寺，那里的僧人还曾受戒于此院，可见它的历史之悠久。

离开寺院，导游又把我们带到约半里远的北山脚下，我们登上两层约两米高的地坎，便来到一片绿草如茵的开阔地，面积之大，地势之平，在房山一带丘陵山区是少有的。在开阔地的中心，一眼便瞧见一座别致的建筑物：粉红色的墙壁，灰白色的顶子，六角形的建筑，似殿宇又似凉亭。走到跟前，才发现正面汉白玉拔券门，上端嵌一块石刻匾额，上有“圆通殿”三个隽秀的大字。此殿象镶在绿色地毯上的一块红宝石。据“圆通殿”前立着的两块碑记载，该殿建筑年代为明朝正统年间。据说：殿内顶子正中还有一个雕刻醮金的盘龙。抬头俯视前面的寺院，形象逼真，不知何年遭破坏，连痕迹也没有了。此殿现今成了一家农户的饲料棚。

站在开阔地里，举目远望，便可清晰地望见谷积山北端三座峰峦上矗立着的三座塔，分别为灰、红、白三颜色，点缀在浓绿的峡谷之中。东侧的塔为白色，叫浮图塔，砖瓦结构，近四米高，塔基为莲花瓣状，塔身为覆钵式，四面各有一龕，龕内有一尊雕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塔基下有地宫。西侧山梁上的塔为灰色，为八角形九层楼阁空心塔，全部为汉白玉砌成。塔顶各角系有铜铃。称铃当塔。只要有微风拂动，便有悠扬清脆的铃声在峡谷上空回荡，给人以凝重雄浑之感。若从一层上到顶层，谷积山院的全景便可尽收眼底。可惜该塔现仅剩三层。中间山梁上的塔为红色，叫鞭塔，建于辽代。砖石结构。为六角形七级密檐式，塔基为须弥座，中部座落莲花上，正面有券门窗可进，其它五面为假窗门。塔身基本完好。

从圆通殿的东路回转，隔沟东侧有一椭圆的小山包，长满茂密的翠柏。这里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据说很早以前，一个老僧到这里建寺院，他有一个小石槽放在院中，石槽里总堆满了谷子，常有人到那里去掏谷，可永远也掏不完。后来，建院经费不足，老僧要出去化缘，临行前把石槽埋在这小山包上，怕回来找不到，便在上面插根柏枝当记号。谁知，等他回来整个山包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翠柏，有的树围达一二米粗。其实，这山包是一位老僧人的坟墓。

顺山包往下行，便是两层楼的钟鼓楼，钟早已不复存在，钟楼保存完好。据说，香火繁盛时，钟声是僧人的每天起居饮食的主要讯号。

钟鼓楼以西，山院东墙外的沟里，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有一口井，井口直径约一米半，井深约20余米，井旁立下的破损的石桩说明它的历史久远。此井是从巨石上凿下去的，凿于何年何月已无从考证。据说井底有块小石碑，碑上刻有“水不干，寺不倒”的字样，因此，井水于大旱之年都没干枯过，尽管它经过多次劫难，寺庙也一直没有倒塌。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燕昌国君乐毅祠墓记

李北岳

编者按：本文选自李北岳原作《燕昌国君(望诸君)乐毅祠墓记》作者成文于1940年，当曾亲睹祠墓遗址全貌。今以墓址依稀可辨，祠、墓荡然无存，故收录其原貌部分，盖于资治、佐史皆有益也。

祠墓在良乡县城东南里许，黑古台村北方。坐东向西，土坟高如小山。墓前有大理石碑，上刻“望诸君墓”四大字。楷书，古朴厚重，具有宋苏轼的笔法。石祭桌三个，一大二小。大桌上面列着石刻五供，香炉一个，花瓶、烛台各一对，全都刻有云龙旋绕，形态生动。再向前数十步处，有石坊一座。石柱上刻着长联，文曰：“偏师下七十城，旷世奇勋，往事空悲墨影幻；崇祠亘三千载，而今遗爱，此邦独系枣花深”。楷书，雄健端重，颇得唐颜鲁公神骨。石坊是明弘治(孝宗朱祐樘)时所建，清乾隆(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时重修。稍偏东南方，有祠堂三间，据县志载：“魏燕郡太守卢道将，曾为乐毅及西晋征君霍原修墓建祠，树立石表，以资表彰前贤。永昭世则”云云。墓表在清咸丰十年时，为地方上的汉奸，勾结英法联军侵略头目强行窃去。祠堂因历代屡加重修，至今尚存。内祀乐公木雕坐像，儒雅魁梧，须髯甚伟。两旁列着待者立像，手捧剑印。祠墓的四周地方，星罗棋布着许多锯断后的枣树根部，全都非常粗大，树龄当在数百年以上。所以石坊柱上的对联里有：“此邦独系枣花深”之句。枣树所生的新株，约计有数百棵，干皆径尺。枝叶葱笼，覆荫很广。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我发现了北京人

裴文中

编者按：本刊第五辑曾发表过裴文中教授的《第一个“北京人”头骨发现经过》一文节录，记述了“北京人”第一个头骨发现的经过。为使读者对“北京人”头骨的发现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今特刊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的另一篇短文《我发现了“北京人”》，与前一篇文章相得益彰，以飨读者。

民国十六年(1927)，我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欲作事无门路可走，流落在北平。后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永霓(文灏)先生想到开掘周口店的事情，令我去为杨克强(钟健)当助手，管理事务，并从杨钟健、步林二先生学习一些古生物学中的有脊椎动物部分的知识。

我在未赴周口店之前，对脊椎动物化石是什么，真是毫无所知。后经参加化石发掘，并承杨、步二先生为我讲解，我于是也渐渐认识何为鹿牙何为猪牙等等。民国十八年(1929)，步先生辞职，去参加西北科学考

察的工作，而杨先生也因有事将离去。关于周口店开掘的工作，翁所长就责令我一个人负责进行，步达生、德日进及杨克强与我一同来到周口店，指示我如何工作，并决定从第五层再向下开，追求真正化石沉积的底。

民国十八年四月开始工作，开过第五层，第六层中渐有化石，使我渐有兴趣。至第七层则化石之多，不可言状。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共得了154个肿骨鹿的牙床。

到了秋季，开掘的部分渐渐缩小，沉积的体积也渐渐狭窄了。在我想来，可以找见底了，工作也可以结束了。但是窄到无可再窄的地方，忽又发现出洞来，计自洞口至山顶将及三十余公尺。新的洞口，就是所谓猿人洞，洞口至洞底又有十余公尺深。

我们若从山顶望下去，见猿人洞洞口之深，及峭立的绝壁，已有些令我们害怕。其实这都是我们一寸一尺的移去，土和石都是我们一筐一筐的抬出。现在看来猿人洞很深很大(最近更因雨水冲积及悬崖落石，已不能下去了)，当我们初开的时候，只是仅能容人的小孔。并且一部尚为砂土所填满，仅有一个薄隙。

想不到，我们开掘猿人洞的第二天，在12月2日下午4时余，竟自发现了猿人头骨。我的运气真好！猿人头骨一半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那时天色已晚，但是我不放心，脑筋中不知辗转了多少次，结果决定取出来，用撬棍撬出，结果呢，头骨一部分被震动而破碎了。这样结果，又使我很后悔，然已悔之不及。但是这个机会，却使我知道中国猿人头骨的厚度。发现了猿人头骨，晚上我没有吃好饭，因为太高兴了。我于3日早又打了一个电报给步达生先生，略曰：“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因为猿人不是人，故我说他颇似人。北平方面得着这个电报，人们好像都不信，不是说我不能认识“人”，就说我不至有这样好运气，实在是因为整齐的头骨太好了，怕不容易得着。

我于12月6日返平，怕猿人头骨未干，我夜间生上炭火盆烤着，连烤了两夜，我认为方可搬运。那时我们是乘坐(北)平房(山)间的长途汽车来往。我将这个猿人头打在我的行李中，用我那两床破旧的被包裹起来，外面再用褥子毡子与普通行李一样的捆好。猿人头骨总算一路平安到了北平，我的职责也算尽了。

(转载 1994年8月4日《文摘报》)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王老铺古洞

张玉泉

如果说十渡的山拔地而起而显美，十渡的河水清如镜，山水相依而显秀，那么十渡的洞千姿百态，走向不一而显奇。

十渡地区的山洞最具神秘色彩的要算王老铺村的三个溶洞了。王老铺位于房山的西南十渡东北30华里的群山中。汽车沿六渡向北穿行，弯弯曲曲的山路越走越高。王老铺村便在那群山环抱之中，该村200余户，散居五面山坡上，方圆约计40多华里。村南的黄老洞，村西的蝙蝠洞，村北的三清洞，都鲜为人知，显得神秘。

黄老洞

该洞位于王老铺大南岭半山腰的崖壁上，洞口向西敞开，为青石发券拱门，顶端刻有黄老洞三个字，已模糊不清。因黄老道在此修炼而得名。洞内有一副石板炕，炕前有锅台。洞深莫测，向东南走向幽深，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洞内宽窄无规则，宽处十人并行能过，窄处一人走还需侧身。只是每百米就有一堵墙，共有 12 堵墙，现保存完好，把洞分为 12 截。黄老道在洞内长年隐居，修身养性，靠向四周村落化缘维济。后来从村内收留穆姓青年为徒。民国初年的一天年迈的黄老道突感身体不适，他让徒弟帮他穿上崭新的黄袍，坐在洞口的椅子上，面对夕阳就不知不觉地长眠了。他的徒弟就地取材，围着他的尸体盖了一间小房，一面靠崖三面打墙，无窗又无门，让他的尸骨任其风化。

文革中破四旧，有人上山钻洞，砸了石佛和香炉，拆了“小房”，把黄老道的尸骨抛进深谷中。他的徒弟原在这道山梁中云游，结合化缘，给山民们相面、看阴阳宅、瞧风水、测墓地。“文革”后不知去向。风平浪静之后，他突然回村还俗，不久便成亲。过上凡人同样的生活，据说他那一对儿女都七、八十岁了。

从此，无人再涉足黄老洞，它的洞深、层次走向、地下河流……目前还有待勘测。

蝙蝠洞

蝙蝠洞位于王老铺村西半坡上，原叫西坡洞，后因发现成群的蝙蝠栖息在里面，改称蝙蝠洞。该洞距河沟 20 多米的山腰处，坡度极陡。进洞要双脚并用，经历艰苦跋涉，才能登上洞口。洞口极小，弯着腰钻四米窄道就豁然拓开了。

洞内寒气袭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洞壁畸形怪状，还有叮咚的声响，洞底凹凸不平，常有巨石东倒西歪，尽管有火把引路，也还得提防，唯恐发生意外。

走进开阔地，脚下一块方方整整的石块，上面有许多指头粗的孔，人们还以为有人进来打过水泥盖板，仔细一瞧才知道是洞顶滴水造成的，顶上有若干个水葫似的石坠儿。再入前行攀上一堆横倒竖卧的巨石，站上面抬头望去，一片片一簇簇黑乎乎的东西贴在洞顶上，原以为是苔藓之类的东西，仔细一瞧全是毛烘烘的暗黄色的蝙蝠。它们紧紧地拥簇着一动不动。象无数绒球挂在顶上，我们举手硬摘下两只，放在手心里也毫无反应。已进暮春它们还在冬眠？把它们带回向导的家中，它们很快苏醒了。向导的孩子伸手一掏便咬了他手指一口。花椒粒似的小眼放光了，肉翅膀一乍再乍，要起飞了，真是好玩极了。

据专家考察，此洞西南约有 2 华里之处有洞口通气好，可钻出去，昆虫较多，适宜蝙蝠生长。而且蝙蝠品种有五、六种，很有研究价值。

三清洞

在王老铺的西北部北坡山腰上有个巨大溶洞叫三清洞，也叫盖老道洞。洞下河沟小路崎岖，洞前有 20 余米的高台阶可到洞口，洞门为拱形，门框为青石雕刻而成，拱门内有门拴槽口，门枢樵头。拱门外顶上嵌有青石板匾额，上书“三清洞”三个大字。洞外右侧壁上有三清洞碑记，为清光绪二十六年春的所立，据载：道人孟至林，入道房山县瓦井村承恩观，游于此地，红尘远隔，忽生隐心……做价纹银 20 两整……购得此洞（碑文附后）。

走进洞内便是能容数十人的大厅，厅的西侧有饮水台，由洞岩凿刻而成。池高一米，台二尺见方，从大

厅右拐，洞里端有大石炕，为当年孟老道的床寝。顺洞北行 20 米左右西侧有石块垒的厕所，清水盈盈不断地从饮水台上流出，又顺洞边的小水沟中流入厕所，把污物冲得一干二净。潺潺的清水用之不竭，洞内精巧的设计也令人叫绝。

大厅的正北有三座石龛穴，里面原供奉着道教三位最高的天尊，左边的是上清真境灵宝天尊，中间为玉清圣境元始天尊，右边是太清仙境道德天尊(均无存)该洞由此得名。由此北行洞宽地平可通行吉普汽车。越过 500 米的路程便是 20 米深的陡坡，直矗地下往西北延伸。据村干部介绍：备战备荒的年月，北京卫戍区一领导及随行人员带发电机入洞探秘，走了 20 余公里未找到尽头，洞内有洞，走向不一。如停步可听到地下河涓涓的水声。该洞到底有多长，共有几层？支洞有多少条？地下河从哪里流向哪里等，目前都是个谜。

在孟老道入洞之前，村内无人敢进，洞内景观也无人知晓：那千姿百态的洞壁，那光怪陆离的景观也无法与世人见面。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附近闹起“老便”，凡有钱人均可可能身遭不测，忽有一日孟老道意识到：老便要来绑架他，高龄的老道连夜逃之，不知去向。据说逃前将一金鼎藏洞内，谁若找到它便能洪福齐天。自此便常有人进洞探宝，但一无所获。

附：

三清洞碑记

山环水抱，创千古之奇观。虎踞龙盘，足备一时之统。赏白云低红日近。自古常昭悦鸟性空。人心于斯为盛诚。所谓三宝之地万法之门也。余孟至林，入道房山县瓦井村承恩观，游于此地，红尘远隔，忽生隐心，是村中乡道建余诚心好道，情愿将此洞以及前后左右坡地卖余至林，以供饮食。做价纹银二十两整，历年交十度里二甲钱粮京线一百丈，如有争论有中人去里一面。承管座落四至开列于左。

座落房山县王老铺村东北，延福石堂洞，上下土木一并相连。东至大巷分水岭为界，西至河沟，南至水流沟为界，北至小东沟分水岭为界。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三日

立字人 穆永福 穆合兴

中说人 师玉秀

书字人 杨润 郭祥魁

检功道□周功书

壬寅中秋望月立□文生田金□书彤

(《房山文史资料》第 8 辑)

香光寺和姚广孝

赵润东

古刹香光寺位于太行山余脉大房山东南麓的大韩继村。该村西邻新街、辛庄，东南是石楼镇支楼村，南通南韩继，北与周口村隔河相望。距西北龙骨山只有 3 公里。大韩继历史悠久，是个古老的村庄。据《日下旧闻

考》记载：“韩砦，俗称韩继村”。曾朝节建香光寺碑略，大都之西百余里，房山之界，有山名荷罗顶，祖龙白花陀而来，至是特然孤出，南下为伏龙冈，冈前万家聚落，村曰韩姑。这里西北部群山横亘，莽莽苍苍，东南部一派平川肥田沃野。周口河从村边流过，河谷与平原相依托，风光秀丽，是一处园境相宜的理想之地。

由于大韩继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因而被高僧择定建造一座相当规模的寺院。据《房山县志》记载：“韩继村有香光寺。寺右有唐宝积禅师塔。”建香光寺碑记：“韩吉村之北有古刹荒基，俗呼为少师园。抚残碑乃唐宝积禅师所建香光佛刹也。”香光寺建于唐，距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从现存遗址来看，该寺当年院落宽阔，殿宇庄严，建筑宏伟壮观。由此可见，寺内僧侣诵经念佛之虔诚，香光寺成盛之景象。

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成祖谋臣姚广孝因功绩卓著，拜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少师辞归山林，隐于太湖之华严寺。朝廷恩赐香光园为其别业，所以香光寺又称少师园。据《房山县志》记载：“广孝姚公，国初功臣，爵至少师，辞归山林，隐于太湖之华严寺。朝廷恩赐香光花园为其别业。久而荒废。万历奉命重修，始事于二十六年春，告成于二十八年秋九月”。大明王朝为何如此恩赐姚广孝呢？姚广孝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据《续藏书·靖难功臣》记，姚广孝是江苏长州人，幼名天僖。祖父姚菊山、父亲姚心都是积德行善之人。其父为医生，本想让他学医治病，但他不乐意此道，愿意读书作官或者学佛。于是在元末至正年间，剃发于家乡妙智庵为僧，法号道衍，字斯道。广孝虽然出家为僧，但又不学佛，喜好兵书谋略，兼学诗书，由于他对“诸子百家无不贯穿”，到了洪武十五年，由镇江北固山和尚法泐推荐至南京。当时，“高皇帝封秦晋燕等十五，成祖（朱棣）封燕王”。姚广孝求见燕王说：“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图草昧，东宫仁柔，愿厚自爱。大王若能用臣，当奉一白帽与王戴。”燕王朱棣领会其意，王字之上加白即为皇字。此时，正遇上朱元璋的皇后马氏驾崩。朱元璋的太子早亡，长孙仁柔，图谋大事时机正好。这时，高帝命各位大王与一高僧“诵经念佛修斋”，以示超度。燕王朱棣便乘机请广孝来北平，居住于庆寿寺，与朱棣日夜图谋。高帝驾崩，建文即位。广孝又策谋于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南征取代建文皇帝，此后步入辅佐朝廷的政治生涯。

姚广孝在辅佐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业当中，“推忠辅国，协谋宣力”论功第一。“明成祖御制姚少师神道碑记：广孝于时识进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福祸之机，先机效谋，言无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间，启沃良多，虽古之明智莫过也。”这里即指“靖难之役”时，广孝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靖难之役”，广孝未尝临阵，然皇帝用兵天下，他出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因为广孝功盖群臣，明成祖拜为资善大夫，恢复姚姓，“赐名广孝，立东宫，升太子少师。辅太子南京”，尔后，皇上再三劝广孝蓄发还俗，并赐与两宫人。而他始终不肯蓄发、娶妻。明永乐十六年来朝北京，“寓庆寿寺”。广孝时至耄耋之年，不能朝政，一日对同僚“告以去朝，即敛趺坐而逝”，终年84岁。噩耗传来，永乐皇帝“哀悼不胜，辍朝二日”，而文武百官前来吊唁者“肩摩接踵，填郭塞街。虽武夫悍卒，闾巷夫妇莫不赞叹嗟咨，瞻拜敬礼”。隆重的丧仪达七日之久。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成祖皇帝特进封荣禄大夫勋柱国。追封荣国公，谥号恭靖，加赠少师，并亲自撰写御制推忠报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姚广孝神道碑文。在房山的崇各庄乡择地建九级墓塔。作为僧人加官晋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据史书记载，姚广孝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曾和解缙等人负责编纂巨著《永乐大典》、《太祖实录》，且著有《逃虚子集》十一卷。他文武兼备，精于诗律，其“文章闳丽，诗律高尚，皆超绝尘俗，文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为不及。《顺天府志》记曰：“重修太祖实录，广孝为监修，身自校阅，克勤其事”，其生平乐善好施，天性然也，尝归吴中，以所赐金帛悉散之宗族乡人。

在房山境内，姚公有不少撰文赋诗，现存咏诗有《拒马河》、《观石经洞》等，现录《观石经洞》诗如下：

峨峨石经山，连峰吐金碧。秀气钟芯题，胜概拟西域。竺坟五千卷，华言百师译。琬公惧变灭，铁笔写苍石，片片青瑤光，字字太古色。功非一代就，用藉万人力，流传鄙简篇，坚固陋板刻。深由地穴藏，高耸岩洞积，初疑鬼神工，乃著造化迹。延洪胜汲琢，防虞独孔壁。不畏野火燎，拒愁苔藓蚀。此山既无尽，是

法宁有极?如何大业间,得此至人出。幽明获尔功,乾坤配其德。大哉弘法心,吾徒可为则。

成祖以后,香光寺因年深日久,风雨剥蚀,累经浩劫,久为荒废,又经百余年后,寺院破瓦残垣,倾颓殆尽,“夜见火光,或闻虎鸣,丰草满园,毒蛇交横”,村民多不敢入内。直到万历年间,御马监太监张公其奉命重修,其间募化中外官僚各捐俸金而助,于二十八年秋九月重建,其寺五进为六层。第一座为山门,供佛门弟子及众香客出入。第二进院内是天王殿,用以安护佛法,第三进院内有“大雄宝殿”,(也叫如来殿或万佛阁,尊奉如来佛像;第四进院内是方丈居住的禅房),第五进院内有重阁也称大悲堂或后殿,以奉大悲容。第六层有围楼,“以屏障乾艮之地”。此外,还有东西厢房,以供僧侣起居斋馔库储之用。同时在寺东重建一宝塔以壮奇观。于寺后开辟园田以供寺僧蔬品。园田当中筑以虚亭用来避暑观望,寺院南面建一座延寿堂,用以驱病养老。距寺院里许设有普同寿塔,“凡僧物故化而藏之”(《房山县志》)。此后,香光寺又香火复燃,然而,从明万历至现在近500年间,该寺几经兴衰劫难,最终未能完整的保存下来。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天元寺

沈书权

天元寺位于房山区崇各庄乡大马村东,是一座保存完好、历史悠久的古寺。

寺院坐北朝南,三合院布局。山厅的石楣上刻楷书三字:“天元寺”。正殿五间,清水脊,前出一步廊,红漆柱,花棂隔扇窗门。桑枋上绘有精致的人物彩画。殿内正面及两山墙布满佛像或佛教故事的壁画。殿中曾供奉过泥塑释迦、文殊菩萨、药师、阿弥陀佛和三世佛像,至今已荡然无存,是70年代初期毁坏的。西稍间前廊下竖立“重修天元寺碑记”一通。碑方首方座,座宽1.2米、厚0.66米、高0.65米;碑高2.02米、宽0.75米、厚0.18米。碑首浮雕朵云,额篆双行竖刻“永垂不朽”。碑文记述了天元寺衰败与复兴的历史。碑阴面镌刻捐资人姓名和捐资数额。东西配殿各三面,均为清水脊、前出一步廊。出廊的枋上绘有苏式彩画。左殿供娘娘,右殿供关圣帝(关羽),七十年代初塑像被彻底毁坏了。院中有两株百余年柏树,枝繁叶茂。位于殿前墙根下,有一八角形倒在地上的经幢,因被土掩埋过半而不知其刻文内容。

在寺后的东北角有一口水井,是寺僧饮食的水源。村民相传此井水甘甜清醇,更有奇特的医治用途。旧时远近百里来此井求水之人甚多,凡所求者均能水到病除。

天元寺始建于何代,已无从考证。从现存“重修天元寺碑记”可知在重修前,只有古刹基址,墙垣尽坍,碑碣无存。其时有善士张得顺、张凤鸣二人见天元寺满目荒凉,倍感伤心,于是产生发愿重修的决心。经过筹备,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开始兴工,落成于民国十五年四月,历时一年又三个月。现在的天元寺就是此次重修的,重修后,仍沿用天元寺之名。

附：

重修天元寺碑记

曾考黄金布地祇园开说法文场白马驮经洛邑建传灯之寺盖我佛以慈悲度世众生因感觉蒙昧非示以宝相之庄严奚动夫群流之信仰此象教之所由起而善业之所由兴也慨自世风日降诈伪为愈口怀夺相寻纷争不息纵横杀伐知浩劫也将临权力凭陵置公理於不顾惟利是视以刻为能欲海横流固有文天良机於渐灭净於天良渐灭人类将何以生存故仁人善士夙具婆心者亟亟振兴佛教会讲明因果阐发福罪使人有所惩而不敢为所劝而训以化由一乡一党拥而至大邑通者借佛法之威灵生宝坻之观感庶几消除恶业挽救狂澜诚正本清源之无上法也良邑所属大马村东首旧有古刹基础一区为良地不及二亩修去岁因事西行经过日是地见其墙垣尽圯碑碣无存不知建于何代废自何年满目荒凉鞠为禾黍惻然伤之遂勉竭棉力发原重修鸠工庀材从新兴筑计成正殿五楹供奉释迦文佛药师阿弥陀三世尊东西各三楹左为娘娘殿右为关圣殿繚以周垣前起山门门仍起旧名榜曰天元寺肇工于国民十四年夏正二月落成于十五年四月从此丹楹刻桷重庙貌之辉煌捍患灾仰神灵之庇即于风俗亦不无裨补是为记

发起人 张德顺 张凤鸣

会口众经理人 王 明 王万恒

三宝弟子法名妙修适伊张促樨 敬述

中华民国十有五年岁次丙寅夏历四吉旦勒石建立

良邑人永立石刻字 李茂季 周景正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广智禅寺

苏宝敦

广智禅寺坐落在本区崇各庄乡晓幼营村吕域沟，这里西北一架山梁连着门头沟区境内的潭柘寺。在苍茫的大山和荒野坡沟上，建有塔、寺院、殿堂等古建筑。

寺院建筑别具风格，是砖石结构的无梁殿，坐西向东，殿正面一块汉白玉上雕刻着“观音宝殿”四个大字。殿前石碑已倒地，碑上云纹精细字迹若有若无，已无法连接成文。殿前两眼水井左右分开，传说叫“二龙戏珠”。殿后是世代信息功第一代传人一剑梅圆寂的石塔。塔后是一个高八米，宽三十米，长一百米和练功平台。经考证，这些建筑物建于明朝第二代建文年间。

广智禅寺一百五十米外有东西喇嘛庙遗址，还有七十二座形状各异的寺庙和塔，有的完好，有的已经破损。山泉、石穴点缀其间，景色显得格外清新宜人。

顺寺院向西北山上攀援而上，有一个地方叫土沟，土沟对面有一突兀山峰石壁，石壁上自然天成一个若大“佛”字。当地村民见过，法光大师说，从潭柘寺那边的鲁家滩进土沟看得非常清晰。十渡山水小桂林的

望佛台上“佛”字，已为人所共知，这里又发现“佛”字，使人倍感房山佛经之乡的神秘。寺院东南方向又有一突兀山峰叫鹰嘴崖，崖下有一块自然形成的平滑大石板，附近有一洞叫石板洞。当地有人见过，每当天气晴朗，早晨太阳喷薄欲出之时，站在这块大石板上，能清晰眺望到北京天安门城楼。

由于这寺院在一条十几里长的大峡谷里，既有文物古迹，又有奇峰异石山泉洞穴，还和潭柘寺及崇青水库近在咫尺浑为一体，确实是京郊一处尚未被人发现而又非常难得的旅游天地。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瀑水岩

赵玉文

出房山县城往东北行，越过齐家坡五里就是瀑水岩了，而今瀑水岩已建成了丁家洼水库。瀑水岩的形成是双泉河由北山经羊耳峪、东流水往下直泻至丁家洼村西北，河床突起两个对峙的山包，山包间的河床形成一个凹穴，河床是一块高约十五、六米的巨石，拦腰挡住了流水，形成了大瀑布、龙潭。这就是旧时曾闻名房山八景之一的瀑水岩了。

瀑水岩的瀑布，四时变幻，具有无羁的性格。雨季洪水经巨石飞流直下，喧泄如泼，如洒、如倾、如注，有时水浪高约丈许，起而又落，落而又起。布帘横宽四、五十米，经巨石飞下时，其声如雷，声震长空，水花飞溅，水珠迸飞，声传数十里。据丁家洼村人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听着那大水骤然天降的声音，不敢站、不敢坐，更不敢睡，生怕葬身鱼腹。人们常说的瀑水岩的瀑布是指枯水季节的瀑布。它布帘不宽，却常年飞泄。它绚丽多姿如练、如带，它飞泄时溅起的水珠儿，阳光一照，成花，成锦，四时飘逸，令人瞩目。

瀑水岩是块巨石，高约十五、六米、横卧河床、长七十余米，雨天而躺。它的高，即河床的落差，构成了雨季时的大瀑布和枯水时节的小瀑布，成了四时变幻的异景。

巨石西部，呈拱形，斜面顶部，有一石槽，槽长约两米多，宽约一米、深约一米二，槽的西部是峭壁，北部即槽的上端，挖刻出一条水沟，河水经沟流入水槽，水槽也就成了人工浴池，可容六、七个人同浴，槽的下方又挖刻出一条水沟，往出流水。这条水就是长年不竭的瀑布了。其下便是水潭，瀑布入潭时在整个瀑水岩上迴环往复，萦绕不绝。

巨石东部，更不规则。有的地方深陷丈余，有的突兀而起，有的崖侧宛如刀切，层崖壁立。虽如此但有曲径相通，达于上下，在接近潭西处，突然有一薄、厚、高皆形如影壁一样的巨石，游人可沿其固定的脚窝攀上壁顶，以观龙潭全貌。

说起龙潭，曾是旧时房、良、涞、涿等县群众求神祈雨的地方。龙潭之西颇象一把椅子图，令人置身其间，顿感神奇。晴天，潭西波光粼粼，椅圈峭壁上的各种造形，形态逼真。显示着它的壮美。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圣米石塘和蟠桃宫

张玉泉

在史家营乡柳林水村正北的崇山峻岭中，有许多胜迹，是房山区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建在莲花山上的两座庙宇：一是圣米石塘（简称南庙），一是蟠桃宫，即圣母石塘（简称北庙）较为著称。

这两庙相隔两梁一沟五里之遥。座落在南山腰的是著名的圣米石塘；北部山腰的是蟠桃宫。两庙均选在半壁崖塘上，地势十分险峻。“境险而僻，非好奇选胜者莫能至”（房山县志·卷三）。昔日那红墙墨瓦，气派非凡的建筑群，如今已成废墟，满院残垣断壁，荒草萋萋，一片凋零的景象。

圣米石塘（南庙）建于唐代。据今已有千余年。主庙原叫长星观建在莲花山主峰北侧，一面靠崖三面为高墙围起。院内有三进殿，一进为山门，两侧有钟鼓楼（尚完好），二进殿为主殿，三进殿建于崖壁内为两层，曾叫千佛殿（原为寺）东西两侧为道士住房（均无存）。主殿前两侧有三人搂粗的千年古松，高耸入云，生机昂然。据《房山县志》载：“其庙南向，前殿三，正殿三，两厢各三。东北隅有石塘，上有泉滴如檐溜下，承以池，可供十数人之用。”清道光十三年又在水洞东面的悬崖峭壁之上凿横沟一道，引崖水入洞旁池中，以弥补洞水之不足。庙西院外道下为塔坟，尚有三座残破的和尚塔坟。坟地内有茂密的杏林，有的很古老。据庙中残存断碑载：唐高宗李治传旨，在逍遥谷召见王远知、蟠师、董奉三人。王远知“善得引新吐故之术”深得高宗赏识。高宗问王需要什么，王说一不求官，二不求钱，只要茂山清泉。高宗让其到京西任选。王等选中了莲花山。于是在此兴建庙宇。庙建成后，王远知、董奉等为前来看病者不收药资。病愈后在庙西植杏树。小病者愈后植一株，大病者愈后植五株。数年后便成林。此法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庙右右侧有二园溜溜的山石崖，崖上有一山洞向南敞开，该洞曰圣米洞，洞深15米，宽约6米，高约3米。洞壁上端嵌有“重修圣米石塘圣泉寺造石佛碑”的字样，为明代嘉靖年所立。洞底有一层米粒大的光润的白石碴，称圣米（已被沾污）该洞由此得名。洞口用白灰墙遮挡，留一门两窗。洞里有佛的宝座。两尊佛的雕像还十分完好，已被推倒在洞口乱石堆中。其中一尊为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七月十九日造。宝座前有人工垒成的供桌尚完好。佛座的顶端有人工打的洞口可钻出到莲花峰背面。相传当年师徒两僧在此修行，老僧外出化缘，让小僧吃洞中的石碴。老僧归来以为早把小僧饿死了，一见小僧吃得白白胖胖，十分惊奇地问怎么回事，小僧说吃圣米吃的。后来老僧为独占庙宇，把小僧推下山崖，佛祖用莲花托儿把小僧救起。几乎家喻户晓的神秘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此寺不知从何时改为道观）。

山崖的东侧有一个狭窄的平台，台上有牲口棚和碾子房遗址。碾盘和轱辘尚存。碾盘直径约两米，厚约40公分。相传，这千斤重的碾盘出在30里外山下柳林水村西。是一夜间用神牛拉上来的。由此往上还有一小山洞，里面有一具少女的干尸，据说是民国初天津一富翁之女为远离尘世，出逃到此观入道修炼，家中不允，派人追回。不久便死于家中，遗嘱家人身后将尸送回圣米石塘道观中，家人将姑娘的尸首送回，安放在山崖小洞中。

二

出圣米石塘向北高耸的山石攀援，此地名曰“阎王爷鼻子”，走在连山羊都难以通过的悬崖峭壁上十分惊险。再过南天门外一道两米多远半尺宽的窄路，底下是千丈深渊，要紧贴崖壁往前挪动，才能抵达蟠桃宫。

蟠桃宫座落在莲花峰北一断崖的平台上。它修建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由人称蔡老道(蔡义先)主持营造的，该庙建筑依山就势，三座庙宇，百余间房(唯山门存)正殿座落蟠桃宫的正中，右山花后有水洞，长约10米，宽约8米，高约3米，水深2米许，清澈见底。顶端滴水如珠，此洞称圣水洞。当年蔡老道曾用此水为军阀曹锟的二姨太刘氏，为段琪端的二子，吴佩孚以及一些社会名流治愈病症。自此蟠桃宫的圣水和蔡老道的名声大震。曾被称西山圣水和西山活佛的蔡老道一时名扬四方。有关军阀、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曾多次布施和许愿，资助大洋，为该观的宏伟建筑提供资金来源。

从东侧一砖砌拱门进院，门楣嵌有石匾，阳面为“洞府”阴面为“古真堂”。向西即进蟠桃宫了，该宫“形势巍峨，有众星环拱，万流仰镜之慨”(见《京西莲花山蟠桃宫碑记》)。从蟠桃宫正殿向北仰望，高高的悬崖上有座彩色菩萨雕像。身高约4米许，面目清秀，身着长袖兰袍，双手端钵在胸前，脚踩莲花托儿，菩萨站像两边站有童男童女，身高2米，石雕刻工精细，栩栩如生。

正殿东北端，通过洞府拱门往北有一个天然洞穴，向东敞开，进深10余米，宽约12米，中间断续隔开，高约4米。正中有三尊神像，已破残，像前有石垒供桌。此洞为聚仙洞，是当年蔡老道独坐洞内接受“法旨”的地方。由此再往东有座三合院，北房原是两层小楼因烧香失火，后又建三间平房，这是著名京剧演员杨小楼的别墅，他投资两次共花3.5万大洋盖的。杨小楼曾在此地避暑、避难三次。

正殿西侧是老爷庙。老爷庙往北为独立成院的娘娘庙。此两座庙宇为曹锟的二姨太和段琪端的儿子，以及其他上层人物及其亲属还愿时兴建的。现仅剩残墙断壁，只有娘娘庙里那只雕刻精美的小石狮还忠实地蹲在残门外坚守岗位。

从此庙向西绕过一道山谷是一座绿荫覆盖的小院，小院西侧是蔡老道的墓地。蔡老道坐化于民国二十五年春(1936年)死后用木炭固定在一个佛龕内。丧事办了近一个月，之后把尸体安放在用砖石砌成发券洞内(现已无存)。

从蟠桃宫西门沿蜿蜒的山谷下行，即“十八盘”，“十八盘”从山顶端曲曲弯弯几经辗转直到山下。面路原比较平坦(现长满蒿草)路宽两米，外有一米高的护墙，这是通向北庙、南庙的主要交通干道，也是蟠桃宫第一景观“犹如蛇行伸向峰峦”，香火鼎盛时期长有成帮结伙的人由此上山。两观数十名道士、道姑的吃喝用等物资均由此源源运上。

综上所述：南北两观，虽建筑年代不同，建筑规模不同，但建筑格局却大同小异。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吸引过四方的百姓进香、还愿和登山寻梦。曾为后人留下了璀璨的文化。

附：

重修圣米石塘碑碣

圣米石塘者古山之峻秀我皇万里锦绣江山出尘修真乃上人养性必仿于明山自摩诃鸠工正林极其轮奂上人游吟山右明山一献引动修真道人之耳进此察其地坦详南北途薪水可以建一小古刹远世勿著自高扬明道人重致之建锐志苦心常忧小禅佛住不齐以为忧也未思工程浩大独力难成故募化四方贵官众善人等辏其资帛品其木石瓦片塑其全身晨昏上香品咒跪拜祝国风调民安八方宁静之兆自古殿宇有推塌风雨之桩塑亦有湿之坏

因年深夷兹含巡衲高达不忍坐视滴漏复地动修建募化四方以助良缘共成圣事菩萨殿山门里楼阶之外禅堂流芳不朽且以后之善人继于将来云尔其功德非渺小也京都顺成门内报子街弟子张。景训施钱壹佰叁拾吊玄阳水村住人弟子刘应钦施钱伍拾吊道衲高永达徒北孟元印杜元英刘元芳高元柱告

大清嘉庆十三年仲夏月吉日谷旦

秋林铺任玉佩敬撰

创造莲花山蟠桃宫碑记

京城迤西皆山也有号为莲花者峰峦杰出林木医然翠微诸峰拱揖相属乃者几西子役敷坐山陬凭高四瞩触余怀见此山可以造佛可以栖真爱即胜地开为道场名之曰蟠桃宫中室两响妃西王母一室妃观音菩萨北一室妃后汉关系宫之南有石洞三日九莲日长生日聚仙里为菩萨山石佛天工无烦智巧亦有石洞日长春日上清而一洞通天落其贯彻灵奇昭著因以为名方外蔡君提举官事饬材洁工自春徂徐莽招提成岁侯则民国第一甲子也工事有秩暇日载过无秽既治无虞经变革后俗山牛上矗青霄清磬法镜时出林表发人深省逸想出世以自入境加桎梏于易风殊庄严禁筑幻为亭台清净园林坏为容室喧车马於入境加桎梏于山灵致足喟也惟莲花一样萧然物外自得天全将以励开洞之浩行契泉壑之真趣庶几游神合莫地偏北远云雨阳谷张稷臣书丹

中华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桂上斡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房山景教十字寺及其文物价值

苏宝敦

车厂村位于房山区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西北约六公里，不远处有座三盆山，山巅平广约十余亩，因有三凹自然天池，状如盆，清泉四季盈满，故曰三盆，山亦由此得名。三盆山树木葱笼茂密，景色宜人，环境幽静。景教十字寺遗址便座落于此。

十字寺坐北朝南，殿宇已毁坏，院内的古银杏树枝繁叶茂，树围524公分，高约30米。还有一颗柏树依附于银杏树下。左侧10米远处另有一棵3米多高的小银杏树。寺院内有汉白玉石碑2通，一为辽碑碑文，正面上方横书“三盆山崇圣院碑记”，碑高204公分，宽91公分，厚20公分。另一为元碑碑文，碑额顶端圆球内刻有十字，左右各有一条石雕云龙。正中刻有“敕赐十字寺碑记”。碑高307公分，宽92公分，厚20公分。碑两边还有汉白玉雕刻的龟趺石2个，石柱础4个，柱础边长78公分，高20公分，柱础上刻有葵花形图案，花盘平整无刻划，直径54公分，花盘周围刻有花瓣16个，花瓣上刻有团状方纹。另有直径48公分的圆柱基石一个。

据燕京神学院林祥增先生，文物界刘之光、齐心、吴梦麟等学者认定，十字寺确是景教遗址。景教属基督教，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210年后，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废禁佛教时，景教同时被禁绝。在内地虽已无景教徒，但在西北地区仍有景教存在。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建立蒙古国

时，在克烈、刀蛮、蔑里乞、汪古回鹘(维吾尔)各部中，大多数都有景教徒。而且，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也是景教徒。1215年蒙古军攻下金中都(北京)后，景教即传入北京。

景教在元代称也里可温教，是蒙古语“福分人”、“有缘人”或“信福音之人”的意思。据元史记载，当时，汗八里(北京)已是景教的一个大主教区，并派有大主教驻在汗八里。据叙利亚文“大画管雅巴拉喻三世及拉班·扫马传”记载：拉班·扫马约在1230—1234年出生在北京，其父昔班在北京任景教巡察使，是一个虔诚的景教徒，扫马幼年入学时，其父请名师专门教他宗教学问，后来就成了汗八里教堂的司事，30岁时削发正式做了景教修士。在修院生活6年之后，便决心离开城市修院，到汗八里郊外一个山间过静修生活。由于受他师傅

景教十字寺庙顶石饰

(苏宝敦 提供)

的恩惠，使他名字远扬四方，一些敬仰他的景教徒在他静修的地方听他讲道。山西霍山(今内蒙古东胜)总主教的儿子马可(生于1245年)因听到扫马的名声，便决心离开家乡，经过15天的长途跋涉到了扫马面前，请求收留他学习过静修生活。三年后，由汗八里继任景教大主教为马可削发，使其成为一名修士。后来，拉班·扫马、马可二人决心去叙利亚拜见景教大总管和朝拜圣地。1276年二人离开北京时，有许多景教徒为他们送行，祝他们一路平安，并互相拥抱，泣不成声。在路过马可家乡时，马可的亲属劝他们留下，但二人决意西行。1280年在马加拉城拜见了景教大总管马·登哈。大总管任命马可为契丹(中国)总主教，改名为雅巴拉哈，时年35岁。又任命拉班·扫马为巡察总监。就在他们回国途中，听到大总管马·登哈逝世的消息，便返回参加葬礼。1281年马可即被选为景教大总管雅巴拉哈二世，2人便留在叙利亚没有回来。

拉班·扫马生前选择的静修处，距京城有一天的路程，而且“山名水秀，地杰人丰，林树郁茂，果树滋荣”(见现十字寺遗址碑)，环境十分幽静，而且还有一座颓废的寺庙。(即原房山县三盆山十字寺)此外，明代还有关于景教记述。房山云居寺小西天石经山曝经台山崖上，现有墨书：“大明国景教庆寿寺三人超然，经匠道一四名，游于一一，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四月二十九日游到一一小西天石经堂瞻记。”

最近，笔者与林祥增先生等3人赴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考察，发现该博物馆内辟一层展室，展出四十余块景教石刻，均属墓志类石刻。另据中国基督教年鉴记：“1931年9月6日，日本人在华北房山县城十八里之山上，发现景教石碑”。为保护文物，同年12月将两块十字石刻运到城内北京博物馆收藏。1936年文物南迁时，又运往南京博物馆，至今仍存于该院。经北京市文物局介绍，我们又赴南京博物馆，目睹了原属于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内的两块景教十字石刻。一块在南京博物馆大展厅内展出(注明：元代原北京房山县基督教石刻)，另一块在地下室库房内存放。这两块汉白玉大理石十字石刻高68.5厘米，宽58.5厘米，厚58厘米。石刻花纹精美，十字清晰。其中展出的一块石刻正面上方为一十字，下侧刻有叙利亚文，据林祥增先生认定为：“仰望他，寄希望于他。”石刻右侧一面雕刻一束菊花，左侧一面雕刻一束尚说不出名称的花草。库房内存放的一块石刻，正面有十字，但无叙利亚文，却有桃形的两颗心相对望。两块均呈凹字形。经认定为原坐北朝南十字寺正殿东南和西北角的两块抱柱基石。查阅《南京博物院珍藏》一书，第78

页记载着这两块十字石刻。南京博物院保管着 40 余万件文物，在展厅展示着仅 2000 余件，其中就有一块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十字石刻。

景教遗址十字寺做为北京地区研究景教的唯一重要的遗址，其文物价值十分可观，应引起我们给与充分的关注。

附：

房山县石字石刻

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以平西房山县发现古代景教遗留之石刻，于九月三日特派该会秘书庄尚严君，干事王作宾君二人前往调查。据云：碑在距周口店十八里之深山中，其路程系由平汉路琉璃河站下车，转支路至周口店，又西行十五里，至柴厂村，由次登山，行约三里至十字寺，即碑所在之地。据寺内辽应历十年碑，知本名三盆山崇圣院，至元至正二十五年改名十字寺，可证此碑元时已发现。碑今在庙内大雄宝殿前崇阶上，石共二方，各方一尺五寸，缺其一面，合置成口形。前后刻有十字，其一面十字之两侧，刻有余利亚文字，译言“仰望此，依靠此”。其左右两侧，各刻盆花。据辽碑，知辽时已为佛刹。元代虽有十字之名，但亦只认为晋唐时之古物，并不知其系景教遗物也。寺及其山地，于二十年前，由僧人龙海售与民人张云甫为私产，张氏改为山庄。现此石刻由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移运到平，保存陈览，并抚拓全形分赠各学术机关云。

（《房山文史资料》第 10 辑）

云居寺石经库房修建记

段汝连

当您到云居寺参观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石经库房内排列如林的石经架和石经陈列馆内的刻造石经历史资料、实物陈列，通过参观现存的一万余块石经版实物和大量的资料去认识石经的历史价值。从中领略这宗文化遗产的深邃文化历史内涵及其科学价值。但多数游人还不了解在建造石经库和陈列馆过程中谷牧同志曾给予的关心和支持。

1979 年“五一”休假期间，谷牧同志想到十渡看看，临时找到市文物研究所的吴梦麟同志陪同前往。谁知上车以后，吴梦麟才知道是去十渡，可她并不认识去十渡的路该怎么走，便灵机一动，向谷牧同志介绍一番云居寺石经的情况。吴梦麟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参加工作后，对云居寺石经有深入的研究，内容丰富，又具有科学性的情况介绍，引起了谷牧同志对云居寺石经的兴趣和关注，便临时改变主意，来到云居寺。

当时云居寺在田福月同志的主持下，正在对 1958 年修建的 40 间简易石经库房地面进行维修（即现在的云居寺文物管理处的前院四合院）全部 10082 块石经被搬出库房，摆放的房前屋后到处皆是石经版，谷牧同志在深入了解石经的历史科学价值之后说，“这宗文化遗产非常宝贵，现有情况不利于长期保存，咱们国家经济再紧张也要拿出一部分钱来改善石经保护条件”。

“五一”过后，5月3日一上班，当时的房山县革委会办公室接到市建委的电话通知：市建委主任佟铮同志和公用处长徐继林同志要到云居寺去，请县政府派了解情况的同志前去接待。我当时正在县革委文化科工作，科长王建忠就派副科长张志和同我去云居寺接待。上午10点多，佟主任和徐处长到了云居寺，听了情况介绍以后，佟主任说：“今天我来是传达谷牧同志的指示；第一谷牧同志指示要改善云居寺石经保存条件；第二谷牧同志责成我和市建委负责这件事；第三房山县要有专人来管这件事，拿出方案并负责实施，市建委在财力、物上给予支持。”听了佟铮主任的话，我们十分激动和高兴：改善石经保存条件，是我们早就想到，但苦于资金又难以办到的事在谷牧同志关怀下，解决问题指日可待了。当天下午把这一情况向王建忠科长作了汇报，并决定这项工作由我具体负责。

经过研究设计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全部石经版由原来的在库内地面叠放改为上架保存，经过逐块逐架计算需增建石经库房30间，陈列室15间(也就是现在的云居寺管理处石经库和陈列馆的格局)建房和制作经版架需要14.3万元；第二个方案是建600间库房把石经全部展示保存。8月份把这两个方案同时上报市建委以后，十月份市建委批复，大意是：由于财力所限第二方案投入资金太多尚无力解决，第一方案投资少，也能改善保存条件，建设资金概算也是实事求是的，同意第一方案，决定在1980年由市建委拨款15万元。由于木材紧张决定建砖混结构房屋。

1980年3月份资金按时到位，施工方案和建设由城建局张玉纯同志设计，经县革委会孟常友副主任和城建局刘景久同志审定后，施工由田福月、王占生二同志主持，5月1日正式开工。当时水泥、钢窗、木材、角钢等建筑材料十分紧张，又跑了两趟市建委，在徐继林处长的帮助下都得到了及时解决。11月份房屋建筑全部完工，到1981年5月石经全部入库上架保存，在吴梦麟同志帮助下，同时完成了石经陈列馆的布展工作，并开始开放接待游人。当时的陈列馆比较简陋，1989年8月至10月又进行了充实改造，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1981年4月，佟铮主任在徐继林处长陪同下检查了云居寺石经保存改善后的情况，看了石经库房和正在进行着的石经馆布展工作很是满意，并乘兴在石经陈列馆挥毫题写了“琬公惧法灭，铁笔字苍石”的草书条幅。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开掘猿人洞工作的回顾

裴文中

民国十七年参加开掘工作之始

我本来是一个很随便而遇事无可无不可的人，凡事多不欲认真，读书亦多不求甚解：自觉很不适宜于担任科学上的工作和科学上的研究；但是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北京大学的理科，又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地质系——其实那时我自己的兴趣，却在办党和新闻事业。民国十六年，总算我从北大大了业。毕业后，欲教书无人聘请，欲作事又无门路可走。流落在北平，穷困已极。后来，我有兴趣的事业都走不通，不得已又回归地质本行。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泳霓(文灏)先生，与我并不认识，但他允许我作古生物学的研究，并可设法补助我的生活费用。我先研究山东的寒武纪化石，研究的结果，不用旁人看，自己也觉着莫名其妙。

至十七年春，我的生活愈觉困难，不得已才正式请翁先生设法。那时地质调查所的经费尚十分困难，实在没法安插我。翁先生想尽了方法，都无成效，结果想到开掘周口店的事情。本来十六年时，步林和李月三(捷)先生已经工作了一年，十七年时，李先生辞职了，另聘杨克强(钟健)先生与步林先生共同工作。杨先生是德国留学的，从明星已故舒罗塞教授及布罗里教授，学习有脊椎动物化石，那时方由德国回来。但是杨先生病了，至十七年春季尚未痊愈，周口店的工作欲开工而不能。翁先生令我去为杨先生的助手，管理事务，并从杨步二先生学习一些古生物学中的有脊椎动物部分的知识。

我在未赴周口店之前，有脊椎动物化石是什么，真是毫无所知，差不多何谓的脊椎动物是什么，都不晓得。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赴周口店之时，那是专为接洽事务而去的，接洽完毕之后，有一位工人带我到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拣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拣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我真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怎么管理他们！？

我随从杨、步二先生，于十七年四月间，来到周口店，开始作开掘的工作。我来到山上，不知身在那里，看见工人工作，眼花缭乱，真莫名是那么一回事。杨、步二先生十七年开掘的计划是：开掘十六年开掘的地方的东边，自山顶上开起，开一个二十米长十二米宽的长方形。目的是开到有化石的沉积的底(那时以为第五层以下为底)。杨先生派我的工作，是管理工人，计算帐目。如遇有化石由杨、步二先生自己亲手及两三个工人帮助掘挖。但是我太清闲了，闲得难过，后来商准杨先生，为帮助他们掘化石。并承杨、步二先生时时刻刻为我讲解，我于是也渐渐认识，何为鹿牙何为猪牙等等。

猿人乙地之发现

十七年春季的发觉，为猿人乙地，我还记得在山上工作时，步先生叫作(Monkeyclay)，即“产猴土层”。到同年秋季，才将这个名词改变过来。步先生是研究有脊椎动物的专家，而认猿人为猴，我们从此可以知道，所谓中国猿人者，实在不是人，从各方面看来，颇有似猿猴之处。

我们在猿人乙地，最初找见一个门齿，牙根长极了，牙冠虽像人，而牙根却与人相差很远。后来又发现一个马牙床，马牙床之下，即是猿人牙床。当发现这猿人牙床的这一天，正赶上下雨，步先生怕掘不出来，在山上放着有危险，于是他找我帮他的忙，在雨地里掘挖。工人们却在旁边打着雨伞，作壁上观。据他说，因为这件标本太宝贵了，只能找我帮忙，不能令工人下手。上面用伞遮雨。我们即伏在泥土中工作，水从身上流过。我们掘完之后，满身都是泥水。说也奇巧，正在此时，来了一个满身泥水的猪，大概是因为雨淋，而忘了家在何处，流落到此地。步先生曾向我讲笑话，猪也到山上掘化石来了，我们与猪一样。

鸡骨山变成了鸡骨坑

十七年春季工作，因为时局的关系，很匆忙的结束了。秋季工作开始，杨先生去开掘鸡骨山的化石。杨先生将鸡骨山有化石的地方，整个的开完，大块土石搬运到店时，杨先生叫作“搬山法”，并谓鸡骨山谓之“鸡骨坑”。我们在猿人地点的工作，开到第五层时，已经到了冬天，冷得不得了。步先生在冰冷地方，仍是一时不肯停地工作，而我则有时走走，或者各处看看。有一天早晨，我走到筛土的工人的地方，一个工人，拿起一个东西，向我说：“这里一个猪牙床”。我接过一看，吓我一跳，原来是猿人的，尚有保存很好的三个牙。我看时，步林先生也来了，我向他问：“你猜我手里拿着什么？”他接过去看，看了一会，见他的脸渐渐红涨起来，手也战栗起来，喊了一声：“这是人！”这一件标本，到后来我们谓之为猿人甲地的牙床。因为这件东西是无疑的从猿人甲地的土中筛出来的。

在这一年的夏季,我认识了步达生先生。步先生是英籍加拿大,任北平协和医学学校解剖系主任,兼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任,我们周口店开掘的工作,所用的款项,为罗氏基金董事会所捐助。该基金会所以能捐助这笔款项,除了丁文江、翁文灏先生的鼓吹倡导外,步先生的力量也很大。我与步先生是在周口店第一次见面,他给与我的印象是瘦小的面庞,脊背稍微弯曲,精神充足,知识渊博。并且对于后进的人们,更多方指导。关于周口店中国猿人的研究,皆为步先生所担任。中国猿人能得世界上赞许,一部分也是因步先生研究之力。

民国十八年山中工作颇有鸡肋之感

民国十八年,步先生辞职,去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而杨先生又决定同德日进先生去山陕各地研究华北的新生代地质。关于周口店开掘的工作,翁所长就责令我一个人负责进行。步达生、德日进及杨先生与我一同来周口店,指示我如何工作,并商议工作的计划。我们决定,由十六年及十七年开掘的中间,从第五层(十六年时以为是含化石沉积的底)再向下开。一直向深里开,追求真正化石沉积的底。

在指示我工作方法的时候,我深切认识了德日进先生,德先生是法籍的神父,曾任法国地质学会会长,在英国辟尔当地方曾发现一个辟尔当猿人的牙齿。在中国的工作已有十几年,现为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顾问。我的古生物学的知识,除杨先生外,完全由德先生所口授。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十八年的事,我已经将基特尔的古生物学第三册(英文版,第三册为哺乳动物化石)看完,看完之后,觉得仍是不能完全了解,但是经德先生带我到地质调查所的陈列馆中,将哺乳动物从有袋类讲到灵长类,不用半天的工夫,觉得明白了许多。

十八年也是四月开始的工作,步德杨三先生指示毕,走后,山中顿觉岑寂,而过起孤独的生活。那是我正因私人生活而感到烦恼,而山中工作,又遇到第五层的下部,坚硬异常,我们如何的崩炸,都不见效,因之觉得山中工作颇有“鸡肋”之感。

山穷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国猿人头骨之发见

开过第五层,第六层中渐有化石,使我渐有兴趣。至第七层则化石之多,不可言状。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共得了一百四十五个肿骨鹿的牙床。这一层的化石,不但多,且很整齐,如水牛头及全鹿角,整猪头等皆从这一层中采得。此外并因这一层是砂土,掘挖化石非常容易。可惜我们因开掘的地方太少,向南向东皆在高崖之下,恐有危险,不敢多掘。

春季的工作结束了,我们一共发见了几个猿人的牙齿,这是猿人丙地。当中有一个犬齿,给我的印象最深,牙根之长,及牙冠的尖,实可令我们知道中国猿人确具人类的原始性质。

到了秋季工作开始,开掘手部分;渐渐缩小,沉积的体积也渐渐狭窄了。我在想来,可以找见底了,工作也可以结束了。但是窄到无可再窄的地方,忽又发见出洞来,计自洞口至山顶将及三十余公尺。新的洞口,就是所谓猿人洞,洞口至洞底又有十余公尺深。

我们若从山顶望下去,见猿人洞洞口之深,及峭立的绝壁,已有些令我们害怕。其实这都是我们一寸一尺的移去,土和石都是我们一筐一筐的抬出。现在看来猿人洞很深很大(最近更因雨水冲积及悬崖落石,已不能下去了),当我们初开的时候,只是仅能容人的小孔。并且一部尚为砂土所填满,仅有一个薄隙。当洞口方露出的时候,我们不知深浅,于是我同个工人一同下去,腰上用绳子系好了,上边用许多人拉着绳子。我觉得我既负这开掘的责任,就应当身先士卒,正如打仗一样,将官若退缩不前,最好这仗不必打,打也必

败。我下去之后，见洞内化石非常之多，高兴极了。那时已到十一月底，天气冷了，应当停工了，然我决定再继续几天。这正与古诗上所云：“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样。

想不到，我们开掘猿人洞的第二天，在十二月二日下午四时余，竟自发现了猿人头骨，我的运气真好！猿人头骨一半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那时天色已晚，若加细工作起来，我怕到晚上也掘不出来。其实他已经山中过了不知几千百万日夜，并不在乎多过一夜，但是我不放心，脑筋中不知展转了多少次，结果决定取出来，用撬棍撬出。结果呢，头骨一部分被震动而破碎了。这样结果，又使我很后悔，然已悔之不及。但是这个机会，却使我知道中国猿人头骨的厚度，我们现在的人，头骨比较很薄，而猿人头骨异常的厚，若说猿人是人，真冤枉！从这一点看来，真不像人。

发现了猿人头骨，晚上我没有吃好饭，因为太高兴了。我高兴了，如何令北平的人们知道呢？如何使他们也高兴？我先决定派专人去送信。写好了信，令人次日早晨返平，专呈翁所长，送信人走后，我又觉得到晚上才能看到信，天时晚了，翁所长未必能通知关心周口店事务的几位朋友。于是我于三日早又打了一个电报给步达生先生，文曰：“（衔略）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下略）”，因为猿人不是人，故我说他颇似人。北平方面得这个电报，人们好像都不信，不是说我不能认识“人”，就说我不至有这样好运气，实在是因为整齐的头骨太好了，怕不容易得着。

我于十二月六日返平，怕猿人头骨未干，我夜间生上炭火盆烤着，连烤了两夜，我认为方可搬运。那时我们是乘坐平房间的长途汽车来往。我将这个猿人头打在我的行李中，我用那两床破旧的被包裹起来，外面用再褥子毡子与普通行李一样的捆好。我们的长途汽车到了北平西便门照例要检验，我们在事先已有准备，我随身带有几块化石，令检验人看，告诉他们我行李中是这种东西，请他们免检，如果一定要看，但我不能允许将外面糊的麻袋和纸张揭开。如果非揭开看不可，那我就得先请他们拘捕我。检验人倒很客气，只令我打开看，并没有要揭开糊的东西，并向我解释，因为时局关系，上司有命令，旅客的行李非打开看不可。猿人头骨总算一路平安到了北平，我的职责也算尽了。

在这里，我应该讲一讲我很抱愧的一件事。十九年春间，有一个技工由北平来。告诉我说，北平技工中，有一人修理一件化石，与猿人洞中发现的猿人头骨一样。这是所谓猿人丁地的头骨，至猿人洞内的头骨则谓之戊地头骨。这件标本，破碎得不像样子，但仍可粘在一起，尚有一小部遗失，未能找出。从这猿人丁地，十八年秋季也曾找出几个零碎牙齿。丁地在猿人洞之上，距洞口有三公尺。在北平的朋友们都说这件标本，因为有泥土包裹着，致使我在山中未能看出。我很明白他们为我维护短处，掩盖我失察的罪名。但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我的疏忽。

民国十九年外交式的交涉

——购买龙骨山山地

因为十八年猿人头骨的发现，翁先生想到这个开掘的地方的重要，恐怕为石灰厂开掘损坏，所以他打算由地质调查所购买来，永远保存，以为纪念。这种交涉的事，在十九年春季开始。我应该先补充一句话，我们开掘的地方，本来是周口店常姓合族的公产，但是由鸿丰灰煤厂永租，立有永租契约。我们由民国十六年至十八年开掘时，全由鸿丰灰煤厂转租，租期大约是三个月，租金约二百五十元。

交涉收买龙骨山的事，由杨克强及我办理，由翁先生丁先生转托了几位人，从中解释。交涉期间，我是因事赴冀南沙河县一次，交涉因之停顿月余。常姓地主，对于我们保存这个地方的用意，经他们本家几位在外作事的先生们的解释很赞成，而对于卖价上，并不坚持一定数目。不过鸿丰厂则因有永租权，不肯轻于让出。据鸿丰厂的经理人讲，该厂曾因此地而赔累了几万块钱，若由地质调查所购买过来，他们永远没有机会

将赔累的钱再赚回来，于是要求我们酌量给与他们相当的代价。交涉了三个多月，未能解决，症结就在这一点。最后鸿丰厂方面减到五千元的代价，一半归地主，一半归鸿丰厂。于是我与鸿丰的总经理，先来周口店划地界。划完地界，讲到价钱，我坚持四千八百元的代价，鸿丰当事人坚持五千元，交涉破裂了。又有人出来转圜，告诉我说，鸿丰方面可不坚持五千元，至多可以再减少一百元。在周口店，遂未能成议。至北平后，我向翁先生报告，允许了四千九百元的代价。议成之后，立了契约，从此以后，即永归地质调查所所有，我们应当感谢鸿丰厂的经理人及常姓的地主们，他们赞助这件事的诚意和实力。不过，契约之外，还有附件，鸿丰厂要求地质调查所不在地界内开办(或租给他人)灰窑，并要求我们开掘化石时所开掘出而无用的石灰石，无代价的赠送他们。因为鸿丰是管理周口店灰业的一家，若不如此，怕我们开办灰窑，影响周口店的石灰的市价。翁先生对于他们的要求，原则上赞同，因为我们购买的目的，不在于开办灰窑，更不希望出租或售卖灰石，从中得利。但是觉得名义上既由地质调查所购买，不便由他人干涉。于是我自己从中转圜，这种要求改为附件，用外交式换文方法。由我起草，替鸿丰和地质调查所彼此各写一公函，鸿丰致地质调查所公函的大意是：请求地质调查所，不在地界内开办灰窑，并请求将无用的石灰石无代价的赠送给鸿丰灰煤厂。地质调查所复鸿丰的一公函，大意是说：地质调查所购买的原意，在开掘化石，和保存遗址，自然不便开办灰窑。我们这样办法，翁先生和鸿丰代表人，皆表同意，于是在平成立了契约。并由地质调查所致函河北省政府，说明经过，请求备案，并转令房山县县政府保护。

开掘鸽子堂洞的动机

十八年的工作的结果，给与我们很大的兴奋。我更观察有化石的沉积层，并不如我们从前所猜想的那样小，好像整个的龙骨山处处都有。十九年工作开始，于是决定，在山顶上，作大规模的开发，即顺着化石沉积的边缘寻找它的边界，先将灰石崩去，有化石的沉积不动。每天要用石匠三十名，普通工人八十名至一百名。这是我工作七年中，最热闹的一季。山顶洞也是这一季发见的，内有化石颇多，那时看起来，好象与周口店时代的化石不同，但因上部只限于开石灰石，所以工作了一点也就停止了。

同时我们主要工作仍集中在猿人洞，一部分开掘工作在另一地点，在我们的山之南，有三里多地远，叫作第九开掘处，俗名椅子圈。从猿人洞中，我们所发现的鬣狗很多，而且多是整全的骨架。老的，小的，什么年岁的都有，并有许多粪层。同时这个洞中，并无人类寄居所遗留的黑土及烧过的骨和石。由此种种，我们推论这所谓猿人洞者，未必即是猿人寄居之地，大约是鬣狗所居住的洞穴。我们称之为猿人洞者，只因猿人头骨从这个洞内掘出来。我们这样工作着，一直到秋季。猿人洞已经深到十几公尺。洞中太暗，于是我们点上汽灯。搬运土石不方便，于是我设法用滑车往上拉。这两层困难虽可打通，但是猿人洞的底部更分为东西二洞，东洞向东南转弯，西洞向西南转弯，并且转到化石沉积下去了，时时有巨大的石头掉下来。我们在猿人洞的工作，因之到二十年即不能不停止。

猿人洞工作有不能进行之势，我本拟开隧道通进去，但是又怕工程太大了。后来才决定，从鸽子堂洞中由洞底向西开，好与猿人洞连起。这是我们开掘鸽子堂洞的动机。

猿人洞中，除最初发见的头骨之外，猿人的东西很少。在猿人洞的底部的东边，曾发见了一个猿人下颌，牙齿尚全，这是猿人已地的牙床。这件标本若在前三年发现，也足以引起我的兴奋，但是当发现这件东西之时，我虽知道，这也是很重要的标本，但我却看得很平淡。大概人情都是如此，经过了一次，再经一次，即觉得不足动心了。

民国二十年中国猿人文化遗物遗迹之发现

——开掘鸽子堂洞之意外收获

二十年春季工作开始，有卞美年和贾兰坡两先生参加。二位先生与我共同工作，一直到现在，帮助我的地方很多，并有时我偶尔返平，一切工作完全由卞贾二先生负责，我应该感谢二位先生的热心赞助。我们的工作，仍是一部分在山顶上开石灰石，一部掘化石，猿人洞因时时有土石落下，二十年春季，我们只工作了几天，即全体移到鸽子堂洞内去了。

鸽子堂洞在龙骨山东坡下，现在看来，洞很大，其实在我们未开之先，并不很大。洞顶也是土和石，间有化石，大概这个洞，(指我们未开掘以前之洞而言)，是因雨水，将一部松软土石冲走，剩下一部坚硬的部分，成了洞顶。这个洞(亦指未开掘前之洞而言)除了鸽子和蝙蝠以外，并没有人类居住过。洞的北边是石灰石，石灰石中尚有一个小洞，深数丈，仅能容一人出入。

我们开掘鸽子堂洞的动机，是要使它与猿人洞打通，但是我们至今尚未打通而得了意外的收获。这就是石器和猿人居住的地方之发现。

我们由鸽子堂洞原来的底，沿着北边石灰石，向下开，开了有八公尺深，遇到一层红土和黑土。这几层之中，碎骨很多，破碎石英也很多，并有许多烧过的兽骨，及猿人的牙床及锁骨，叫作猿人庚地。这一层出产的东西，最令人注意的是石英，石英本来不应当产在石灰石山中，为什么这样多？于是我想到是人力所搬运而来。搬运作什么用？不用说，作石器用。我们除了有石英石器外，尚有砂岩制作者，砂岩的材料，多半是河床上的河光石。

这猿人庚地地层中含有猿人的牙床，石器，烧的和碎的骨头，而同时又没有许多的食肉类动物化石，于是我们推论：这个地方，从前猿人寄居过。

猿人用的石器很简单，只有刮削器，尖状器和批裂器具等。制作方法，仅用石头打几下子而已。且周口店猿人的石器多是石英质制作，与欧洲的燧石制的石器迥然不同。燧石的石器上，石头打的痕迹，很容易看出。但是周口店的石器则不然，打的痕迹很不易认识。因有此石器的发现，及研究这种石器的困难，我不能不开始学考古学，最初从李济之先生(济)，后又有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教授来平，我又从他学习。

秋季仍然继续开掘鸽子堂洞，又有许多石器发现。山顶上的工作，因为化石沉积的大部已经认识清楚了，工作也就停止了。

建筑办公室

这一年春季中，我们的办公室修盖完毕，前院是三合房，共有九间，为办公室，后院有房六间，为技工们寄宿之用，正门向东，北面尚有一个大车门。

民国二十一年开掘工作之大革命

二十一年的工作，可以说是最清闲，我们有三个人，而所开的地方化石又很少，所以我们常常觉得闲着没事。当我未来工作之先，我与步达生先生计划，由山顶开掘，开掘猿人乙地附近的地方。我们工作不到二十天，忽又得着步先生的紧急来信，要变更计划，又变更开掘方法。总而言之，是要由古生物学的开掘，变为考古学的开掘方法。这是工作方法的一次大的变革。

从发见石器以后,我曾屡次同步先生谈,应该改变开掘的方法。我闲着无事时,也常计划,应该怎样的开掘,以免失去考古学上的意义,或失去考古学上的重要纪录。步先生改革的来信,说起来,本是我提议,计划也是我所时常考虑者。但是当我接到来信之时,使我万分的急燥和踌躇。人的毛病,都是旧的好,不管如何的不适用,我们旧的开掘方法,无论我们自己,技工,石匠和散工们,都熟悉了,养成习惯,一旦改革,实在不易。我筹思一个整夜的结果,先不动声色,再照常工作一天。再过一天停一天工,表示中间有时间的隔断。在停工的一天,给技工和工头们讲解新的计划和新的工作方法(方法见第三章)。

经了这一次改革,这才算是正式开掘的工作,这才有精密的记录。当中虽经相当的困难和许多商酌,结果是非常满意。二十二年开掘山顶洞而能获得异常满意的成绩,皆由这一次改革而得。

新的开掘方法,是掘一公尺半宽的探沟,深度为五公尺。探沟开毕将待开之地方,分为若干“方”,再按由探沟所得的地下知识,按方开掘,每方为九平方公尺。我们在山的东坡上,鸽子堂洞洞顶迤南的地方开沟开方。一年之中,共工作了两层方(五公尺深为一层),并开了一条东西沟。至今东坡上遗留的一道深沟,那就是我们二十一年最后的工作。开掘的结果,是训练了我们的技工,画了几张图,得了几十块破碎的石英。

民国二十二年山顶洞之开掘

——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遗骸、遗物、遗迹之发现

二十二年是国难最严重的一年,在国难最严重的四月中,我们的开掘工作又开始了。但是工作计划又完全变了。步先生嘱我先由山顶洞开起,不继续二十一年的工作。我们的工作计划,时时有变更,我们是完全因临时的需要而作工作,可以忽而东,忽而西。不明了我们工作内幕的人,很难知道,我们是怎么一回事。

开掘山顶洞的工作,是我们七年中最精密的工作,记录最详的工作,最值得注意的工作,而同时又是收获最丰富的工作。

山顶洞是民国十九年春季发现的,洞口向北,当时我们就由洞内,采了许多化石,由化石上看来,好像没有含猿人化石的地层古远。后来因为山顶洞的石灰石墙及洞顶,都有些破碎,难于保存,我们即将洞墙和洞顶移去,只剩下洞内含化石的石和土。至民国二十二年初,我们在北平著中国原人史略,我想报告出这个山顶洞,但是有人反对,经了几次辩论,终于将山顶洞列入报告之内,说它的年代,较含猿人化石的地层新。

山顶洞未开掘之先,我们已经看出有一层薄的黑土,中有碎木炭,在我们想来,也许有人类寄居过。这种人类,大概比中国猿人晚,我们从书本上得来,中国猿人之后,即是旧石器时代的后期。那个时候,欧洲的考古学者分了许多文化期。据说:在未必有一公尺厚的薄层中,即可有不同的文化。我们这开掘的工作,若稍微大意一点,恐怕把这文化的层次都马胡过去。我决定,开掘时,以一平方公尺为一方,以半公尺为一层。每个技工管辖两公尺宽的地方。我们开掘的时候,绘画五十分之一的详图。每隔二公尺有一个南北剖面,每掘半公尺,画一张平面图。凡是人类的遗物及其他各种重要化石及重要地质上的观察结果,都画在图上。我们每天从不同的三点,更照像三张,是为记录照像。

技工们因二十一年的训练,他们工作时,并不感觉什么困难。只是我们忙了一些,不像二十一年时,可以偷闲了。

二十二年春季,我们得了许多人的零碎东西——单个的牙齿,牙根很短,完全与猿人不同;破碎的头骨很薄,也与猿人头骨大别。所有的化石,与含猿人层中所得者,完全不同。最要紧的,没有肿骨鹿,没有中国鬣狗。因此我们断定山顶洞是旧石器后期人类寄居之地。

我们并发现了人类的腿骨和脚骨。当我们找见之后,令我回想到在含猿人的地层开掘时的情形。我们在含猿人的地层中,总也没有找到腿骨。因之引起了怀疑,为什么猿人只有牙齿和头部的骨骼,而无腿骨?有

人想出许多解释方法，但我却时常归罪于我自己，就是觉得猿人腿骨或者是有的，因为我们(包括我和技工们)不认识，亦许打碎了。但是我们在山顶洞中，每遇见人类的体骨，技工们全可以认出，我自己也可一望而知，因之，我们从前在猿人地层，未发现猿人的体骨(自然也有，但是很少)，并不一定要归罪于我们自己，也许是真的没有猿人的腿骨，那我们将从何而找出。

二十二年七月八日，是我们发现骨针的日子。十五日是我们发现带孔的狐犬齿的日子。当我们发现骨针之后，我很怕山顶洞也许属新石器时代，因为这个骨针与安特生在辽宁锦西县沙锅屯所发现的仰韶时期(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骨针太相像了。大小一样，粗细相同，而破的地方也一样，同是由针眼的部分破了。但是又接连发现了带孔的鹿犬齿，方使我的怀疑去了一半，因为带孔的鹿犬齿，常在欧洲的旧石器时代的地层内发现。这两件东西，和两块燧石制的石器都锁在我的柜子里。晚上困倦了，就拿出来看看，共同工作的卞先生和贾先生也同我一样，过一两天，就要向我要钥匙，看一看这几件东西。这个我们有一个名词，看一次，叫做“过一次瘾”。

秋季工作开始，工作方法，稍微变一点，即每一个技工，只开掘四平方公尺的地方，每人管一个区域，除去有整的骨架的时候，不许越界。

在山顶洞中，我们时时发见整齐的骨骼，有时一个全付的骨架常连在一起，我们于是常闲着谈论，也许我们从山顶洞中，发现一个整齐的人骨架，各部皆全。这是我们的迷梦，所希望的终未实现。但是我们曾连续发现了三个人的头骨和一部体骨。

十一月二日找见一个人的头骨，稍微压扁一些。这是老年人的头骨，牙齿多已脱落(大概是死后脱落的)。次日又找见一个人的头骨，比第一个好一点，虽稍压破一些，但大形尚未改变。当这两个头骨发见之时，我正因事返平，接到山中来信，赶快跑回山上，我很怕这个地方是人类的葬地，若是葬地，应当很仔细的观察地层内的情形，以研究当时葬仪。但是那两个头骨，除第一个人头的太阳穴地方，稍有一些红色以外，并没有什么葬的遗迹可寻。两个人头由北平一个技工取走之后，九日又发现一个，这第三个一点也没有压坏，下颌骨尚与上颌骨相连，并有大腿骨盆骨肩胛骨等，最初我以为是整齐骨架了，但是只有一部分，各部并不连接，尚说不定是否同是一个人。

我原来计划，十日返平，好参加十一日北平开的地质学会年会，但是，这第三个头骨怎么办？考虑的结果，也带至北平。我们忙了半夜，修理好，装好箱子，已经到了次日二点钟了。除了人骨外，在山顶洞中我们也发见了许多考古学上的材料。考古学上最多的材料是带孔的牙。一共有多少，我已记不清了，总有七八十个罢。我记得，当第一个带孔的狐犬齿发见之时，很有兴趣，这个牙齿是技工唐亮君找见的，有孔的地方，有一块硬土盖着，看不出有孔。那几日中，唐亮开掘的“方”之中，化石太少了，当日晚上，技工柴凤山去到他那里收化石，预备包裹和写号码之时，唐亮说：“我这里就是一个破狐狸牙”。(破字是瞧不起之意，并非破碎之意)。柴凤山拿起来，又放下了，说是不值得一包，后来唐亮又给柴凤山一次，柴凤山均没有收下。第三次给的时候，是在天晚将下工的时候，正在我旁边，我于是顺口说了句：“不要瞧不起，也许有窟窿哩”！我从唐亮手中讨过来，拿到我房中，预备晚上修理后，再看一看，但是我忘了，到临睡时才想起修理。修理之后，果然中了我无意中的一句话，牙根上有一孔！我赶快跑到技工宿舍中，想告诉他们，但是已经晚了，他们都已入了睡乡。第二日清晨起来，未上工之前，我遇见一个技工，就告诉一次。跑到山顶，就在唐亮工作的地方，加细再找，不久果然再找见一个，于是大喊一声：“又一个”！在很小的一个地方，我们共找了二十八个之多，到后来，又常找到。找到几十个之后，已令我们不兴奋了。觉得带孔之牙，也很平淡了。此外尚有带孔的圆石和海蚶壳，并有鱼骨和蚌壳等。这许多考古学上的材料，都足以证明，这山顶洞的人类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

再者我们开掘山顶洞之时，时常找见赤铁矿矿石，这赤铁矿矿石，是很好的染红色的材料，磨之成末为

红色，用它在硬的东西上一画，也可以成一个红道。在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中，所有的洞中的壁画等，多用这种材料染红色。这种东西，周口店附近并没有，据我们现在所知，最近的出产地，大约是察省宣化县附近的龙关镇。山顶洞住的人类，从这么远的地方运来，或交换来，他们一定有用途。用途是什么？当然以用在艺术上，最可能。然而，也可以是葬时涂身，或葬时撒在尸旁。但是就大体看来，我们并没有看出很清楚的墓葬，至少是虽有墓葬也为后来的人(亦为旧石器时代之人)，或曾给损毁了，因之我们不能不注意山顶洞中人类的艺术作品。我于是许下了愿，向技工人说，如果找见艺术作品，包括壁画、洞画、骨角画，及雕刻作品，我请他们吃一个全猪。吃全猪的希望，至开掘的终止，总没有达到。我很奇怪山顶洞的人，不爱好艺术，而无作品留给我们，使我们不能吃一个全猪。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文昌阁与魁星楼

王国林

房山区石楼镇石楼村，原有不少古迹。如村内东街的东门、文昌阁、魁星楼、娘娘庙、朱熹祠等。这些建筑虽已荡然无存，但作为石楼村的一段历史，颇有记述的价值和必要，现作此文以记之。

石楼村村委会往东北胡同口，原有一座长14米，宽约8米，高约4米，与城门相似的东门楼。上建有一座“文昌阁”。该建筑长约5米，宽3.2米，该阁楼建筑古朴典雅，阁楼挑大脊围墙砖砌。属木结构框架，柁檩为优质松柏木，上面绘有油漆彩画，龙凤图案。门框、窗户均是土红色，古色古香。

阁楼正堂供有一神像，即文昌先生，古代文官打扮，左手握书卷，右手执笔，温文尔雅，栩栩如生。左有两侧各侍立一书童，手执佛尘，侍奉先生。文昌座下，门洞顶居中嵌有大理石门额“毓秀”二字。

相传：文昌先生是玉皇大帝驾前一文臣，专司招考天下状元事。旧社会，石楼村念书上学堂的学子们，都须先拜文昌先生。所以，每年二月初三已形成传统习惯。

与文昌阁相背，坐西朝东，一壁之隔，是一座魁星楼。魁星楼与文昌阁，从建筑结构上可以说是一个整体。魁星的神像，与神话中哪吒三太子形象相似，外观较之凶恶丑陋。站姿，举右手搭凉棚，远眺东方(门洞顶与魁星足下中轴线位嵌有大理石门额)，与门洞“迎旭”二字同处一条垂线上。魁星左臂后摆，右脚踏在鳌鱼背上，左脚抬起为迈步向前之状，也似独占鳌头之举。

在文昌阁北侧，原有一座宽1.8米，长3.5米的11层台阶往正北方向，乃是娘娘庙旧址的正门。过去有人戏言：石楼村人应知娘娘庙台阶多少层。如回答正确，亦说明对石楼历史有所了解。

登上11层台阶，东行5米，建有三间配殿，殿堂高屋大脊。两侧马鞍背向东西南北延伸成犄角之势。檐角马鞍背伸延部分有砖刻龙头，狮、虎、彪、豹等形态各异的怪兽，其势壮观宏伟，气势磅礴。

砖砌甬道进殿，正堂石台上端坐一泥塑神像，高大魁梧。此神乃朱熹，故称“朱熹祠”。此祠建于清代(1794年)乾隆年间，比文昌阁晚近20年。据说建此祠为衔接文昌阁与娘娘庙，大殿之内曾有一尊泥塑神像。神像前放供桌，桌上有石香炉。配殿东南墙角有一砖砌楼梯，此路是谒拜文昌先生的必经之路。谒拜完毕，可环文昌阁四面花墙转一周，瞭望四周美景。朱熹祠存在时间最长。

当年大清乾隆皇帝(弘历)曾出京南巡,途经石楼村东时,远见树木郁郁葱葱。蓝天、碧日、清水、绿树相衬十分雅静。农家院落掩映其中。随信步走来,忽然发现面前有一潭清水,水面足有二亩余,清澈见底。水塘为“砚台”之状。西南沿岸是由河光石垒砌的石堰,石堰上有一棵钻天白杨笔直挺拔,近看岸柳成行。皇上好不高兴!称颂这是块风水宝地。皇上金口玉言“宝地”、“福地”!将来必出文人巨匠,而且会层出不穷。于是村民自发遵照皇上旨意,集资募捐。于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94年)修建了“东门”和“文昌阁”,亦为弘扬中华文化而树碑立传。

附:

文昌碑记

文昌帝君继舜而称孝者也其所著孝经与曾子十八章相表里盖本至性所发言浅意真凡我同人宜奉之无违也房山县石楼村侯君文者敬信有素会同捐资建阁用兴祀事且将村西南隙地一段永为香火之资爰新庙貌以敬以诚矣帝君感之曷克有此夫天下之大善以孝为先人伦之首万化之原不外是矣帝君十七世纪详于化书其最著者阴鹭文及劝士子等文人能遵而行之庶不愧为帝君弟子也然或以无财不可为善不知以财为善者其善小以心为善其善大所以帝君训人曰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锡汝与福又曰欲广福田需凭心地遵是训也则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皆以不忍人之心行孝所以能锡厥类而与大舜并垂不朽也

乾隆庚子科举人七品京官华肇撰文赐同进士出身内阁中书 常泰丹书

嘉庆戊午科举人 闫恂题额

嘉庆四年岁在己未七月古旦 立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重游谷积山院

张玉泉

一个隆冬的双休日,我携友人重游了位于房山北部40华里的北车营村谷积山院。院中那座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灵鹫禅寺,已被修葺得焕然一新,昔日的风采将逐步再现。然而,院内、群山上的文物古迹尚待修复开发。

灵鹫禅寺创建于辽代^①,始称谷积山院(含四周群山中的古迹)元代改称谷积山华严禅寺,明正統年间重修又称灵鹫寺,现依统称谷积山院。据《房山县志》载“北车营村东(西)有寺二,上曰圆通寺,仅有圆殿一,馀圯。下有灵鹫寺,尚整齐。寺北三学(仙)洞。北过岭处曰高桥寺……”关于灵鹫禅寺和圆通寺,等笔者曾在《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及《京西风物典故》一书“谷积山院游记”一文中做了记述。现仅就山中的文物古迹及其它情况记述如下:

拐喇嘛师徒及家业兴衰

谷积山院在清光绪后期曾红火过一段。原禅院东侧为乱石滚滚的河滩，遍地是荒草萋萋，庙中僧人以外出化粮为生。自从大和尚(姓荆，因腿跛绰号拐喇嘛)卖掉吕域沟的寺庙归到灵鹫禅寺，当了主持之后，使寺庙一度兴旺起来，从光绪后期至宣统初年(约从1891年至1910年)较为鼎盛。山院拥有土地数百亩、骡马一把儿(12匹)，牛羊两群、大车三挂。长年顾用长短工百余人，含管家、财会、饲养、驾驶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大部分劳力农闲开沟垒坎、造田，农忙时耕、种、锄、收拾果树。大喇嘛与顾员们都签有合同书。合同书上标明庙产四至，使用顾员的规定、分成等。四至是：“东至东岭，西至西岭，北至北岭，南至沟口。”用人的规定是：“只许客辞主，不许主辞客，要是主辞客，罚米十筐箩。”到庙里做工的得到此合同心里很踏实。有时庙里没活了也不走留下混饭吃。拐喇嘛对人很宽厚，附近的孩子到庙里玩，见到他只要叫声拐爷爷，他就赏块点心给他们吃。谁家接不上顿了，他还施舍。住山上农民包果树的按三七开，即三成给庙，七成留己，在山下包地种的按二八开，即：二成给庙，八成留己。每到收获的季节管家就赶上驴骡去树下或场院里收租。驮回入库。拐喇嘛还常放出了不少高利贷，据当地老人说，那时附近村庄，如上万、口头、坨里等村公所或私人都欠过庙里的高利贷。由此可看出当时庙里的家业十分兴旺。

拐喇嘛圆寂后，住持由他的大徒弟法号叫云普的担任。云普有四个徒弟：大的叫雨宽，二的叫雨周，三的叫雨河，及他的徒孙无明，老四姓杨，为当地农民子弟，4岁时由母亲抱到庙里出家。今年已78岁，他上边有4个姐姐，父母怕养不活就先让他出了家，但多半时间呆在家里，14岁时还俗结婚。还俗时到庙里上一大桌供，给个毛驴钱(10元大洋)，向佛爷三叩头。云普师傅胡撸两下脑瓜顶，然后再打个小耳光，说：“不要你喽！”他便从庙中跑出，百步内不得回头。从此他成了凡夫俗子，后来参加了革命。

云普住持几年之后，庙业逐渐萧条、败落，主要原因住持长期不在庙里而是呆在老家鲁家滩。抗日战争爆发后云普把寺庙全部卖给了东庄子村大地主殷月宗，几个徒弟徒孙们有的还俗，有的出游，还有的当了国民党兵。从此庙无人迹。

铃铛塔·鞭塔·东塔

谷积山的北端山梁上有三座各具特色的古塔。我们从西北山沟爬上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梁，坡头一平台上矗立着一座八角铃铛塔，塔身为一色汉白玉垒成，制做精良、造型美观大方。分为13层。每层八个角上都挂有铜铃，有山风吹来铃儿摆动，优扬的铃声，回荡山谷。塔内每层内建有回廊，可从一层登上顶层，俯瞰谷积山的全景。该塔建于明万历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是位高丽籍禅师的墓塔。塔的左后立有汉白玉石碑一通，因风化严重，层面脱落，无法辨认。根据《大元敕赐灵寺碑》记载应是元至正七年“高丽僧天湛大师”的墓塔。

据文物部门考证，此种塔在全市仅此一座。可惜“文革”后期被当地住户破坏。拆走石料盖房、垒圈。现仅剩两层完好无损。

在铃铛塔东部另一道山梁上，耸立着一座土红色的六角形七级密檐式的塔，称鞭塔。高七米，砖石结构，正面券门顶上嵌有汉白玉匾牌，铭文为辽塔，与灵鹫禅寺正殿后面的辽碑同一年代。站在此塔前向下眺望，它与寺内的山门、天王殿、释迦牟尼殿在一条中轴线上。寺内外一切设施可尽收眼底。当我们环顾四周，便惊奇地发现北山象一只巨大的猛鹫由北向南展翅俯冲。它头顶鞭塔，嘴伸庙前，两翅舒展。怪不得管它叫镇山塔(又叫风水塔)，当年建塔时定有一番用意。因有此塔，使山院显得格外庄严、肃穆。然而，这一珍贵文

物正濒临倒塌的危险。塔座四周已被盗宝者扒得七零八落，塔底已被掏透。

再往东行，在另一条山梁顶端，还矗立一座灰白色的和尚塔，也称东塔。砖石结构，为覆钵式的建筑风格（唐代以后由尼泊尔传入），身高3.2米。塔基须弥座，呈“亚”字形，上为仰莲承托塔身，四面各有一龛，内有雕像一座，塔刹与塔体间有八道相轮连接，做工十分精巧。塔基下有地宫。宫内正面为释迦牟尼涅槃时卧像，左右为宝塔记。地宫早已被人挖开、当年的陪葬品早已无影无踪了。现在地宫口已被乱石堆砌、遮挡。

张公墓·叶公墓

在鞭塔的两侧，沟谷顶端，有两座太监墓地，左边的为“乾清内府供应库掌印南溪张公寿域”，此墓地座北向南。汉白玉质的宽厚石门紧闭。门框顶四个门楣上镶一块两米长，50公分宽的石匾，雕有上面的字样。这15个楷书大字，标明了墓主的地位、身份和官职。

石门内为椭圆形的墓地。占地约百平方米。宝顶无存。正中只立有高两米六角形的汉白玉经幢。正面顶端雕刻横写小篆“明皇”接着为竖写的“乾清宫管事兼掌印太监”字样，（经幢从辽金起较普遍使用）。靠山砌的北墙呈半圆、高约2米。灰石结构。整个墓地均用黄土垫高一米许，为当地住户种地所为。

鞭塔右侧山梁的太监墓地建筑也十分气派。汉白玉的门框、门牌雕有精美云朵、花卉、鸟兽。门顶的横匾上刻有“磔氏宗支内管太监公磔公之墓”的字样。石门后有突起的坟头，为假坟灰石裸露。假坟往北依山势往上60米处，有拢起的土丘。丘前被盗墓者挖出地穴入口处，从此可进入地宫，找到太监的棺槨。地穴入口已被山上一住户当做了红薯窖。后被他人用柴草遮掩。从该坟的建筑规模和风格可看出墓主生前地位的显赫。假坟后躺有一块清建皇帝赐的九尺高汉白玉石碑。文字被泥土覆盖，字迹难以辨认。

少林寺·三仙洞·谷积庵

沿谷积山西北崎曲的山路上爬，在山沟西侧层层梯田中，有一堵高约5米的围墙，圈出一块平地，为少林禅寺遗址，紧靠高墙下有一口三丈深的石井，水仍丰盛，是当年少林弟子吃水的地方。走上高墙向西北爬个小坡就是月亮洞。洞壁圆得似月亮，皓月当空时能照进洞里，故称月亮洞，洞里还供奉一尊释迦牟尼坐像。脸部被毁。我想摄个影，但无论如何也按不动快门。友人笑道：“佛祖被毁容，怎让你照。”我只好做罢。

石佛脚下斜放一块1.5米长40公分宽的石匾。刻有“移嵩山祖庭大少林禅寺宗派之图”落款为：正統十三年八月吉日立石。上面还有5字一行共14行计70字的经文。此寺因山体滑坡被埋于地下，故此，寺的建筑格局、规模都无从考证，解放后闸沟垫地时刨出此匾，才使人们略知一二。

由少林寺遗址再往上爬到山顶端便是三仙洞了。此山上有四个洞，最里边的两个洞口向东敞开。其中一个洞口顶上嵌有“戒成惠”的匾额。据说明代良乡县有位保镖总督，因官路不畅，屡屡失意，便离开仕途，循入空门，躲进此洞修炼。

另一洞较深，面积开阔，据说灵鹫禅寺正殿修好后，没有佛像，释迦牟尼、药师佛和阿弥陀佛都在此洞供奉，盖好殿从洞里往山下请，开始时多少人都抬不动。有人提醒得进了香，口颂阿弥陀佛之后，才抬下了山，且不觉累。

另外两洞口向南敞开，其中一个最深11米，高约3米，里边有炕和炉灶。相传高桥寺的住持扣留进香美女便通过地穴引到这里过夜。最浅的洞进深仅有4米，高2米。现里面仅存石佛像的残肢断体。

谷积庵遗址在山院的东北部，鞭塔的右上方，座落在一个山场宽阔平坦的台子上。据说当年的庵建得很宏伟，不知在何年代由于山体滑坡覆盖地下。遗址后面山崖根有一眼水洞，泉水依然旺盛甘冽，在遗址前有

一残碑躺在一住户的破墙院中，字迹稳约可见。从碑记中确定为明代正统七年岁次正月十五日立，住持沙门。正文大部分模糊。可确定建筑时代十分清楚。院内还有一盘碾子，碾轱辘立地上，为青玉石制，上面黑绿的纹络图案，象龙飞凤舞。上为青龙腾云驾雾之势，下为金凤展翅翱翔于太空。图象栩栩如生，是件极有价值的文物。

高桥寺

在谷积山院东北爬过山梁之下，建有明代中期的寺院。因寺门前有两崖对峙的深谷建有约 50 米长，3 米宽的汉白玉拱桥，故得名高桥寺。桥横跨南北飞架，十分壮观。遇有白云缭绕，似天宫御带桥，显得特别神秘。

高桥寺原有三进殿宇，建筑形式很考究，红墙绿瓦高大宏伟，古色古香，主殿后壁有高约 5 丈宽 3 丈光如刀削的悬崖耸立，正中雕有三米见方的镀金“佛”字。经阳光照射，光芒万丈，映得四周群山金光闪烁。如在晴空万里的天气站在崖顶可看到天安门城楼。

因该寺地处正中它为上寺，位于它西南的灵鹫禅寺和位于它东北部的戒台寺都为下寺。当年的香火极为繁盛。每年的各种节日都有成帮结队的善男信女前来自香拜佛祈祷许愿还愿。据当地老人讲，清代乾隆年间，因住持作风败坏，背叛佛法。竟在殿前设暗道机关，见有漂亮女子单独来进香，便把她们翻入地下，通过地洞运往三仙洞奸污。后被朝廷得知派黄天霸化装卖花的暗访。事情败露，禀报皇上，皇上说：惊惊他就罢了吧。结果把住持及有关和尚绑到南四位村一块平地上，先用犁耕后又用耙耙了几遍。此后人们把高桥寺改称桃花寺。因名声败落，剩下的和尚都出走了。僧走庙空无人管理，渐遭到破坏。从此昔日的苍桑和古朴便渺无踪影。现仅存遗址上的高桥也已破烂不堪。

在谷积山院中积淀着丰厚的佛教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它可算得上房山佛教文化的摇篮之一，早在大辽时代“司空大师议于谷积山院请众僧侣读大藏”见(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碑文，笔者在此文中做了些肤浅的记叙，以重游补记。

附：

大辽析津府良乡县张君于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

当山疏主崇禄大夫宁司徒通慧大师赐紫沙门守臻□当山提点宣法大师赐紫沙门恒□昔金仙氏在于世也阐扬大法诱导群愚以救拔为怀以慈悲为念久于其化□人兴厌怠之情复归于无示众以寂灭之理自双林入沮之后六百余载而教流于震旦教来而有像像设而有寺寺建而有藏藏置而如来方便之言善巧之说秘密之咒开悟之文于是乎在苜能发心瞻仰稽首归依至乃闻一偈一句者尚获福无量何况延召缙请办设香供年读一藏周而复始无穷之时者其功德限际岂可道哉谷积山院燕之胜概也左临桑水却枕方山千重之林薄荣纒四面之峰峦掩映幅圆数里俨类仙居昼夜六时恒闻梵呗轨仪严整徒侣精勤加以兴善崇胜司空大师怀大提振而主领之由是邑落忻怡檀信归慕顷以善从特市良才于净坊荆彼华经师焜煌之金碧炫间杂之丹青虽绣栴云楣素尽庄严之具而宝函诃轴准兴览阅之心清河张君钿文绚良乡县之绣户也妻田氏皆性钟纯吉名闻乡间家有资靡好奢华之乐身惟积善颇信浮图法越一日谓亲族曰我兴□佛刹□僧徒修植善根集福聚□多矣然于藏曲似阙胜经□启白 司空大师议于谷积山院请众僧侣读大藏经便从今年四月十五日启读之始他时亦然乃将县北公村别墅一所田土园林约近六七顷庄院房舍依旧主佃据所收地利斛粟果实等并无买卷契共壹拾陆道并分付院同常住收附以充逐步刍流蒲塞之费约日落僧徒不怠经课无阙及不别将货卖曲质他后子利无得取蔡苟或歹此取之可也仍刻贞

珉以貽后来者实于院之文绚地噫儿人帑禀盈溢衣食曲足丰不以声色弋腊自娱而张君能去此取彼不难事矣是知富而不奢积而能施义也舍今生爱求过去福智也□身后事立石为约也五常之中而有三焉所谓淑德善人者矣觉京邑居实多余暇因恭褐□司空大师坐次从容话及张君者读藏教给备给资缘以文见托余亦美其为人故不复牢让信笔直书杨君子之风且旌于善道办外孙之字□之于好辞时大康四年岁次戊午四月甲辰朔十五日戊行中书舍人前知营州军州事陈觉题

南吕村张文绚妻田张氏故男□妻□李张氏次孙女贾张氏孙男观音奴□将仕郎守均州泰军张惟白书并篆额河南郡宫士金刻

注：

①据《大元敕赐灵严寺碑》中记载“灵严禅寺初为谷积山院，有石刻辽大康中读纪记，迹其始五代，唐人成中已不知所起止，金迄我朝元统至元二百年有余……”由此可见谷积山院的历史的悠久，至少应创建于唐代。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孔水洞万佛堂

杨亦武

孔水洞万佛堂是房山区一处重要的文物古迹，这里保留着隋唐辽金元明清一千余年间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因而在北京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孔水洞

孔水洞在房山西北的河北镇境内云蒙山麓。西北洞开，清澈的泉水从洞中涌出，东流而去，汇入大石河。洞前依山势筑砖石墩台，中辟券洞，水出其下，清澈见底。洞券面石砌，中雕兽头，左右雕二走龙，券用青石平砌。孔水洞在历代文献中多有记载，洞壁还遗存着隋唐时期的刻经、摩崖造像和金代的题记，极具研究价值。

关于孔水洞的记载，初见于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经注》（卷十二·圣水）：“圣水出上谷……水出郡之西南圣水谷，东南流经大防岭下，岭之东首山下有石穴东北洞开，高广四五丈，入穴，转更崇深，穴中有水。耆旧传言，昔有沙门释惠弥者，好精物隐，尝篝火探之，傍水入穴三里有余，穴分为二：一穴殊小，西北出，不知趣诣。一穴西南出，入水迳五六日方还，又不测穷深。其水夏冷冬暖，春秋有白鱼出入，数日而返。人有采食者，美珍常味，盖亦丙穴嘉鱼之类也。”所谓大防岭下的石穴就是孔水洞，只是当时尚无孔水洞之称。

这说明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孔水洞就已引起世人的关注，并有佛教徒惠弥第一次入洞探险。

到了隋代，佛教徒开始在洞内雕造佛像，刊刻石经。隋郎蔚之《隋州郡图经》：“防山上有仙人玉堂。”那么，大防岭下的石穴在隋代已有了“仙人玉堂”的名字。所谓“仙人”，是指在孔水洞内石壁上雕造的佛像。孔水洞是座天然溶洞，满洞的钟乳石洁白如玉，置身孔水洞如同进入一座白玉宫殿，即所谓“玉堂”。

在距洞口不远处的对面石壁上雕有两龕佛像，左龕内雕一佛二菩萨，左右两侧雕骑牛大自在天各一，龕呈楣拱形，高1.5米，底宽0.65米，龕左右雕八棱形棱柱，柱中腰雕仰复莲，中间坐佛面相长圆，高肉髻，颈部稍长，结跏趺座，座呈弧形，座前正中雕宝瓶，下有二卧石狮，佛旁二菩萨站像下承莲花座，着宽袍广袖，骑牛自在天立像身材修长，手持“丫”形物，从雕像特征和龕内外布局来看，此龕佛为隋代作品，这也和《隋州郡图经》中“仙人玉堂”的记载相符。

右龕内雕菩萨一尊，保存较为完整。菩萨面部丰圆，神态肃穆，左臂下垂，搭于右膝之上，右臂肘部上曲，手指已残断，头戴华鬘冠，宝缒下垂至肩后，头后有楣拱形圆光，刻火焰文，身后有火焰文组成的背光。上部袒胸，盘曲而坐，依稀可见雕刻的衣纹。座上雕复莲纹台基，上作束腰，正面影刻曲颈琵琶乐人一，束腰之上叠涩三层。菩萨像周身肌肉丰实，比例匀称。此龕应为晚唐作品，在石刻下约一米处有隋大业十年(614)刻经：

大小涅槃经倡汝不维生人道□已是第六天我□一□□今
故□道诵人中众□□令当入涅槃汝患□我等唯颠□请佛入住
于世间利益无量众演说颇所无上甘露法□若不请佛我□将不
全是故□□侍□遵师示时纯陀欢书踊跃辟如人父母

通过对刻经的考查，专家认为孔水洞很可能是隋僧静琬的早期刻经地之一，因此对房山石经研究有重要意义。

洞内在隋代刻经位置的右侧尚有金代大定二十年的题记：

山陵北垂□
大房古刹全
佛殿应用线
大定廿年……
吏部尚书驸马都尉乌林答□题
婿曹何西完颜□
疮疽侍行

大房山金陵以三峰山为中心，兆域一百多华里。孔水洞金代题记中“山陵北垂”句，为金陵北界界定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孔水洞古时曾称为“龙泉”，是幽州地区著名的祈雨之所。《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唐玄宗时天雨不节，民祈于是，莫不应征尔。”《大房山投龙壁记》载，唐开元年间，唐玄宗曾遣吕慎盈三次来孔水洞投下金龙和玉壁祈雨。《大房山投龙壁记》碑原立在孔水洞吕慎盈投龙壁处，道光十六年(1836)二月二十四日，该碑和孔水洞的卢襄诗碣被奕绘贝勒用十两银子买走。1982年孔水洞一度干涸，洞内出土了玄宗时吕慎盈投下了的金龙7条，现由房山区文物管理所收藏。

孔水洞幽深莫测，《水经注》首载僧人惠弥篝火探洞耆旧传闻，本是写实。经世俗演绎，成了神话。明清时期，以古人篝火探洞的神话传说为背景，“孔水仙舟”成为房山八景之一。

万佛堂

万佛堂是孔水洞古刹仅存的一座殿堂，原名万佛龙泉宝殿，因殿内嵌有《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所以俗称万佛堂。万佛堂建于孔水洞墩台之上，是一座无梁建筑，通体砖石结构，歇山顶，灰筒瓦，挑大脊，吻兽，叠湿出檐，檐影作檐椽，飞子。正面明辟汉白玉卷门，其上浮雕飞禽花卉卷门顶嵌石额，楷书：“大

历古迹万佛龙泉宝殿”，落款：“大明万历己丑春吉日重建”，石额四周浮雕莲花瓣。卷门两侧各辟卷窗一，透雕网形纹石窗扇。整体雄伟庄重。

万佛堂始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朱希彩布地出资创建，原名龙泉大历禅寺，寺名为唐代宗御赐。创寺时，雕巨幅汉白玉浮雕《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嵌于孔水洞上端的石崖上。禅寺创建后，经“辽末烽火，宋朝兵革，皆为灰烬”。此后，海慧禅师将寺院修复。后该寺住持僧为玄觉禅师，他是著名僧人枯木的嫡传。玄觉过世后，其弟子龙溪奉官府指令，接任住持。不久，“干革四起”，寺院“廊庑一灰，唯余正殿一所”，龙溪退居燕京十方圆明禅寺。战事平息，他回到此地，决计重修捐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又向社会募捐。五年以后重建完工。寺院落成后，燕京十方圆明禅寺派出德印、德松、德彻十余位僧人随龙溪到龙泉大历禅寺居守。

元末该寺再度毁于战火。明初分封功臣把寺所在的云蒙山赐给了开国元勋英国公张辅，张辅弟文安伯张貌将孙女悟兴舍为开山住持，于是该寺始由比丘尼住持，悟兴修复了毁掉的寺院，改称“大历万佛龙泉禅寺”。成化二年(1466)，房山太平里(今房山区崇各庄乡)谢家，将七岁的幼女舍与大历万佛龙泉禅寺为尼，法号真通。这是该历史上可考的唯一一位房山籍人。真通长大以后，与徒常喜协力重修，历时十余年，此番修寺，在孔水洞西北侧修建了天王殿、伽蓝祖师殿、天妃圣母殿以及增福土地、五山药师殿，左右建有僧室、客楼、廊庑、庖厨等。又将孔水洞内的两龕隋唐时代的石佛涂饰了金粉。

唐大历年间雕制的《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历时千载；部分嵌石脱落，已残损不堪。于是又在孔水洞上建万佛龙泉宝殿，将《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残部从所嵌山崖上取下，连同脱落部分一同组嵌于万佛龙泉宝殿内的后壁和左右两山，就是现在的样子。明万历十七年(1522)，万佛龙泉宝殿曾经修葺，直到现在。

《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长22.8米，宽2.4米，由31块长方形汉白玉石浮雕而成，堪称浮雕艺术珍品。主题浮雕是释迦说法的场面。浮雕中央，释迦端坐说法，神态肃穆，螺髻袒胸，宽袍广袖，右手平举伸掌，左手自然放于腿上，双膝下垂，赤足，脚下置二夜叉与摩尼珠。释迦两侧雕骑狮文殊、骑象普贤，二菩萨均著宝冠，缨络飘带，其前后有供养菩萨、天王、神人和鬼众簇拥，长幡飞扬，云浪翻滚，背后衬托着苍茫的海水，庄严有力地突出了“万菩萨法会”的主题。释迦之上，另嵌一石，雕护法转轮王神像，护法转轮王背生双翼，裸体，手持缨络，满腿鳞纹，足踏二龙女。

浮雕周围，雕万菩萨供俸人侍佛者等层列。有的合掌拱手，有的献花荐宝，形态各异。有冠者、髻者、垂髻者，万头攒动；填满山川云气之间。南山墙伎乐天一组浮雕尤为精美，天人持响板、排箫、箜篌、琵琶、阮咸、瑟等乐器作弹奏状，姿态各异，错落有致，组成一支阵容庞大的乐队，飞动流畅的线刻，使人如闻丝竹声。

南山墙浮雕尚残存着唐大历五年三月八日发愿文已模糊不清。

《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是在创寺雕造的，那么这则纪年便成研究万佛堂古刹始建年代的唯一纪年依据了。

清代以后，寺院再度易尼为僧，并将寺院改为关帝庙。嘉庆九年(1804)十月，寺僧曾重修关帝庙，于佛殿前建关帝庙三间，左右各建禅室三间。关帝庙无存，只余西禅室三间。

孔水洞万佛堂北侧还有一座建于辽代的花塔。单层亭阁，由青砖砌筑而成，通高约30米，造型十分美观。塔下部的须弥座上部雕制出斗拱和平座栏杆。塔身四正面设拱卷门。门两侧雕佛、菩萨、天王力士像。其余四面用砖雕直窗。第一层塔身，出跳斗拱以托塔檐，檐上有斗拱平座，以承托巨大的圆形花簇状塔身。花束状塔身非常高大，几乎占全塔高度的二分之一，以七层小塔龕和狮象等相装饰组成，最下一层塔龕为单层亭阁小塔。塔顶冠以八角形小阁式塔刹，以宝珠结顶。此塔属于早期花塔(我国仅存十余座花塔)，是北京地区仅存的两座花塔之一，其外观雄浑壮丽，造型优美，浮雕内容丰富，是难得的珍品。孔水洞万佛堂前，

有密檐一座，名龄公和尚塔，建于元代。七级密檐式砖结构，通高约 15 米。须弥座上以三重串珠相间的仰莲承托塔身。第一层塔身八隅施抹角方柱，下承复盆式柱基，檐下施云形垂帐。正面与南北西三面辟券形假门，其余四面辟方形假窗。门楣呈半月形，上雕乐神、缠枝莲等纹饰，正门楣嵌汉白玉一方，其上双钩阴刻“龄公和尚舍利塔”铭文，其余各门楣雕饰缠枝莲。由于年久失修，均有不同程序的残损。1991 年市文物局拨专款修缮，于 1995 年 10 月告竣。

(《房山文史资料》第 11 辑)

房山石经与名人书法

田福月

房山石经始刻于隋大业年间(605)。历经唐、辽、金、元、明末清初方告结束。房山石经内容广泛，不但弥补了久已失传的佛教经典，还为我国书法艺术的演变提供了珍贵史料。早期的刻经及题记主要出自开山静琬之手，如《雷音洞内妙法莲华经》、《大隋大业十二年佛舍利储藏记》、唐武德八年残碑、唐贞观二年、贞观八年题记等。从石经整理看，并没有发现历代一些书法名家为其写经留名，大部分出自僧人之手。1987 年 8 月 15 日，在清理行宫院遗址时从渣土内发现了 27 块碎碑石。大的 10×10 公分，小的 6×6 公分，后经研究人员从字中发现了孟頫二字，经鉴定与赵派书体吻合，确是元代赵孟頫撰写的石碑。赵孟頫(1254—1322)，书画家，文学家，字子昂，号雪松道人。湖州人(今浙江湖州)。传世真品有《重江迭嶂》、《东洞庭》、《秋郊饮马》。今存碑刻及真迹较多。

此碑碎成多块的原因有二：1、云居寺行宫毁于战火(可能被火烧碎)；2、很可能在(明、清)兴建行宫砌墙垫了基础，不管什么原因，赵孟頫撰写的石碑给云居寺增添了元朝史料(碑碎石存于库房)。

1214 年以后，蒙古军队南逼金中都，金、元在幽燕一代交兵不绝，破坏深重，石经山在劫难逃。延祐二年(1315)，元臣明星董阿游石经山，见寺内僧徒无经可读，奏请圣上赐大藏经一部。石经山现存元代史料稀少，表明这里元朝处于衰败时期。

明朝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期间，一些南方居住在北京城内的官僚、居士如赵琦美、包士杰、谢兆中、陈大仪、冯铨、葛一龙、董其昌等人在北京城内石灯庵刻《四十华严经》14 部，共大块石经 200 余条，运往石经山下，待四月初八日(浴佛节)庙期间，会同游人、香客、善男信女们一同送上山，在雷音洞旁辟一小洞藏之。由董其昌亲题“宝藏”二字嵌于石壁。

董其昌(1556—1636)：明代书法家，字立，号思白。松江华人(今上海松江)。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奄人请书翰者，一切谢绝，故得免于党人之祸。其书法超越诸家，独创神妙，四方金石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云居寺自董其昌题“宝藏”二字后，一千多年的刻经事业宣告结束。

(《房山文史资料》第 11 辑)

作者系原区文化文物局干部

开发云水洞

段汝连

上方山的云水洞是北方著名的喀斯特地貌溶洞。明、清以来的古籍中多有该洞洞内景物和游人在洞内游览的记述。但在1980年以前，云水洞基本处于原始状态。

1979年底，县长吕镒找到文化科长王建忠到县革委办公室，研究云水洞开发问题。当时我在文化科负责业务组的工作，也参加了会。这次会定下了三件事：第一，县里决定开发云水洞，初步计划投资12万元，第二，上方山由林业局划归文化科领导；第三，云水洞开发由文化科负责，立即派人到桂林七星岩考察，年初拿出方案并负责实施，1980年“五一”开放。会后王建忠责成我具体联系到桂林考察事宜。经过当时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白儒铎同志介绍，取得了市科办陈省耕副主任的支持。在与桂林市外办联系后，对方同意接待。

1980年1月初，文化科由李荣光、崔宝华和我组成赴桂林考察小组，经革委会办公室张本荣主任同意后起程。在桂林受到了市外办的热情接待，住在漓江饭店，桂林市外事办派秘书科长洪朔进同志陪同考察。我们先后对七星岩、芦笛岩、漓江、杨溯等处的旅游开发、设施、导游、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学习考察。当时桂林的旅游事业已具相当的规模。这次我们重点考察了芦笛岩的洞内照明电器设备和导游，与有关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座谈，收获很大：一是开发云水洞心里有底了，二是开阔了眼界，学到了不少旅游、管理方面的知识。

考察归来后，结合上方山云水洞的实际情况和资金情况在王建忠的主持下，拿出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扩大原来洞口，使原来只能爬行才能进洞的洞口走道，扩展到2米高，使游人能立身行走进洞；接通山上电源解决洞内照明，修整兜率寺至云水洞的人行道；培训导游人员，撰写导游词；把退居庵五间北屋修缮改装为临时客房；增加饮食设备，解决游人在山上用餐饮水问题。方案经领导审定后，2月份就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原有上方山造林队改建为管理处；高金祥任主任，李荣光任副主任，张希武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洞内和山上工程。崔宝华和冠述饶负责洞内电器安装技术事宜，我负责导游词的撰写。整个工程在区有关部门，特别是在房山供电局、房山公路管理所、岳各庄公社和圣水峪大队等单位的支持下，进展顺利。到4月底各项工程基本完工。4月28日下午5点洞内各景观的彩色灯光开通后，顿时大放异彩。这个山洞由于这次开发建设脱离了原始时代，第一次以旅游景观的形式展现给世人。经过县里领导检查、验收，都比较满意。

1980年“五一”节期间，上方山云水洞正式开放，一时轰动京郊，报纸、电台、电视台争相报导。这一年上方山旅游收入达7.8万元。添置了一套有限广播设备，购买了一辆“南京嘎斯”卡车。这一年，房山县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旅游开放点。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上方山的植物景观

王国富

上方山以“南有苏杭，北有上方”而著称于世。由古寺、奇峰、异石、林海、飞瀑、云雾等景致构成。奇景、胜景遍布园区。

放眼望去，上方山茫茫林海，峰峦叠嶂，郁郁葱葱，有水皆清，万壑鸟鸣。春花如潮，夏日滴翠，深秋红叶，冬披银装，使人心旷神怡。

上方山是座珍奇的植物宝库，也是北京地区乃至全国特有的生物基因天然宝库。上方山古木参天，共有一级古树名木24株，二级古树181株。其中千年古树有“四大王”，各显风姿，独领风骚。如柏树王，胸径1.52米，高28米，1500年；松树王，胸径1.1米，高29米；槐树王，胸径1.3米，高27米；银杏王，胸径1.11米，高28米。另有七叶树，胸径0.84米，高20米，1200年；“拧丝柏”、“一龙缠九柏”也以其独特风韵使人们争相观赏。

松柏林景观形成了上方山森林公园景观的主要特色。油松主要分布在阴坡，柏树主要分布在阳坡，有的成团状分布，有的生于悬崖之上，形态各异，风韵有别。特别是在摘星垞与飞来峰后，北坡一带油松林，茂密葱郁，环境优美。是游人休息、野营的好去处。

上方山早春天气渐暖后，腊梅最早迎人怒放，柳梢泛绿，杏花飘香，桃花灼灼，野花丛丛，遍布山峦，生机盎然，引人入胜。

上方山夏日苍翠欲滴。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里说：“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上方山的夏秀景色，无暑气逼人，是娱乐的好去处。当你来到上方山，会感到曲径通幽，水流曲曲，树木重重，树里青山一两峰，你会理解到我国著名园林学者陈从周先生的话：“山不在高，贵有层次，峰岭之胜，在广深秀。”当你来到一斗泉庵时，会体会到“门前悬瀑流，半空白皑皑”。雨后的上方山，会使你看到：“雷声千峰落，雨色万峰来，腾空似涌烟，密雨如散丝”。

霜降之后的深秋季节，山中的枫树、黄松、橡树、柿树、槭树的叶片有红色、绛红、粉红，象人工涂染一般，令人难忘，其景色之美可与香山红叶相比，毫不逊色。如《上方游记》所写：“一林秋叶染天工，夹绿编黄染血红，唯柏不随清露改，依然翠滴冷霜风。”峰峦盈金，秋果累累，银杏黄，柿果红，松柏翠，奇峰怪石，景色相映。

冬披银装。巍巍群山，苍松翠柏顶白冠，枝条洁白冲天举，翠柏叶依然绿不改木色，英姿耸立，气势雄伟，上方山披银装，独具特色，是冬季林景绝妙处。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琉璃河馆壁题诗记

赵思敬

清代文士褚人获，留心街谈巷议，钟情文史掌故，著有《坚瓠集》十四卷，所述轶闻奇事令人拍案。书中有《琉璃河馆壁诗》一章，记述了清朝顺治初年，长沙女子王素音在琉璃河馆驿墙壁上题写的三首诗，一时间，许多文人墨客专程拜读，和诗满壁。王素音原诗如下：

—

愁中得梦失长途，女伴相携听鹧鸪。
却是数声吹去角，醒来依旧酒家胡。

二

朝来马上泪沾巾，薄命轻如一缕尘。
青冢莫生殊域恨，明妃犹是为和亲。

三

多慧多魔欲问天，此身已判入黄泉。
可怜魂魄无归处，应向枝头化杜鹃。

读了这三首绝句，孤苦零丁的王素音仿佛就站在眼前，向人们诉说着她悲惨的遭遇。她之所以从长沙被裹胁到良乡琉璃河，这还得从历史大背景上寻找原因。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纷繁复杂的一年，这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皇城的武英殿即位，第二天便退出北京城，至五月三日，清摄政王多尔袞统帅清兵入城，以满州贵族为统治的清朝开始主政北京。至十月三十日，顺治帝亲至南郊，行定鼎登基礼，向天下宣布：“告天即位，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此后，清廷便出兵与李自成和南明朝廷作战。据史料记载，清军入关后，驻守长沙的明朝左佥都御史何腾蛟，便招抚大顺军余部盟誓抗清，还同前来围攻长沙的李自成残部刘体仁、郝摇旗等人携手合作。但不幸的是，何腾蛟后来被部下徐勇出卖，以身殉国，长沙终于落入清军之手。王素音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徐勇献给清军的。琉璃河为南北交通要道，是通往北京的必经之路。在这里，王素音有机会寻来笔墨，把自己的身世和遭遇以及一路愁苦倾诉于笔端。

褚人获叙述：“顺治初，有长沙女子王素音，题良乡琉璃河馆壁诗并序”：“妾生长江南，摧颓冀北。豺狼当道，强从毳帐偷生；鸟鼠同居，何啻将军负腹。悲难自遣，事已如斯，因夜梦之迷离，寄朝吟之哀怨。嗟乎！高楼坠红粉，固自惭石崇院内之妹；匕首耀青霜，当誓作兀术帐中之妇。天下好事君子，其有见而怜予乎？许虞侯可作，沙叱利终须断头陷胸；昆仑客重生，红绡妓不难冲垣破壁。是所愿也，敢薄世上少奇男；窃望图之，应有侠心怜弱质。”

这篇序文，把王素音的身世、处境、思想合盘托出。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如今却与“鸟鼠同居”，这是怎样一种生活啊，等待她的结果，也许就和“青冢”中沉睡的王昭君一样，埋骨他乡。在清军眼中，她只不过是一件玩物而已。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奇男”来搭救自己，那真是她“所愿也”，只可惜，这个良好的愿望就象天上的明月一样，可望而不可及。

王素音在琉璃河馆驿粉壁上题诗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人传抄，也有人奉和。一时间和诗甚多。褚人获的叔父苍书，得知这件事后，写下了两首和诗，读来气氛悲怆，令人回肠。诗作如下：

—

楚山行尽总征途，谁向黄陵唱鹧鸪。
烟火不禁愁日暮，江乡还忆煮雕胡。

二

红泪模糊白练巾，封侯夫婿满头尘。
弓刀队里羊裘畔，只共题愁笔墨亲。

新城人王阮亭也有一首伤离怨别，感情真挚的小令《调寄减字木兰花》，其词如下：

离愁满眼，
日落长沙秋色远。
湘竹湘花，
肠断南云是妾家。
掩啼空驿，
魂化杜鹃无气力。
乡思难载，
楚女楼空楚雁来。

康熙年间的博学鸿儒，工诗及骈体散文的陈维崧，在其《妇人集》中说：“长沙女子王素音为乱兵所得，题诗古驿云云，见者莫不怜之。”他还记下了在乙未年(公元1655年)，有一位叫“阿貽”的人，带领两个仆人专程到琉璃河馆驿去寻找王素音题诗，当他们“觅原题不得”时，经询问，有人“指墙边积木堆五六尺许，云在此中墙壁上”。于是，三人便将木移出，终于见到了王素音的题诗：“素音原诗共三绝，前有小序，是俚语，凡二百许字，其精丽可与琅玕女子相敌。”如果这首诗题写于顺至四年的话，那么，此时的“己未年”，已是顺治十二年。其间已过八年，八年间，题诗还完好地保留着。可见，这三首诗已经流传很广了。俞陛云先生在《清代闺秀诗话》中说，以诗文著称的文学家王士荪(字渔洋)生有和作：“王渔洋闻(王素音之事)而伤之，赋《减字木兰花》词云云。三难女中，其横遭厄运同，而文藻则素音尤胜。当弥天烽火，红颜之沦落者，不知凡几。不仅徐中山王弟之娇女，被军府一鞭驱走，为梅村祭酒所悲也。”从俞陛云的叙述中，得知王渔洋也曾有词和王素音，词牌为《减字木兰花》。

王素音的题壁诗和因此而产生的和诗和轶事，肯定还有许多。这对研究明末清初的社会风情和琉璃河古镇的奇闻轶事，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参考书目：

- 1、《笔记小说大观·坚瓠集》
- 2、《清诗纪事》
- 3、《兵家必争之地》
- 4、《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 5、《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
- 6、《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
- 7、《阅读和欣赏·古典文学部分(三)》
- 8、《中国女性文学史话》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琉璃河石桥

杨亦武

輿梁溯源

琉璃河石桥座落于房山区西南部与河北省交界处的琉璃河镇。该镇镇北有河流一道，古称圣水，今名大石河。大石河发源于房山区与门头沟区交界的百花山小寒岭，下游从窦店镇地界到琉璃河镇界一段当地称琉璃河，琉璃河石桥横跨于镇北河道之上，是一座多孔石桥，桥身长165.5米，宽10.3米，高8米，有桥孔11，中拱最大。拱券正中雕有精美的兽头。桥身全部用巨大的方石砌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桥面两侧树有石望柱88对，柱与柱间有石栏板，全桥计178块。栏板长1.65米，宽0.80米，厚0.28米。望柱和栏板上雕刻着海棠线等纹饰，古朴简洁，确实大方。桥面以条石平铺，条石衔接处嵌以“银锭扣”，异常坚固。琉璃河石桥建于明嘉靖年间，是首都北京南下途中的第二座古代石筑桥梁，它的北面便是闻名中外的卢沟桥。

据民国十三年(1924)《良乡县志·輿地志》称：琉璃石桥“为朝宗孔道，四会轮蹄；北望芦沟，双虹对跨，诚京南要隘也。”说明了琉璃河石桥的宏伟壮观，以及在我国古代对沟通南北交通的重要作用。

琉璃河石桥地处交通要冲，衔南交交通于一线，自古以来就是北京地区通往中原、江南以及晋陕地区的门户。远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琉璃河北岸乃是燕国都城所在，从燕都遗址出土的众多殉葬车马来看，当时这一带的交通已十分发达。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翌年(前220)治驰道于天下，其中咸阳至碣石(今河昌黎西北)驰道北段即穿越琉璃河。汉唐以来，北京历来为北方重镇。辽金以后，北京为历代国都所在。可见琉璃河的桥梁史该是相当久远的。

据文献考之，金代琉璃河上就架有桥梁，金元之际琉璃河桥毁于兵燹，元定都北京后曾再度修建琉璃河

桥：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作《琉璃河》诗^①：

烟波葱茜带回塘，桥影惊人失睡乡。

陡队褰帷揩病眼，琉璃河上看鸳鸯。

范成大是南宋著名诗人，他是于南宋乾道六年也就是金大定十年(1170)^②，假借资政大学士的官衔出使金国时途经琉璃河的，诗中所述乃是在琉璃河之亲历。从诗中描绘的情景看来，当年范成大应在琉璃河小憩，而琉璃河上“惊人”的“桥影”竟然使这位使节“失睡乡”。可见，在八百多年前的金大定年间，琉璃河上已有桥梁。

元初，王恽曾呈《请起盖良乡县留李河桥事状》^③(留李河乃琉璃河的别称)，《状》曰：“窃见中都迤南，系四方官员客旅朝会经行驿程正路。……有旧来经由留李河桥道，……兵革以来，桥废不行。”建议“依旧起盖留李河桥道”。这表明，金末琉璃河桥尚存，后来在金元交战中毁废。

元初的一段时间，北京沿袭金代故称仍名：“中都”，世祖至元九年(1272)二月，改“中都”为“大都^④”。王恽《状》既称北京为“中都”，则此《状》呈递时间不应晚于至元九年(1272)二月，又王恽《状》尾：“伏请御史台备呈中书省行下相视，改正施行。”据《元史》王恽传^⑤，“至元五年，建御史台，首拜监察御史，……九年，授承直郎、平阳路总管府判官。”那么，王恽呈《状》建议修复琉璃河桥，应在至元五年到至元八年他任监察御史的一段时间内。

元世祖于至元四年(1267)正月下令在中都建大都城，为迁都大都做准备。当年四月，新筑宫城。至元五年(1268)十月，宫城落成，至元八年(1271)，始建大内^⑥。随着大都城建设的加快，迁都的日益迫近，修复“四方官员客旅朝会经行驿程正路”的琉璃河桥，以便使未来都城大都南下路途畅通无阻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背景之下，王恽的修桥建议顺应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政治需要，因此被采纳施行，这从历史文献中可得到证实。

宋文天祥《过雪桥琉璃河桥》^⑦：

小桥度雪度琉璃，更有清霜滑马蹄。

游子衣裳和铁冷，残星荒店乱鸣鸡。

文天祥是南宋丞相，南宋末年与张世杰、陆秀夫等抗元，至元十五年(1278)兵败被俘，至元十六年(1279)被解往大都^⑧，琉璃河正当其大都途中。这时的琉璃河，有桥梁供行人往来。可想而知，元世祖迁都后，元人确曾修复了被战争摧毁的琉璃河桥。而元代的琉璃河桥当毁于元末战火。

明代的琉璃河石桥

现存的琉璃河石桥始建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是年明世宗到南方巡视，驻蹕于琉璃河北岸的良乡行宫(故址即今琉璃河中学)，亲眼目睹了因琉璃河无桥可渡，过往行人艰难渡涉的情景，遂决计修建琉璃河桥。巡视归来，世宗即命工部尚书甘为霖督修，桥尚未建成，甘为霖称病去职。嘉靖二十四年(1545)，世宗又命工部侍郎杨麟、内宫监太监陈准、袁亨督修。嘉靖三十二年(1553)，琉璃河石桥竣工。

琉璃河石桥基非常巩固，当年建桥时，用巨大的条石一直砌至河底深处，石基下密密麻麻地凿垫着柏木桩，以防石基下陷。民国十三年(1924)《良乡县志·建置志》载：“巨石砌至水底，其下柏桩栉比，巨马、卢沟未必有此巩固。”

石桥建成后，由于两岸地势低洼，每逢夏季洪水暴发，石桥南岸和北岸都被洪水包围，激流滚滚，难以渡越。世宗得悉此情，于嘉靖四十年（1561）十一月拨银八万两，命工部尚书徐杲继续琉璃河石桥工程，以彻底解决琉璃河水患造成的两岸交通阻隔。徐杲受命后向世宗建议，在石桥两岸低洼地带用条石各筑路堤一道，与石桥相连，以提高两岸的路基，为了减轻洪水对石桥和路堤的冲击，在路堤上增建小石桥一座，并于堤间设水沟以泄水势。徐杲亲自设计，勘画图纸上呈世宗，世宗采纳了徐杲的建议，又委任郎中王尚直、员外郎曾一经同内官监太监杨用分理修建路堤事。工程进展顺利，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告竣，历时一年。依照徐杲的设计，以条石铺设路堤两道，一堤自石桥北端铺设到刘李店村，一堤自石桥南铺设到琉璃河镇内大街南口，路堤平坦如砥，全长1660米，宽19.8米，平地起3.4米，俗称“五里长街”。在桥北路堤中段建独孔小石桥一座桥长15米，宽11.4米，高4.5米。路堤间又建水沟八道以泄水。工程竣工以后，遵照世宗的旨意在石桥上建石坊二座，一曰元恩，一曰咸济^①。这次工程，确实彻底解决了因琉璃河水患造成的交通阻隔，直到四百年后的今天，京（北）—石（石家庄）公路从琉璃河石桥通过，仍然以徐杲所建路堤为路基。琉璃河石桥工程从嘉靖十八年开始，到嘉靖四十一年路堤竣工，三委督员，历时二十三年之久，反映了此项工程的艰巨。琉璃河水深流急，两岸地势低洼，加之雨季山洪泛滥，施工艰险难已想象。故甘为霖工半而病去，杨麟、陈准、袁亨成其桥而未善其事，直到徐杲精心筹划，增铺路堤，才最终成就了这项垂世不朽的工程。

明万历时，由于历年洪水冲击，琉璃河石桥南侧有三孔塌陷，石桥两端的路堤或冲断或残损，桥路断绝不能通行。神宗皇帝获悉，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冬，拨内帑动工抢修，神宗母慈圣太后也出资相助，后来资金不足便派出军队参加施工，万历三十年（1602）春，石桥和路堤修复完毕。并于桥北建神祠一座，祠前凿井一眼，以济过往行人渴饮之需^②。这是琉璃河石桥的第一次重修。

琉璃河石桥的第二次重修，是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是年夏，连日大雨，山洪暴发，异常汹涌，将石桥冲断二十余丈，交通中断。地方官员上奏朝廷，清廷即拨巨款，命直隶总督李鸿章派员监修，年余竣工^③。此后至今，琉璃河石桥久历洪水，从未圯断。

琉璃河石桥外观壮丽，设计独道，堪称北京地区古代桥梁建筑典范，充分体现出建设者的聪明才智。

燕谷长虹

琉璃河镇，旧称燕谷店，古为良乡县境。镇北的琉璃河，两岸风光秀丽，明嘉靖年以后，一座壮丽的石桥横于烟柳岸间，架于碧波之上，石桥两端石堤耸延，连绵五里，远远望去，如雨后初晴时飞落而下的一道长长的彩虹，成为一大景观。明隆庆三年（1569）良乡县知县安守鲁创修《良乡志》时，把琉璃河与琉璃河石桥列为“良乡八景”之一，名为“燕谷长虹”。

佚名《燕谷和桥》^④：

百里皇华路，畿南第一桥。烟霞迷泽国，风雨度星轺。
倒影波中印，垂杨画里摇。乍惊虹一曲，晚霁出云霄。

吕植《创建琉璃河輿梁碑记》^⑤：

琉璃河……澄清澈底，朗若琉璃，……有桥跨其上，扬帆而至者，开窗西望，状类飞虹。……一水空明帆檣云集；沿岸商贾，楼阁参差；马骤车驰，征途络绎，桥横晴絮，天然一幅画图。

琉璃河与琉璃河石桥早已汇入房山古老的历史文化，在前人的诗文中，回眸昔日风光，难免触发怀古之

情，而琉璃河下游数里处凌空飞架的(北)京—石(家庄)高速公路桥，令人感叹今人的创造。今天的历史是昨天的创造，而今天的创造将成为明天的历史。

注：

- (1) 清于敏忠《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三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
- (3) 清于敏忠《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三
- (4) 《元史》卷六
- (5) 《元史》卷一百六十七
- (6) 《元史》卷六
- (7) 清于敏忠《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三
- (8)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版《辞海》历史分册
- (9) 明嘉靖创建石桥修建路堤事，据清于敏忠《日下旧闻考》、明雷礼《琉璃河路堤记》
- (10) 明万历修桥事，据清于敏忠《日下旧闻考》、明沈一贯《琉璃河桥碑记》
- (11) (13) 清光绪修桥事，据民国十三年(1924)《良乡县志》卷二
- (12) 民国十三年《良乡县志》卷八
- (13) 民国十三年《良乡县志》卷八

(《房山文史资料》第 12 辑)

曹锟别墅及其它

张玉泉

民国初期，我区西北山区都留下过军阀或名人的足迹，他们或建别墅或开矿或派人来剪辫子。本文记述以下几件事：

曹锟别墅

曹锟生于 1862 年，逝于 1938 年。字仲珊，天津市人，布贩子出身，后入北洋武备学堂学军，毕业后曾为袁世凯训练新军。北洋六镇成立后任北洋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和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等职。1923 年国会选举大总统时，他以五千元一票的高价购买国会议员 590 人而获选。1924 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把他赶下了台，以后退居老家天津，直至病故。

曹锟别墅坐北朝南，依山就势而建成的两进院，上层有五间大北房，两旁卧室、中间客厅。有东西厢房各两间，一侧为厨房库房；一侧住护卫、厨师；下层院为三合房，看护别墅的人所住。上、下层院间有 40

级台阶连接，十分陡峭。上、下院内都有粗细不等的家槐等树。上院中还有石桌石凳，供在院中乘凉之用。别墅北墙外的山包，叫旗杆山，因山顶竖起一杆杏黄青龙大旗而得名。平时在此护院的头头姓刘，是曹锟手下的副官，也是他天津的老乡，曹锟赐他一匹枣红马、一根黑红棍，骑在马上，十分威风。

曹锟给这座别墅起名叫黄金山。1939年一架侵华日军的飞机在此失事后，日军蹿入村内，把曹锟别墅及百姓的四、五百间草房全部化为灰烬。从此这一人文景观便消失了。

杨小楼别墅

在史家营乡柳林水村北的莲花山上曾有一处民国初年建的道观，名曰蟠桃宫。宫内东北角有座绿荫覆盖的三合院，叫杨家三合小院，是著名的京剧武生杨小楼的别墅。

小院占地三分，坐北向南。北部有一道高高的山崖做屏障，西部崖缝中有泉水流淌，东部缓坡上有成片的草木、野花。山青水秀，环境很优雅。小院有三间北房，东西各有两间厢房，均为灰石结构。北房原是两层楼房，1937年旧历3月3日在下层供佛烧香时失火烧毁。别墅由杨小楼出2.5万大洋，经蟠桃宫道长蔡义先组织施工建成。失火后，杨小楼又掏一万大洋拆掉小楼，重建三间北房。

杨小楼别墅以及蟠桃宫建筑所用砖、瓦、沙、石、木材，均由蔡老道雇用柳林水村民肩扛人背运上来的，每百斤给三铜子(当时380个铜子才换一块大洋)。1928年以后，杨小楼携家眷在此处小住过一段时间。现别墅尚存残垣断壁。

剪辫子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封建帝制的结束。

1916年春天，周口店西北车厂村街头锣鼓喧天，管号齐鸣。村民们涌上街头把鼓乐队围得水泄不通。这乐队共20余人都是小伙子，身穿浅绿色的服装，只有七、八个人手拿鼓、号等乐器。百姓们观看演奏兴致正浓时，响声嘎然而止，站出一个小伙子大声嚷：“老乡们，现在是中华民国，不是大清啦！大家不要辫子啦！”喊完后，原来空手的十多个小伙子立刻掏出剪子，站到围观青年的身后剪起来了，不大工夫，二、三十个人的辫子被剪掉了，有的抱着脖子来回躲闪，保护辫子。村内有个20来岁的小伙子名叫高黑子，大高个圆脸盘儿，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再加上那条乌黑闪亮的大辫子在背后飘洒，显得十分漂亮。他从14岁就留起了辫子，一说剪辫子，他捂起后脑勺就跑，再也不敢围观了。还有的因躲躲闪闪只剪了半截。一年中，剪辫子队先后进村三次，一共剪了不到80人。人们不让剪辫子，一方面是多年留下的传统习惯，再有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留着辫子不好混，小留辫子怕张勋”(张勋为清末将领，清朝被推翻后仍留长辫子，以示效忠)。

段祺瑞开煤窑

辛亥革命后至1920年，段祺瑞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期间，曾在京西开了不少煤矿。光在车厂、长沟峪购买矿山就达3540多亩，同时开几个煤窑，统称为大丰公司。其中周口店车厂小窑是开的矿之一。该煤窑实行产运销一条龙。窑口上方的山厂中盖有30多间石头房子，一门两窗，是矿工的住所。小窑的伙计叫李中，是本村的财主(窑主是段祺瑞手下军官名叫付良左)，整个煤窑交给伙计经营。

村东北的山下有一条小铁道，紧连山下面的站台，站台占地0.6亩，为长方形，长约50多米，宽约40米，距窑口里许。拉出的煤，用驴、骡、骆驼运到站台，装上小火车，一次可运十多吨，直到周口店的

西侧煤厂。据《房山县志》载：“铁路未修以前，不过小本经营而已，而今车站旁商业林立，从前运往琉璃河上船之货如今铁路运行。商业竞争资本家多注意开此。”煤栈用铁丝网围上，院内有石头楼房一座，供工作人员办公住宿。

该公司设有警察所，有警察 12 人。主要任务是保卫大丰公司的一切设施和生产、运输、销售的顺利进行。

段棋瑞的大丰公司一边生产，一边凿洞，在小矿附近向南窖凿一条山洞，凿通后可把南窖的煤从这里运出装入火车。可节省百倍的运力。同时从煤矿到货站准备安装索道运输。洞刚打了百余米，索道尚未动工，段棋瑞便被赶下了台，大丰公司也结束了它的使命。据《房山县志》载：“轻便铁路由周口店车厂村运自大丰煤矿之煤。后因开采不盛兼时局有关遂至无形停止……”

(《房山文史资料》第 12 辑)

云居寺石经的发掘、收藏与研究

段汝连

1956 年，中国佛教协会为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对房山石经进行了全面调查、发掘和拓印，到年底始告完成。中国佛协的黄炳章先生自始至终在石经山和云居寺地穴现场主持了发掘和拓印的全过程。

石经的发掘和拓印

1956 年 3 月 12 日开始在石经山上修建工房和工棚、筹划发掘拓印的准备工作。4 月 21 日周叔迦副会长和北京图书馆金石部曾毅公先生亲临现场，首先启开第三洞洞门，搬出经版，开始拓印。对山上的九个藏经洞按近代发掘处理办法进行编号：下层从右侧起编为一、二号；上层自右侧起依次编为三——九号。拓印工序是：从洞中抬出经版，抬到工棚平放，洗刷干净，编号并注明洞号再行拓印，然后放回原洞内。这次发掘九个洞共得完整经版 4196 石。洞内残石 363 块，洞外残石 419 块，总计 4978 石。每石拓印七份。山上各洞全部石经拓印工作于 1957 年年底圆满完成。

云居寺地穴的石经发掘拓印工作从 1957 年夏天开始。地穴的石经发掘不同于山上，在山上九个藏经洞，洞门明显，只须启开洞门，石经版即可取出。而云居寺地穴的石经深埋地下，具体位置并不十分明确。有两则文献资料对石经的发现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则是天庆八年志才撰《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载：“……至天庆七年于寺内西南隅穿地为穴道宗皇帝所办经大碑片，通理大师所办石经小碑片，皆藏地穴之内，上筑台砌砖，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知经所在”。另一则是天庆七年《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载：“至大辽天庆七年已铸造了经近三百帙，秘于东峰满八石岩。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释迦舍利塔是一座十三层密檐砖塔，于抗日战争期间为日本军队所毁，仅存塔基，杂树丛生。1957 年 8 月 1 日，周叔迦副会长和北大考古系闫文儒教授来到云居寺遗址，指导发掘工作。先清理塔基，到 8 月 6 日塔基已全部显现。沿塔基东、南、北三面各掘一道探沟。塔的西面为山崖，

无需开掘。8月7日下午，南面探沟左端发现经版。经全部发掘得知地穴南北长1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地穴分南北两部，北部占三分之二，南部占三分之一，两部之间有1米厚的土墙相隔。整个地穴藏经一万零八十二石，比文献记载数目要多。拓印工作仍依山上办法进行，到1958年底全部完成。

地穴石经的收藏

地穴石经拓印后，没有回归地穴原处。原计划在山上开凿石洞，地穴出土经版全部运到山上保存。后来鉴于山洞内石经容易风化，市文化局决定在地穴遗址东面建造了四十间石经库房，地穴出土石经全部入库保存。配备一名专职人员，由市文化局开支，周口店区(房山县)政府文化科代管，这个单位就叫“经版库”。

经版库比较简陋，砖木结构，四十间库房围成一个四合院，南北屋各十一间，东西屋各九间，大门开在南屋中央的三间，一间大门，东西各一间门房供工作人员食宿办公之用。库房地面是泥土未经硬化，经版分二至三层立面朝上并排码放。经版库的用电是从附近部队营房拉的电线。饮用水是从经版库东的小河里担水。经版库的四周都是庄稼地。

从1959年建立经版库到1987年建立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二十八年间，先后有周玉琨、张瑞云、刘显斌、李荣光、田福月等五位同志在这里充当守经人。

守经人的生活是十分寂寞的，一天到晚很少有人到这里来，又不能擅离职守到外边去。所以后届守经人都是全家住在这里或是有子女陪伴。

守经人的责任是重大的，那就是确保石经不能丢失，云居寺遗址不遭人为破坏，山上石经洞不遭人为破坏。除看守经版以外还要经常到山上和云居寺遗址巡视，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石经出土至今四十多年未遭人为破坏，也没有丢失，当有守经人的一份贡献。

房山石经的研究

1958年底石经发掘拓印工作结束。石经拓片分藏在中国佛协、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以及上海、吉林等六个单位和地区。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对拓片作了系统整理和编目工作。一些学者开始利用新的发掘材料，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建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其中设有房山石经整理研究组，专门从事房山石经的研究工作。不久，中国佛协又设立房山石经编辑刊印委员会，计划全部影印拓片和有关论著。现在已有《房山云居寺石经》、《房山石经之研究》、《房山石经》、《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等专著出版。

由于众多学者参与房山石经的研究，因而研究成果是很丰富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房山石经(辽金部分)是早已失传的《契丹藏》的复刻本。学者们在对房山石经拓片的研究中，对照有关资料，特别是对照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契丹藏》残卷。发现房山石经与契丹藏的千字文编号、版式，每纸经的行数、每行字数二者完全一致。从而可以确定房山石经是契丹藏的复刻本，这一发现在佛教史及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资料：

- 1、《房山云居寺石经》
- 2、《房山石经题记汇编》

黄炳章著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协图书文物馆编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西周燕都遗址的发掘始末

包世轩

西周燕都遗址，地处北京房山区琉璃河办事处董家林村。1990年开始筹建博物馆，1995年8月21日建成开放。因多数专家认为周武王灭商这一年是公元前1045年，武王灭商未及下车封召公奭于北燕，故以这年作为燕国都城建城的起始。以此推算，1995年正好是北京建城3040年。

馆舍建在遗址古城东墙外，座东朝西，占地28亩，建筑面积2888平方米。呈方形，顶部由一高四低的五组四角攒尖式大屋顶覆盖，呈棕红色色调。四壁为月白色，使馆舍形成庄重肃穆的主体结构风貌。馆舍前部(西面)为屏风式巨型影壁，上嵌大理石面料，雕刻有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写的馆名。两侧为方形亭式建筑各一座，馆舍四周环以严整的围墙。整座博物馆布局严谨，格调典雅凝重，较好地与周围村落地貌及遗址呼应对比，自然和谐，表现出浓烈的历史纵深感。

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为《灿烂的古燕都文化》。馆内共七个展厅：序厅、青铜礼器厅、墓葬车马坑厅、青铜酒器兵器厅、陶器玉器漆器厅等。以大量出土的西周燕国文物(102组件)，重点展示古燕国文化的风貌神韵。展厅内陈列设计古朴庄重，较好地体现出周代崇尚赤色的审美意识。展览主题突出，特色鲜明，使观众很容易了解到西周燕国的历史。

展陈设计和陈列内容，突出地表现了北京建城于三千多年以前的历史。展现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三千年前建城时的状况和文化风貌。

燕国始封地之谜

1979年北京市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其列为“琉璃河商周遗址”，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命名为“琉璃河遗址”。这两次文物保护单位的确立和升级，是基于1972—1977年，以及1980—1986年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取得的重大收获，并以此确认为西周燕国都城所在地而公布的。

这两次科学考古发掘之前，西周燕国都城即始封地问题，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疑案。司马迁《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北燕为何地？是否即今北京城？无法确定。同时召公以下七代燕侯名字亦失载。另据《礼记》引孔子的话“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使为诸侯。”蓟和北燕分封各自有主，地名亦不同。蓟和北燕是否都指今北京城一带，汉唐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唐开元年间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力图把这个歧异调合起来，他在《周本纪》下注为“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观其文似稍重也。……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以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猜测的地点很多，以致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扑朔迷离。通过历史文献来准确印证的努力，仅能是种种的推测，于事无补。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使解决这一历史难题成为可能。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现缘起

清末、民国初年陆续发现燕国青铜器，著名的有山东出土的“梁山七器”，有燕侯旨鼎、太史友鬲、宪鼎等，虽出于山东，从铭文看确是西周燕国的重要礼器。如：燕侯旨鼎“铭文”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二十朋，用作有如人宝蹲彝。明显地表明是燕国的器物。

1945年琉璃河水泥厂欲恢复生产，北平中国银行吴良才先生到琉璃河商谈贷款事宜，在遗址中采集一大包陶片，回后送北平研究院苏秉琦先生。

1962年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派郭仁领队，在房山调查古遗址，于刘李店村、董家林村发现大面积西周时期文化层，采集了大量的陶器残片。当年秋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组成考古队，有北大学生参加，对遗址进行两个月试掘。试掘情况著文发表于《考古》1963年第3期，这是关于燕国始封地调查情况发表最早的一篇文章。

1963年黄土坡村村民施有在院外挖菜窖，挖出铜鼎、铜爵各一件，交给市文物工作队，外界不知此事。郭仁在其后办展览时，于库房中发现这两件器物及其来源。遂意识到黄土坡村有西周墓葬。此期间琉璃河遗址年代方面的重要内涵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考古所夏鼐所长和苏秉琦先生曾亲临试掘现场。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发掘

1972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进行教学实习，选定琉璃河遗址为发掘地点。北京市文物处派郭仁为领队，共有队员7人，与北大学生组成考古队进行合作发掘。在董家林和刘李店两地共开探方200平方米。为寻找墓葬，在黄土坡村施有家以南开了两条探沟。这次发掘没有重要突破，墓葬也未找到。

1973年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继续开展发掘工作。并到科学院考古所求援，夏鼐所长表示支持，并派了4名专家参与发掘。国家文物局亦派员指导。将刘李店村东遗址揭露2500平方米，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发掘后期，到洛阳请来经验丰富的探工，即洛阳廛河区钻探队马武堂同志。经在黄土坡钻探，果然在施有家北部探出一批小墓，之后又在该村的西侧探出201（即1986年发掘的1193号）、202号等大型墓葬，以及251、253号等中型墓葬和车马坑。201、202号大墓当时西周燕侯的墓葬。

琉璃河遗址大规模发掘历经两个阶段：

1973—1977年，郭仁为领队。此阶段发掘西周早期墓葬61座。车马坑5座。

1980—1986年，考古所殷玮璋领队。发掘墓葬182座，车马坑29座。

第一期发掘成果汇集为《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一书，199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第二期发掘成果，择其重要者已发表，如1193号大墓，其历史科研价值异乎寻常。正式发掘报告面世尚有待相当时日。

两期发掘的墓葬、车马坑中出土各类重要青铜礼器113件，青铜兵器、陶器、工具、车马器、漆器、玉石器等总数计1万件以上。两期发掘的34座车马坑，少者2马1车，还有4马1车，6马1车的，最多者42匹马12辆车。车上还有伞盖发现。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中，最重要的青铜器有董鼎、伯矩鬲、克壘。董鼎重达41.5公斤，铭文记载西周初年燕侯派董去宗周（陕西岐山丰、镐）向召公奭奉献珍馐，召公赏董贝，董铸此鼎以示纪念。伯矩鬲，全器上下铸造大大小小7个牛头，造型精美绝伦，艺术水准高超。克盃、克壘出土于早年被盗过的1193号大墓，此墓学术界公认的一代燕侯的墓葬。因这两年件青铜器上铸有内容完全相同的铭文，是周天子对召公封疆授民的史事和内容。由于对铭文文字的诠释存在差异，近年成为西周最著名和争议最多的学术话题。铭文为：

“王曰：太保：唯乃盟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命克侯于燕，事羌……微。克寔燕，纳土口厥有司，用作宝尊彝。”为此有人认为1193号墓是召公之墓，也有人认为是一位名叫克的燕侯之墓。还有的人认为“克”不是人名，是个代表“能够”之意的词。

遗址还出土一批漆器，嵌表精美的贝饰，色泽艳丽，工艺高超，具有很杰出的艺术水准。1995年至1998年，北京市文研所、社科院考古所为配合北大考古系学生实习，对古城遗址进行发掘，曾发现祭祀坑，出土整牛骨骼，并发现一片龟甲，上刻“成周”二字（“成周”为西周成王时在洛阳营建的东都）。在发掘中还发现西周陶窑一座。发掘十余座西周早期墓葬，有一座殉葬三名奴隶，为目前琉璃河遗址中殉人最多者。

琉璃河遗址发掘出土大量西周早期陶器，有陶鬲、陶罐、陶豆等，其中有一些大型陶器。经研究分析，从考古学区系类型分类上看，属三种文化构成：即这批陶器的风格有商文化的因素；也有本地域土著文人的因素（与天津蓟县张家园文化相同）；更有西周王朝所在地陕西文化面貌的典型器物。这充分说明了在西周早期的北京地区，人类活动集团的构成和来源，以及北京地区经济文化融合四海，包容四方的独特面貌。

琉璃河遗址及燕国都城

琉璃河遗址面积广大，整个遗址东西3.5公里，南北1.5公里，面积达5.25平方公里。遗址包括东部的立教、庄头村；西部的刘李店、涸城村；中部的董家林村；东南部的黄土坡村。燕国都城遗址基本位于董家林村。黄土坡村是墓葬区所在地，目前已发掘的仅是村子边缘的墓葬，大量的工作和惊人的发现还在后头。琉璃河遗址范围内有广泛的西周文化遗存分布。

燕国都城城址为土夯城墙，地表剩余遗存已不多。据考古实测，北墙东西长829米。城南部因临近大石河，成为汛期的河岸，经几千年冲刷，南北方向东西两侧城墙仅剩300余米。从迹象看，当初达700米左右。1976、1984、1995年均曾对城墙进行过发掘，发现有河卵石砌成的排水沟。城墙基部厚达2.6米，夯层厚5厘米。主墙内外两侧有护坡，城墙外还有护墙壕沟，深约2米。

在全国同时期遗址中，琉璃河遗址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特点表现为既有城址，又有墓葬区。因时间跨越商周两个时代，文化差异最为明显：表现在商代遗民贵族的墓葬形式上，除殉奴隶外，还有腰坑，内殉狗。而西周燕侯及贵族的墓葬不存在这种文化现象。

琉璃河遗址以其独特久远的文化面貌，重要的历史价值，为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着辉煌和历史的厚重感。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古刹中山寺

赵润东

中山寺，又称中峪寺，位于著名佛教圣地云居寺西约1公里的张坊镇北白带村北山坡之阳。其寺创建年代久远，最早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座千年古刹曾香火绵延，高僧云集。尤其是与蜚

声中外的云居寺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沧桑巨变，几经兴衰，日剥风蚀，山崩崖落，致使中山古刹断壁残垣，殿宇衰颓，继而消声于世。但是，遗址尚存，风韵依旧，究其深厚的佛教文化之内涵，开发恢弘其旧制，仍可辅佐云居圣火，再展白带山麓之辉煌。

所谓白带山，系上方山支脉。此处风景幽胜，白云如带，故称白带山。白带山方圆数十里，北倚水头村，东临三岔村，南俯高庄、大石窝，西接南、北白带及拒马河等。正如周叔迦先生在《白带山志》序中所云：“兹山绵亘太行，以为脉络，接上方而俯拒马，黄陂万顷，翠萼千重，峰峦秀峙，林木蔚跂。建赭宫于山椒，萦白云于岩曲，是以山名白带，寺号云居焉。”整个白带山麓，又被称为五台。所谓五台，即云居五台。“曰五台，皆有石浮图，唐金仙公主之所造也。今南台、中台浮图尚存”（《白带山志》）。自云居寺北侧的水头村向南，当年依次建有八座寺院。据载：“水头，出寺北石罅中，南流八寺，汇于河。”纵观白带山麓，有山有水，峰青水秀，诸寺古刹，遍及其中，构成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的佛教古建筑群，为后来石经的镌刻与封藏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有利的条件。

那么，当时的历史背景又是怎样的呢？据史书记载，早在北魏时期，幽州已成为佛教聚兴地区之一。幽州地处北方边陲，佛教的发展，比中原和江南等地起步时间虽晚些，但发展的速度很快。隋唐五代时期，燕地名僧辈出，并在唐初开始普遍建寺，使佛教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且对后来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正因为如此，隋唐时期的房山（属幽州）经济文化相应发达兴盛，沿西部连绵起伏的群峰秀岭兴建庄严巍峨的佛教寺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白带山麓系上方山支脉，其地质构造又多属喀斯特岩溶形势，如它西北5公里有东关上的黑牛水洞（现已开发为仙栖洞）、上方山云水洞，沿着山脉朝西北方向，有黄山店沟的涑利水、宝金山，长流水、英水（即银狐洞），与银狐洞相对应的是石花洞、万佛堂孔水洞。从脉系及溶洞构造可以看出，这一带应视为十分壮观的地下长城，即地下溶洞群。因此，地下水源较为丰富。另外，此地依山傍水，峰峦灵秀，兴佛建寺，特别是南面的高庄、大石窝一带，贮藏着丰富优质的汉白玉、艾叶青等石料，成为镌刻石经的上好材料，所以，历代高僧为维护佛法刻经于石。同时，在这幽静怡人的环境中修建佛教寺院，使这个地区的香火很快兴盛起来。

中山寺，依山势而建，坐落在北白带山坳之中，与云居寺只一岭之隔。当地村民有“先有中山寺，后有云居寺”之说，且世代相传。据《小西天东峪观音寺碑铭》记载：“涿之西北有山，名白带，隋静琬禅师刻石经于此，因名石经山，人以其有经也，呼为小西天。先是，北齐慧思禅师发愿刻经，未鸠工而化。琬公毅然任其事，自隋大业迄唐贞观，涅槃经始成，为洞七，为穴三，藏之……及刻经既成，因山巅石室为雷音殿，仅架数楹，不足以多住僧伽，大弘法宝，见山麓流泉三道，各建一寺，中曰中云居，左曰东云居，右曰西云居，土人所谓中、东、西三峪寺者，即其处也。”《白带山志》卷三·考工记载：“云居寺，隋曰智泉寺，以泉名也，盖静琬既刻石经，临岩为寺，即上寺也，复以泉流所经建寺三，其中寺曰中云居，其东曰东云居，西曰西云居，以在山也，又曰东峪、西峪。康熙中，溟波上人重建云居西寺，改峪为域。”又载：“中山寺，又曰中峪寺，寺西南五里，康熙中重建。其后西峪代兴，而中峪、东峪并焉。”以上碑记说明，隋朝时期的白带山中，始创较早的寺院当为中峪寺、西峪寺，东峪寺，而中山寺则是在明、清以后所重建。“先有中山寺，后有云居寺”之说大概源于此。而中山寺和东峪寺的颓废萧条乃至香火中断，也是因西峪代兴所至。西峪寺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佛教活动的发展，所封藏的石经（房山石经），也成为稀世之宝。房山石经，自隋代始，历经唐、辽、金、元，终于明末，历时千余载。所刻1122部、3572卷，刻石14278块。如此浩繁的铸造事业及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的确令后人钦佩之至，赞叹不绝。这些中国文化之瑰宝，早在1961年3月4日就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999年9月9日，重修后的云居古刹，面貌一新，肃穆庄严。在“云居寺石经回藏地穴”法会上，笙箫鸣起，人声鼎沸，出土40余年的《契丹大藏经》石板，又以隆重的礼仪回藏到地宫珍藏，至此，石经又得以归安。

由上述碑记得知,中峪寺始创于隋,而且由高僧静琬法师刻成石经,安置僧伽时所建。笔者实地考察和查阅诸多有关史书资料,疑为现存中山寺遗址为原中峪寺的一部分。其原因是,它的西侧、北侧地势广阔,坡度延缓,且多乱石杂土覆盖。视其形势,似有建筑埋藏地下并且规模可观,大概因泥石流所毁,泯灭于一旦。当地村民就地挖掘,在1米深处便有古砖出现。继续挖掘,下有墙基灰渣。能否确定上述观点,还有待于专家进一步考证方可断言。另外,中山寺附近,应该有塔院遗址。这对研究历代高僧入住、镌刻石经以及当时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发展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经初步统计,仅《日下旧闻考》、《白带山志》、《房山县志》等记载,中峪寺和中峪寺塔院建经幢、造灵塔幢就达17座之多。其中辽代有9座:即“经幢。正书,太康。在中峪寺塔院”、“沙门法忍为本师造塔幢。正书,八面刻。大安九年岁次癸丑三月戊寅朔二十九日辛时。在中峪寺塔院”、“为亡师建陀罗尼经塔幢。正书,八面刻。大安九年岁次癸丑十月八日。在中峪寺塔院”、“郑因为师兄志贞造塔记。正书,大安九年岁次癸丑。在中峪寺塔院”、“沙门志口为本师造塔记。正书,前经后记,六面刻。寿昌元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峪寺”、“塔幢。正书,乾统三年。在中峪寺塔院”、“为先师志延造陀罗尼经幢。正书,前经后记,八面刻。乾统八年戊子四月辛巳朔十七日丁酉。在中峪寺”、“为本师造经幢。正书,八面刻。在中峪寺”、“多罗尼经幢。不知年月,在中峪寺塔院”金代有5座:即“惠潜塔幢。正书,天眷三年。在中峪寺塔院”、“石经山前别贖圆师寿塔记。正书,前经后记,八面刻。贞元初,侍密教芯篆义藏撰。在中峪寺塔院”、“秀公口志。正书,前真言,后志。贞元二年二月十四日。在中峪寺”、“比丘惠明亡考妣事实记。正书,八面刻。大定十二年清明节。在中峪寺北塔园”、“义尚为潜寺主造灵塔幢。前真言,后记,真言梵书,记正书,额一面,正书。大定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在中峪寺北塔园”明代有1座:即“中山寺新建之记碑。正书,已断。奉天大夫吏部郎中兼翰林侍口。在中山寺(即现在遗址中断碑)”清代有2座:即“创建维摩禅师碑记。正书,康熙二十年岁次辛酉季秋九月。在中山寺”、“中山寺碑,行书,文泐,碑额存辐辏二字。在中山寺”由上述不同年代所造经幢碑记看出,当年的中峪寺到了明、清时期重建后才改称中山寺。从中峪寺塔院、塔园等文字分析,隋唐以后每个时期都有高僧在此讲经说法,修身养性。这里的确是“佛宇经厨,僧坊钟阁”,高僧辈出的佛门圣地。

据碑文记载,现在的中山寺遗址,为明、清时期所重建。顺着北白带村向北攀登,约1里,半山腰砌有石堰。来到近前,左侧乱石铺路,陡峭曲折。正所谓“荆棘荟翳于沟壑,磴道曲盘于半空”。须臾,便有山门呈现在眼前。山门倾圮,仅存墙基。前后各五级台阶,汉白玉砌成。山门内有空院,约占地半亩,北侧有碑一通,碑座二个。碑高约2米,宽0.9米,厚约0.18米。碑额刻有“齐出手眼”字样,于宣德元年四月十五日立。该碑为功德碑。南侧有正统年石碑一块,碑首刻有“谁藏家丑”四字及记文。碑通高1.2米,宽0.8米,厚0.15米。紧靠此碑,另有一断碑,上镌刻“中山禅寺新建碑记”,碑文有“奉政大夫吏部郎中翰林侍口”等字迹。过山门院落,又是一进院落,比前一层院落高约2米有余,当中有古槐1株,高约20米,粗约一尺。该院进深约50米,南北宽约20米。院内庑顶、础石等散落于地,正西有殿基三间。大殿进深6米,宽约10米。内有佛座一个,长约3米,宽2米,高1米有余,束腰有精美花纹。

由一进院落向北,登上12级石砌台阶,进入北院。该院有正殿,进深8米,长约12米,正中有汉白玉佛座,长4米,宽2米,高1.2米。院落两侧建有东西配殿各3间。在北殿的两侧有股清泉环大殿流过,经院落向南流淌。转过北殿,绕西山墙拾级而上,殿后地阔坡缓,山石覆盖,有柿树数株,即上文所述旧遗址所在。由此向上至北崖,怪石嶙峋,洞穴百出,高20米处洞穴内有尊汉白玉雕成的佛像。从北殿向西攀登,约20米,有一尊观音菩萨像,坐西朝东,大理石石质,雕刻细腻,纹理清晰。观音菩萨像前,有水井一眼,积水盈池,长年不息。据《北京名胜古迹词典》记载:“观音像,选艾叶青石精雕而就。它始刻于明末清初,高1.9米,蜷足端坐,表情慈善,端祥恬静,在北京地区尚不多见,现已被列入房山区文物保护单位。”另据区文物科同志介绍,前不久,有专家来此考查,认为该坐像造型、刻工等艺术应属元代风格,称之为元代

造像似更为贴切。

中山古刹，历史悠久，诸多碑记及志书又有所记述。西峪方兴旋起，中峪百废待兴。中山寺历经千年，虽殿宇颓圯，碣断碑残，但其幽雅环境及祥光瑞气使它永远不会匿迹消声。《小西天东峪观音寺碑铭》记载：“中峪，遗址尚存，丰碑宛在，阁黎檀越必有起而重构者矣。夫传灯即再世之大雄，护法岂人天之小果。”看来，犹如云居古刹所言“山门不倒，寺必重修”一样，恢复中山寺旧制，只待时间迟早而已。中山寺东倚著名的云居古刹，西通风景秀丽的十渡旅游风景区，南临宽阔的拒马河畔，将千余亩山场开发利用，集佛教旅游文化为一体，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参考书目：

- | | |
|----------------------|------------------|
| 1、《房山石经之研究》 | 中国佛教协会编 |
| 2、《白带山志》 | 中国书店 |
| 3、《房山县志》 | 民国十七年本 |
| 4、《帝京景物略》 | 明·刘侗于奕正著 |
| 5、《日下旧闻考》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 6、《房山志料》 | “养恬斋笔记定本”，清·高骈云著 |
| 7、《北京名胜古迹词典》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 8、《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十周年纪念文集》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 9、《冥报记》 | 唐·唐临戴浮撰 |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房山的石牌坊

赵润东

房山地处京郊，山青水秀，地旷物丰，尤其是盛产汉白玉、艾叶青等十几种精美石材，给石刻、石雕以及历代标志性或纪念性建筑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材料。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对有功名、尽孝、义举等均立牌坊昭示后人，加以表彰。牌坊，又叫牌楼、牌楼夹子。《辞海》中解释：一种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物。从造型上比较，牌坊比楼简单，建造陵墓中广泛采用，一般龙门枋，大额枋上装有石质火焰、宝珠、狮子等，顶部不再建其它装饰，民间建造牌坊可以采用。如建牌楼就要受到限制，民间不能用斗拱和彩绘曾是封建社会在建筑上的规定，违者必然受到刑律追究。所以，严格地说有楼的叫牌楼，无楼的叫牌坊。

牌楼的形式大体上是由单排多柱组成。有二柱一间一楼牌楼，二柱一间三楼牌楼，四柱三间三楼牌楼，四柱三间七楼牌楼，最多的有六柱五间十一楼牌楼。以上牌楼又分为出柱与不出柱两种。房山区内现有四座石牌楼：刘庄村金成明墓牌楼、磁家务庄亲王墓牌楼、皇后台村伊桑阿墓牌楼、顾册“圣旨”贞节牌楼。

刘庄村金成明墓牌楼位于良乡城西4公里崇各庄乡刘庄村。这座石牌楼建于清代，采用精选的艾叶青大理石材料构成，座北朝南，四柱三间三楼形式。四根粗壮的不等边八角形通天柱项上都雕刻着生动形象的石

狮，四只石狮相对蹲坐，怒目圆睁，雄壮威严。石狮中间雕刻着三个火梁，枋是方形垫板，垫板中心镌刻铭文“金公之墓”，四周浮雕行云腾浪，刻工精细，纹理清晰。四根通天柱呈不等边八角形，高4.3米，四个正面都是0.6米，柱础坚实稳固，每面1.4米。整座牌楼庄严肃穆，辉宏伟重，宏大和谐，充分显示了清代厚重的文化内涵和高超的雕刻艺术。

在牌楼前面，原来设有一对华表，一对汉白玉石狮，再往前有一座高约2米的石桥。牌楼后面50米处，有螭首龟趺碑记两座，再后则是灰土夯实的三座宝顶，四面还设有围墙，自成一院。据村中看坟老人讲，这里是乾隆皇帝岳父金成明的墓地。金家是皇亲国戚，处处都要显示出尊贵的气派，不仅墓地建筑讲究，就连石碑上的文字也要点缀真金。

位于刘庄村的清代金成明墓牌楼 (赵润东 提供)

后来，金家败落，便借迁坟的名义，在墓地搭上大棚翻尸倒骨，挖掘随葬的金银财宝。以后又卖掉整座坟地。外国天主教会看中这材质优良的石碑、石牌楼，于是出钱买下。但在当时运输非常困难，因此把碑上的贴金抠走，其余文字全部凿毁，将碑遗弃于地，让人无法辨认。现在，三块碑石倒在地上，碑额篆书“敕建”二字。石牌楼依然庄严肃立，已被列为房山区文物保护单位。庄亲王墓石牌楼，坐落在房山区河北镇磁家务村北。现为房山区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埋葬着清代王爷和硕承泽亲王、和硕庄慎亲王、和硕庄襄亲王。据史书记载，和硕承亲王葬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三合土宝顶下砌置两层大理石高台，前有碑石和供桌。石牌楼就设在这座墓前。和硕庄慎亲王葬于乾隆年间，有两个宝顶，一个用三合土夯实，一个用砖砌筑。两个宝顶前各树一碑。和硕庄襄亲王葬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三合土宝顶下用大理石筑座，高4米，直径6米。墓前有螭首龟趺碑。

庄亲王墓石牌楼是四柱三门形成。通天柱为方形，高7.5米，宽0.48米，柱顶上雕刻着望天吼，柱脚两侧有抱鼓石，共4对。牌楼通面宽为9.8米，中门宽3.2米，两侧门宽为2.8米。梁、枋上浮雕海水江牙，祥云图饰。从牌楼的建筑规格到选材都比较讲究，造型华贵雄壮。

皇后台伊桑阿墓石牌楼位于房山区岳各庄乡皇后台村。这座石牌楼建于清代康熙年间，座西朝东，采用汉白玉石料，五门六柱，面阔21米。方形通天柱上浮雕层层云朵。明间横梁上楷书：“崇祀贤良”。梁下石垫板上楷书：“大学仕伊文端公之墓”。这座牌楼单排多柱，建造精致，斗拱上承正楼、次楼、边楼、夹楼。各间横梁上安置的是仿木结构庑殿顶，斗拱挑出重檐和瓦垄。每根柱子有两面抱鼓，将牌楼牢牢固定。整座牌

位于皇后台村的清代伊桑阿墓牌楼 (赵润东 提供)

楼洁白如玉，肃穆端庄，造型古朴大方，圆雕、浮雕、纹饰等丰富多样，以石料雕刻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古代木结构的建筑。在石牌楼的前面有华表一对，石狮一对，还有华表、碑石等。最前面的一对华表，都用汉白

玉雕刻而成，底部须弥座呈八角形，须弥座的上、下枋和束腰部位，雕刻着仰覆莲花和云朵。座上置八角形石柱，柱顶蹲坐望天吼，昂首翘尾，雄壮威严。华表后面是两座石碑，即伊桑阿墓碑，螭首龟趺，通高4.8米，宽1.2米。额心是篆书“御制”二字。碑文由满、汉两部分组成。汉文楷书是：原任文华殿大学仕兼吏部尚书加二级谥文端伊桑阿碑文。立碑时间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七月十八日。从碑文记载看出，清王朝对伊桑阿给予了很高评价，说他出身科第，有厚重之望。任文华殿大学仕以后，工作勤恳，左右无违，任职十五年

位于顾册村的清代“圣旨”贞节牌楼 (赵润东 提供)

始终如一。因此，死后给予厚葬，并立规模壮观的石牌楼以示表彰。这座石牌楼与周围的石刻石雕构成了石雕艺术的珍品，是石刻研究的宝贵资料，现已公布为房山区文物保护单位。

顾册“圣旨”贞节牌楼，位于房山城西南，顾册村西北方向。这座牌楼由单排两柱组成，方柱采用花岗岩石料，上端选用精质大理石。从建造形式、规格上看，是北京地区典型的二柱一间一楼牌楼。

这座牌楼建于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为顾册村廩生李仲的妻子刘氏所立。牌楼面向西南，高2.67米，宽4.94米。两横梁间的隔心板阳面楷书：“节烈可风”。两方柱上刻有对联，上联是：“捐躯尽节生平原”，下联是：“宠锡嘉名世代芳”。隔心板的阴面雕刻楷书：“鸿胪寺序班廩膳生李仲之妻刘氏因夫殉节，奉者旌表，建坊入祠。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五日立”。柱上有石刻对联：“浩荡皇恩嘉烈妇，从容节义底完人。”横梁上是仿木结构的庑殿顶，重檐，有瓦陇，四条脊上雕有垂兽。阳面垂檐下面有华盖匾，上面楷书：“圣旨”二字，周围浮雕祥云。横梁上面雕刻石崖，刻工精细，构图新颖，风格别致。据村中老人讲，两柱上原来有望天吼，后被人毁掉。柱子下端有用铁箍固紧的夹杆石，夹杆石高0.37米，长、宽各为0.77米，通天柱高2.07米，宽0.42米。整座牌楼造型古朴，突出了它的纪念性。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张坊的黄廷桂墓

张玉泉

在房山区张坊镇东南的南白岱村北有座清代坟墓——郝家坟，它是清乾隆时期的少保大学士陕甘总督忠勤伯黄廷桂及家人的坟茔。该坟座北朝南，占地十余亩。东西北三面青山环抱，南面有拒马河流淌。坟地已

面目皆非，坟前尚有两座青石碑耸立。螭首龟趺，通高4米，宽1.15米，厚0.5米。碑首雕有双龙戏珠，正中刻篆书“圣旨”。两碑分立一条平行线上，西为满文，东为汉文。碑文记载着乾隆帝对黄廷桂丰功伟绩的赞誉和满怀深情的歌颂，表达了皇上对死者深切的悼念。碑座为一对头南尾北的喜欢夔夔，高1米，宽1.3米，长3.35米，体魄雄健，雕刻精细，刀法遒劲有力，是难得的石刻艺术品。

墓碑后原有一大供桌。据当地老人讲，桌后共有七个三合土的宝顶，顶端最大，是黄廷桂的。在他的左右后侧并排三对略小的，可能是他的妻室儿女的。三座宝顶形成人字形。坟墓后边是坟圈，半圆形的土围子，长约60米，高约2.5米，草木葱生。宝顶间还有直径半尺至一尺粗的柏树，整个墓地庄严肃穆。这些建筑物早在清末民初年逐遭破坏，解放后几次平整土地曾出土过楠木棺材、骨骼、清官服饰、铜钱币等物。

据《文物辞典》载：黄廷桂在川廿年，战功卓著，体国奉公，为大清边陲立下汗马功劳。文武双全，为皇帝重用。黄字丹崖，汉军、镶黄族人。其父秉中，官福建巡抚。黄廷桂初袭曾祖父宪章，抱沙喇哈番(爵名)世职。康熙五十二年授三军侍卫，迁参领。雍正三年授直隶宣化总兵，五年提为四川提督。之后，他发展军马，整治士卒，重新部署成都兵力，整治治安，镇压叛乱酋首近万人，疏导苗疆诸事，镇压违法土司。开护黄螂铜矿，封禁乱采者。率军攻克川贵叛乱者盘踞之地，狠狠打击和摧毁了大、小金川的叛乱基础，剿捕了为乱的首领。直至乾隆元年召诣回京师。

乾隆二年授銮仪使，寻授天津总兵。五年升古北口提督。在皇帝阅兵中，营伍整肃，赐坐骑一匹。六年授甘肃巡抚。十二年署陕甘总督，十三年授两江总督。得皇上“汝至江南，整饬振作”之称赞。处治一批不得力的巡视、知县。十五年加太子少保(虚职)，乾隆十六年调陕甘总督，兼四川分设总督。此间黄征粮赈灾，勘修塘堰，引江水灌田，修筑十余州县府城池，平息土司间内乱，为大清军队从新疆等地调剂军马骆驼七万余头，运储军粮十万多石。

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上谕曰：“廷桂于西陲用兵，虽未身历行阵，而筹办军需，每有联旨未到，旋即奏至，与所规划不约而同。体国奉公，精详妥协，而又毫不累民。内地若无兵事，其功最大。”其功积自太子太保进少保，自骑都尉进三军忠勤伯(官名)，先后赐双眼孔雀翎、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白金二万两。

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月，从四川传来黄廷桂病危的消息，皇上立派驸马福隆安率御医去诊视，途中闻讯廷桂卒。皇上即命福隆安奠醢，御制诗挽，赐祭葬。授谥号文襄。丧还，皇上亲临祭奠。二十五年，凯宴成功将士，追念黄廷桂，将其遗像挂在紫光阁。御制了怀旧诗。把黄廷桂遗像列在五督臣首的位子上。

参考书目：

- 1、《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三
- 2、《中国历代职官词典》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张坊的辽代石塔

张玉泉

张坊村小学操场北侧，用鹅卵石砌起的高台上，耸立着一座青色石塔，秀拔壮美。

塔始建于大辽天庆六年(公元1116年)，距今已有800余年。塔为八角形五级密檐石塔，通高6米，塔座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圆形的石雕仰莲承托儿，中下层为须弥座，束腰的浮雕为狮子头图案。周身浮雕人物，造形各具神态，形象十分逼真，体现了辽代的雕刻艺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塔身是独石雕就，因上面刻有经文，又称“经幢”。塔身正面，刻有10公分见方楷书，“奉为先大师特建佛顶尊胜密檐灵塔”的铭文。铭文下面的浮雕为双扇假门，上下两端刻有云朵。从正面向左两面刻有“佛顶尊胜罗陀尼经”。其它五面由左向右的铭文记述了大辽国燕京林禅寺僧忏悔正慧大师的经过。题为“大辽国燕京永泰寺崇禄大夫栓校口，皮菩萨戒忏悔正慧大师遗行塔记”。

文中还刻有正慧大师的身事：“大师俗姓济氏，为水德县人，因厌民俗屋，志乐空门出家到燕天王寺，拜三藏为师。后又到永塔寺拜守司徒疏主大师为师。以后又奏旨勒为燕京□□僧，为主戒之道师，设祥坛普渡之众九百人，周济贫人达二千余人。他名振四方，德影八面，他所到之处，自然有香、花烛、普乐、铎钹□□供养，不求而至。”正慧大师生于1037年，圆寂于天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1112年)，享年75岁。铭文中还详细叙述了他圆寂前后的情景：“他原居于圣水岩(今圣水峪上方山)，后有请命出席至本村(张坊护国林禅寺)，死前他的禅室闪现霞光七道，大师亲眼见天帝释迦诸圣众同来迎接，夜更涌愁云，天垂国惨；呜呼哀哉，三界无依，四生休托。国法山而倾倒，念法海以枯竭，可怜智炬潜辉，弹幻泯照。于是辽国七品国皆以丧考，至后二月二十八日名茶毗之，则广积香坛幢盖，殡送之众数以百万。当期天降五色祥云，地涌四色莲花。当及火灾舍利盈空，众皆取供。大师灵骨七处，各兴妙塔……别加荐藏之诚，回报先师之德。”

“特命良工造成石塔一座，上下十五层，高悬20天，去张坊院内乾位”。落款为“天庆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丙付其礼掩建”。

塔的上部为五级密檐，每层下都有斗拱，上覆筒瓦，角翘起，并雕有狮子头，塔刹上有石雕仰莲，内含宝珠。该塔是珍贵的辽代石刻艺术精品，而且为研究辽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燕桓侯徙都临易

王硕儒

召公奭被封为燕侯以后，历经十二世进入春秋时期，其十六世为燕桓侯，都城仍位于今房山区董家林村。桓侯时，燕国都城曾发生大迁移，即今北京地区都城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迁移。

燕都迁移所在何地?据《史记·燕世家》集解引《世本》云:“桓侯徙临易。”“桓侯徙临易”的“临易”在何处?据《世本》宋衷注,临易在“今河间易县是也”,宋衷为东汉人,汉代易县当今在河北省雄县西北。《括地志》卷二载:“易县故城在幽州归义县东南十五里,燕桓侯徙都临易是也。”《读史方輿纪要》卷十二,“废易县”下云:“废易县,在今县(指雄县)北三十五里,本燕故邑也,即此。”两书都指出“临易”在今河北省雄县西北地区。另外,1976至1981年考古界在与雄县相邻的容城县境内,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遗址,在遗址中发掘出铜鼎、铜壶、铜壶盖等刻有铭文的遗物,在遗物上刻有“左征”、“右征伊”、“西宫”等字,证明了这个地方就是“桓侯徙临易”的“临易”之地。

燕桓侯迁都的年代,据《史记·年表》载:桓侯在位的年代是在公元前697年至前691年,“桓侯徙临易”就在这个年代范围之内。另据《读史方輿纪要》载,桓侯徙临易的时间在鲁庄公时期。而鲁庄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93年至前682年,二者年代相合,故“桓侯徙临易”的时间是在春秋初年。临易都城正式使用约四十年。

燕桓侯南迁临易的原因,与躲避北方山戎族的侵扰有关。春秋初期,燕国东临孤竹(今河北卢龙一带),北接山戎(今北京北郊军都山南麓,延庆盆地北部边缘地带),东北是肃慎族(今山海关外),即处于北方民族的包围之中。各民族间既相互接触和往来,又相互争斗。周武王发兵灭商时,孤竹的伯夷和叔齐劝阻武王不能灭商,武王未听。周王朝建立后,伯夷、叔齐发誓“不食周粟”,逃至首阳山采薇而食,后饿死首阳山中。山戎族有多支,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郑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而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说明山戎支系很多,即“百有余戎”。山戎族的生活以游牧为主,经济、文化均比中原落后,但在桓侯时,山戎的势力强大起来。戎狄族原来活动在燕山、军都山等山地,后来有一部分迁到今河北承德和卢龙一带,春秋以后开始南下中原,燕国则成为戎狄侵扰的首要目标,《左传》中曾有“山戎病燕”的记载。戎狄不仅对燕国进行侵扰,抢掠财物和人口,而且越过燕国去征伐其他国家。在文献记载中:“山戎越燕伐齐”、“伐郑”、“狄人攻卫”、“攻邢”等屡见不鲜,说明戎狄野心之大。山戎势力的发展,对燕国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燕桓侯不得不迁都临易。

燕桓侯死后,其子庄公继位。燕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4年)山戎再次侵燕,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山戎侵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说明燕国经常受到北方山戎的侵扰,直到迁都临易,仍然如此。

燕庄公去世后,燕国都城又从临易北迁蓟城。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上方山九洞十二峰

王国富

上方山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落差变化明显。平均海拔400米,最高峰紫金岭海拔860米。山体坡度起伏较大,在20~70度之间。由于山脉纵横,将上方山地区分割成大小数十条沟谷,山势陡峭,峰峦叠嶂,怪石密布,地貌构造壮观,有著名的九洞十二峰。上方山九洞分别是:天王洞、华严洞、延寿洞、

金刚洞、阴阳洞、朝阳洞、西方洞、九环洞、云水洞。有的洞深不过盈尺，有的长达几百米。其中以云水洞最长，洞溶最大，洞体组成最奇妙，景色最为壮观，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云水洞在兜率寺西3公里，是我国北方最长的溶洞之一，总长612米，分为7个室。云水洞口在大悲庵后，上方山南坡。洞口标高530米，座北朝南，洞体向北延伸。洞尽头底标高504米，是串珠式近水平溶洞。溶洞的形成，一有通透性的可溶性岩石，二有足够的水流量。云水洞口为雾迷山组白云质灰岩和白云岩。入洞，距洞口160米处出现洪冲庄组岩石，至第七室出现铁岭组厚层白云质灰岩，岩层形状延缓，溶洞立体发育在洪冲庄组地层中。这一地区以灰岩、钙质板岩和白云质灰岩为主，具有一定可溶性。岩层节理十分发育，实测洞内节理主要有近南北和近东西两个方向。多处洞壁就是这些节理的破裂面。实际上，正是南北向节理控制着溶洞的延伸方向，东西向节理制约着溶洞的横向发展。又根据溶洞底板高程的变化和廊道内化石层积物排列方向的研究，溶洞形成时水流方向是从洞口向里流入的。这一自南向北的地下水流，便是溶洞形成的主要因素。今日洞口高程530米，与圣水峪河水面高程差达300米左右。可见自溶洞形成至今，上方山已经有了大幅度的上升。进洞须经146米的廊道。距洞口60米远，东侧溶岩瀑布上镌刻有大悲佛母像，这是元代遗迹。在廊道东侧壁上，沿水平方向裂隙内有沉积的冲积层，厚5~20厘米，含有牛、鹿等牙齿和肢骨碎块及小型啮齿趾骨化石。1980年初，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贾兰坡教授鉴定，这些古生物化石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的时代大致相当，距今约有50~70万年。根据化石的破碎及埋藏状况来看，很可能与古代人类的活动有关。

云水洞有7个厅，也叫室，各具特色，其中2、6两厅最为壮观。第2洞好似九天仙宫，称全洞精华。居中一根石笋，下部围长49.5米，直径8米，底层以上，通高38米，称宝塔山、擎天柱，为全洞石笋之冠。据中科院地质所张寿越采取石笋样品进行 $^{230}\text{Tn}/^{234}\text{V}$ 年代测定，石笋形成年代在35万年前，即中更新世晚期。旁侧钟乳，或立或垂，形态奇特，或钟乳片片，似莲花高悬；或下有石笋，以杆击之，可发生敲响锣声，能演奏优美动听的乐曲，可称古洞绝妙。第6洞称18罗汉堂，呈一派肃穆景象，厅内石笋多作人形，或直立，或斜依，高低错落，状似罗汉布法。洞顶钟乳垂悬，数不胜数，犹如幡旗招展，更增添几分威严。其余各厅独具特色，变幻奇妙的溶洞自然景观，展现天工造美景。

上方山十二峰雄威险峻，秀丽青幽。分别为：紫金岭、观音峰、啸月峰、回龙峰、毗卢峰、象立峰、望海峰、天柱峰、骆驼峰、茶罗峰、狮子峰、猩猩揽月峰。

十二峰形态各异，险峻陡峭，诸峰相联。其中以天柱峰最美最雄健。天柱峰，又叫莲花峰，也叫摘星驼。据《上方山志》记载，顶有势至庵一座，皇上赐匾曰：“空中见佛”。可见其高、其妙。骆驼峰与猩猩揽月峰惟妙惟肖。飞来峰峰顶有奇石一块，故取名飞来峰。翠微峰，位于西北，苍翠精微，故曰翠微峰。紫金峰位于正西，最高海拔860米。象立峰位于东北，因山体似象，岩石似苍皱象皮，故得名象立峰。望海峰，位于东南，高不可攀，取名望海峰，北起毗卢峰，东至棺材山。几处怪石，有的取其意，有的取其形，千姿百态，大者鳞殉峻峙，小者造化精灵，具有奇、特、美、巧、怪的特色。

我国著名园林学者陈从周先生曾名言：“山不在高，贵有层次，峰岭之胜，在于深秀。”游览上方山九洞十二峰，回味各景点之状，真是妙趣无穷。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关于房山孔庙的追忆

田树屏

孔庙，又称文庙，亦称学宫。在昔日尊孔读经的年代，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城到各州、县，每一行政建置，都建孔庙。以供“春秋祭祀，教化群黎”。

房山孔庙，在原房山县城东南隅，座北向南，面临南城墙，东接文昌宫，西面和北面均与学房胡同相邻。占地约六、七亩，形制较大，规格较高。1946年我初来房山时，虽有颓毁、改建，尚能睹及全貌。1948年来房山中学任教时，孔庙的仪门及东、西戟门均已拆去，而代之以一堵砖墙。此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需要，尤其是解放后广大劳动人民子女迫切要求入学，因之，学校亟需改建、扩建，但限于经济实力之不足，只好“修旧利废，拆旧建新”，“少花钱多办事”。这样，到七十年代初所有殿堂、碑幢、石雕、古柏，几乎全部荡然无存，只有原大成殿前月台右侧的一株明槐(万历)和原来被砌在墙里的两通明碑(万历、嘉靖)，硕果仅存，今天依然屹立于房山中学大操场的西北角上。本人亲身经历了这五十年的沧桑变化，自觉有责任把关于房山孔庙的原貌及其变化过程，追忆成文，聊以存文备考，兼正妄断、讹传之论，以还历史之真实面目。

孔庙正门，南门，称仪门。为一四柱三路木牌楼门。斗拱、飞檐、起脊，中路为双层。正中嵌一横匾，蓝地楷书“大德曰生”，背面书有“泮池鱼化”四字，东、西戟门为起脊过道双扇门，门上各有匾额，东曰“德配天地”，西为“道贯古今”。进仪门，北进约十余米，即为泮池。泮池为一半径约十米之半圆，南弧北直，池深一米余，池帮以青砖铺砌，出地面有半米多高的透砌花墙，泮池上纵跨单拱三路石桥，桥面以大块青石铺砌，桥上有艾叶青石望柱、栏板四排，每排计望柱四、栏板三、卧牛二，望柱、栏板、卧牛均经雕琢。栏板宽一米二，高约一米，周边凸起，中部凹进有纹饰，上沿呈栏杆扶手状；望柱通高一米三，柱头与柱身之间略有凹进，柱头、柱身通体有雕饰：卧牛上亦雕有云纹。桥长近八米，中部隆起，坡度圆缓流畅，桥体匀称壮观。我曾见良乡孔庙泮池与涿县孔庙泮池，其规模、形制均较为低、小。这就是房山孔庙与其它州、县孔庙的一个不同之处。

自泮池北进约二十五米，即棂星门，为一两柱一路碑坊门，亦为斗拱、飞檐、起脊形制。门额一鉴匾，上有楷书“棂星门”三字。在仪门之内，棂星门之前，当时尚有古柏九株，(原植柏数，未见记载)分布于桥南、北之东西两侧，树径二人合围有余，蓊郁苍劲，葳葳壮观。树龄皆近五、六百年，起码为明万历、嘉靖年间所植，甚或有与庙同龄之可能。桥北东侧棂星门前左侧，有石碑十余通，其中之一二为座，字迹剥落，年代难考。其余字迹可辨者，明万历、天启、成化、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代都有，还有一碑为民国年间所树。

棂星门内，有大成门，开面三间，底盘高一米余，七级台阶，阶旁有垂带石，房屋青砖平砌，阴阳瓦垄，铺青水脊。原来中间一间为过道门，左右两间为祭祀时的更衣室(中学曾改为图书资料、医疗室用)。

大成门内，为周边近三十米正方形院落，是孔庙之主体。院内东西两厢各五间，称东庑、西庑，乃祭祀名宦、乡贤之祠。据《房山县志》载，补建于元代延祐元年(公元1344年)，东庑、西庑底座比大成门略高，约一米二，七级台阶，衬有垂带。墙体青砖铺砌，房顶铺大块石板，前后坡两端各压以三行瓦垄，脊为青水脊，疑为后世翻建时所做。

正殿为大成殿，开面五间，中间一间较大，前廊后厦，前面为通天阁扇装修，中间一间开门，靠后墙，

筑龛台，台上有孔子坐像，大小如真人，圣像前有立像四，即颜(回)、曾(参)、思(子思)、孟(轲)四配，均为金丝楠木雕成。圣像两旁的四间，靠后墙也有台，台上供奉七十二贤及程颐、程颢及朱熹等诸理学家之牌位。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的是：一般省城及各州、县的孔庙，供奉的都是牌位，上书“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或“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尺寸大小，也有规定。然而房山孔庙供奉的却是雕像，这是房山孔庙与其他州、县孔庙的又一个不同之处。

大成殿前有月台，长约十米，宽近八米，高约一米三、四，月台之东西两边，均有一紧靠大殿底座的九级台阶。要进大殿，必须先从两侧台阶上月台，再从位于大殿正中的正门进殿，月台的南面正中，正对殿门处，没有台阶，这又是一个与别处孔庙不同之处。大殿基座比月台高出的三公分。大约一米五多，大殿两山墙及后墙，外层约为大块青砖平砌。大殿柱头高约三米五，殿内八根明柱直径约四十公分。屋架六椽十一檩，都是松木。屋顶为大号布瓦铺底，上覆绿色琉璃筒瓦成瓦垄。殿顶正中起大脊，高一米余，为绿色琉璃瓦阴阳透彻。大脊两端的鸱吻更为高大，上面树有铁制三股叉，两边还有铁链牵引，极为牢固。这在其它州、县的孔庙中也是罕见的。大成殿前的月台东南角有一古松，这是当时孔庙中的唯一松树，月台西侧有一古槐，树干的一小半被砌在月台内，两树树龄估计均有五、六百年。据说古槐在市文物局有档案，该树为明万历年间所植。月台两侧尚存石碑二十余通，唯两侧一磊厝座石碑最为高大，字迹大部剥落，年号似为大元至元二年。而据《房山区志》载，学宫建于大元至元元年，据此可认定，此碑应为建庙时所立。月台东侧还有一通元碑，碑文为寸楷，字迹清晰可辨。其内容为重修孔庙的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盖闻天下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年号为大元至正四年，此时距建庙已八十一年。其余石碑，大都字迹可见。均为明、清两代所树。内容概为：重修孔庙、学宫、补铸祭器等等。另外，大成殿东有一随墙后门，灰脊双扇，直通庙后学房胡同。此门为何时所开，不可考。估计不是建庙时所为。孔庙大成殿东，文昌宫大殿之后，还有两座三开间大殿，知之者指认，为忠烈祠和贤孝祠。这样说来二祠也应属孔庙的一部分。以上，是我1946年至1948年目睹之房山孔庙之概貌，追忆于此，以备查考。倘有疏漏、讹误，尚希方家指正。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兵马元帅陈珪之墓

陈长利

房山城关办事处域内的洪寺村西，有一座较大规模的牛口峪水库，这里四面环山，草木葱翠，环境幽雅，景色宜人，是一处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一体的风水宝地。五十年代末修筑水库前，当中有一座较为壮观的坟墓，即人们常说的明代兵马元帅陈珪之墓。

陈祖籍江苏泰州，布衣出身。据老人们讲，陈年轻时因不堪忍受元人暴政，遂随明太祖。朱元璋于长江一带揭竿起义，反抗元朝统治。洪武年间，受封为龙虎卫一百户护卫座殿出征。永乐年间，又被明成祖朱棣嘉封为大将及招讨使兵马元帅。

据史书记载，当年为推翻元人统治，燕王曾亲率大军五十万，以李文忠、朱能、陈珪等为东路大军，从

南京、徐州至山东济南至河北天津进攻元都(今北京),陈珪任前部正印先锋官统领马兵。以徐达、常遇春等将领为中路,从南京起兵经安徽、蚌埠、河南开封至河北邯郸以进攻元都。公元1378年8月间攻至河北通州。元顺帝惊惶之余,一面调太原大将扩廓贴木尔北上支援,另一方面准备弃城出逃。9月燕军攻进元都。元顺帝见大事已去,仓惶从居庸关北逃。同月,陈率马兵出京都,进入燕山山脉的马耳山平峪,准备与中路军合歼前来支援的元军。但元军得知元都失守的险讯,便急回。陈知情后率骑兵尾随其后,接近太原之际与徐达部合围将其击败,大将扩廓贴木尔受伤而逃。从此一举平定了北方,为大明打出了一统的新局面,结束了元朝的暴力统治。因陈珪作战勇敢,智勇双全屡立战功,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骑勇大将。

公元1398年,朱元璋驾崩,由朱元璋的长孙朱文即位。改元建文,称明惠帝。他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密谋削藩策略。自1398年6月起杀囚周王、湘王、齐王、代王等。此时燕王正在燕京驻守长城边关,得知此事后大为恼火,于公元1399年6月举兵,亲率陈珪等众将杀回南京,对抗明惠帝的削藩策略,即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变”,由此引发的内战长达3年之久。

以后,燕王在北京称帝即明成祖,对“靖难之变”有功人员嘉官进爵。明成祖朱棣封陈为兵部招讨史、兵马大元帅累至都督佥事,后因其年事渐高,命其子随帝北征。

据《明史》记载,“永乐四年,明成祖重修北京城,命陈珪经划条理,甚见奖重。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北征蒙古,命陈珪偕驸马都尉袁容辅佐赵王留守北京,永乐十五年兼掌行在后府。永乐十七年卒,终年八十五岁,赠靖国公益忠襄,敕旨勘赐灵园,以表忠贞”。

陈珪去世后,其墓地曾几经勘选,后择定北京西南郊即房山城西牛口峪的群山之中。这里山水相连,树木丛生,百草丰茂,且有山水之雅。登上山颠可仰望群山连绵,眺望涿良,即可晨观日出,又可夕赏晚霞。入园隘口左为青龙头,右为卧虎山,背靠马耳青山,为天然盆地。陵园入口处的甬路直通墓地,两旁树木荫翳蔽日,石人石马威震一方。

走进陵园,迎面有一殿堂,座西朝东。殿前左侧有奉天承运圣旨碑,碑高九尺,碑额雕有盘龙,正面由朱棣皇帝御书“兵马元帅陈珪之墓”。右侧为功德碑。殿内有供桌神龛,殿后不远处便是灵墓,呈圆形,直径3米,高约2米,周身1米砖砌而成,端部用三合土制成宝顶。墓前设有供桌,四周筑有青砖砌的矮墙。墓外山泉清澈环绕而过,各种古树千姿百态,遇有风时会发出松涛般的吼声。

当年周围方圆几里尚无村落,由护陵人看管墓地。由于所种耕地不纳官税,故称官地。明成祖曾赠陈珪金缰银镫马具一套,以示嘉赞,子女出于孝心用于陪葬,后被贼人盗走。

几百年沧桑历史,使兵马元帅坟及官地日渐荒漠,直到五十年代末,兴修水利,勘察地质修建牛口峪水库时发现了陈珪的墓穴和殿堂遗址石碑等遗物,由此为后人研究陈珪的历史提供了一处有价值的史料。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作者系区林业局干部

房山的石刻文字

薛宝华

房山区历史悠久，域内文物遗存丰富，形式多样。尤其是散落在山间田野各时代的石刻，已作为一种新兴的边缘学科，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它的历史内涵，学术价值，艺术价值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和资料。

房山区共有 89 项、300 余处石刻，可分为两大类：即文字石刻与石雕作品。文字刻石是指以石为原料，在上刻上文字。其中又因内容的需要和时代的不同刻有不同的形式和类别，如：刻石、摩崖、碑碣、墓志、石刻法帖等。

摩崖

所谓摩崖，是指利用天然的石壁以刻文记事的石刻，人称为“天然之石”，为刻石的一种。它的分布很广，遍布全国各地。摩崖刻石出现的时间众说不一，有的说在夏商时期就有了，有的认为最早出现在西周，还有的认为在秦代，但全都缺乏史料，无可证实。目前有实物和记载可考证的摩崖，应在东汉时期，而且数量较多，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汉以后各时期也续有镌刻。除在万佛堂孔水洞内的石壁上发现摩崖造像龕，北京地区目前还未发现比隋朝时期更早的摩崖刻石。洞内共有造像六尊，其石龕应是隋代所雕。此龕高 1 米，宽 2.5 米，人字形龕楣，边刻立柱。龕内雕刻一佛二胁侍。主佛结跏趺坐，神态安详。高由髻，脖颈细长，双耳长垂。其座上刻净瓶 1 件。左右胁侍侧面而立，左手持于胸前站在莲台上，龕门两侧分饰二力士，左手持兵刃，身穿长服，另饰披巾，自肩下垂，至腹前交叉后，搭于臂腕之上，脚下踏卧鹿。这种披巾方式明显带有北朝特点，与河南巩县石窟中一龕门两侧力士的雕刻极相似，但体量较大。佛龕没有文字，但根据主佛所着衣纹的刻划已没有了北朝时期的波浪和垂落于宝座之上若幔帐般的袍襟，再加上岩石下的隋大业年间问题，专家认定虽有北朝风格，但仍是隋朝时期的作品。

另外在万佛堂孔水洞的洞壁上还发现了隋代刻经。关于万佛堂孔水洞的记载，最早见于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十二“圣水”条：“圣水出上谷……水出郡之西南圣水谷，东南流迳大防岭之东首。山下有石穴，东北洞开，高广四五丈，入穴转更崇深，穴中有水。耆者传言，昔有沙门释惠弥者，如精物陷隐，尝篝火寻之，傍水入穴三里有余，穴分为二，一穴殊小，西北出，不知趣诣，一穴西南出，入穴经五六日方还，又不测穷深。其水夏冷冬暖，春秋有白鱼出穴，数日而返，人有采捕食者，美珍常味，盖亦两穴嘉鱼之类也。”这段记载说明，在北魏时只有天然的孔水洞存在，还未开始在洞壁上凿龕雕像或在洞上建佛堂，但已经有佛教徒开始注意这个神秘的洞穴了。到了隋代，郎蔚之的《隋州郡图经》内，有两则关于孔水洞的记载：一则是“防水，在良乡县，有石穴东北洞开，春秋有白鱼，珍美非常味”。一则是“防山水有仙人玉堂”。《房山县志》卷三·古迹条内认为“仙人玉堂石穴即今孔水洞”，据以上文献及文物工作者在七十年代的田野调查，从孔水洞洞壁上发现的刻经和隋代雕像来看，说明孔水洞在隋代时就已有人凿龕刻经了。孔水洞原是一个喀斯特溶洞，洞之前依山势筑砖石墩台，中辟券洞，大约 20 米，内通孔水洞。就在溶洞入口处凹进的岩石上刻了隋大业十年“大殿涅槃经寿命品”，“如来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刻经的右侧还有“山陵北垂口大房古刹金佛殿应口口口大定庚子廿年……吏部尚书附马都尉乌林口题曹河西完颜疔疔侍行题记。”这些刻经和题

刻有 1/3 浸没在水中。这一发现为研究北京地区最早刻经的时期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为探讨房山云居寺石经镌刻缘由、发展脉络提供了信息。

唐代摩崖艺术无论从水平、技艺上都超过前代。如张坊镇大峪沟村东的山腰上面摩崖造像,从风格到人物的雕刻与万佛堂石雕有相似之处。龕高 88 厘米,宽 98 厘米,人字形龕楣,中央释迦佛坐于花台之上,面相丰润,背有项光,外饰火焰纹,两侧刻祥云托起飞天,左右各一。主佛左右侍立着阿难和迦叶,他俩的侧前方为二菩萨,身披薄纱,腰系丝裙,背有火焰项光。再前为两位身穿铠甲手持利器的天王。造像面积不足一平方米,但雕刻人物众多,布局严谨,错落有序。龕内右上侧刻文“照一天下八月二十四日佛放光曰豪”。虽无年款,但从人物风格断为唐代,可称为北京地区唐代摩崖造像中小而精的典范。

碑碣

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研究,碑的发展史至少经历了两个大的演化阶段。首先,是将碑当作一种工具加以使用的时期,简称为实用碑时期。其后在上雕刻文字,歌颂人的伟绩、品格和记载史实的时期,简称刻字碑时期。实用碑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使用时间长、用途广泛,而且还有独特的形制。这种碑出现后,经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一直延用到西汉,经历了 2000 多年的时间。它的用途是多方面的:一是人死后,在下葬时下棺和放置器皿用。二是置于王室、诸侯宫庙庭院门前作为拴马的柱子,或当作一般人家系牲口的柱子。三是在宫殿或贵族的宅院中竖立的柱子,作为观察太阳偏斜、中正的标志,以判断一天时间的早晚。到西汉晚期出现了石刻字碑,刻字碑出现后,由于形成的原因不同,因此就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如在下棺的实用碑上刻写记述墓主姓名、籍贯、家世、生平以及事迹,如一些颂扬和悼念铭词,形成传记性的文字。使过往行人读后,可了解墓主的身份。这些碑称做墓碑。如在宗庙、祠堂等建筑物旁和殿院内竖立的实用碑上刻上文字,使人看后知道建筑物的情况及受祭者的业绩、道德、行为,这种碑称作祠庙碑。在汉代和三国时期,刻字碑还只有墓碑和祠庙碑两种,这两种刻字碑均多为纪念亡人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正因为这种特点,所以当时人们认为:树碑是为了对前人、先辈表示悼念和怀念。唐代早期大学者徐坚对碑字的解释为“碑”所以悲事也。唐代晚期陆龟蒙解释为“碑者,悲也”。这种刻字碑按内容可分为:墓碑、祠堂碑、寺庙碑、纪念碑、记事碑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前进,北京地区碑碣发展到了多种多样。如墓碑、会馆碑、寺庙碑、进士题名碑、记事碑、功德碑、墓志、刻经等。

由于房山文化起源很早,再加上石材资源丰富、坚固易得,应用广泛的特点,因此地面上保存下来的石刻文物、种类、内容十分广泛。

墓碑

墓碑遍布全区数量较多。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是 1964 年石景山区永定河出土的汉“秦君神道柱”,其次就是我区南尚乐镇广禄庄的唐光启四年(公元 888 年)“孙士林神道碑”,后被移到张坊井台作捶石用,八十年代文物工作者将其运至云居寺保存。该碑之座已佚,螭首,额题“唐乐安郡孙士林神道碑”。八十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金陵墓调查中于周口店车场村龙门口处发现了金世宗政变上台后为追封其父完颜宗辅睿宗的灵碑。碑汉白玉石质,螭首龟跌,碑高 2.1 米,宽 0.86 米,厚 0.25 米。碑阳镌刻双勾体“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扁字填朱砂,镀金粉,为碑中之精品。此碑是北京地区近年重要发现。

1991 年又在石楼村发现“杨瀛神道碑”,碑汉白玉质,高 2.23 米,宽 0.86 米,厚 0.17 米。碑载:“……大安三年岁次辛未四月壬朔十六日丁酉立己”。

位于岳各庄乡皇后台村的伊桑阿墓雕刻很有气派，地面上存有华表、石狮、石碑坊、墓碑等。碑刻“原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二级谥文端伊桑阿碑”，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十八日立，此墓已列入区级保护单位。以上三种墓碑为研究房山古代陵墓石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石经

我国古代刻写大部头经典，要属儒家最早。儒家大宗刻经才有七种。宗教石经要属我区《房山石经》为最大，镌刻时间为最长。石经始刻于隋朝，兴盛时期为唐、辽、金，终刻于明代末年，历时一千余年，所刻佛经 1022 部、3500 余卷、刻石 14278 块，分藏于石经山九洞和南塔地穴中。石经不仅数量大，镌刻精美，而且还有过去从未著录过的经典。并刻有大量“题记”约 7000 余条，其中有明代近 1500 条。这种世界罕见的文化工程，有极高学术价值。尤其对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提供了可贵的丰富的原始资料。其中辽代刻经的发现，使恢复《契丹藏》有了范本。1981 年石经山雷音洞内又发现了隋、明两代藏佛舍利，隋大业十二年石函、银函，明万历年石函、玉函，是研究房山石经历史的重要实物。除了大宗的刻经外，还有辽金时期的石碣，呈八角形或六角形，一般为前后题记。著名的有云居寺天庆八年的《涿鹿山续秘藏石经记》。

墓志

墓志，即埋藏在墓室中的一方石，其上镌刻墓主人的生卒年月、生平、埋藏时间、地点和颂铭等。房山区现有墓志 16 种、30 块。其中隋二盒共 4 块，唐 9 块，辽、金、元各 1 块，明 12 块，清 2 块。

房山区早期墓志的出现是 1998 年 10 月，韩村河镇曹章村出土的 4 块隋代墓志，一盒是汉白玉石质，方形。盖、长、宽各 0.50 米，厚 0.10 米，盖覆斗形，中间篆书“韩口墓志”。志楷书，方界格“君韩口字子括燕国良乡县称乡流里人也……始年五十有三……大隋国开皇九年(590 年)廿日己酉立。碑文书法秀劲典雅，结构峭劲匀稳，是隋代之精品。一盒是青石质，方形。盖、志长宽各 0.55 米，厚 0.12 米。盖覆斗形，中间刻文“韩君墓志”，志载：“隋良乡县司功韩君墓志……良乡县人也……死于仁寿元年(601)享年五十六。”这 2 盒墓志的发现对研究当时房山区的地理状况提供了实物资料。

唐代墓志现存共有 9 块。占墓志总数的 1/3，年代价值比较高。它的特点是方形，出现的形式是一盒，采用汉白玉的石料。盖覆斗形，中间篆书刻成。四面刻十二生肖，四角雕刻莲花纹。但因年代不同，十二生肖的样子也不同。如史光墓志雕刻的生肖人身兽首，这种做法属于唐早期。而蔡君墓志的生肖是人身胸前抱有十二生肖，这种做法则属唐中、晚期。

石刻法帖

石刻法帖是石刻的又一种类。即指摹刻在石上的书法。经捶拓、影印、装裱而成可供人效法或欣赏的作品，是我国书法流传的形式之一。它具有“欣赏性”和“可效法性”，这种石刻起源于何时名家说法不一。现在可见最早的法帖是北宋刻的《淳化阁帖》。北京自古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帝王中也有颇善书法者，如乾隆皇帝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书法则是刚劲有力，潇洒自如。他的代表作是“懋勤殿法帖”，被后人们所效仿、欣赏、赞颂。他的御笔在房山地区有许多遗存，最著名的御笔应是镶嵌在原长沟小学教室内的 28 块石刻，这些对学习书法之人提供了实物资料。

石雕

所谓石雕，是用天然石块，通过能工巧匠之手精雕细刻，使之变成石刻艺术品。前人留下来的大批石雕艺术，多年以来始终得到考古学界、艺术史学界一致的重视和研究。

石雕就北京地区而言可分三大类：即陵墓雕刻，建筑装饰雕刻，宗教雕刻。这三大类又包括圆雕、半圆雕、浮雕、浅浮雕和阴、阳线刻几种，在房山前二类都有体现。而后类在北京地区则更有名气，这就是坐落在万佛堂殿内墙壁的巨幅浮雕，多少游客到此都为它的精湛雕刻艺术赞叹不已。

浮雕是由三十一块汉白玉雕板所构成的《万菩萨法会图》。该图总长 23.8 米，高 2.4 米，石质洁白，质地高雅，殿壁左则镌刻铭文“大历五年”，得知浮雕应是唐大历五年(770)所造。此殿明万历年间重修，殿内壁画亦全部拆下修补，现存壁画的中部为明时后补。主要内容是释迦佛传播佛法，使众生皈依。中心主题图案为释迦牟尼佛与文殊、普贤、金刚力士同聚一堂，释迦佛向众生说法。主图周围在海水波纹、祥云飘渺中雕刻众多信徒头像，他们则全神贯注侧耳倾听。在主图两侧，分成不规则几个小部分，以菩萨为中心传讲佛法，并有乐伎持各种乐器演奏于侧，烘托出一派祥和气氛。

该图画布局错落有致，人物众多却不显杂乱，以图画的形式宣传佛法早在十六国时期已出现，在敦煌北京时期壁画中可得证实。而且，石雕形式如此大规模创作，在北京地区实属罕见。同时又充分利用本区盛产汉白玉石的便利，雕刻新颖别致，乃是唐代石雕之精华。

综上所述，房山地区的各种石刻都是石刻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文物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有很高价值，还是房山文化瑰宝。

(《房山文史资料》第 14 辑)

吉羊村的寺庙

卓成栋

吉羊村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汉代，当时叫“继阳”。民俗文化丰富，历史古迹颇多。尤其寺庙遗迹在房山地区较有名气。据《房山县志》载：“吉羊万佛寺香火鼎盛，可与万佛堂大历龙泉禅寺齐名。”据村中老人讲：“吉羊村有十三条街，十三座庙。”

最大的庙是玉皇庙，四层院落，五进殿宇，座北朝南。最南端为南天门，依次是山门殿、天王殿、伽蓝殿、观音殿、凌霄殿。殿宇规模宏伟，建筑壮观。解放初尚存清代重修的部份殿宇，六十年代后有的变为民居或库房，今仍存有殿宇数间。

万佛寺虽规模不大，却因供奉菩萨最多，以“万佛”而远近闻名，尤其以此寺发起的每年一次的庙会享誉房山。可惜该寺毁于战争，今仅存遗址了。

第三大庙宇为建在村东大石河畔的龙泉禅寺。据寺中碑文记载，该寺始建于辽金，明清重修。

娘娘庙为两进院落，前院为三清观，供奉道教的道德天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后院为娘娘殿，供奉

紫霄、碧霄、云霄三位娘娘。这里常有善男信女到娘娘面前一揖到地，求爱、求子等。这座娘娘庙与别处不同的是：在正殿三位娘娘右侧，供奉着一顶小轿，轿中坐着一位娇滴滴的不同凡响的娘娘。据说她的原型取自“宋太祖赵匡胤千里送京娘”中的京娘，每逢“严九”庙会开幕之前，先要抬“京娘”到庙会的主会场中走上一遭，送归神位，供上香火祭品，履行了正常会规，然后才能宣布庙会正式开始。据老人讲：“清道光皇帝一次去西陵祭祖，正赶上吉羊庙会抬着京娘上街，还亲自到娘娘殿拜祭过哪！”娘娘庙前院还有一株古槐，远看似乎是一棵树长了三个枝杈，近看又似三棵槐树后天长在一起，距今已有数百年的树龄，但遗憾的是1995年被一阵大风刮断了。

在御道旁还有一座“五神庙”，供奉着保护风调雨顺的五位神灵。此外还有大真武庙、小真武庙、老爷庙、五道庙、三阳观、弟子庵、鞑子庵、土地庙总计十三座之多。

对于吉羊的庙，人们常说的四句顺口溜是：“寺中有井，井中有寺，庙中有碑，碑中有人”。“寺中有井，井中有寺”说的是龙泉禅寺。吉羊这村号称“嘴甜心苦”。村中打井，全部是苦水，只适合浇灌青菜。而在村外打井，则是甜水。龙泉禅寺在村外东南临近大石河边，坐西面东，是房山最低洼处，海拔仅14米，寺内有一口水井，水质甘甜，据说可治疾病。在其井壁上人工开凿一尊供奉龙王的小佛龛。所以人们说“寺中有井，井中有寺”。过去每逢天旱不雨，村民就要到龙泉禅寺祈雨。

“庙中有碑”说的是清时重修娘娘庙时，在原址发现了块极有价值的汉白玉石碑，为了保留风水及灵验，寺中住持将碑砌进娘娘殿中的后山墙中，故而有“庙中有碑”之说。

在“五神庙”中，有一道两米多高的汉白玉石碑，该碑面东，前面刻有碑文，背面是一平滑石面。人若从碑处向后呈垂直角度走出四米，再回头看那石碑面上，竟然出现一头戴斗笠的人形，看上去酷似八仙中的吕洞宾，五官齐全神气活现！于是留下“碑中有人”的传说，可惜文革时此碑被推倒砸毁，砌了大墙。

更有趣的是，五十年代初，通县专区文工团来吉羊村演出《白毛女》，演喜儿在山神庙中偷吃供果一场时，因为没有道具，竟把村中土地庙中的土地爷、土地奶奶请上了舞台，成了现代歌剧中真正的道具了！

解放后，吉羊村的寺庙除极个别的有些破坏之外，其余大多数的基本规制还存在。到文革期间，这些庙被一座座拆毁了。至于那些曾在人们口中津津乐道的“寺里有井，井里有寺，庙中有碑，碑中有人”，抬着娘娘上街；观音镇鳌鱼；三阳观里小道士等等有趣故事，也随着历史的沧桑变迁，都成了人们快消失的记忆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房山古镇史话

赵润东

大房山悠悠千古，文化灿烂，古迹众多，钟灵毓秀。她是龙的故乡，人类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火正是从这里燃起的。据史书记载，早在五六十万年前，著名的“北京人”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封召公奭于燕，在这里建立起北京地区最早的都城。农耕牧歌，辐辏熔融，成为古燕国文明的发祥地。因此从殷商时期至春秋战国、从秦汉时期至隋唐五代、从宋金时期至明清时代，历代侯国都城古镇，遍布于房山域内201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窦店古

城、广阳郡、奉先县、长沟、张坊等古镇，历尽沧桑，遗迹犹存，且自古至今始终作为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而发挥着作用。

西乡侯国长沟镇

长沟镇历史悠久、古迹众多、物阜丰腴，历来被誉为京郊鱼米之乡。它距北京城区 60 公里，京石高速公路、京广铁路 5 公里、京原铁路 9 公里、京周(周口店)、京易(易县)、房云(云居寺)公路穿境而过。全镇占地面积 38.7 平方公里，拥有人口 2.7 万。由于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此地东西交汇，南北贯通，商贾云集，贸易繁荣。也正是因为如此，自古以来这里又是兵家必争之地。据《房山地名志》记载：“长沟始建于金代，因有大沟经村中而得名。”而追溯其所属沿革，则历史沧桑，源远流长。

据《天府广记》记载：“秦以前燕地通名为涿”。公元前 21 世纪末，周初于今河北省北部分封两个侯国，北边名为“蓟”，都城位于北京外城西北部，南边名为“燕”，都城位于房山域内琉璃河董家林。约在公元前 657 年，燕襄王时或稍前，燕灭蓟，迁都于蓟，涿地一直为燕国地。春秋时期(前 770—前 476 年)，由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涿县这个地方逐渐成为居民聚集商贾之地，以涿命名的城邑出现在燕国，而长沟为涿辖属。

燕国设郡始于公元前 283 年，燕击东胡千余里，设上谷(治今怀来东部)、渔阳(治今密云西南)、右北平(治今天津蓟县)、辽西(治今辽宁义县西)、辽东(治今辽宁辽阳)五郡。公元前 227 年，燕王喜 28 年，秦军兵临易水，燕太子患秦兵临境，用荆轲以献督亢之名义谋刺秦王不中。督亢位于今涿州东南，跨固安、新城三县边界地，径 50 余里，中有陂泽，为当时有名的富饶之地。

公元前 226 年，燕王喜 29 年，秦始皇 21 年，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前 5 年，秦派大将王翦大举伐燕，攻下燕都蓟。燕王喜逃亡辽东，秦在原郡基础上分天下为四十郡，以燕都蓟及其周围增设广阳郡，辖范阳(今定兴县固城)、易县及涿邑，长沟地从属之。公元前 206 年，刘邦即帝位，建立汉朝，推行郡、国并实行郡、县二级政权制，在秦郡县基础上更为增多，将秦之广阳郡的蓟城及其以南包括大兴全境建立广阳国，其余以涿县城关为治所建立了涿郡，涿郡属幽州，辖良乡、西乡等 29 个县(包括侯国)，其中西乡侯国，又称西乡县，即现在的长沟镇。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乡，侯国。莽曰移风。”《汉书·王子侯表》记，西汉末，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 44 年)封“广阳顷子”(即今良乡东广阳城附近)刘建之子刘容为西乡顷侯，封广阳王子刘发为阳乡侯。西乡侯国辖地为涿郡，北境包括今房山区大部地区，其都邑即今长沟古城。

长沟古城，位于今长沟村东 250 米处，现在古城遗址仍较清晰。经专家勘察，该城呈方形，每面长约 500 米，城址地势较高，周围地势较低。墙体最高为 5 米，厚度 25.6 米。古城遗址曾出土大量汉代陶器残片。可想当年西乡古城兴旺之盛况。这座古城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是北京通往涿郡、易州的交通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到了东汉时期，王莽建国元年(公元 9 年)改涿郡为垣翰。东汉建元五年(公元 25 年)，复为涿郡，西乡侯国废置并入涿郡，涿仍属幽。《方輿纪要》记载：“西乡废县在州(涿州)西北二十里，汉置属涿郡，后汉省，或谓之都乡城。”又有《日下旧闻考》记：“西乡废县在州西二十里，长沟村北有城遗址，土人呼为古城或即其地。”西乡县几易变迁，西汉置而东汉废。“(武帝子)济阳怀王珪，建安十六年(公元 211 年)封西乡侯。”(《三国志·济怀王珪传》)据此，涿郡之西乡侯国曹魏时又复置。“唐代侨置慎州及降龙县、黎州及黎县于此。”“而置长沟镇始见于清代与民国年间。(见《房山地名志》)宋金时期，北京改为中都，涿州为中都路所属，领范阳、固安、新城、定兴、奉先(今房山)等五县，元中统四年(公元 1263 年)涿州仍领范阳、房山二县。明洪武初(公元 1368 年)废范阳县并入涿州，涿州只领房山一县。至清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因房山直隶顺天府，涿州不在领县。自此，长沟隶属房山县而不受涿州所辖。

长沟镇不仅历史悠久，境内还有诸多名胜古迹。除了汉代西乡县城遗址长沟土城外，南正村北还有建筑

宏伟、规模壮观的清代行宫。清代帝王赴西陵谒陵之御路由此经过，并且多次于行宫驻蹕。南正行宫毁于国难当头的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而27块遒劲流畅的乾隆御碑刻至今保存在长沟中心校内。此外，西甘池村西北的慧聚寺，又称轩辕寺，保存下来的金贞元年间的“严行大德灵塔”被列为房山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村南的清代园寝即顺承郡王和敬谨亲王墓葬，目前仍保留着宝顶和墓碑。墓碑为璃首龟趺，碑侧浮雕团龙和海水江牙，刻工十分精细，为研究清史的珍贵资料。

长沟镇地处大房山南麓山前平原，自古交通畅达，物阜民丰。此地气候温和，土沃泉幽，又是房山区生产水稻的地区之一。所产稻米品味极佳，色白如玉，历来有“九蒸九晒，色香如初”之说，自明清以来，著名的“御塘贡米”因被奉为御膳食品而久赋盛誉，因此长沟一直被人们称为鱼米之乡。

由于长沟镇交通畅达，自古又为集市贸易之重镇。据《房山县志》记载：“长沟镇在涿房之交，涿境居三分之二，房境居三分之一，商业以粮行为大宗，杂货次之。其他药行盐店布行等亦皆殷实。集为一、四、七、九(旧历每月初一、初四、初七、初九)，附近菜园居多，凡有婚丧购鲜菜者集此焉。”此外，长沟还有十分热闹的民俗庙会“五月庙”。五月初一这天，庙会加集市，客商临期赶到，摊贩林立，摆满几里长街，干鲜果品、风味儿小吃、农家用具一应俱全。大街小巷，人群簇拥，赶集上庙者，络绎不绝，各道民间花会，一字排开，叫卖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整个镇子呈现出一片欢腾景象。

长沟是一座文明的古镇。在战争年代，它也曾惨遭践踏。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占领长沟。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同年旧历八月十二日，日军突然进袭镇西的坟庄村，实行残无人道的大屠杀。坟庄残案中，有70余村民被杀害，村内房屋门窗全部被砸毁烧光，猪鸡牲畜被洗劫一空。同年12月23日，日军又突然进犯镇北的太和庄村。进村后疯狂屠杀无辜百姓78人，死难者尸体如谷个子一样倒了一片，血浆满地，惨不忍睹。数十间房屋和许多柴草垛被放火烧光。一时间，喧闹繁华的长沟镇被糟蹋得千疮百孔，难以言表。

解放后，长沟地区重见光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展经济，繁荣市场，根据域内西北部蕴藏的多种矿产资源，办起了石材加工厂，汉白玉、大理石等产品行销全国及东南亚。为了把长沟镇建成北方的“小深圳”，1991年，镇里投资120万元扩建商贸大街。1992年又投资100万元兴建第二条商贸大街，两条商贸大街在镇中呈环形且首尾相连，数百家商亭、门店依次排列，井然有序。发展药材基地2000亩，贡米、林果、药材三大基地形成规模。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基本形成了以建筑、建材、商贸、医药、机械加工等行业为主的工业体系。

1994年，长沟镇首批列为北京市小城镇建设试点，1996年列为全国小城镇建设试点和北京市小城镇建设示范镇，享受中央和北京市、房山区政府给予的房地产开发、外省市户口进京并农转非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目前，城市规划面积5.4平方公里，2010年人口容量达5万人，居民住宅面积达到50万平方米。

长沟这座历经千年的文明古镇，将成为一个以商贸、工业为主，融科技、文化教育、旅游服务为一体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新型城镇。

拒马河畔张坊镇

张坊古镇位于房山城西南40公里的拒马河畔与河北省涞水县交接处。辞书所释：“坊，市街村里之通称，如街坊、村坊，也作工场。”自古以来，此地就是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塞，又是客商经销山货的集散中心。很早以前，这里就摊贩林立，连棚接帐，故有“帐房”之称。久之，随当地人口音便称张坊。

张坊镇历史悠久，周围有不少古代城寨遗迹。如镇西南龙湾山下铁锁崖有铁锁下垂，相传禹曾治水于此。镇东南，有西周时代文化堆积，叠压在相当于商代的先燕土著文化之上，有被春秋时期的灰坑所打破的夏文

化镇江营遗址。镇西北，有郁郁葱葱连绵起伏的太行山支脉。上寺、下寺、中山寺以及佛教胜地云居寺周围的白带头麓宛如一座天然屏障，上面筑就的唐、宋、辽金时期御敌守卫的古寨关口依稀可见。

据史书记载，在拒马河右分支向下约2.5公里的一块高敞台地上，有一座建于战国而沿袭到西汉时代的蔡庆古城遗址。“城址范围：北至蔡庄半里许，南至河北省涞水县板城3里，西至涞水县北庄1里，东至涞水县王家碾2里许。这座古城呈正方形，东南、西南两角尚完整，高约3.5米，长宽各约300米。”（《房山区志》）根据现存的东、西、南三面遗址看，古城为板筑夯土墙，北城墙早年被河水冲毁，而遗址地表出土的大量夹砂陶器残片、青石镰残段、兽面纹瓦半当、夹砂红陶鬲足以及汉代五铢铜钱、翁棺墓葬、铜铁箭镞等文物，表明此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至汉代。《房山县志·古迹》记载：“在张坊西北二十里南一里，有旧城墙一道。北十五里即佛岭。岭西北八里至石门沟再西北十里即口子洞霞岭地。关上控南北咽喉、东至黑牛水约三里，由黑牛水东南经东域寺可至鳌头寨。”“鳌头寨又名般洲山，在东域寺东南，四围斗绝，而顶则坦平”。明嘉靖《缮城记》云，般洲山实南北相控之咽喉。群盗未平时盘结其中，不时穷发，按其上有碑，碑载明崇祯间北郑村廩生张汝器因闯贼之乱，联络涿房两县五十余村筑寨于此。《养恬斋笔记》云：“三角城在北关上，城在中般洲山，寨在南皆大山前后形胜之地。而《畿辅通志》并《阙邑志》说：于关上城，示阙三角，仅载山名般洲。《房山县志》记载：“乾河口，山高水深易于控扼，从南流河越关上城即可通山后霞岭等处，从穆家口子经十渡越大龙门即可通蔚州桃花而至外边。切按黑龙关与三角山皆在大房西北同在圣水沟壑之中。关上城桃叶沟口在大房山东西为人圣水沟壑所必经之要路，山后八军果如养恬所言也。窃谓黑龙关桃叶尤要于般洲山之鳌头寨。盖鳌头寨与山后交通不便，呼应不灵，为一时草切则有余，以日久相持则不足，高公以鳌头寨为形胜之地，实八军之扼要，独未及桃叶黑龙，余切感焉。若乾河口则另一区域，关于涿涞者甚巨，关于房邑者甚轻，则又研究形势者所当知也。”又载：“按《大清一统志》，在县南四十里的孤山口为涿易二州分路处。宋雍熙三年，李继战契丹于拒马河上，追至孤山口契丹引去。”由上述记载可知，张坊一带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蜿蜒起伏的太行山，奔腾东去的拒马河，山高水深，易于控扼，因此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地。

在张坊镇中，现仍存有古战道。古战道为砖石结构，下有两层木制结构，宽1米，高2.2米，距地面4.5米，上下贯通，能攻易守。据《房山县志》记载：“县西南七十里张坊街北楼三层，门南向，高可数丈。下层空，其中甚暗。下有隧道向西北约二里通任家坟，俗传任为阁老。由下层楼上中层，半途转折处有井一。相传其井中设有刀山剑树，颠而人无生。里中塑碧霞元君像，上层可远眺，上中两层亦通隧道。”据考证，这座古战道建于宋朝，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当年，镇楼造型精美、壮观，登楼远眺，四周美景尽收眼底。唐代大诗人王之涣曾作诗咏赞：“之焕图之鹳鹤忧，谁云五风胜此楼。南临大水一招手，北映青山可纵眸。”可惜的是，这座壮观的镇楼在1938年毁于战火，现存镇楼为现在重修。张坊西行，经涞水、易县，过紫荆关，可到山西各地。张坊西北的穆家口村据说是穆桂英的家乡。《秦酋日记》中引诗道：“拒马河边古战场，土花埋没绿沈枪；至尽村鼓盲词里，威镇三关说六郎。”这里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杨家将英勇抗辽的动人故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入华北，占领房山，为实现其所谓大东亚圣战，大修“警备路”，深挖“封锁壕”，凡重要村镇，特别沿山边的要塞，从房山至张坊，建立了18个据点。每个据点至少驻有一个中队的日本侵略军。1940年，日本侵略军对房山山区“扫荡”失败后，妄图封锁山区，阻止八路军的进攻。从1941年夏季开始，又强征涿、良、房、涞、易等县民工，沿房山至张坊，南入涞、易县境，挖掘了一条宽5米、深6米的“封锁壕”，每3或5里筑一岗楼，由伪军驻守。平西抗日军民同仇敌忾，积极抗击日本鬼子的罪恶行径，使敌人最终难逃其失败的命运。

张坊镇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它南临涞水，北通十渡，西接易县。全镇总面积为

152.4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16371亩，粮田面积15300亩，林地面积3.66万亩，森林覆盖率占29%。全镇15个自然村分布在山区、半山区和平原地带。最远的东关上村距张坊15公里，拒马河流经该镇辖地16.7公里。北部山区最高海拔为1107米，南部最低海拔81米。果林占地面积近万亩。各种果树30余万株。其中土特产磨盘柿、花椒和拒马河鲤鱼久负盛名。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位置的优越，张坊镇依山傍水，四通八达，又是集市贸易的繁华中心。据《房山县志·实业》记载：“张坊镇当拒马河出山之口。南通涑易，北达三坡，其交易除粮食外，以木炭、香料、果品为大宗。故其地粮行、炭行、果品如红果、柿子及水磨等皆为此镇最茂生意。”当年，镇中店铺很多，杂货类有祥瑞、三义、振兴、元裕、德裕和；炭厂有公和号、同瑞号、德顺号、德益号；药行有广和号、永合升、聚成永；布行有协力号、聚昌号。此外，还有裕昌号果铺、丽生鞋铺、益照临盐店。每逢年节，众商客便云集至此。人们西北出入于穆家口、进深于六渡、十渡、霞云岭，西南往来于石亭、涑水和易县。当年的张坊镇，货源充足，繁华兴盛。

张坊地处浅山丘陵地带，无论是从温和的山前气候，还是独特的地理环境，都给柿树带来适宜的生长条件。《房山县志》记载：“柿，为本境出产之大宗，西北河套沟、西南张坊沟，无山不有。售出北京者，房山产最居多数。其大如拳，其甘如蜜。白露后，将熟柿经椒水浸之谓之榄柿，入冬软柿谓之烘柿。产山阳者味最甘，汁清而利口。村人以核桃做瓢制为柿脯甚佳”。张坊磨盘柿，色艳形美，清汤薄皮，甘甜可口。不但含糖量高，还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历来是老幼皆宜的美味食品。据老人讲，自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张坊磨盘柿作为贡品年年向皇宫进贡。

新中国成立后，张坊地区的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更加扬眉吐气。他们占有地处京郊、为京南之门户以及物产丰腴之优势，内引外联，发展旅游和贸易，经济收入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张坊古战道、穆柯寨、皇姑陀、中山寺、南方大峡谷、仙栖洞等景观已成为人们闲暇旅游之胜地；磨盘柿因品质优良早已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磨盘柿生产基地。大批磨盘柿，除了满足供应首都居民外，还要源源不断地销往东北、内蒙古等地。素有果中之王的中华猕猴桃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农业部、财政部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也在拒马河畔的西白岱村落户并成为“中华猕猴桃商品基地”。

古镇越千年。张坊镇随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拓展的张坊大街，两例古香古色的商品用房让人看上去赏心悦目。服装杂货，干鲜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如今的张坊镇不仅吸引着众多的商客到这里贸易往来，还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来这里旅游采摘、观光。

参考书目：

- | | |
|--------------|------------------|
| 1、《房山县志》 | 民国十七年本 |
| 2、《良乡县志》 | 民国十三年本 |
| 3、《房山志料》 | 清·高骧云著、“养恬斋笔记定本” |
| 4、《北京名胜古迹词典》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 5、《房山区志》 | 北京出版社 |
| 6、《日下旧闻考》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 7、《天府广记》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 8、《汉书》 | 中华书局 |
| 9、《三国志》 | 中华书局 |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金门闸与清代永定河水患治理

杨亦武

永定河古称瀑水、治水,又名卢沟、浑河、无定河。上源有南北两大支流;北支洋河发源于内蒙兴和县,流经河北张家口地区;南支桑干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流经山西雁北地区。两大支流汇于河北怀来县的米官屯,始称永定河。永定河东流官厅,纳妫水(发源于北京延庆县),入官厅山峡,至三家店出山,进入北京平原,东南流经北京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大兴、河北涿州、固安、永清、霸州、武清等区县(市),达天津入海。全长700余公里,流域面积50830平方公里。由于永定河发源于黄土高原,上游支派众多,山坡植被差,水土流失严重,河水含沙量大,导致中下游严重淤积,加上上游束行于两山峡谷,流速湍急,出山之后,奔流急泄,来势汹涌,自古以来经常泛滥成灾,给沿岸地区造成严重灾难。为了抵御永定河灾害,辽代开始至元明清历代都曾对永定河进行治理。

有清一代,自入关以后的首位皇帝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至末帝宣统元年(1909),历十帝二百五十七年,把永定河治理列为一项重大国事。常年督办,朝野上下不遗余力。谱写了永定河治河史上辉煌的一页。永定河上的重要水利工程金门闸,便是清代二百多年间永定河治理的历史见证。

金门闸的创建与康熙的治河方略

金门闸位于房山区窑上乡窑上村南、韩营村北的永定河右岸堤段,清代右岸称南岸,堤防编号为南二工十四号段。金门闸创建于康熙四十年(1701),原址在窑上乡任营村南、窑上村北的永定河右岸堤段,清代堤防编号为南二工八号段。此地原为老君堂村地界,对岸与今大兴县北章客隔河相望。现在的金门闸是该闸创建三十七年后的清乾隆三年(1738)移建于此的。

金门闸的创建与康熙时期的永定河方略密切相关。清初,永定河称“浑河”。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动工修筑石景山以南至卢沟桥决口堤岸,这是清代永定河治理的开端。而有清一代大规模的永定河治理工程,则是自清圣祖康熙年间开始的。当时,明人修筑的永定河堤防早已不复存在,下口淤积日甚,致使永定河河道渐次北移,永清、霸州、固安、文安等地时被水灾,甚至导致上游石景山、卢沟桥一带屡出决口险情,直接危及京师的安全。于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工部尚书萨穆哈、顺天府尹熊一潇奉命修治上游石景山至卢沟桥一线堤防,康熙三十一年(1692)四、五月间,康熙帝命直隶巡抚郭世隆疏浚永清东永定河故道五十四里,使其下口通畅,顺流归淀。又筑固安至永清之北永定河故堤七十二里。从而揭开了清代大规模永定河治理的序幕。

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帝采取“疏筑兼施”的策略,命直隶巡抚于成龙对上游起自卢沟桥南良乡县老君堂村(今房山区窑上村与任营村之间)下游至永清县朱家庄(今河北永清县小朱庄)长达一百四十五里的永定河段进行全面统筹治理。先疏挑全程一百四十五里的河道,自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县十里铺,永清县朱家庄,会于东安县郎城河(今里兰城与外兰城之间),达于西沽入海。同时修筑南北两岸堤防,南岸起自老君堂旧河口,迄永清郭家务,全长八十二里;北岸自张庙场(今北京大兴县北章客村),至永清卢家庄,全长一百零二里。又于南岸高店(今北京房山区高佃村)起,至老君堂旧河口止,堆沙堤三十五里,南岸筑堤总

长一百一十七里；北岸又自卢沟桥南至利堡村(今大兴县立堡村)南止，堆沙堤二十二里，利堡至张庙场(今大兴县北章客)五里，地高无堤，后于康熙四十年(1703)接筑，北岸筑堤总长一百二十九里。从而建立起京南百余里的永定河两岸堤防体系，这段永定河堤防历三百余年保存至今，堤防地段的河道也一直稳定至今。当年，还于老君堂旧河口建竹络坝，使水并流东注。未筑堤之前，水常泛滥，至此侵入莽牛河，故建竹络坝以断之，勒河东转，而南岸大堤遂从此起。是年，康熙帝赐名永定河。

康熙三十八年(1699)，永定河下口的郎城河淤平，郭家务以下河道则淤高六七尺，致上游河水壅塞。康熙帝于三十八年(1699)十月、翌年(1700)二月先后两次亲临永定河巡视考察，遍观全河形势，意识到永定河水患皆由淤积所致，因此把治沙列为治河重点，康熙一改传统清淤治沙的办法，由被动人工清淤改为以水主动攻沙，一方面筑堤束水，增加河水流速，以自身河水攻沙，一方面把莽牛河清水引入永定河，以外来清水攻沙，名曰以清刷浑。

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帝亲授方略，命直隶巡抚李光地于郭家务以下旧河右岸借低洼地势另挑新河，经霸州牛眼村、柳岔口注辛章淀。以旧河南北堤及淤高河身为北堤，另筑南堤。遵照康熙的旨意，郭家务一带的两岸河堤修筑得非常高大坚固，河道则狭窄，以使水流迅速，刷沙而行，不至淤积。北岸朱家庄以下筑新堤十五里，南岸郭家务以下筑新堤十里。北岸自张庙场至柳岔口堤尾，堤防总长一百六十五里。南岸自高店沙堤至柳岔口尾，堤防总长一百六十七里。

永清以下永定河工完成以后，康熙四十年(1701)，郎中佛保、永定河南北岸分司齐苏勒、色图浑，在宛平县南、竹络坝北(今房山区任营村与窑上村之间)建金门闸。康熙三十九年(1700)二月，康熙帝考察永定河情时，曾特地至良乡老君堂旧河口处巡阅竹络坝，提出了于旧河口处引莽牛河清水入永定河，以清水攻永定河沙的构想，当即谕李光地等曰：“莽牛河出水之口，亦宜下埽防之。隆冬冰结时，莽牛河口照常开泄，清水流于冰下，则水为冰逼，向下冲刷，河底自愈深。”经过周密的实地考察，郎中佛保、永定河南北岸分司齐苏勒、色图浑，于康熙四十年(1701)三月，自老君堂东南将莽牛河堵塞，于莽牛河与永定河之间，斜向竹络坝北挑引河一道，长五里，名小清河，将莽牛河清水逼入永定河，以实施康熙帝借清刷浑的既定方略。为控制水流，在竹络坝北的小清河入河口处的永定河堤岸间建草坝一座，口门宽二丈，名金门闸。四月八日工竣，开闸放水，引入永定河。金门闸虽然规模不大，但它及其配套工程小清河，却是康熙时期清淤排沙的关键水利工程，是当年永定河防治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熙四十六年(1707)，齐苏勒将金门闸改建成石闸，永定河水大则闭，防浑水倒漾，水小则开，引莽牛河清水入永定河攻沙。金门闸二丈，入深一丈二尺，两金刚墙高八尺，南北护以埽坝，各长五丈，宽一丈，高六尺。闸河旁还设有一只镇河铁狗，因此后来便称此段堤防为铁狗堤。

雍正时期，基本因循康熙治河办法。这一时期，金门闸作为永定河上引莽牛河清水排沙的关键性水利工程，在永定河水患防治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雍正二年(1724)，曾修缮金门闸。于金门闸旧埽下增下新埽二道，闸东溜增筑鸡嘴坝一道，围长二十一丈，尾宽六丈五尺，鸡嘴坝东护崖，下近水埽二道。金门闸下溜接旧埽下，增下顺水埽二道，各长一丈。配合金门闸修缮，于闸侧筑新河堤一百九十丈，顶宽二丈，底宽五丈，高六尺至一丈不等。修缮旧大堤一段，长四百五十丈，加高六七尺不等，顶宽二丈，底宽五丈。用银五千六百一十四两九分余。这是金门闸创改建后第一次修缮。

金门闸的移建与乾隆的治水探索

康熙时期所采取的疏浚河道，修筑堤防，以水攻沙等治河方略，取得了巨大成效。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以后至雍正末，垂三十余年，永定河基本稳固无大患。但是客观地说，康熙时期的永定河治理有其局限性，

它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效地缓解了患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永定河沙淤问题，（这个问题乃至清后来的历代统治者也未能解决），因此也就不可能根治永定河水患。当康熙采取有效的措施攻沙后，淤留于河道的泥沙减少，大量的泥沙顺流出永定河下口入淀，由于淀池宽广，水流放慢，泥沙便沉积淀内，淀淤阻水，下游河道亦淤，加之永清郭家务以下堤岸狭窄，下游永清河段时有决口。康熙四十一年(1702)决三圣口，四十八年(1709)决王虎庄，五十六年(1717)、六十一年(1722)两决贺尧营。雍正四年(1726)，辛章、胜芳二淀淤，永定河去路断绝，雍正不得不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軾改柳岔口稍北为下口，自郭家务开新河至王庆坨北接长甸河，东入三角淀达天津界归海。至乾隆初，永定河淤势向上蔓延，至上游河水出山之口三家店以下的石景山。石景山至卢沟桥河段，河底淤填，浮沙高积，卢沟桥底淤沙高达八尺。南岸头工以下河道(今房山区大宁村至下场村)浮沙涌起，如砥如洲，河水乱流，讫无定溜，至二工(今房山区佛满村至河北涿州市南蔡村)则沙积成脊，暴雨骤至不顺下而横行。所以，乾隆二年(1737)六月永定河伏汛，洪水涨漫卢沟桥面，过堤顶，冲刷石景山土堤一处。又漫南岸金门闸铁狗堤等八处，北岸张客(今大兴县北章客)等二十二处，全河漫决达四十余处。张客地居上游，出水便利，刷决口四百余丈，大溜从此直泻而去，由宛平(今大兴县界)、良乡(今大兴县界)、涿州、固安、永清、东安、武清等县弥漫而下，归凤河。南二工八号的金门闸，本因永定河河床淤高，莽牛河清水难入，废置有年，乾隆二年正当南岸决漫处，被大水彻底冲垮，小清河也被泥沙淤平。金门闸——这一康熙时期重要的引水排沙工程终于被洪水毁废。这是康熙治河以来最大的一次水灾，这次水灾标志着清水定河治理史上康、雍时代的结束。

永定河出山以后，全河淤塞，行流受阻，康雍堤防体系已不足以遏制汛期洪水，清都城北京以及永定河流域内的畿辅诸州县，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水患形势。此时的永定河情已不同于康雍时代，当年“疏筑兼施”的故策于事无补，所谓“浚筑皆穷”。如何治理永定河，有效地解决永定河水患，急迫地摆在乾隆皇帝面前。乾隆二年(1737)七月初九日，乾隆帝立即派出协办吏部尚书事务顾琮等官员驰驿前往永定河沿岸察勘河情，会同直隶总督李卫与总河会筹办理修河事。协办吏部尚书事务顾琮，提出了效仿黄河治理方法，于永定河两岸筑十里遥堤的主张。在顾琮看来，永定河水患“总缘临河筑堤之病”，永定河原本无堤无岸，“淀外数百里之地，任其游漾，水归于淀中，泥沉于淀外，民田虽有淹没，所谓一水一麦，亦不为若。自筑堤以来，下口迫近潮汐，其淤愈速，堤日增而河日淤，河底已高于平地，近年河患所尤甚也。”他认为，“大凡治水之法莫若行其无所事”，也就是所谓的“不治而治”，像从前一样听任永定河游漾，但是，“如欲复其旧，听其迁徙自流。则高下不同，故道已成旗民田舍，欲图善后之策，宜筹永久之方，莫若仿照黄河遥堤之法，留出水大时容纳之去向。”按照顾琮十里遥堤的构想，在二工八号金门闸之上堵筑横堤，联络东岸，以旧有两岸堤并淤高河道作为永定河南岸，将永定河自北岸张客引出，向河左共留宽达十里的河道再筑北堤，由东安、武清而下。显而易见，顾琮的主张是不可行的，所以乾隆二年(1737)八月，被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议奏搁置。于是乾隆特命大学士鄂尔泰亲往永定河筹度，以求善策。经考察，鄂尔泰确认“永定河水性水势，俱非黄河可比，十里遥堤之议，万不可行。”顾琮“十里遥堤”的治河主张即被否决。

鄂尔泰认为，“永定河之所以为患者，独以上游未曾分泄，下口不得畅流，经行一路，中梗旁薄，以故拂其性而激之变耳。”因此他提出改导下口，在上游两岸建闸坝、开引河，减水分流，再自下而上疏浚河道淤沙的主张，并借鉴康熙以清刷浑的排沙成策，建议将引河下游导人清河，以除沙淤。鄂尔泰的主张是正确的，所以即被采纳。这一主张后来被乾隆帝发展成为乾隆时代的主导治河方略。

依照鄂尔泰的方案，乾隆三年(1738)，在永定河右岸建良乡金门闸坝、永清郭家务闸坝。金门闸以康熙三十七年(1698)以前永定河通向莽牛河的旁支故道下接莽牛河为引河，郭家务坝以雍正四年(1726)以前郭家务以下的永定河故道为引河。

再建的金门闸从南二工八号南移至数里外的南二工十四号；即今窑上村南、韩营村北的永定河右岸堤段，

也就是现存金门闸的位置。乾隆三年(1738)所建金门闸改为减水石坝,金门宽五十六丈,进深五丈,石迎水簸箕内宽五十六丈,外宽六十一丈四尺,进深二丈,石出水簸箕内宽五十六丈,外宽六十七丈三尺,进深九丈。南北两坝台,各宽十二丈,进深十六丈,金墙高八尺。灰迎水簸箕七十五丈,外宽八十五丈,进深五丈,灰出水簸箕内宽七十五丈,外宽八十五丈,进深十五丈。南北迎水雁翅各长三十丈,北出水雁翅长三十丈,南出水雁翅长六十丈。用银十八万六千一百一十二两有奇。此金门闸与原南二工八号康熙金门闸功能完全不同,原金门闸是引水闸,是节制小清河所引莽牛河排沙清水进永定河。而再建的金门闸是排水闸,是永定河上游的一项分洪减水工程,但仍袭用了康熙金门闸旧称。

鄂尔泰原计划改下口,于永定河下游永清半截河北岸改挑新河,以原永定河北堤为南堤,沿之东下,入六道口,经三角淀,北至青沽港,西入河头大河。但因半截河以下地势低洼,积水不消,一片汪洋,未能兴工。

顾琮“十里遥堤”的治河主张虽被否决,但是他把水患归咎于康熙筑堤,认为治水上策“莫若行其无所事”,向康熙治河前一样听任永定河漫漾的提法,却演变成令永定河渐复故道的治河主张。当年,顾琮之所以未起“复其旧,听其迁徙自流”之议,只是顾虑到“故道已成旗民田舍”,所以提出“仿照黄河遥堤之法”,以为权宜之策。但是他的顾虑不久竟被大胆的官员盲目地破除了,从而导致了乾隆皇帝早期治河的失误。

乾隆三年(1738),正当鄂尔泰正确的治河主张实施的时候,吏部尚书孙嘉淦改授直隶总督,他与兵部尚书协办户部尚书果毅公讷亲合词具奏乾隆帝:“永定河冲决之患,实因筑堤而起”,“莫若因势利导,以收永远之利济。”使永定河复其故道,恢复康熙三十七年治河前状态,无堤无岸,听其漫流。讷亲、孙嘉淦称,即使洪水漫溢也与民无害,沙淤田间,民享肥田之利,清水归淀,可免淤塞。至于故道低洼处村庄,可围堤自保,零散居民可迁人大村。南岸金门闸侧的莽牛河,下接中亭河,乃永定河故道,为复故道计,于两岸相度形势,开建草坝。南岸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北岸少建,使南泄之水常多,水小则归引河,水大听其漫流,数年之后,草坝朽坏,永定河便由现行河道改循故道南下。

乾隆四年(1739)正月,孙嘉淦向乾隆帝《疏》陈,于两岸筑坝,开引河,导永定河复故道的具体计划。乾隆批复:“果如是,诚为善举,且试为之。”

乾隆四年(1739),导永定河复故道的计划启动,乾隆帝命讷亲勘察永定河故道。开金门闸坝引河,两股分流,西股自闸下至长安城,东西两股引河自汇流处起至霸州张贵庄西南入中亭河,计西引河长一百一十九里,东引河自固安毕家庄起至杨青口南,长四十八里。在南岸金门闸以下的宛平长安城(今河北涿州市长安城村)、永清曹家务,北岸的宛平求贤村(今北京大兴县求贤村)、永清半截河村,共建草坝四座。

乾隆五年(1740),复永定河故道。九月初六日兴工,挑浚永定河槽二百七十余丈,导流至金门闸口外通引河,因东引河村庄较多将其堵塞,使水走西引河,疏西引河浅处杨青务至李各庄段三千六百余丈。十三日,河道总督顾琮、直隶总督孙嘉淦亲临金门闸,开挖金门闸之上重堤二十丈作为永定河出水口,十五日各工具竣,十六日辰时开放河水,将永定河全溜导入引河水定河故道。

不料,凌汛过猛,固安、良乡、新城、涿州、雄县、霸州诸州县多被水淹。显然,水势汹涌的永定河没有固定的河道和堤防是不行的。于是,乾隆六年(1741)初,即将金门闸侧永定河出水堤口堵筑,使永定河回流。这是乾隆时代永定河治理的一次严重失误,孙嘉淦因此失掉了直隶总督的官职。乾隆帝对于孙嘉淦误导所致的错误决策深为懊悔,御制诗中屡言误听孙嘉淦之言。

实践证明,大学士鄂尔泰疏挑下口,使永定河去路通畅,自上游始两岸酌建闸坝开引河分洪泄水,再自下而上疏浚河槽的治河主张是正确的。乾隆六年(1741)十一月,直隶总督高斌上《疏》,建议以永清冰窖至洞子门一线改为下口尾闾正道,“下口既通,上游应筹分泄,使泛涨、盛涨之水皆有分泄。”实际上又回到鄂尔泰的治河主张上来。根据此议,年底,浚新河下口以下。挑葛渔城河槽,两岸自上游以下,完善分泄工程。上游南二工关键的分洪设施金门闸滚水石坝,因坝身过高常汛不能泄水,将中间十八丈,下落一尺五寸,常

汛可从下落处减泄，盛涨全坝漫泄，七年(1742)竣工。又于南六工双营、北三工胡林、七工小惠庄添筑三合土滚水坝三座，以备宣泄汛期盛涨之水。

乾隆三十四年(1769)，直隶总督杨廷璋奏：河身淤高，泄水过大，金门闸落低处进深一丈三尺，补乎如旧，添建尖脊石龙骨五十六丈，高二尺五寸，如所请。三十五年(1770)工竣。

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命大学士高晋、工部尚书裘曰修，会同直隶总督周元理兴举大工，治理永定河。于贺尧营东条河头南挑下口，经毛家营、沙家店，会凤河，过双口，入大清河达津归海。同时，加培大堤，疏浚永定河道，南岸筑月堤，三角淀培南北埝，疏凤河，培东堤斜埝。修缮金门闸，粘补坝台雁翅、灰土簸箕。疏浚金门闸分泄引河莽牛河及下游黄家河。共用银十三万六千五百余两。是年春，乾隆曾亲临永定河巡视，从北二工九号渡河，循南二工，经金门闸至头工，驻蹕良乡县黄辛庄行宫(在今房山区黄辛庄村)，谒西陵归途，到永定河下口条河头阅视全河形势。

乾隆三十七年(1772)全面、大规模永定河治理，是乾隆时代永定河治理盛期的标志。此番治理是以明确的方略为指导的，即：“疏中泓，挑下口，以畅其势。坚筑两岸堤防，以防其冲突。深浚减河，以分其盛势。”它是乾隆帝永定河治理思想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乾隆时代治河理论的成熟。这一治河方略被河臣勒于《永定河事宜碑》立于金门闸堤头，成为此后清历代永定河治理的既定方略。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初，乾隆帝再临永定河巡视，阅金门闸，面谕直隶总督周元理，于金门闸上建挑水坝，使水势迂回过闸。又谕两岸大堤邦内多种卧柳以资捍御，这是一项具有乾隆时代特色的河防措施，当春即被实施。六月，乾隆帝谕周元理：督饬河员，于金门闸过水之处，即为挑浚，务使积淤尽涤，水流畅行，以资宣泄。数月之内两谕金门闸事，乾隆帝如此重视金门闸，实因这一分泄工程事关永定河全局安危。是年，河员遵照乾隆帝指示，修金门闸，添筑挑水草坝一座，长十丈。工毕，勒《金门闸碑》记金门闸形制，历述乾隆三年(1738)以来金门闸工事，立于金门闸南坝台上。乾隆帝巡视永定河，阅金门闸时，曾作五言长诗《堤柳》，陈植柳御堤策，作《阅金门闸》，叹永定河难治、陈于金门闸添建挑水坝策。当年勒《御制诗碑》，亦立金门闸坝台上。

嘉庆以后金门闸的修治

乾隆时代以后的嘉、道、咸、同、光诸代的永定河治理，基本因乾隆成法。金门闸一直作为永定河减河上的一个关键的分洪减水工程存在。

嘉庆二年(1797)伏汛，南头工、二工决漫，冲决金门闸石龙骨二十余丈，挑水草坝亦损，旋即补筑。十五年(1810)七月九日永定河两岸同时漫口，金门闸迎水雁翅被冲垮，闸口泄水过大，恐夺溜，筑埝堵闭。

永定河水患发生一般是因为下口不畅，上游不能分泄洪水以减水势，暴雨一至便拥塞决漫，泛滥成灾。当年鄂尔泰建议在永定河上游南岸要冲设置金门闸，确能有效地分减水势，缓解永定河灾势。可是嘉庆十五年(1810)首开堵闸之例，至道光初，金门闸口河底淤高，年久失修，闸墙、雁翅、龙骨、海墁、簸箕低矮酥碎，残坏严重，恐放水造成夺溜，久筑拦埝，已滴水不能渲泄。嘉庆末以来，永定河决溢频繁。一些有识官员意识到，从永定河防治的全局出发，金门闸不可废而不治。道光三年(1823)九月十七日，当道光帝在良乡县黄新庄行宫询问永定河防治情况时，河臣张文浩力奏，金门闸事关永定河分泄，亟须修治。道光帝即命永定河道张泰运，督率庭汛各员勘估。根据勘估结果，张文浩于十一月上《疏》，奏陈金门闸详情及大修金门闸、疏浚减河的计划方案。于是命修金门闸，疏减河。

道光四年(1824)春，起工拆修金门闸，拆去尖脊龙骨，改建平龙骨，高四尺五寸，长五十六丈，顶宽五尺，迎水坡斜宽六尺三寸，出水坡斜宽一丈三尺五寸，两金刚墙加高四尺，补砌石海墁，筑迎水、出水灰簸

箕、灰雁翅，长十三丈，宽二丈，连槽高三尺八寸五分，下牙桩护埽，挑水顺水埽坝，砌片石坦坡。挑挖闸塘淤沙，挑引河四十丈，减河三千四百六十丈。这是乾隆以后，金门闸的第一次大修，耗银十万三千四百五十一两。勒碑记修闸事，立于金门闸侧。

道光十年(1830)，河底淤高，闭金门闸。十一年(1831)重修，加高石龙骨一尺二寸，迎水一面砌石坦坡，上长五十六丈，下长五十九丈，顶宽二尺，底宽八尺，高五尺七寸。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将金门闸龙骨加高三尺于海堰下接修散水石一丈，并补缺。二十三年(1843)兴工，拆卸石龙骨一尺二寸，加高三尺，海堰下接修散水石九尺，厚一尺。

同治五年(1866)，河底继续淤高，再度筑埽堵塞金门闸口。此后历年，虽连遭漫口之患，金门闸一直堵闭，涓滴不能渲泄，闸坝颓废而不治，至十年(1871)河底淤高已与龙骨平。十一年(1872)，直隶总督李鸿章重修，二月二十日开工，旧龙骨高七尺八寸，全部拆除，进移五尺，重筑新龙骨，龙骨长五十六丈，中段二十丈，比旧龙骨升高四尺，两头各十八丈，升高五尺，建新龙骨进深加宽至六丈，下接旧海堰，上斜作坦坡形，以使水平缓过闸，这样，就防止了出闸水势过猛，毁及金墙和海堰，或意外夺溜。南坝台未动，北坝台东面南移九丈，与龙骨紧接。坝墙内外镶护闸埽，仍于龙骨上添设拦水埽一道。疏通闸下减河，由童村人小清河(即莽牛河，后称小清河)四千一百七十丈。重修汛房，建碑亭于闸侧，勒碑记事。五月底工竣。是为第二次大修，耗银六万四千七百四十二两。

同治十三年(1874)，将龙骨中段二十丈，下段十丈，照中段原尺寸落低一尺七寸。光绪二年(1876)，龙骨中段二十丈，加高一尺二寸，下段十丈加高一尺五寸，迎水坡加高一尺。六年(1880)，加高龙骨中段、下段，共三十丈，与两头原龙骨平。

宣统时期金门闸的重大革新

金门闸，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一项不朽的工程，凝聚着清历代河员与工程建设者的聪明和智慧。但是，在康熙四十年(1701)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二百零七年间，金门闸一直是一道横在永定河堤口的坝，以坝位高低控制水量。既是闸，应筑闸涵，设闸板，以便灵活启闭收放，控制水量。坝则是固定的，不能控制自如。创建之初，金门闸作为引莽牛河清水入永定河刷浑的进水闸口，以坝控水尚无大碍。乾隆三年(1738)，金门闸改建为分洪泄水的减水闸，以坝控水的局限愈加明显。河员一向用拆、筑龙骨的办法调节泄水，渲泄不利拆卸龙骨，降低坝位，渲泄过盛则增筑龙骨，提升坝位。繁工误时，糜费财力，收效不大。永定河沙淤严重，河底不时淤高，坝位常见淤低，再升龙骨，再见淤低，恶性循环。惟恐夺溜，便筑埽拦闸，弃置不用。由于金门无闸涵，筑坝横于闸口，洪水泄出闸口时，闸体承受巨大的冲击，易损坏。故创建以来三十年一大修，数年一小修。这便限制和影响了金门闸功能作用的发挥。

自宣统元年(1909)，金门闸终于改建成为名副其实的闸。主持这项工程的是永定河道吕佩芬，金门闸的工程设计者和工程师则是张黼廷。是年，清廷拨银五万二千两，大修金门闸，永定河道吕佩芬请张黼廷前来协助，张黼廷久历河防，有丰富的水利工程建设经验。他亲临金门闸勘察，立即发现了金门闸的故弊：“金门闸以坝而称闸，名实既不相符，且坝有定型，不若闸启闭由人，可因水大小以为宣塞。”因此，经与永定河道吕佩芬商议，乘金门闸大修之机重新设计，改坝为闸。重建的金门闸石龙骨减为三十二丈，上辟闸涵十五道，涵高八尺，宽四尺。各涵设闸板，可任意启闭，控制泄水。闸上平板为桥，上铺黄土，可供行人往来。二月初经始，五月末告成。宣统金门闸，完全是按现代涵闸原理和构造设计的，实现了金门闸建设史上的一次革命，在永定河水利工程史上具有突出地位。

经重建后的金门闸一直保存至今。其间，1937年改建南二涵为铁闸板，1971年复加改建，引水灌溉，

其余各涵均填废，闸板、桥板已失。

金门闸是我国古代涵闸建筑史上一个典范，它反映了清代我国建筑科学和水利工程技术、水利工程建设水平的进步。它是清代二百多年间，永定河治理的见证，是祖先和自然灾害斗争的不朽丰碑，是永定河继卢沟桥之后留下的珍贵文物。作为永定河上的分泄工程，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作为一处珍贵文物，应修复原貌，妥为保护。

永定河治理的思考

水利，事关国计民生，为国之要务。治则为利，不治则为害。有清一代，从顺治九年(1652)修筑石景山以南至卢沟桥决口堤岸，至末帝宣统元年(1909)大修改建金门闸，凡十帝二百五十七年，苦求善策，历费巨帑，立官守，设河兵，役民夫，对永定河长治不懈，可谓不遗余力。顺治首启治端，康、雍、乾三世为治河全盛期，屡兴大工，建立起永定河防洪工程体系，并总结出一套科学可行的治河策略，为以后的永定河水患防治打下良好的基础。嘉庆以后，清朝开始走向没落，道、咸、同、光，江河日下，至宣统帝乃至亡国。但历代国君多亲问永定河事，尽其所能，苦心经营。同治九年(1870)，尚责成州县协理河防，以解决官方河防机构“永定河道”与永定河防区州县地方在永定河河防上的脱节，加强“河道”与州县地方协调协作。宣统元年(1909)，于亡国之先，又出巨资，大修、改建金门闸，使金门闸完成了历史性的革新。客观地说，清代永定河治理，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永定河水患的发生和灾害，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治理，永定河造成的灾害是不可想象的。

在治河方略上，清历代总结、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康熙时代首创“疏筑兼施”的方略。乾隆时代加以丰富，形成了“疏中泓，挑下口，以畅其势。坚筑两岸堤防，以防其冲突。深浚减河，以分其盛势”的治河思想，成为清后世遵循的成法。到光绪时代，更作出完备的治河说：“治有万端，两言可备，曰疏，曰筑”，以疏为主，“疏之道三：宣下口，其首务；……，浚中泓次之；……，开支河又次之。”疏永定河宜直，免其顶冲。“辅之以筑，庶无枉功。”筑，以堤防为主，“埽也，桩也，皆以护堤；坝也，埽也，闸也，涵洞也。”

清代永定河治理的基本做法是：挑挖下口，使河水去路通畅，也就是“宣下口”；自下而上清淤挖沙，疏浚河道，使河水一路顺行不受梗阻，也就是“浚中泓”；再自上游起，两岸建闸坝、开引河(减河)以泄洪分流，缓减水势，也就是“开支河”；同时修缮、筑固两岸堤防，以防决漫，也就是“辅之以筑”。这些作法是成功的，也是缺之不可的，以至成为当今永定河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清代治河没有解决永定河为患的根本问题。

永定河造成水患有三个根本原因。一是河水含沙量大。二是尾闾入淀，没有人海口，河水夹带的泥沙不能排入大海；于是泥沙陈积，淤淀淤河，以至下口淤塞，河道浅梗。三是上游一路夹山峡而行，于三家店出山后水势迅猛，排山倒海。所以，洪水骤至，下无排泄之口，中无容纳之河，一路溃决，全河泛滥。

因此，治河首先要治沙，治沙要以清源为本，附以疏浚。清源就是要从源头人手，采取措施，减少、乃至彻底根除河水泥沙，这就要在源头各大小支流流域，改善植被，附以它策，减少、根治水土流失，清除永定河泥沙来源。而清代治沙，只是停留在石景山以下河道疏浚上，河日疏而沙日淤，所以历代河员颇有人不胜天之叹。

其次，开通永定河入海通道，使永定河直达海，河水如夹泥沙即可排入大海，不至淤淀淤河，梗阻水道。清代也曾在疏通永定河去路上动脑筋，但只是在下游诸淀间屡挑下口，未革永定河入淀之敝。至于给永定河开挖独自の入海通道，清人始料未及。到了光绪年间，周家楣、缪荃孙编纂《光绪顺天府志》，已经意识到永定河淤塞在于下游无入海口，述及永定河疏浚时曾论道：“永定河与黄河异，黄河之沙可以自达之海，

永定河则沙停于淀，愈停愈高，病在下口。”但是这种卓见并未成为决策者的治河主张，即便纳此上策，国力尤恐不抵。

其三，则应于三家店以上建设配套蓄洪设施，足以拦蓄洪水，缓解水势，使水流舒缓出山，这样汛期便无水盛决岸之虞。而清代于此无所作为。乾隆九年(1744)，曾在桑干河与妫水汇合处的和合堡(今官厅附近)建小石坝两道，不久即被洪水冲毁。随后，乾隆帝设想：“于旷远无碍之地，使之稍落泥沙，微救涌急。”并派人到上游山峡勘测，但是由于当时技术手段的落后，没有结果，只好作罢。乾隆时期在永定河上游山峡地区的举动，只是出于“收束河流，以杀水势”的目的，根本没有在上游建设关系全局的大型蓄洪控水工程的构想，更没能意识到上游大型蓄洪控水工程在永定河全局的关键作用，主要注意力放在卢沟桥以下河段，而以开减河分流作为减缓水势的对策，今天看来，减水分流只能作为辅助措施。

可见，清代治理永定河，虽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策略，但是治标未治本，没有抓住治沙治水的核心，即使一时缓解患情，却不能避免水患发生。所以，从顺治九年(1652)至末帝宣统元年(1909)的二百五十七年，既是一部永定河治理史，又是一部永定河灾患史。在永定河面前，我们的祖先，是一位满身创伤，挥戈上阵的勇士。

清代永定河治理策略上的缺憾，受其历史的局限，但足以给今人以启示。新中国成立后，借鉴前代成功经验，总结历史教训，从治沙人手，根治永定河水患，已取得重大突破：

在上游源头流域，封山育林，改善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开等高倒坡梯田，以保持水土，建拦沙谷坊，阻止泥沙下流，永定河的含沙量已大为减少，从而大大缓解了永定河石景山以下河道的淤积。1954年，在上游蓄水工程建成官厅水库，基本控制了永定河官厅以上流域的洪水。其后在上游各支流修建大、中、小型水库300余座；在官厅峡建斋堂、苇子水等中小型水库，并修建珠窝、落坡岭，三家店等拦河闸坝，又于卢沟桥南右岸建小清河分洪闸。永定河水势得到有效控制。在下游开挖了永定河新河，直达海口，永定河有了自己的出海口，所携泥沙可直接排入大海。筑两岸堤防，对部分险工险段进行护砌。从全流域着眼，初步形成了永定河防洪工程体系，永定河水患基本得到控制。

但是，我们尚不能说，永定河不再为患。永定河的治理使命尚未完成。近年来，永定河未发生水患，一方面是有防洪工程作保障，一方面北方连年干旱，永定河几乎常年断流。如果遇到三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乃至百年一遇的洪水，永定河会怎么样呢？为永定河的长治久安之计，我们应以五十年一遇乃至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继续建设永定河防洪体系。进一步完善上游流域地区的生物工程，逐步形成植被封闭，使永定河水变清，无沙可淤。及时清除官厅水库淤积，以维持水库寿命和防洪效果；同时应在上游适当的位置再建一座大型水库，以确保大洪、特大洪之年，永定河水势得到控制，彻底束住永定河这匹野马，使永定河有洪无险，一路平稳。疏通石景山至下游入海处，清除淤梗，挖深河道，确保河道通畅。坚固两岸堤防，统筹规划分洪工程。

永定河流经首都北京，两岸地域广阔，人口稠密，事关首都的安危、沿岸地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永定河的进一步治理愈加迫切。确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再面对永定河，面对金门闸的时候，永定河水患已经永远成为历史。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清代二行宫

赵润东

在谈到名胜古迹和皇宫寺院时，人们常有“七十里地一行宫”之说。即从皇城出发，于不同方向沿途每隔七十华里便建一座行宫，专供皇帝和皇亲国戚、诸位大臣驻足歇息之用。出北京去西陵，房山是必经之路，在房山境内就有两座清代行宫，即黄辛庄行宫和南正行宫。

黄辛庄行宫，位于良乡精品卫星城拱辰北大街最北端黄辛庄村，现在京石高速公路良乡段东侧。此处为帝王皇亲西行谒陵途径的第一座行宫。《良乡县志·古迹》载：在县治北黄辛庄村西南，距城二里许，乾隆十三年建，为谒陵驻蹕之地。前面东西朝房，围墙四隅，更房各一。宫门以东为执房，又东为膳房。西如之进宫门，十字甬路，左右为东西阿哥所，中为垂花门，内正殿五楹，后为皇后宫，又后为照殿，四面皆回廊。循廊右行为西书房，后为太后宫。循廊左行为东书房，后为春丽斋，斋后假山屏列，松柏数株，皆百余年物也。正殿匾曰“香清绣影”，联曰“远近咸安耕凿乐，春秋时动露霜情。”

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这座行宫建于清朝乾隆十三年。它座北朝南，规模宏大，豪华壮观。行宫整体建筑占地面积四十余亩，其建筑格局为，最前端为东西朝房，进深为第一层大殿——大宫门，明三暗九格局，硬山石板盖顶，调大脊。两侧有配殿各五间为执事房。院内有牌楼和古松柏，树高约10余米，干径周长达3.5米。垂花门两侧有阿哥住所，过垂花门进入第二层大殿——前王殿，俗称三通殿，也是明三暗九，硬山石板盖顶，调大脊。两侧配殿各五间为东西书房。西书房后有太后宫，东书房后有春丽斋，院内有牌楼。穿过第二层大殿进入第三层大殿——后宫，其建筑形式、规格与第一、二两殿相同。行宫的后面是花园，花园内堆砌假山，植有奇花异木。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黄辛庄行宫在良乡县北五里。”“黄辛庄行宫建自乾隆十三年，每岁为我皇上谒陵驻蹕之地。”

乾隆十八年《御制良乡行宫晚坐》诗写道：

又驻行时蹕，萧齐可意清。
去来时屡易，今昔念交萦。
习武遵前迹，均劳验众情。
春云傍晚重，希泽为新耕。

这座建筑宏伟的行宫落成后，便有一批行宫护卫和武林高手住在院内，习武传艺，迎候帝王。著名武术大师王占春就是这里的老艺人，他传授“五行通臂拳”于弟子，至今传为佳话。为迎接帝王西去谒陵，黄辛庄还兴办了龙灯会等流传至今。《良乡县志》记载，清宣宗成皇帝《戊子季秋黄辛庄行宫即事》诗曰：

霜降平皋颢气清，晚来行馆亦怡情。
房山晴霭无边秀，易水秋风第一程。
乍见疏林叶初落，最欣长亩麦皆萌。
幸恩债事真堪恨，成事翻然又不成。

由于年深日久，乏于修缮，加上日剥风蚀，行宫建筑所剩无几。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一座殿，面阔三间12米，进深7.4米，柱高2.9米，柱础为古镜式。大殿的顶上铺上了水泥瓦。装修改成了玻璃门窗，屋内

地面也改成了水泥地面。槛墙用水泥改过，台阶为三阶，垂带踏跺台基高 0.5 米，此外，行宫基址还保存着

花园、假山和几十棵古松古柏。

从黄辛庄行宫西南行 70 里，为汉高祖刘邦封二十九县之一——西乡县，即现在长沟镇，镇西约五里有南正村，这里还有一座建筑规模十分壮观的清代行宫，即南正行宫。

它座北朝南，占地 30 余亩。临泉依坡，水秀山清。据史书记载，当年宫前面有华美的汉白玉拱桥，叫“御河桥”。过了御河桥是宽阔的小广场。御河桥左右是两座月台。广场后面为行宫主体，黄瓦红墙，重檐庑顶，两层殿堂，另设配殿和回廊。在东西长廊墙壁下

良乡行宫平面图

(赵润东 提供)

镶嵌着乾隆皇帝时刻御制诗三十首。其中《过卢沟桥一首》道：

卢沟桥北无河患，卢沟桥南河患频。
桥北堤防本无事，桥南堤防高嶙峋。
地长河尔随之长，行水墙上徒劳人。
我欲弃地使让水，安得余地置彼民。
或云地尔不必让，但弃堤防水自循。
言之以易行不易，今古异宜难具论。

行宫建成后，清历代帝王赴西陵谒陵均由此经过，且多次于行宫驻蹕。据《房山县志》记载，此处曾设“千总”、“外委”、“旗兵二十绿营”等，作为护卫之用。据当地老人讲，当年这里有个人叫国泰，是乾隆皇帝的表弟。他依仗皇权十分骄横，“广杆旗子能调十路兵。”国泰任山东巡抚期间，该地区接连三年闹灾荒。国泰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害得百姓逃荒避难，四处求生。当地流传着一首歌谣：“一年不打粮，二年闹灾荒（指蝗虫），三年发大水，闸草上两子，黑豆穿线秤上量……”后来，有个举人左连成及京师众举人联名告状，告到刘大人（刘墉）的镇山主二喇嘛那里。谁知管着二喇嘛的大喇嘛正是国泰的镇山主。告状不成，被罚四十大板。乾隆得知此事，非但不追查国泰，反而赐他“可以骑马穿金釜”。从此以后，国泰更加放荡不羁。当时，还流传着另一首歌谣：“国泰做了济南府，好比出京的二朝廷，见了百官不下马，到了金釜才下蹬。”可想当年的皇亲国戚是何等的骄蛮。

岁月悠悠，历代帝王和皇亲国戚如风卷残荷，被岁月淘去。只可惜的是，一座豪华壮观的古建筑，在军阀混战和抗日时期也未能免遭劫难。从民国十四年始，行宫院内树木被伐变卖。

1939 年，行宫又遭炮火。之后，宫中建材运至长沟村盖了学校，一直到现在。幸运的是，行宫里的二十七块乾隆御制碑刻至今镶嵌在长沟中心校教室的墙壁上。

长沟古镇，交通畅通，土沃泉幽，自古为房山之重镇。随着旅游事业及经济的发展，域内古迹及文物必将得到开发和利用，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必将得到充分的展示。

（《房山文史资料》第 15 辑）

房山八座清代官吏墓记

张玉泉 刘景田

在房山区西北至西南一带的丘陵山地中散列着一、二十座清代坟墓。这些坟墓除少量的亲王、郡王、贝勒、公主墓之外，大部分是上层官吏之墓。他们中有将军、巡抚、总督、督统、内阁、学士等，都是朝廷命官，分管一方的重任，为建立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立下过汗马功劳。现就墓地尚存建筑物的八座墓及墓主身世作一粗略介绍。他们是：镇海将军王国光；直隶总督那苏图墓；安徽巡抚孙国玺墓；勇略将军赵良栋墓；内阁大学士、督统耆英墓；通议大夫杨斗垣墓；华文殿大学士伊桑阿墓以及少保大学士黄廷桂墓。

镇海将军王国光墓

闫村镇公主坟村，因明永乐皇帝之女永安公主安葬于此而得名。进入清康熙九年(1670年)，公主坟又有一位清顺治年间的开国将军安葬在村西，他就是镇海将军王国光。

王国光先世本满州，姓完颜氏。汉军旗制定，隶属正红旗。其父王一屏在天聪八年(1634年)授为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元年(1644年)王国光由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升为都统。顺治六年(1649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伐叛将姜琅，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顺治十年(1653年)从定远大将军屯齐征湖广。十二年(1655年)再从宁海大将军伊勒德援浙江。十三年(1656年)二月任两广总督，加太子太保。两年后因疾解任。康熙帝即位后，授镇海将军，驻广东潮州。康熙三年(1664年)与平南王尚可喜讨伐叛将苏利。康熙五年(1666年)返京，仍任本旗都统，康熙九年(1670年)卒。

王国光之子永誉，官至广东将军、都统，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卒。乾隆十八年(1753年)，命其族改隶满洲正红、镶白旗。

将军坟在公主坟村西一里的山坡上，坐北朝南，占地四亩。东北两面环山，墓前两侧为河沟，环境幽静，景色秀美，墓于“文革”初遭破坏。墓地前曾改做生产队场院，后由张姓村民承包耕种。目前墓地已被全部占用做煤场。墓前的一对六角望天吼柱已被推倒垒进墙里。院里仅存吼柱基石和驮龙碑底座。原有高大的三合土宝顶已被夷平，盖上了排子房，坟前的石碑和石五供桌已做基石。

王国光墓地早已面目皆非，如果没有残存的碑底座和柱基石人们很难确认。

注：

- 1、镇海将军：爵名，清为宗室封爵九级，在不入八分镇公下，武散官名。
- 2、阿思哈尼哈番：清爵名。顺治四年(1647年)定名，乾隆元年(1736年)，定汉字为男。满文如旧。
- 3、督统：官名，顺治十七年(1660年)定为固山额真，汉语为都统。清制各省驻防八旗兵，置将军或都统为长官，统管地方军政。

直隶总督那苏图墓

在周口店地区西庄村，村北部有座规模宏大的清代坟茔，占地十余亩，坐北向南，北依金陵遗址九龙山东侧，南傍周口店坝儿河，东西两侧为坝儿河的支流，整个墓地被青山绿水环绕，景色迷人。墓地北端，有土坟一座，高约10米，上面长满了灌木。坟头前约5米处有汉白玉供桌，长约2米，宽约1.5米，厚约0.5米，高约1.6米。供桌四边雕有盘肠、云朵等花纹。供桌两侧各有两根石蜡千，高约2米，蜡千底座和柱上雕有花朵和盘龙。距大供桌前3米正中有三腿大香炉一座，高约1.5米，炉上雕有蝙蝠、花卉、鸟兽等。雕工精细。距坟墓20米处的最南端，有汉白玉碑两通。分立在东西一条平行线上。东为汉文，西为满文，龟趺螭首，两碑通高4米余，宽约1.2米，厚为0.4米，碑首为二龙戏珠，雕工十分细腻。两碑均于“文革”中推倒、摔断。大部分文字被风化，从可辨认的文字中可确认：该墓主为原大清直隶总督那苏图，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二月十九日立碑。

那苏图，字羲文，满族，镶黄旗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袭拖沙拉哈番，授兰翎侍卫。雍正初年(1723年)，迁兵部侍郎。四年为黑龙江将军，八年调奉天将军。乾隆元年(1736年)升兵部尚书，旋出湖广总督。六年，任两江总督。七年，调闽浙总督。十二年加太子少保。十三年(1749年)加太子太保，授侍卫大臣，任直隶总督。当年卒，谥号“恪勤”。

此墓被当地百姓称大卞家坟(可能是随看坟者姓氏而起名)。

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清乾隆时曾把那苏图派往金陵令其重建金陵，恢复太祖睿陵、太宗恭陵，熙宗恩陵等陵墓时，他偷偷在此处定下自己的万安之地，在这块风水宝地修筑了自己的陵寝。不料此事被人告发，那苏图被判欺君之罪。皇帝赐死。后又觉处理过重，才在此给予厚葬。事实并非如此。

注：

- 1、沙拉喇哈番：散武官，云骑卫，从五品。
- 2、兰翎侍卫：兰翎，清官员冠饰。皇帝近臣领侍卫府官。属五品以上者皆戴孔雀花翎。
- 3、侍卫大臣：官名，清初选三旗子弟为侍卫。侍卫大臣为侍卫统领。

安徽巡抚孙国玺墓

在坨里镇上万村西南半里许，有块三面青山环抱、环境清幽秀美的墓地，当地百姓称做王家坟。其实该墓地主人是清乾隆初年的安徽巡抚孙国玺。

该墓地座北朝南，占地十余亩，坟茔后边筑有波浪式的半圆形围墙，拱卫着坟墓，呈黄褐色，与墨绿的麦田相对照，十分显眼。围墙由坚硬的三合土打成，总长91米，墙高2.5米，下宽上窄，墙底厚2.5米，墙顶厚1.2米，虽经三百多年的风雨侵蚀，墙圈完好无损。坟墓早已无存。坟址呈低洼状。解放前就被挖掘，大平大整土地时出土过条石、清官服饰、棺木等物。碑前地阶下有三合土铺地，由此可以确定墓前地上有建筑物。坟址前左侧立有一通汉白玉祭祀碑。螭首龟趺，上刻汉满两种文字。碑高3.3米，宽1.5米，厚0.4米，额阳刻有尺余正方篆书“谕祭”二字。

孙国玺的生平不详，仅从碑文中得知，他生前任安徽巡抚。病故后，于乾隆五年(1740年)特颁祭葬以慰幽魂，并建墓立碑。文中对他的政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文曰“鞠躬尽瘁，臣子之劳，特赐恤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文中还对他的人品给予较高的评价“孙国玺性行纯良，才能称职，方冀透怜”，文后还表达乾隆悼

念之情，为了使其“名垂史，聿昭不朽之荣，特颁赐葬以慰幽灵”。

注：

巡抚：官名，清巡抚从二品官，视察吏治检查民政、处理刑狱。一般每省一员，地位仅次于兼辖二、三省的总督。

勇略将军赵良栋墓

孤山口村西北的群山脚下有座清代将军坟墓，名曰赵将军墓。坐北向南，北依一座椭圆的小山包，名叫平滩，两侧有平矮的小丘陵环抱，形似一顶清官帽。左侧有条小溪从山后绕墓前流过，形成三山环绕一面流水的小盆地，墓占地十余亩，呈长方形，平坦如镜，京原铁路高高的路基从墓地前山口横过，把墓地封闭起来。

将军墓墓主在最北端小山包下的台地上，是个大宝顶，原高约5米，顶子全部用三合土覆盖，底座高约1.2米，用砖石砌在四边，底部占地面积约10余平米，宝顶左部有地宫向西延伸，地宫为青砖垒成，上盖大理石条石。民国初年被盗。后曾从地宫中出土过几口棺材木料，可能是墓主妻室。现地穴已塌陷，宝顶、台基砖石在抗日战争中被日伪军拆往村北，建了岗楼。现仅剩低矮的黄土包。

墓地从南至北，原有大红宫门，两侧蹲有近两米高的石狮，已被砸坏，推入河沟中。门内有两根并列的望天吼，现仅剩小半截躺在地上，一柱顶和一截儿残破的吼柱。石供桌、香炉、小石鼓早已丢失。据墓主后裔82岁的赵福臣回忆，早年墓地全部被古松柏覆盖，郁郁葱葱，十分庄严、肃穆。现仅有几棵一抱粗的果树，一片荒凉。

据《清史稿》载：该墓主名为赵良栋，字擎宇。甘肃宁夏人，祖籍为山西榆林。顺治二年(1645年)晋升高公游击。顺治十三年(1656年)援宁夏水利屯都司、督示伸中军副将。至康熙元年(1662年)授予山西大同总兵。康熙十八年(1679年)授勇略将军。十九年(1680年)晋升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仍领军衔。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授一等精奇尼哈番。

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卒，终年77岁。赐葬后谥号襄忠。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追晋一等伯。

在赵良栋坟墓左右两侧地阶下，尚存两个小坟，疑为墓主的两个儿子。赵良栋的大儿子赵洪灿，曾任江宁总督、两广总督，后升兵部尚书，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卒。谥号肃敏。二儿子赵洪燮，曾任河南巡抚，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卒，谥号“敏恪”。两子均为皇帝赐葬。

注：

1、勇略将军：清代武官名，从一品。

2、精奇尼哈番：爵名，顺治四年(1647年)定名。乾隆元年(1736年)定汉字为子。

内阁学士兼督统耆英墓

在今青龙湖镇大马村村西有座丘陵，满山遍野的松林，故名叫松树坡，坡下是个小平川，植满了桃树，平川上有座清代坟墓，座西朝东，当地人称耆大人墓。墓地地上建筑物消失，只有阴宅房基和东侧通往墓地一座青条石平桥尚存(桥长4米，宽3米，桥空高仅有1米)。墓地北侧有条小河(刺猬河的上游)由西北向东南从墓前绕过。两岸绿树成荫，景色十分秀美。

墓地上除原有宝顶、供桌、祭祀碑之外，还建有祠堂、月台、享殿等建筑物，占地十余亩，四周建有花墙，植满松树。看坟者姓马，故耆英墓曾有马家坟之称。

该墓与众不同之处，享殿过厅处有一个木头人，身穿清侍卫服，坐在迎门口处。一有人踏进门槛，踩着了机关，木头人会立刻站起来，不知情者初入过厅会吓一跳。

所说耆大人墓即耆英之墓。耆英(1790年—1858年)字介春，爱新觉罗氏，满洲正兰旗人，历任太仆寺少卿论一副督统，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礼部尚书、盛京将军等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月初任广州将军兼钦差大臣，赴粤向英军求和，成为清政府妥协派的代表人物。同年八月他与伊里布(前任钦差大臣)授权与英人签订了《南京条约》，广州成为通商口岸，但未规定外人可以入城。英人强行入城，激起广州市民的坚决反抗。耆英见众怒难犯，即让英人暂缓入城。1846年1月英驻华公使德庇乘兵舰直驶珠江，胁迫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张贴准英人入城禁止市民阻挠的告示，耆英立即照办，还派广州知府刘浔通知英订期入城，激起广州市民的反抗，怒斥官府无耻，闯入衙门烧毁刘浔的朝珠官服，并张贴攻打洋馆的告示，吓跑了德庇。耆英在英军入城中执行了“抑民奉外”的政策，后密许英人两年后入城。

同年9月，耆英任两江总督，兼管苏、浙、闽善后通商事宜。在英方的要挟下，他向朝廷奏陈诬陷在台湾抗英的姚莹、达洪阿，致使二人被革职。1843年7月28日，耆英在香港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当年10月又在虎门签订了《虎门条约》。1844年任两广总督，与美签订《望厦条约》，与法签订《黄埔条约》。之后分别与葡、比、瑞、挪、西、普、丹等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任文渊阁大学士。1850年咸丰帝继位，将其革职。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咸丰八年(1858年)命其赴天津交涉，遭英国公使拒见，擅自回京，因此获罪被处死，享年68岁。

注：

太仆寺卿：官名，为掌车马之一官。南宋太仆寺归兵部。清沿用。清末废归属陆军部。

通议大夫杨斗垣墓

在长沟镇西甘池村村南的一片丘陵地上有清代顺承郡王家族墓地，里面的宝顶和石碑特别引人注目。而村北坡头下的园田中，杨斗垣的墓地却鲜为人知。

据《房山县志》载：“清杨斗垣墓在西甘池北，斗垣官浙江布政使兼台海道事，有碑，康熙十八年立。”

在村北一座山坡前一片翠绿的园田中，一通银灰色的大理石墓碑立在正中，座向西北面朝东南，在阳光的照耀下烁烁生辉。圣泉河从西向东在墓前涓涓流过，两岸绿柳依依，蓝天、白云、绿地在灿烂阳光下显得特别秀丽。

杨斗垣墓碑的规格较小，通高不足3米，宽约1.2米，厚0.4米，碑首刻有“皇清”两个篆书，四周是凹进的云朵和海水江牙，图案模糊，石质较差，做工粗糙，刀法简单。

碑心正中从上至下是楷书扁字：“通议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参议加一级仍管台海道事斗垣杨公之墓”。右前为一行小字：“康熙十八年(1679年)岁次己未八日吉旦”。左下落款有五行并列的人名均为杨的晚辈：

吏部候选通判孝男	杨天枢
吏部候选知县孝男	天 楫
吏部候选知县孝男	天 柄
恩生孝男	天 柱

孝孙 文耀
合奉祀

碑阴无字。承重的螭首龟趺，又瘦又小，浮雕纹络粗浅。碑后十余米处的荒草地上有花岗岩的供桌一个，长2米，宽1.5米，厚0.4米，雕工简陋，两侧有支桌的条石高0.5米，杨的坟头已找不到痕迹。

从墓碑文字上看，记载很简单，只能说明杨的身份，没有生平、政绩(祭祀文)。也没有皇帝赐葬的记载。从落款上看很可能为家葬。其原因无从考证。

注：

- 1、通议大夫：文散官名，参议朝政之事。隋始建，从唐至明、清沿用。清从正三品，概授通议大夫。
- 2、布政使：官名，清沿用明制。掌全省民政、田赋与户籍等事。为总督巡抚属官，每省一人。使司参议协助布政使者。
- 3、台海道事：管理所辖沿海各县行政、通商事务等，隶属省长。民国三年袁世凯公布省、道、县官制，一省分数道。

文华殿大学士伊桑阿墓

在皇后台村南，有全区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一组清代石雕石刻，这就是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的原任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二级谥“文端”伊桑阿的墓地。墓地座西朝东，建筑豪华气派，且庄严肃穆。从东向西最前面有华表一对，制作精美，八角须弥座浮雕仰覆莲花，八棱柱周身雕有云朵，柱顶的望天吼眺望远方(而今仅剩南侧一只)。吼柱后有墓碑一通，石狮一对(南侧一只已倒)，大型石牌坊一座，牌坊后(宝顶无存)尚存华表一只及石碑两通。这是一组清代高超的石雕艺术精品，是研究清代历史的艺术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用大理石精雕的石牌坊，五门六柱，面阔21米，方形通天柱，柱头雕有云朵，高耸入云。明间的横额上刻有楷书大字“崇祀贤良”，梁下垫板刻有“大学士伊文端公之墓”。各间横梁上有仿木的庀殿顶，斗拱挑重檐。每柱两侧有抱鼓石保护，使主体更加坚固。石牌坊选料精细，构思独特，别具一格，是全区仅存的几处牌坊规模最大的石雕建筑。

伊桑阿是清康熙初年的朝廷重臣，生前的政绩十分突出，颇受朝廷信赖，其生平简略如下：

伊桑阿，姓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1652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后升内阁学士。1675年兼礼部侍郎，升工部尚书，调户部。当时吴三桂盘踞湖南，朝廷筹建舟师，命伊桑阿赴江南督治战舰，从岳州入洞庭湖断贼饷道。

1665年，黄河决口，命伊前往江南勘视河工，以布政使崔继雅随行，在黄河两岸堤工修筑。又复命筹海运，奏书：“黄河运道，赖以通行，国家在所必治。若搞海运，先需造船，所费不费，且胶、莱诸河久淤，开通匪易。”是年冬，俄罗斯侵犯边疆，命往宁古塔造船备征。再调吏部。

1668年秋，又奉命南巡，阅视海口后，向皇帝奏书：“车路、串坊诸河及白驹诸口，已淤，引流入海。”1670年封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充三朝国史总裁。1676年亲征噶尔丹，命往宁夏安设驿站。事平，与大学士阿兰泰充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

伊桑阿居政十五年，尤留意刑狱，对每个罪犯都知其精详。皇上御批者，伊桑阿以折奏请旨，使十余人皆得缓死。皇帝谕曰：“此等犯皆当死，尤曲求其可生之路，不忍轻毙一人。因念淮、扬百姓频被水淹，死者不知凡几。何患不除，朕不能暂释于怀也。”伊桑阿陈灾民困苦，状上曰：“百姓既被水害，流离转徙。田多不耕，赋安从出？今当予免田赋……”伊桑阿上书后，朝廷遂下大诏：免除淮、扬明年田赋。

1670年曾受到皇上高度赞誉，谕曰：“伊厚重老成，宣力年久，自任阁事，推诚布公，不惟朕知之，天下无不知者。伊虽年老求罢，朕不忍令去也。”1681年复以病告。逾年卒，谥文端。后人祀贤良祠。

注：

大学士：官名，顺治十五年，置中和、文化、英武诸殿大学士，清大学士官阶为一品，为文臣最高级。

少保大学士陕甘总督黄廷桂墓

在张坊镇东南的南白岱村北有座清代坟墓——郝家坟，此墓即是黄廷桂墓，详情已刊在第十三辑《房山文史资料》。

参考书目：

- | | |
|--------------|-------|
| 1、《清史稿》 | 中华书局 |
| 2、《中国历代职官词典》 | 北京出版社 |
| 3、《北京文物辞典》 | 北京出版社 |
| 4、《中国历史年代简表》 | 北京出版社 |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作者刘景田系原北京市丰台区云岗发电厂工程师

公主坟村的三座墓葬

卓成栋

房山区阎村镇公主坟村建村历史悠久，听村中老人讲，村中几大姓氏村民中，有的自明洪武年间来自山西，因看中了这里的风水，便在这里住了下来，后繁衍成村落。也有一种说法是该村建村历史早于明代。原来村所处位置是东南西北西山间一片洼地，其水源丰盛，水质极佳，故当时人们称这里为“金水洼”。

过去，人们择水而居，在水洼西北向高岗处建成村落。适逢雨季水自高岗村街处南北向流向两侧，故这里人们也曾把此处叫为“分水岭”。再后来有人落户成村，在村中建庙的和尚便在庙外打了一口甜水井，井口用大青石砌成，因百姓与和尚长期用井绳汲水，竟在大青石的井口磨出了九道绳痕，故老百姓又把该村叫成“九道渠”。此外也有一种说法，即：因公主坟村这口井是远近闻名的甜水井，也是附近村落中的“官井”，因此打水的人多，井口大青石上开了五处汲水口，故这里也被老百姓叫成了“五眼井”。后来，明代的永安公主墓建在这里，该村便叫成“公主坟”了。

那么，明代永安公主为何选中了公主坟村呢？说来也有一定的原因。一种是风水说，公主坟村的地势呈

西北向高东南向低，北向坡像一面影壁把来自西北向的风遮住，与东南的坡形成一处山形相圈的小盆地，不仅土地肥沃，而且水源充足，冬天北风过不来，盆地间受稍矮的东南向暖气流影响，村中不冷。夏天，南向风向西北刮来又被村北山怀挡住折回南再遇南坡折回，风势锐减刮过水面，再吹到村子又显得凉意融融。再一种说法是地壳构造原因。南北二山场系石山，北山面南东西向各有两道小丘，其丘系两道石山梁，南坡面北东西向地各有两道小丘，其丘也系石质，惟有两山间的平地是厚厚的黄土，一直延至南北山脚。后来这里被皇亲国戚选中，成了明朝永安公主及其驸马的墓地。

不久前，公主坟村因村委会办公处施工挖出一通石碑，碑额上书“大明永安公主之墓”。据说此前曾出土过该碑的下半部碑文部分，至今仍存于村民家中。

公主坟村的明代公主坟墓位于村西北坡梁的山脚下，距村中心五里许，座北朝南，背倚山坡。该山原叫“佛前山”，当地百姓叫“坡顶山”。墓东西向均有两条小山脊从佛顶山向南延伸，墓址位于东西向和北向山坡怀中，占地约有三分多，坟高7—8米，坟墓前为享地，地下均是厚厚的黄土层。享地前过去建有享殿和牌楼。解放后地表建筑无存，仅存一高大坟包。1958年村民将坟包挖掘，只挖出一硕大的瓷釉花缸，缸壁被砖石砸出一洞。墓室有地面三间房大小，墓内其它随葬品均无，系早已被盗掘过，因位于墓的西北向就有一个盗洞。这个地表坟墓也已于农业学大寨时平掉。

与村北公主坟相对映的村南山坡前，也有一处高大坟墓，该墓与公主坟规模不相上下。据村中老人讲，该墓原为驸马墓，系与村北大明公主原为一对恋人，因尚未结婚公主便先他而去，故死后葬到了一起。也有一种民间传闻为，公主与驸马生前曾来过这里，因看中了这里的风水，许下死后归葬此处的誓言，故公主与驸马的墓同时建在了这里。

驸马墓地势与公主墓类同，只是朝向相反。过去这里有墓碑和坟包及墓外建筑，只是毁之于更早年代。

公主坟村子不大，可墓地建有多处，村西还有一处为在当地很有名的将军墓。据了解此处墓葬主人姓王，因征战沙场屡立战功，后来在一次战斗中战死，头被砍下，皇帝为厚葬其身，配以金头葬在此处。由于是“金头”，故墓早就被盗，解放后尚存墓包，墓碑、牌楼、石柱、石羊等，后来平整土地时很多遗存被毁，现仅存二个石柱柱头，上雕有精美的“望天吼”，现仍存于原二队场院处。

文革期间将军墓巨大墓碑被村民们炸毁，石牌坊被拆，石柱、阶条、墓砖用于砌筑牲口棚，部分石料残件散落于庄稼地中。原墓坑尚存。前些年平整土地在将军墓处发现一通碑刻，根据见者说明，疑是墓誌，现被掩埋于墓坑附近的水泵坑中。

据老人讲，村南山坡上原有高塔一座，样式与良乡塔类同，后塔毁于清代。前些年修路，曾用推土机推出过塔墓。

总之，公主坟村虽小，却拥有众多的文物探寻和研究价值。光就公主坟村的历史就是一部耐人寻味的读物，可供人们闲暇时品味研究。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房山的古矿遗址

卓成栋

在史家营乡柳林水村南侧的任家堡坡上，很早以前就有“七十二间房”之说。原来人们都认为那里是一处天然溶洞群。当我们真的攀上高高的山坡，来到“七十二间房”的遗址前，才真相大白。所谓的“七十二间房”、“古洞坡”原是几百年前古代劳动人民开采银矿砂的古银矿遗址。

古银矿遗址分布在任家堡坡与霞云岭北直河村交界的古洞坡的山下，矿井井口分布在这面山梁的腰部。据调查有大小矿井口十几处，深的可由柳林水三队的坡面直钻到霞云岭乡的北直河村的古洞坡。浅的有几十米，也有几百米的。“七十二间房”之说的矿洞，原为古银矿采矿工人居住的场所。它们沿山崖的走向开设，一洞套一洞，一间连一间，面积大则几十平方米，小则几平方米。有的矿洞仍遗留有过去矿工睡觉的土炕，洞内有放油灯之处，放物品之处，供奉佛龛之处。据当地老人讲，刚解放时，人们上山来这里还发现有土炕上铺的被褥，只是一动就已风化。

“七十二间房”过去名声很大，在京畿几乎人人知晓。许多北京的老人，都知道在京西宛平的大山深处出产白银。正是因为白银矿藏的存在，才形成鲜为人知的古矿遗址。这些矿址沿任家堡坡的腰部向东南西三个方向延伸，呈放射状分布，矿井约有一百多个。沿“七十二间房”一线矿洞依山崖而凿设，大洞套小洞，间间相连、相通。当你走进去，简直到了一个洞穴的世界，高高低低，错错落落。我们一连查看了几十个矿洞和开设的住人单间，大小虽然雷同，但布局很是考究。凡居人所都面向坡阳，凡矿洞都以山岩矿床的走向分布，故而形成这大山深处奇妙的矿洞群。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我选择了一处较大、较深的矿洞作为调查的对象。六人轻装简从，钻进靠任家堡坡西南的一处矿井口。

起初洞口窄小，人匍匐方可进入。进入隘口，里面豁然开朗，洞口一变三，向上、向下、向中。向上洞进十几米忽然到头，向中往左又是几十米，而且洞的两侧小洞很多，极似地道战中的杀敌掩体。短则几尺，长者几米或数十米。我们选择了一处小洞口试钻，一下子钻进30多米，可里面仍有可钻之洞穴，只是太窄我们没有进去。

最后我们选了下面的洞口钻人，前行几十米，里面又多出了几个洞口，要不是有向导的指示，简直就会迷路。过一道斜型小洞口，再向左下，右拐，洞体又大了。我们用手电灯光搜寻洞壁和脚下，发现有前人留下的路标，最明显处是一处北京大学学生留下的痕迹，红色箭头指示着前行方向。据向导讲，十几年前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是请了当地的向导曾考察此处矿洞，但没有找到出口而告失败。

矿洞仍向前延伸，支洞越来越多，我们有时走在宽阔的大厅之中，有时在狭小的隘口里爬行，有时上到高高的洞顶，有时向下向下，就如掉进深渊。还好，由于向导的作用，我们的行进始终是顺畅的，只是年轻人好奇，每个洞他们都要去看看，钻钻。我们的行进很慢，这时入洞已有两个小时，矿洞仍然向前延伸。忽然，向导在一个三叉的洞口停住了，其中两人叫我们先等下，他们钻到右侧一个支洞说去探探，近一小时后，三路人马才又回到三叉处。听他们一讲，这两个支洞都很长，一直没有走到尽头。也可能是洞有另一个出口吧？

汇合后我们又前进了。前面出现了古矿井支撑用的木桩，矿工用的锤把，以及取暖用的木炭。一位同志还拾到了一个用来照明用的陶制油灯，看其烧制的型制，估计最少也有五百年的历史。洞中还有很多朽木，

从腐烂程度上看,年代已是十分久远。

沿路一处绿色的岩壁引起我们的注意,同行的老任说:“那是胆矾矿石,氧化后形成绿色,这种矿石山里人用它为羊治肠胃病效果很妙,它常伴着银矿生长”。我们剥开氧化层,里面便露出了晶莹闪烁的银矿砂。

我们又到达了一处贮满清水的大洞穴处,这里水清味甘,据说可以和矿泉水媲美。再行是一处向下的深穴,用石探之,当当之声不约于耳,两位大胆的年轻人要以身再探被我们拦住。沿洞前行又数十米,见有风迎面,再行一丝光亮一闪,有人大喊起来“到出口了!”此时我们一看手表,进洞已有四个小时,所行路程最少也得3000米以上。出得洞口才知对面是霞云岭乡北直河村的古洞坡了。

据考证“七十二间房”古矿遗址,为明代永乐年间开采银矿砂遗留下来的。里面矿洞四通八达,采矿已吃通了大山的底部,且洞洞相连相通,里面遍布古代人采矿的痕迹。洞中有生产现场,有居住场所,有通行的主巷道,有通风的风巷口,有供人食用的水源,真可谓一处古银矿开采的地下博物馆。

目前,类似这样古矿遗址在我国北方地区了了无几,保存的这么完好、完整更是绝无仅有。如此处从旅游的角度加以开发,使当代人充分的了解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进行矿冶开采,更具有历史意义。更何况这种类型的景点在我国国内乃至世界上都是不多见的。所以发掘这部分资源,将对人类和社会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七十二间房”古矿遗址的外部自然条件也是非常之好的。它地处京西奇险“圣米石塘”自然风景区附近,与其隔河相望的是一条向西南的沟谷,谷中果木如林,风景优美。柳林水水库座落其间,又有公路直达山脚。只要修通到达山腰的石阶蹬道,对矿井内部稍加整理,就可以对外开放,接待游人。

“七十二间房”是一处古代人遗留下来的珍贵的历史遗迹,如能开发和妥善保护将对人类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抚今追昔话窦店

赵润东

窦店镇是座古镇,位于北京西南40公里,地处古燕中都地良乡与商周遗址琉璃河之间,距迁址的房山区政府所在地良乡12公里。

据史书记载,窦店古城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今窦店村西,为中都县,隶燕上古郡;秦代为良乡县,隶广阳郡;汉代为良乡(或梁乡)(王莽时改称广阳)侯国。西汉高祖六年(元年前201年)置,隶涿郡;王莽时属垣翰郡(涿郡改),东汉复属涿郡;到了三国(魏)时期,窦店西古城仍为良乡县治邑,文帝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涿郡改称范阳郡,良乡属之;南北朝时期,为良乡县治邑,北魏、东魏时属燕郡,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复设,北周时属燕郡;隋唐时期,为良乡县治邑,开皇初废燕郡,改属幽州总管府。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罢府置郡,改属涿郡。武德至开元末年(公元713—元年741年)相继属幽州总管府、幽州大总官府、幽州都督府和幽州大都督府,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属范阳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改属幽州。

据《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广阳故城以其属广阳国,亦谓之小广阳。后汉初耿弇追贼至小广阳,即

此。”“阳乡城在县南二十五里旧店西一里许，旧传窆建德筑。”“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为夏王窆建德五凤元年，建德定都乐寿，取深冀易定等州，又尝攻李艺于幽州，此城或其时所建与！”所谓旧店即今窆店。旧店改称窆店，是由随末农民起义领袖窆建德在旧店修筑古城阳乡城所至，窆店即由此命名，沿袭至今。

窆店古城位于大石河东岸，南距董家林古城3公里许，东距京广铁路约1.5公里。1951年1月，北京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调查此城，命名为“窆店古城”，认为大城外墙是“郭”，系堆积而成，大城内设子城，由大城内墙夯土中出土陶片推断筑城年代“当是战国末期到西汉”，为汉之良乡县。1962年3月至6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又一次调查该城址，确认古城分为大城、小城两部分。并对大城内之小城作了建筑年代不早于辽代的具体分析。

大城平面近方形，方圆128万平米，周长约4500米，始建于战国早期，战国晚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修，为燕国抵御齐、赵的一座重要的城镇。大城西南邻芦村，东北为六合庄，东靠窆店镇。有内外两道城墙，两墙内侧间距16.9至19.5米。南塘保存略好，西、南、东三面墙因紧靠村庄而残缺甚多，北墙则由于大石河改道，加之人为破坏，已荡然无存。西墙方向为15度。显然与西侧为河道有关，北部被河道冲毁，河以南部分残长830米。南端一段约50米被取土破坏。南墙基本正东西方向。全长约1230米，保存完好。西部约658米一段两墙共宽40至50米，内墙现存最高处高于城内地表6至7米，高于两墙之间地表4至5米，外墙宽约18米，南侧因取土、耕种，地势甚低。东墙中部，窆店至房山公路通过处，距东南角约490米，城墙无存，地势较低，与西墙中部城门遥相对应，应为大城东门。北墙现为河滩洼地，城门无从寻找。

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北部，北墙被河流冲毁，东墙近期大部破坏，城内为板桥村址。小城西墙多处残断，高于地面2至5米，从几处剖面都可看出小城西墙在大城内墙东侧起筑。西墙原长应为450米，南墙全长近440米，西端与大城西墙内墙相衔接，南侧被断崖破坏，东部在板桥村东，地势低洼以破坏殆尽。小城西南角切去了原大城西门北侧夯土，使大城西墙完全断开，以利小城防御。根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北魏时期弃大城，筑小城，作为良乡县治，直至五代的后唐移至于今良乡镇。又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良乡，汉县，属涿郡，至隋不改。”故小城为北魏时期地良乡县治。北魏时期经多年战乱，经济遭到破坏，人口锐减，据《魏书·地理志》载，燕郡所辖良乡等五县，人口总数仅22559人，因而改大城为小城，以利防守。千年古城历尽沧桑，终于失去昔日巍峨，逐渐被夷为平地。

纵观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当年的窆店镇阡陌交通，四通八达，历来为兵家交通要冲。它历经沧桑，绵延千余载，成了中原的“京易御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为了达到“示强威，服海内”的政治目的，于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治驰道于天下”。设秦驰道通过此地而东巡碣石；魏晋南北朝时，窆店又成为汉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和主要场所，也是北方各族起义军与北魏官兵多次交锋争夺的古战场；隋炀帝出师，水陆并进，其陆军线路经由窆店，直指高丽。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此处道路得到进一步修整，同时筑城派兵把守；到了宋、辽、金时期，由于兵家混战，国不安宁，道路时有兴废。元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建都北京，历代帝王在境内的活动也日趋频繁。因此，明、清两代大修御路，更使这里成为南北交通大干线的要冲。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肥田沃土，物产丰腴。或军事需要，或因帝王活动频繁，兴衰起落，每每显示出一片繁忙景象。然而，尽管如此，古老而文明的窆店镇，始终没有改变贫穷与落后的局面，历史上给它留下的是“破街烂镇穷窆店”之称。

往事越千年，今朝巨变。建国五十余年来，全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坚持改革开放，加大科技投入，用自己的胆略、智慧和勤劳，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古镇旧貌变新颜，并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呈现在北京郊区。

现在的窆店镇，总面积66.8平方公里，辖30个自然村，46000口人，粮田面积50000余亩。农业实现

了全过程的机械化和喷灌化,采用先进的栽培技术,粮食产量稳步提高,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水稻和蔬菜,是北京市商品粮基地。全镇共有镇、村企业及中外合资企业 175 家,主要以建筑、建材、电子、化工、机械制造、服装、运输、食品、生物制药等行业为优势,形成了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十业并举。目前,仅镇、村两级企业工业产值就达 4.8 亿,已形成建筑、建材、化工、轻工、商饮,机械制造等几大行业全面发展的格局。先后有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和客商到这里投资办厂,产品远销欧美亚十几个国家和地区,1998 年全镇的外贸出口供货额达 6050 万元,为进一步投资发展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8 年,窦店镇被评为北京市十六个重点乡镇之一,北京市文明镇;1989 年,被评为市农村综合现代化试点镇;国家建设部新农村规划试点。

1986 年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来到窦店镇窦店村参观时高度评价说:“窦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雏形,走的是农村现代化路子。”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中共中央常委宋平、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等领导同志,相继来窦店指导工作。《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农民日报》等均在显著位置刊登消息。

窦店一举成名,窦店村党总支书记仇振亮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窦店村已驰名中外,迄今已接待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

还是这片土地,这片天空,还是那轮日月,那颗星辰。然而,沉睡的土地终于向勤劳、淳朴的窦店人奉献了真情。宽阔的大街,别致的住宅,亮丽的厂房,横贯南北的京深高速公路以及度假村、居民小区等向世人展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

(《房山文史资料》第 16 辑)

燕国故地琉璃河

赵润东

“良乡塔,漫山坡,过了窦店琉璃河。”沿着宽阔平坦的京石公路驱车向南行驶,穿良乡,过窦店,行约 15 公里即有古圣水琉璃河横贯东西,临河南岸里许便是古镇琉璃河镇,镇即由河得名。

琉璃河镇地处北京西南部,北邻汉代名城良乡和古城窦店,南接历史悠久的涿州市,西部山区自然形成天然屏障,东部地区为一马平川的平原。域内既有西周时期燕国都城遗址、规模较大的西周贵族墓葬,又有著名的明代建筑琉璃河古桥和嘉靖年间修建、万历三十七重修的离宫,满汉蒙回等多种民族杂居其间。这里是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心、军事交通的要地,而且是京郊民族融合、集市贸易的繁华重地。

据史书记载,远在周武王灭商以前,这一带就已自然发展成了奴隶制国家——燕,当时为商王朝北方之属。商灭亡之后,燕又臣服于周,召公被分封于燕地,取而代之,遂有了燕国的由来。尔后,燕的势力不断发展强盛,且并吞了周初的另一个封国——蓟。约在西周末或春秋时期,燕又从琉璃河都城迁都于蓟城。到了战国时候,燕国成为战国时期的七雄之一。直至最后被秦所灭,才归属秦朝统一的疆域之内。

一

七十年代初，北京市考古队根据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等村地上文物和地下文物遗存进行了考古挖掘，发掘出古城一座和大量的出土文物。坐落在董家林村的古城址，昔日城墙虽已夷为平地，但地下仍保存着大部墙基及文物。常征先生在《古燕国史探微》一书中写到：“其中城的东北角和西北角保存最好。北城墙全长 829 米，东西二面城墙保留的北段长约 300 米，南城墙及东西二面城墙的南段，由于破坏严重，长度不明。在东西三面城墙外边，发现有 2 米多的护城壕沟。根据城的东比和西北两个城角的方位，以及已知长度，推测城的平面应是方形或长方形。”经考古专家多年考证研究，认定该地应为商周二代古文化遗存，至今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从而也证明《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关于“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的记载是可靠的。

天戈先生在《北京出土文物》一书中写到：“（董家林）古城东南一里的黄土坡村周围，发现了二百多座不同类型的墓葬，奴隶贵族的墓葬占有相当的比例。大型的带有二个或四个墓道的墓葬是只有诸侯才能使用的。……1974 年和 1975 年黄土坡墓地的出土器物中，刻有偃侯铭文的鼎殷、盾饰、戟等已有十一件。重要的是青铜器。”从这些出土文物看，这座古城成为燕国都城以前，已是殷人城堡。如（董鼎）文中涉及了四人，即偃侯、董、大保、太子癸。其中，偃侯是董的君主，大保即太保，也就是召公，因为召公奭一族中任周王太保的只有召公奭一人。太子癸应是太保召公奭的长子或曰元子、太子。

由上述分析得出：董鼎出土于董家林古城东郊的黄土坡，其墓主自是董本人，因为董鼎记载的是董的功业，鼎铭的“偃侯”既与董同世，便当也是董的同辈人。而“偃侯”继位于太子癸，自然便是太子癸的嫡子或长子，召公奭的嫡孙或长孙。这位偃侯继位后居董家林古城，该城当然就是燕国都城。然而，在出土的文物中尚未发现太子癸本人的器物，这说明召公奭北迁其国最初的都城并不在董家林一带。

而最初的都城在于何处？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废涑水县在（易）州北四十里……按，县地即周公封召公于此也。”所谓“废涑水县”，正位于“易州（今易县东南贯城村）北四十二里。”《魏书·地形志》记载：“县境有南北二道城，北周大象二年废并道县入涑县，隋开皇元年于范阳郡置道县，设县治于今定兴县，更置范阳县于今涑水城。六年改范阳县为固安县，移县治于两汉之固安城，辖今涑易两县地。八年废固安县，十年复置，移县城于永阳城，即名永阳县。十六年分置易县，改永阳县为涑水县。十八年迁涑水县治于曹魏道县故城，即今之涑水县城。自此以后一千三百九十余年大致未变。由此可见，最初的燕国都城应在涑易之间。”

琉璃河一带本是北方殷人的中心地域，殷人城堡甚多。在考古发掘中，古城遗址的夯土城垣之下，发现压有商代墓葬，说明燕国的这座都城是扩建殷人的古城而成的。

二

历史上的琉璃河又名刘李河。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良乡）“四十里琉璃河镇，亦名刘李镇，又约燕谷店，把总住焉，有铺。”“琉璃河，即古圣水。”圣水，即今大石河，历史上也叫六里河，发源于京西房山百花山西麓，经霞云岭、佛子庄、河北庄、磁家务，沿山诸泉到坨里出山，过平原到县城东南琉璃河镇，又称至涑县码头镇南注入拒马河，全长 129 公里。圣水之名最早见于东汉末期桑钦撰著的《水经》一书，“圣水出上谷”。而周代成书的《山经》之“北次三经”则称之为“燕水”，曰：“燕山，多婴石，燕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山经》之“河”，说得是《禹贡》黄河，水道在今白洋淀大清河一线。注入黄河的燕水是永定河与拒马河之间的一个小水系（今与拒马河水系合），其下游古道在今涑州市、固安、霸县境，古人或以莽牛河当正源，即称全流曰莽牛河，或以刘李河当正源，即称全流曰刘李河。《水经注》以圣水当正源，《山经》

以燕水当正源，故通名其全流曰圣水、曰燕水。

那么，何谓“燕水”呢？所谓燕水之得名是因为该水系流经燕国都城之下，而城内西北部山脉也由此得名称燕山。《水经注》里还有“圣聚”之说，所谓圣聚，是指董家林古城遗址一带。冠以圣聚之名，是由于它濒临圣水。而所说的圣水，又指今之大石河，旧称洄城河、琉璃河、刘李河。

又据《水经注》记载：“广阳水出小广阳西山，东流经广阳故城北，又东福录水注焉。乱流至阳乡右注圣水。”所谓“福录水”即盐沟水。盐沟即今良乡。在西边还有一条水叫茨尾河，在城南注厂“阳水，而广阳水又汇入圣水，即琉璃河。从北魏时期的水道看，广阳水是圣水(即琉璃河)的重要支流。

琉璃河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连通京城，直达津、保，水陆并用，船泊货物的漕运码头。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二十一年(公元前220年)，以秦京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其标准为：“道广五十步(约合69米)，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东通燕、齐，南极吴楚”，咸阳至蓟，途径涿郡、琉璃河。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修筑琉璃河石拱桥，长165.5米，宽10.3米，高8米，其工程之浩大，是可想而知的。《日下旧闻考》记载：“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九月，浚良乡琉璃河，置桥其上，名其桥北曰仙积，南曰永明。”而且修筑二堤，专用条石，中添小桥一座，(俗称一孔桥)，并设水沟八道以杀水势。堤南北西共长五百余丈。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曾重修。清光绪庚寅(1890年)因山洪暴发，冲段桥梁二十余丈，朝廷曾命直督李鸿章派员监修。

《良乡县志》记载：“此水可行船，琉璃河村南开有粮栈、灰栈、煤栈、煤油栈，皆借此水之利。”据有关史料记载：南宋抗元将领文天祥被元军俘后押解元大都，于元至元十六年(1280年)途径琉璃河，曾作《过雪桥琉璃河诗》：“小桥度雪度琉璃，更有清霜滑马蹄。游子衣裳和铁冷，残星荒店乱鸣鸡。”又有《良乡县志》记载德少司空龄诗曰：“白发苍颜老侍臣。又随豹尾踏芳尘。琉璃河畔毵毵柳，应识三朝扈跸人。”又载前人诗曰：“一水澄清澡行浮，垂柳两岸系渔舟。风帆沙鸟天然画，闲少诗人此地游。”“水到村西曲折流，青山环抱白云浮。绿阴深处宜携酒，闲数清溪贾客舟。”

关于水运码头的情景，张克耕先生曾在《房山文史选辑》第五辑《琉璃河旧闻轶事》一文中作过精彩的描述：“卸船的，装船的，日夜不停。每到夜幕降临，沿河两岸几十家煤、灰货栈汽灯高挑，照得满镇通明。劳动号子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等待卸货装船的船只，从琉璃河镇一直排到十里开外的小店河。这些船大都是从天津、保定运来的洋广杂货、食盐、布匹、苇席等。当时黄土坡渡有一个大的过货栈，把运来的货物卸下来，再从琉璃河镇运走煤灰石料……那时，最大的货船有载重十二吨的。为了装完船能顺利驶进正河道，在莽牛河桥设一水闸，待装煤灰的船驶进货场后，把水闸放下，以提高水位，船装满货物，再把水闸提起，货船顺流而下，驶进正河道。如此驶进驶出，日夜不停。”

段天顺先生在《燕水古今谈》中说：“南宋孝宗淳熙年间范成大奉使到金国，这位从南宋来的外交官，路过琉璃河，从桥上惊奇的看到了鸳鸯戏水的场景，实在是喜出望外，他写到：‘琉璃河又名刘李河，在涿州北三十里，水极清此，茂林环之，尤多鸳鸯，千百成群。’并作诗道：‘烟林葱茜带回塘，桥影惊人入睡乡；陡起褰帷揩病眼，琉璃河上看鸳鸯。’”

当年，琉璃河镇商贸繁华，煤厂、灰厂鳞次栉比，驮运煤、灰、石的骡子骆驼、驴马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店铺林立，贾客云集；河上行船，昼夜穿梭，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夜幕降临，汽灯高照，满镇通明，行人不息。真可谓车水马龙，人喊马嘶，一派繁忙景象。据《良乡县志》记载，民国十年左右，琉璃河有“粮商十八家、布商八家、油商五家、药商六家、木厂五家、石厂三家、铁厂二家、煤商十六家、首饰行三家、煤油行一家、瓷器行一家、染商三家、杂货行六家、席绳行二家、过货栈四家、烧锅一家、盐店一家、茶叶行一家。”当年琉璃河镇的商业税收是良乡城和窦店镇两地商业税收的总合，可见经济兴盛和贸易繁华之景象。

这座历史悠久的名镇也曾遭到劫难。清朝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冲出北京进攻保定，途径琉璃河，将古建离宫及周围文物抢烧精光。至民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入侵中国，琉璃河一带很快也被沦陷。日本鬼子在大石桥南端修筑了上下两层炮楼，由日伪军日夜把守。凡由此过往的行人均遭到盘查勒索。

一处古今交通的要道，很快就成了日伪军队敲诈发财的“宝地”。据当地老人讲，当时这里驻守一个连的兵力，人称“石头军”。来往行人一旦被抓进炮楼，便十有八九被搜尽钱物，然后割掉舌头，背缚大石，趁夜沉入河底。当时流传着歌谣：“宁挨十天饿，不从琉璃河过；宁吃十天乔麦皮，不赶琉璃河集。”

由于连年战火，国无宁日，百姓始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诗为证：

意气相争各不平，畿南百里起连营。
军书傍午飞驰急，炮火通宵胜负明。
十室九空嗟避乱，三年两次慨遭兵。
至今凭吊琉璃水，仿佛独闻鼓角声。

莽莽乾坤是太和，神州空有旧山河。
人怀往日推恩主，谁扫中原混生魔。
忍使群黎齐破产，那堪同室屡操戈。
民心厌乱如斯极。未卜苍天意若何。

三

新中国成立后，琉璃河镇的经济建设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农工商企以及非公经济等全面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镇经济发展迅速，两个文明建设明显提高。该镇于1961年建立人民公社，1981年3月改为琉璃河乡，1990年3月成立琉璃河地区办事处，2001年2月建立琉璃河镇，2002年1月撤乡并镇与窑上乡和东南召乡合并为琉璃河镇。现在，琉璃河镇，地域广阔，东连大兴区，西接韩村河镇，北与窦店镇接壤，南邻河北省涿州市码头地区，其土地总面积109平方公里，有47个行政村，散居着汉、满、蒙、回等11个民族，61000口人，拥有耕地面积77652亩。境内有大石河，牯牛河、泇括河；京石高速公路、107国道、京广铁路纵横全境以及客货火车站各一座，交通十分方便。

据统计，琉璃河镇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39104万元，农村经济经营收入115243万元。乡镇企业677家，从业人员11167人，主要包括建筑、建材、化工、造纸、交通运输、饮食等。其中房建集团三公司和燕疏工程公司为“国家一级建筑企业。”兴河造纸厂生产的“金字”牌餐、面巾纸、卫生纸、和编织纸、在全市乃至全国享有较高声誉。琉璃河劳保用品厂的“盾”牌安全帽被国家劳动部评为“全国劳动防护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唯一监制产品”，产品行销全国。该镇境内有中央、市、区属企事业单位17家，其中有国家大型企业——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随着城镇建设的不断发展，1996年该镇建设总体规划经首都规划委员会批准，确定了中心镇的地位。2000年10月，被市政府确定为全市33个重点建设的中心镇之一。

如今的琉璃河镇，旧貌变新颜。境内著名的三处古迹：琉璃河商周遗址于1979年公布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琉璃河大石桥于1984年5月公布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创建、清代重修的岫云观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城改造后，宽阔平坦的柏油路贯穿南北，成为首都的南大门。交通方便，地利人和，地理优势得天独厚。仿古建筑，古香古色。商贸市场更加繁荣，生活日用品琳琅满目。过往车辆，井然有序。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的新气象。

参考书目:

- | | |
|-------------------|-----------|
| 1、《良乡县志》 | 民国十三年本 |
| 2、《房山县志》 | 民国十七年本 |
| 3、《房山区志》 | 北京出版社 |
| 4、《中国古都研究》 | 中国书店出版社 |
| 5、《日下旧闻考》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 6、《古燕国史探微》 | 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 |
| 7、《考古》(1992. 8) | 科学出版社出版 |
| 8、《北京文博》(1995. 1) |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云居别所香树庵

张玉泉

香树庵，座落在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西南，云居寺北侧的卧虎山脚下，原属云居寺别所。寺庵坐西朝东，依山傍水，景色秀丽宜人。山门高耸，灰筒瓦调大脊，歇山顶无梁殿，前檐为汉白玉发券过堂门，嵌着青石板匾额，刻有楷书“古刹香树庵”。山门两侧各有旁门，平日只开一侧。庵内有两进院，山门后为一进院，过道两则有南北房各三间。进二道门，登上六级石阶进入二进院。该院为三合房，两侧为正殿，属明三暗五间，供奉释迦佛等。南北各三间房，为僧用房。

据《白带山志》载：香树庵，唐代称梦堂庵，是梦堂大师的居住之地。因当时院内香椿树多而茂密，又称香椿林。庵的后面原有一单层小方石塔，高约1.5米，上端四面设有佛龛，龛内佛像完好。此塔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移到云居寺北塔的西侧，保存完好。

据清康熙十一年《重修石经山香树庵碑记》载：“山之西胁有庵，曰梦堂，乃琬公刻经之所也。其后琬公刻涅槃经成，其夜山吼数声，地涌香树三十余株，故额曰香庵。”

香树庵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各代，有千余载，或兴或废，代亦有之。明万历以前此庵已废，卖给私人郭公所有。后明万历20年(1592年)间，著名僧人达观损钵费赎回。后又置下粮产一处，共五百亩，以供香火钱，使庵重振。后又有明神宗之母慈圣皇后及黄、王二太史捐资，恢复旧观。数十年后，香树继传到一个叫石壁的僧人之手，他偷偷卖掉这个粮田，弃庵而逃，庵即废弃。后该庵收归涿州胡良延寿寺代管。至清康熙四年(元公1664年)秋，唐县有个名叫纯白大师的僧人，在涿州南关药王禅院讲经，经该院住持含公介绍他到香树庵任方丈。纯白同意后，到香树庵，“欣然敷座，乐面忘归”，曰：“吾得此庵，其志足矣”，从此纯白继续修膳此庵。先建起五间禅房，又建起佛殿、僧房、山门、墙垣等。后来又辟荒地二十余亩为水田，果树千余棵，康熙十一年香树庵重修竣工。并于当年五月二十九日举行百余名弟子参加的开庵仪式(见《香树庵记》)。继纯白大师之后，时至雍正正末年，不知何因，庵又遭毁坏。至乾隆二二年(1737年)时隔

六十年之后，又进行重修。曾有碑刻(时任主持僧人叫法智。碑文由房邑庠生梅子蕃撰写)，此碑现已无存。

至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香树庵又重新沦为私人宅地。是年由一位法名真善的再次捐资赎回庵址。由山西汾阳县冀村镇张隆太出资，按照香树庵原有规制重新修建而成，庵院及佛像焕然一新。二人愿将此庵正式列入云居寺的别所。从此结束了香树庵自立山门的历史。当时云居寺住持为广泰、空利。香树庵由此再度兴盛，见《香树庵原置重修二善信碑记》。由此，可以看出二位善人的良苦用心。修复后，正式列入云居寺别所，统一管理，以防再次沦为私产，再遭破坏。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天灾兵患，连云居寺也难免于难。

1931年，因云居寺抗交地税被罚义务办学三年。学校就设在香树庵三间北房中，学生亲自下庄、水头、三岔三个村一个班约四、五十个学生，教师由河北易县聘请，教室的桌椅及其它设备都由云居寺准备。所学课程是“三字经”、“百家姓”以及算术等。每天上四节课，午饭自带。每村出一人负责学校管理。当时庵里有两个尼姑，照常做佛事活动，彼此互不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庵里的两位八十多岁的尼姑，一个叫门长真善，另一个叫李真修，安全没了保证，逃往了天津，香树庵又没有了主人。1940年日军扫荡平西抗日根据地时，几乎把水头村的所有民房烧光了。香树庵也未能幸免，铜佛以及庵中珍贵的法器全部失落了，香树庵最终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香树庵，仅存小部分遗迹，解放初期后在土改中分给了农民(现正殿的遗址上仍存私人住房4间)。院内柱基、山门的条石、二门的门柱等还依稀可见。

令人欣慰的是，一通康熙十一年(1672)的《重修石经山香树庵庵记碑》的石碑还竖立在杂草中。另一通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6年)《香树庵原置重修二善碑记》的字迹也清晰可识。这是古刹香树庵自建成以来或兴或废的最有力的见证。

附：

香树庵原置重修二善信碑记

盖闻须达布金起居，供说法之天；只陀施树覆荫，示修因之地，斯给狐独园之所由来也。兹有云居之北，有古刹香树庵，历年久远，风雨飘摇，有信女宗室赵门张氏法名真善者，常于云居作诸功德，偶经其处，目击心伤，遂出己资，售斯旧址。又有山西汾州府汾阳县冀村镇善人，今寄居永清县南关镇信士张隆太，自捐己资，发心重修。今当大工告竣，佛像庄严，焕然一新，二善情愿供为云居别所，此其功德无量无边。又经言：香树者，过上方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国名众香，佛号香积，现今在香树下说法，其中楼台池榭以及人天供养，皆以香气而作佛事。有诸天予，同号香严，在香树下共听香积如来说法，闻斯香者，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直至菩提，乃消斯庵之香气称，其亦有见于此而立耶？若然，则置址重修，谓之只园后学亦可，即谓之众香有分，亦无不不可。余喜其众香国土依正庄严复现于兹山也，将必有香严诸亦天听法于此者乎？其功德可胜言哉！故乐而为之记。

香树庵系道光八年山西汾州府汾阳县冀村镇张隆太重修
二年宗室赵门张氏法名真善置
功德无量
八年山汾阳县冀村镇张隆太重修
云居寺住持广泰氏空利刻石
后学比五慈海氏普济撰书
太清道光十五年岁次乙未夏六月谷旦立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也谈孤山口村的来历

戴家斌

案头上放着一本《房山文史选辑》(第一辑),里面有一篇赵润东同志撰写的“上方山拾零”的文章(以下简称“赵文”),研读以后,感到有些论断不太确切。现仅就我所知道的一点史实谈谈有关孤山口村的来历问题,以求教于赵润东并一切关心房山历史的同志们。

关于孤山口村的来历,就我所知,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依据的文字。但据“赵文”分析,孤山口村名,是因一个叫园银的和尚创建普济禅寺而得名的,其根据就是孤山口村北的一块石碑。赵润东同志勤奋好学,工作之余,探访名胜,搜集、整理成文,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他在叙述史实时,没有引用原碑文,而且在行文中,似乎对原碑文的标点、解释上都有不太准确的地方,因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曾因工作关系抄录了普济寺石碑。碑文并不长,现将原文抄录于后,以便对照。对于“赵文”中标点,解释上的错误,恕不一一指出更正。

石碑的背面:“普济开山墓志”。正面:“示寂普济堂上开山第一代银公孤山和尚之铭”。碑文全文如下:

孤山大师,俗姓李氏,讳进寿。生于武清,少侍内庭银作局^①,管理公务之余,留心内典^②;颇于佛法相应。于是遍游南海诸名山,历参知识。至少林,遇道公无言和尚,机缘契合,道公乃为披剃,更名园银,乃临济嫡派也^③。居数时,归隐房山之上方山,搆(构)朝阳庵,结静侣以尽礼诵。又念山道迢遥,行者艰辛,乃募化四方,于上方山之东南十五里许,村名孤山口,创建普济禅寺。殿阁崔嵬,金碧晃曜,供佛饭僧,诚为福田之所。劳者得安,行者得息,便利往回,果称第一。因是大师乃地名号孤山者,以铭其志耳。当斯之时,四众依以提挈,一方赖以时晷,乃于万历庚申岁正月十一日示寂焉。徒等追忆大师操履精严,法乳情至,依浮屠法,择吉卜地,瘞骨于寺之西北隅,仍以纪其时日于石表,方坟于岸端,以传不朽云尔。

由以上所引碑文中得知:1、孤山和尚俗名李进寿,今河北省武清县人。2、李进寿年青时曾在皇宫银作局作过工匠,后来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出家,法号园银。3、归隐房山上方山朝阳庵时,念上方山“山道迢遥,行者艰辛”,中途无歇息之地,于是在孤山口村外建普济寺,并因此将法号园银改作孤山,以铭其志。4、园银和尚死于万历庚申年(公元1620年),葬在普济寺之“西北隅”,普济寺踏徒众尊他为“普济堂上开山第一代银公孤山和尚”。很显然,这里并没有如“赵文”所说的“将此地命名为孤山口”的意思而恰恰相反,是园银和尚因孤山口村名而改法号为“孤山”。也就是说,孤山口村的存在早在孤山和尚创建普济禅寺之前。这从其它的史料中也得到证实。

明代学者曹学佺在《游房山记》中说:“万历己亥正月……出城行六十里,所过村落,曰瓦井、曰天开、曰孤山口……查万历己亥年为公元1599年,此时较孤山和尚死时的万历庚申年(公元1620年)早21年。又据清代《国门近游录》一书记载:“孤山普济寺、欢喜台、接待庵、上方兜率院,皆万历初太监冯保修筑,各有碑。”我们从近年房山文化文物局组织的文物普查时发现的有关石碑中,得知冯保修筑上方山诸寺院为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此时又距孤山和尚死时的万历庚申年早44年。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普济寺既为孤山和尚创建,又怎么会有万历初太监冯保修的记载呢?查一下《明史》,知道冯保为万历初的大太监,他的官衔全称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提督两司房掌司礼监事监掌御用监印总提督礼仪房太监。”这

些权势极大的头衔，使得他在朝中专横拔扈，连神宗皇帝要办的事，没有他的允许都办不成^④。《房山县志》上也记载过他向明神宗“推荐”官吏的史实。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曾在皇宫作过工匠的园银和尚募化创建普济寺时，冯保施加过影响，资助过钱财（包括资助过上方山修云梯、兜率寺、接待庵等寺院），所以在孤山和尚的墓志铭上注明普济寺是孤山和尚“募化”“创建”，是“开山第一代”住持，而冯保只注明“修筑”了包括普济寺在内的上方山诸寺院，并无“创建”的字样。又由此推断，孤山和尚“创建”，大太监冯保资助“修筑”普济寺当在明神宗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

又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孤山口在房山县南五十里，涿、易二州分路处。宋雍熙三年，李继宣战契丹于拒马河上，追至孤山口，契丹引去。”又据《宋史》记载：“端拱二年，将讨燕蓟，诏群臣各言边事。……宋琪疏上，谓：循孤山之北，涑水以西，挟山而行，援粮而进，陟涑水，并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则东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⑤。”

本文无意研究宋、辽战争史，但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辽在距马河大战，辽军被宋军追至孤山口向北败走。过了三年，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宋太宗召集群臣商量征讨辽军事宜，吏部尚书宋琪出谋，让宋军沿孤山口北上，征讨辽军（宋琪是幽州人，对房山的地理是十分熟悉的）。这两条史料，一方面如“赵文”所说，证明“孤山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古战场”。而另一方面，不也证明了孤山口村早在宋太宗时就已存在吗？奇怪的是赵润东同志在引用了宋雍熙三年宋辽大战于拒马河畔，追至孤山口的史实后，紧接着引用孤山和尚墓志铭，最后得出孤山口是由明神宗万历年间“由孤山大师所创造”的结论。要知道宋太宗与明神宗之间相距六百三十多年！这种相互矛盾的论证方法，让人感到不可理解。

那么，孤山口村名到底始于何时，又因何而得名？笔者才疏，不敢妄断。但它至少在宋太宗时就已存在，这是有史可查的。孤山口村决不是在明神宗时由园银和尚创建普济禅寺而得名，本文也只想说明这一点，如此而已。再噜嗦一句，本人才疏学浅，行文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得到批评指出。

注：

①明代分设内官十二监、四司、八司，共二十四个衙门，统管宫内事务。官员多由宦官充任。银行局由掌印太监管理，专门负责打造宫廷内所需金银器皿和首饰（《明史》）。

②内典为佛教专用名词。佛教徒称佛教典籍为内典，其它典籍均为外典。

③临济嫡宗为中国佛教禅宗教派中的一支重要流派。佛教禅宗派以《楞伽经》和《金刚般若》为其经典，以修习禅定（俗称参禅静坐）为其修行方法。它是我国流行最为广泛的一支教派。（赵朴初《中国佛教问答》）

④“冯保、深州人，嘉靖中，为司礼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保倚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之”，“后保益横肆，即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明史》）。

⑤宋琪字叔宝，幽州蓟人。端拱初，……以旧相进位吏部尚书（《宋史》）。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关于金陵的几个问题

王德恒

肖智同志的《北京的金陵》在《房山文史选辑》上连载,读后受益非浅。我是从1980年起开始对金陵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先后写了《金陵初探》(北京史研究会结集出版)、《金陵通考》(辽宁《社会科学辑刊》)、《金帝陵述略》(发于法国、德国出版的《欧华学报》)。1986年起,我参加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课题组,直接对金陵进行了调查试掘。

1989年我应中国城市出版社之约撰写了《北京的皇陵与王坟》一书,金陵自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章。此书写作过程中,金陵一章中承蒙肖智同志提供许多资料,我在此书后记里表示了真挚谢意。

然而,《北京的金陵》一文,读后我还是觉得有些问题没有说清,下面试举几例:

金兀术坟

金朝自始祖函普超,有封号的皇帝共二十四个,但哪个也没有金兀术这个王爷有名声。这是由于小说和民间传说影响所致。在坟庄、栗园、车厂、龙门口乃至整个燕房地区民间,一直把金太祖陵一带呼为金兀术坟。那么,金兀术坟到底在不在金陵区内,肖文没有涉及。实际上,回答是肯定的,金兀术坟就在金陵区内。笔者曾撰文《金兀术的坟在哪里?》(载于《燕山石化报》1990年2月13日)考证金海陵王完颜亮在筑陵之初,迁葬“祖宗(完颜阿骨打)、父(完颜宗干)和叔葬于大房山龙衔寺寺基之上”,这个“叔”就是金兀术。也就是说他是随同太祖一起入葬房山金陵的。但确切位置在什么地方呢?根据踏察和史料分析应是在太祖陵西的那座山的“鎬塔”之下。所谓“鎬塔”就是抗金名将牛皋之塔。明朝天启年间毁金陵时,在各帝陵上都是修筑帝庙以“压胜”的,太祖、章宗陵址上都有关庙遗址。而此地独出现了一座皋塔,这是因为自明朝以来便传说金兀术是死在牛皋手中的,即所谓“气死兀术,笑死牛皋”的故事。所以,明朝才在金兀术坟上修筑鎬塔压胜。现鎬塔遗址尚有二米高的塔基,呈正方形,全是明代的大青砖垒砌成的,已成为陵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

瑞云宫

肖文认为瑞云宫“今已踪迹全无”,不确。1981年我去太祖陵考察,正逢当地农民将瑞云宫的宫碑向西搬迁,按县志记“瑞云宫在太祖陵侧,遗址仅存”。瑞云宫宫碑所在地便是瑞云宫所在地,临近太祖陵。后来,在文物普查中房山文物管理所将此碑搬运回了文管所保存。我以前写的论文中对金陵几个陵址尤其是太祖陵陵址的确定,此碑是立论根据之一。宫碑现还完整,承蒙文管所薛宝华副所长为我捶拓托纸。碑文如下:

钦授瑞云宫

祖师灵阳真人门下宗京,都提点受洞微,崇真礼录?大师王道通仙茔。

以前人们往往以为瑞云宫是一与太祖陵有关的建筑,其实不然,而是道士的坟墓。

金代佛道并崇,在丹鼎、符篆两派之外,又新创全真教。全真教的创始人王喆,曾考中金朝的甲科武举,后在终南山弃家立教,号重阳子。他收马钰(号丹阳子)、谭处端(号长真子)、刘处玄(号长生子)、邱处机(号

长春子)、王处一(号玉阳子)、郝大通(号广宁太古真人)、孙不二(号清静散人)七人为弟子,创立了全真教,后世称七弟子为道教七真人。“灵阳真人”当是七真人同时代同辈份人,王道通应是晚一辈的道士。金世宗时期在京城多设道教宫观,召道士讲法传教,邱处机、王处一、刘德仁都曾应召。估计王道通也是当时应召的道士,传教得法,死后才能在太祖陵侧择地立墓,并被“钦授瑞云宫。”

章宗陵

肖文认为“章宗是全始终的皇帝,死后,直接葬在大房山,地下墓葬可能没遭到破坏。”

此说不确。章宗陵名为道陵,他入葬后的第十八年,元蒙古据北京,金陵一度被盗掘捣毁,连地宫也挖开了,取出了随葬的珍宝。据宋朝周密所写的《云烟过眼录》记载,宋徽宗时曾设“百琴堂”其中称最之琴为“春雷琴”,后被金人南下掠得,“章宗挟之以殉葬,凡十八复出人间”,按此记载,如果章宗墓未被盗掘,春雷琴是不会复出人间的。

元蒙在中国的统治稳定之后,便奉金为正朔,可能重修了一下金陵。“道陵夕照”便列为北京的“八景”之一。元代散曲《鹦鹉曲》咏“燕南八景”曰:

卢沟清绝霜晨住,步落月问倚阑父。
蓟门东直下金台,仰看楼台飞雨。

道陵前夕照苍茫,叠翠望居庸去。
玉泉一派西山,太液畔秋风紧处。

原来“金台夕照”一景是叫作“蓟门金台”的,“道陵夕照”自成一景,后因明末对金陵大规模破坏,道陵亦遭浩劫,此景不存,“夕照”二字才被挪于“金台”。

太宗陵

肖文认为金太宗陵葬址基本上是在现在燕化东炼厂所在,石棺出土。这点存疑。

1971年,东炼厂施工取土,发现了五个汉白玉石棺,都是盗劫之余,其中一个石棺内有一鎏金银面具,即银胎鎏金。厚度1.5毫米,通长31厘米(面部25厘米、脖长6厘米),最宽处22.2厘米,制作精良逼真。耳垂和耳部,上边各有一个小圆孔,是系带之用。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死者脸上戴面具,是契丹(辽)贵族特有的葬俗。《虏廷事实》载辽葬俗:“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这种面具在内蒙、辽宁等地的辽墓中均有发现。此面具在金陵区内发现是一个谜。按金太祖、太宗陵所在的坟山一带,原是辽廷的栗园,由贵族充任栗园吏。辽代文学家萧寒家奴就曾任过栗园吏之职,所以不排除在栗园一带也有辽代墓葬的可能性。

还有一些其它疑点和可商榷之处,限于篇幅,就此止笔。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房山区的三座清真寺

张宝贵 李增录

据我们所知,我区现有三座清真寺。这三座清真寺是良乡常庄村的常庄清真寺、窦店乡窦店村的窦店清真寺、周口店乡新街村的新街清真寺。清真寺冠以地名称谓是习惯叫法,也别有命名的。如:广州的怀圣寺又叫光塔寺,杭州的真教寺又叫凤凰寺,建筑最早的泉州清真寺叫清洋寺又叫麒麟寺,又如国外著名的清真寺,麦加城的清真寺叫“禁寺”,为纪念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而建的清真寺叫“先知寺”。我区的这三座清真寺都冠以地名而称之。

我区的这三座清真寺,分别座落在三个乡,地理位置呈三角形,基本上覆盖了居住在我区的一万一千多口回族人民。大分散、小集中是我国回族人民分布的特点。清真寺是随着回族人民生活聚集区的形成而建的,我区也是如此。每座清真寺所在地都是回民聚集区。众所周知,常庄是回民村,窦店村和葫街村的回民人口都各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常庄清真寺是我区保存最完好的一座清真古寺。寺门,影壁,礼拜殿建在一条轴线上。寺院内砖石砌铺小路,松树翠绿挺拔。寺院占地面积不下八百平方米,是一座长宽比为十比八的矩形。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有两种建筑风格,一种是阿拉伯式的,一种是中国宫殿式的。这座寺的礼拜殿是中国宫殿式的,或者称殿堂样式。它进深三间,面阔三间,接近边长为12米的正方形。中国宫殿式的建筑一般都有廊,“步檐谓之廊。”宫殿、寺观、王府宅居、坛、庙等,都建前廊,有的还建后廊,以示壮观。常庄清真寺的礼拜殿有前檐廊,出檐约有一米。殿的明间宽、次间窄。明间开木门两扇,次间装木窗。门、窗直棂均完好,殿内梁架、檐部斗拱,衔接如初。礼拜殿在外观上只有一处让人感到痛心,就是礼拜殿的正脊垂脊上的琉璃脊兽全没了,只留下破楂斑痕、光秃秃甚为难看,大煞寺院景观。当地的老人说,那都是“破四旧”的年头给凿去了。这座寺的创建,当地有种种传说。有的老人讲,是常遇春、胡大海给修的。据历史记载,常遇春确系回族人,且是明朝开国元勋。跟朱元璋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常遇春确曾建过一座清真寺,但那是北京花寺清真寺,这座寺内还保存着刻字铭记的石碑。如果常遇春也建了常庄清真寺,不会没有碑碣之类记载。但确无文献史料可供查证,当地还有这么一个传说,清朝在易县建西陵时,有两个官员,一个要截留木料建清真寺,另一个不肯。两个人最后默契,另一个官员也截留一些木料,用于建庙。原来的炒米店庙就是和常庄清真寺一同建的。传说毕竟是传说,唯一可供今人考证的还是原来挂在礼拜殿门上的一块匾。匾上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清虚妙境”至今还留在许多老年人的记忆里。匾的落款是“乾隆”二字。关于匾的传说已是记忆的再现,这是我们了解清真寺建筑时间唯一可追溯的线索。清朝在易县建西陵是雍正帝八年。乾隆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八年)在房山境内大兴土木,同时建筑了“黄辛庄行宫”、“半壁店行宫”。乾隆帝又曾两次到房山犒劳凯旋将士。这都是在史志上有记载的。所以,关于常庄清真寺建筑的后两种传说还是有历史背景的。可以确定是乾隆年间所建。但因乾隆在位六十年,具体年份还需继续查考。寺院内的南、北讲堂、浴室是后建的。值得敬佩的是,常庄村人民在1987年集资维修、粉刷了礼拜殿、讲堂,使这座古建筑焕然一新。常庄村回族人民为保护伊斯兰教古建筑,保护文物古迹,齐心协力作出了贡献。这也是我们党和政府所号召的。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就发出了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的规定。常庄村人民这样做了,使我们区的这座古寺免受损失、破坏,国家财产得到了保护。

在常庄清真寺的西南，相距 30 华里，就是窰店清真寺。

窰店清真寺是三座寺中最大的一座，占地近九百平方米。原为两进院落，现在是一个大院。院内以礼拜殿为主体，其它房群是南讲堂、北讲堂、浴室、办公室、仓库等。礼拜殿的建筑风格、建筑结构和常庄清真寺基本相同，属中国宫殿式，只是面积稍大些。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这座殿已是梁架脱节，墙体开裂，柱基下沉，殿顶透天摇摇欲坠了。从“共产风”刮进寺院，清真寺成了马厩、鸡场到“浩劫”年代，清真寺的遭遇就更痛苦了。天灾人祸，年年失修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只有陈旧的被淘汰的农具堆弃在这里。这座礼拜殿唯一可供欣赏的是一块碣石。碣石镶嵌在前檐下北山墙内侧距地面两米高处。碣石字迹工整，清晰可认。碣文其中一段记述了关于窰店清真寺的创建。现抄录如下：康熙“五十二年春，二月间，谁不料有西安府羊行一客住歇本街史家店中，人品苍苍，身矮目秀，似疯不疯。呆不多时，遂后有家下一人找到店内，喜报爷知：自爷起身后三日，家内大娘产一婴儿。大娘唤吾，迅速赶上，老爹速说、急信速回。当人听话在耳，定事在心。敌面(故而)竟托店东请本处掌教，再请年尊老者几位议话。时至二更，丁杨古沙四人齐至客前，会坐已定。来客先言，我弟马俊举意已定，留银五十两□□□□，我劳列位苦苦兴心写化阎教，顺心人等，盖寺开学。”从这一段碣文可以看出，窰店清真寺是一位西安羊行客商马俊因生子得喜而捐款倡议兴建的。碣文还记录了丁、杨、古、沙四人受托之后，又四处奔走募捐银两、组织人力施工情况，恕不一一抄录。窰店村委会于 1988 年重建了南、北讲堂，又聘请了阿訇，现已把修建礼拜殿纳入村的发展规划。

在窰店村以西大约 30 华里是新街清真寺。这是一座处处展新容的建筑。1989 年 5 月新街村委会对新街清真寺进行修建。修建前，寺院内有礼拜殿和南、北讲堂、浴室等十几间房。礼拜殿和现在的窰店清真寺礼拜殿一样破乱不堪。这次修建采用了两种建筑形式。平面布局紧凑，内外格局别致。寺院申三个院落组成，共占地 685 平方米，比常庄寺、窰店寺都小。一个院是望月楼，供开斋望月用；帮克楼又称宣礼楼，供呼唤礼拜用；殿亭、商店门市部。一个院是浴室、锅炉房。一个院是礼拜殿、南、北讲堂。寺院内房群共三十间。礼拜殿恢复了原来样式，面积大约 60 平方米，比常庄清真寺的礼拜殿几乎小一半。礼拜殿平面成凸形、进深二间，面阔二间，殿西端为后窑殿。殿内地毯全铺，地毯是伊斯兰教很讲究的绿色，显得满殿生辉。由于殿的南、北硬山各开圆窗一孔，采光充足，光线柔和。由于修建中注意吸收了阿拉伯式的园顶建筑艺术和尖塔式建筑艺术，使这座清真寺院更是古朴又具新意。登上望月楼便一览新街全貌。寺院内两棵古柏、两株新松、装饰得寺院肃穆清静。但这么好的一座清真寺，却一度遭浩劫。从 1956 年开始，清真寺就被占用，办食堂、大队办公、开绣花厂等。损失最大的是“文革”期间，古瓷香炉被砸成碎片，石碑被推倒，至今下落不明。刻有“真主无二”的大匾被毁作案板。特别令人痛心惋惜的是，清真寺原珍藏几代供阿訇传阅的三十本木本古兰经被红卫兵一场火化为灰烬。二十四间房屋几经占用、拆毁只残存十四间了。匾石、匾额、经卷、名瓷等寺院珍品被毁被焚，又要我们凭啥去重新考证这座清真寺是否创建于康熙年间？

为更好的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新街村不仅修建了清真寺，还聘请了政协委员沙志云为清真寺阿訇。村里的回族人民感激的说：我们多年的愿望实现了，还是共产党好。

（《房山文史资料》第 3 辑）

作者李增录系区政协四届委员、区政协办公室副主任